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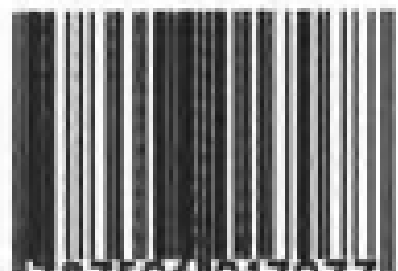
郑超麟 著

(内部发行 仅供研究)



《邓超群回忆录》，作者邓超群，早年参加中共，1923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上海地委委员，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29年因参加党内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他是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前被蒋介石政权两次逮捕，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监禁。1979年出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本书回忆录部分写于1945年；《陈独秀与托派》写于1960年。本书对中共早期领导人及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亲历资料。

ISBN 7-5060-1707-5



9 787506 017077 >

ISBN 7-5060-1707-5

定价：100.00元(上、下卷)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上）

郑超麟 著
范 用 编

东方出版社



郑超麟 1991年秋



郑超麟在卧室里



郑超麟与曾孙女毛毛在一起



耶超麟一家人



1979年耶超麟与刘静贞
在上海南汇周浦劳动玻璃厂



“少年共产党”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留影（一九三三年）

- 后排左起：1.王凌汉 2.××× 3.于耀中 4.任卓宣 5.胡仲 6.吴琪 7.尹宽 8.周维祺
 9.薛世纶 10.周恩来 11.江泽巍 12.董朴生 13.林蔚 14.任泽楷 15.×××
- 中排左起：1.赵光宸 2.张增益 3.刘伯坚 4.蔡支华 5.××× 6.穆清 7.王仁达 8.秦治谷
 9.××× 10.××× 11.王千翼 12.袁千武
- 前排左起：1.高凤 2.赵世炎 3.××× 4.郑超麟 5.余立亚 6.陈存年 7.袁庆云 8.陈延年
 9.××× 10.陈九畴 11.王若飞 12.××× 13.刘伯庄 14.杨介人

出版说明

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社有计划地翻译或翻印了少量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有关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著述及资料,主要有《中共50年》(王明)、《我的回忆》(张国焘)、《双山回忆录》(王凡西)、《中国纪事》[李德]等等。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内部),有控制范围地供有关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考,对现代史和党史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不少专家反映,这些人的回忆录,虽然囿于其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及当时的历史原因,都有不少歪曲史实、吹嘘自己、攻击他人的内容,但毕竟是亲历、亲闻、亲见,可以使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使研究者更加深入细致地去考察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罕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是其中的一种。作者郑超麟,早年参加中共,1923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上海地委委员、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29年因参加党内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他是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前被蒋介石政权两次逮捕,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监禁。1979年出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作者在20世纪40年代和晚年撰写的个人回忆,叙述早年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对中共早期领导人及许多重大事件提

供了亲历资料。全书近 100 万字,由范用先生编,分上下册出版。

东方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三月

前 言

东方出版社为适应广大领导干部与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研究人员需要，将出版《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包括《我的回忆》(张国焘)、《双山回忆录》(王凡西)、《延安日记》([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纪事》([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华夫)、《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美]盛岳)、《苦笑录》(陈公博)、《郑超麟回忆录》(郑超麟)、《中共50年》(王明)。这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我们党历来重视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学习、研究与教育。这不仅要通过正面的、写得比较好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出版物来获得，也需要通过那些即使写得不好、甚至对历史有所歪曲，但毕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那些有影响的出版物来了解。有比较才有鉴别。要认识历史的真实和科学的真理，需要多渠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反面教员的作用，就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史料编刊社曾有计划地翻译或翻印了少量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有关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著述及资料，其中就有上述著作。人们俗称为“灰皮书”。

上述著作，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当时的历史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有不少吹嘘自己、诋毁他人、曲解史实的内容，但毕竟是亲历、亲闻、亲见，只要通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就能够去伪存真，剔芜取菁，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更加深入地去考察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纠正或补充若干历史细节。这些年来，现代史、革

命史和党史的文献与人物的研究者,很重视这些“灰皮书”提及的若干重要史实。在经过分析研究和考证辨伪后,有的甚至成为一些重要著作涉及的某个事情的论据,因而加以采用。就我所知,这套“灰皮书”出版20多年来,还未听说有不赞成在有控制的范围内出版它的,也未见到它有什么不良反映。

历史又过去20多年了,一代新人已成长起来。许多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一批青年学子也在从事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何况我们面临的21世纪,对历史文化信息的需求显著增加,学术界对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已大大深入。许多方面都迫切需要这一类书作为参考资料。面对图书市场的这种需求,东方出版社推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实为应时之举。我祝愿新的“灰皮书”的出版获得成功,并希望进一步解放思想,组织有关力量,出版更多有价值的“稀见”书系。

石仲泉

2003年8月10日

总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3

上 卷

髫龄杂忆	1
回忆录	155
记尹宽	347

下 卷

怀旧集	1
鳞爪集	245
论陈独秀	411
玉尹残集	695
晚年诗词	735
附录一 郑超麟著译书目	743
附录二 生命如此结束	746
附录三 我的太爷爷	749

目 录

鬻龄杂忆

自 序	3
一场民变	5
“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11
“拆城,玉鸣兄!”	16
漳平县的商业资本	25
教育与文化	36
新学堂	45
岁时记	54
我的塾师	76
和春郑家	99
祖父和父亲	113
我的中学生活	129

回忆录(一九一九——一九三一)

自 序	157
一个意识的觉醒	160

十二人	175
K. U. T. V.	184
五卅前后	206
武 汉	239
进潮或退潮?	269
第一次入狱	298
左派反对派	321

记 尹 宽

自 序	349
自明社	352
工学世界社	358
“少年共产党”	378
王 辩	408
左派反对派	426

看
齡
雜
憶

自序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一年，我本人恢复了公民权，各地方的政协也恢复了活动。我第一次知道，漳平县也有一个政协，也开展了活动。于是，离家恰好六十年的我，可以堂而皇之，以上海市政协委员身份同故乡父老联系了。

我像中国古时神话中的丁令威化鹤归乡一样，感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过去从游的师友差不多没有一个在世了，现在在县内活动的，几乎都是我离乡后才出生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师友的后人，他们未见过我的面，只听到人谈我这样一个人，六十年前离家去了。现在我比丁令威的命运好得多，故乡没有人拿弓箭射我，而是欢迎我回家去看看。

漳平县政协也出版《文史资料》期刊，主编者对于解放前后本县发生的事情较熟悉，但对于“光复”前后的事情，则所知甚少，他要我每期写一点当时所见所闻，我答应了。辛亥那年我十一岁（实足年龄只有十岁），离乡那年，我十九岁（实龄十八岁），尚是“垂髫”的年龄，不会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毕竟比今人多知道一些，譬如白头宫女话开元天宝遗事，还是有人要听的，于是我就同意了。

我本来打算如实地记载那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不必加以解释。但写下去渐渐成了“综合的报道”，不但写事实本身，而且写事实的前因后果；再进一步就写成了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生活了。于是，我就不再写，我不应当利用一县的期刊来写个人的事迹，前年写成《我的中学生活》，并没有拿到县政协的期刊上发表。

故乡父老对于我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感到兴趣，

主张出一个单行本，也收入《我的中学生活》一篇，我自然不敢推辞，因此赶写《祖父和父亲》一篇文章，完成了原定的写作计划。

我虽然活了九十六岁，但对于人类毫无贡献可言，是不值得后人去研究的。但难免有人要借我做线索来研究我所处的时代，因之要知道我个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正如我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一样，那么这本书也不妨留作史料，作为《回忆录》的补充，此书的最后一章也恰好可以同《回忆录》的第一章相衔接。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 场 民 变

据说,老年人喜欢回忆,年纪愈老,回忆得愈早。这说法能否成为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一般老年人,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来说,还是适用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应友人劝勉,写了一本回忆录,系从虚龄十九岁离开家乡以后写起的。当时的回忆只追溯到离家时为止,离家以前的经历和见闻就记不起来了,或者认为那些事情不值得去记,更不值得去写。写那本回忆录时到今年恰好四十年,中遭变故,容易回忆往事,渐渐涉及离家以前的事情,尤其最近几年回忆得更多,更远。与四十年前不同,现在我觉得,这些五四运动以前(我恰好是五四运动那年离家的)的事情仍是值得回忆,值得写下来的。因为那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就我个人说),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同后来的时代有很大区别,既然回忆起来了,而且由于联想的作用将有更多事情回到意识中来,那么把这些事情回忆清楚后记下来,不会全无意义的。因此,我决定,从现在起,抽出时间,不按先后,不分门类,把涌现到记忆中的往事分条写出,聊以自娱也好。

以下所记都是出于个人回忆,没有或很少史料可供依据,因此,总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好在我不会把所记当作信史,别人也不会把八旬老人回忆童年见闻视为信史。童年所见,容易记错;童年所闻,除容易记错之外,来源本身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漳平县第一位“知事”,姓卢,是本省永定县人。我忘其名。

今人不满意于辛亥革命,认为革得不彻底。事后,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还不是照样统治着中国？可是现在，七十多年以后，回顾看看，我们不能不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以后彻底的革命，就是从那次不彻底的革命发展下来的。形式上、称谓上的改变，孕育着后来实质上的改变。

例如，“知县”改为“知事”，就是一个改变。明清时，县官的正式称谓是“知某县事”，含有防止滥用职权之意，好像说：皇帝不过派你去搜集某县的“情报”，知道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供朝廷施政之用而已，不是叫你骑在老百姓头上。为了简化，“知某县事”便称为“知县”。同样道理，我们也有“知州”、“知府”。日本官制仿自中国，但因日本似乎只有县一级行政单位，没有州、府、省等级，同样是“知某县事”就可以简称为“知事”了。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与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称为“都督”，“知县”改称为“知事”，而州府二级也撤销了。

又如，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令，这也是一种改革。当时许多县知事是本省人做的。各县绅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读法政学校的学生纷纷活动出来做官。龙岩县就有好几个人做了官，但漳平落后没有人做官。以前本省人只可以在本省做教官（教谕，训导，俗称“老师”），但不能做县官。废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变县官称谓，更受人注意。

卢知事年纪不大，当时约三十岁，似乎不是永定县大绅士，而是清末在福州学法政的，他显然没有做官的经验。上任不久，人家就向他建议同本县绅士合作，自然不是旧派绅士，而是新派即具有新学知识的绅士。于是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就受他聘任，每日进县衙门办公了。我不记得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幕宾？是顾问？是秘书？总之，同过去的“老夫子”一样。当时卢知事的许多措施，据说，就是养奇和少泉二先生出的点子。

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渐渐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实质性的变化发生作用了。

首先,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短时间,真命天子没有出来,群雄割据,争做皇帝,但真命天子终会出来的。正当革命高潮期间,我家书房(今解放南路八十一号)东隔壁一个人家养的老母鸡忽然变成了公鸡,鸡冠变大了,羽毛变红了,天亮前也会高声报晓。这本是生物学上容易解释的事情,但漳平人不能理解,认为是一种灾祸。几天之内,这个人家的大门几乎给人挤倒了,城里的人看了之后乡下的人也跑来看。最后一个测字先生买了去,装在一只木箱内,放在明伦堂前面的大院子,多少钱看一次。老百姓把这件生物变异同当前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成了歌谣,满城传唱:“鸡母变鸡翁(ang),皇帝没头髻(zong,‘头髻’辫子也)。”不说没有皇帝,只说皇帝没有辫子,似乎不是因为当时溥仪尚未退位,而是以没有辫子表示没有皇帝之意。老百姓以为人生下来就有辫子的,当城里剪辫子成为一种风气之后,乡下人表示反抗。一次,我在小船上听一个赶集的乡下人说:城里人要强迫剪“头髻”,我们就不来赶集了。由此可见,乡下农民并不拥护排满兴汉和民主共和。

但“老爹”背后没有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的人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要多少兵派多少兵。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来我们县里做官,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中水门西边几处赌场整天开赌,一个北方人叫做张桂,判了流刑来漳平服刑的,娶妻生子,做了流氓头子,便到远郊一个乡村去开“花会”^①。过去,有时也有人开“花会”,但那是秘密的,城里影响不大。最后,花会头子多半会被捕判刑。所以流传一句话:开花会穿半边红衣(据说重罪犯人是穿

^① 花会,旧社会在很多地区流行过的一种赌博方式。从三十七门中打一门,打中的赢得三十倍的钱。

红衣的)。此次张桂“花会”则是公开的。城里也有不少的“桌子”公开收取赌注,以每日张桂所开“字头”为准。张桂一场兴旺之后,还有李芳场,开设更近,在大菁乡上去一个墓地上,我曾随人去参观。地下围了一班人,中间有一只竹篮,提柄上绳子拴着一个纸卷,几个人收取赌注。半下午开彩,即打开那个纸卷,然后付给中彩人钱。

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粮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书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

但最使卢知事头痛的是私盐贩子。中国的盐向来是国家垄断,售价高出成本好几倍,以此作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收入。名为“官盐”,其实是由商人承包,规定每年缴纳多少钱给国库,官厅则保证盐商的正当收入,主要是取缔私盐。贩卖私盐,判刑很重。漳平和宁洋二县属于一个叫做“平宁帮”的盐商集团的地盘。盐商本人很少露面,主持其事的是一些“师爷”,即现在说的经理。漳平县“盐馆”设在今天第一中学的地方,面临九龙江,下游运来的盐在此入库,然后批发给盐店。盐店不是随便可以开的,要走后门,花钱,买执照。盐馆的“师爷”(经理)和“大爷”(职员)多数是福州人,似乎盐商股东多数是福州人。盐馆虽是商办,但一派官气,称谓已是官气了,那些“师爷”又同知县平起平坐,不仅出入衙门,而且时常在馆内宴请知县、幕宾以及当地绅士。盐馆有个后花园,虽不大,却有亭台、池塘、树木花草。盐馆有很多的钱,义和团前后曾遭一伙强盗抢劫,强盗是从下游坐船来的,抢完坐了船回去。

在清朝,私盐还是有的,否则盐馆不需要勾结官府了,但官府办得很严,敢于犯法的人不多。现在,知县换成知事了,而且是本省人来做知事,没有威风,于是许多人从下游贩私盐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不用说,官盐没有人买了。于是盐馆给卢知事施加压力,卢知事也想振作起来。一

天,杀什么土匪,他亲自去北门外草埔坪(今已建起房屋)监斩,返回城里时就带着杀人余威,跟随几个亲兵和差役,在大街上捉了一部分盐贩子,到衙门里来。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了。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人。我认识此人,家住校场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人赌场,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看见形势不好,便从堂后逃走了。他一个人从四知堂后逃入内宅,再由内宅逃出后门,一直逃到大夫家庙(今已拆建粮油加工厂)附近的养奇先生家里,但养奇先生不在家。恰好一个经常在县里各大家族串门的清客李祖尧,此时也来找养奇先生。他和卢知事认识。他建议带卢知事出东门,去离城五里的东坑躲避,住在陈玉银家。陈玉银是东坑一个大地主的养子,是县立小学甲班第二名毕业生,小学毕业后曾在福州读法政学校,此时在家。玉银是小名,我忘记了他的学名

城里沸腾起来了,好多人聚集在大街上,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多数是普通市民,不知道谁传出消息,说卢知事被李祖尧带出城去了,于是有一部分群众到北门外去包围李祖尧的家,扬言要放火烧掉李家。这件事终于和平解决了,没有放火,没有死人,也没有伤人。只有盐馆一个职员,人呼“柯大爷”的,被群众从家里绑出来游街,随后也就放掉了。

怎样解决呢?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钟知县交卸给卢知事之后,尚未回山东去,在中宪第附近租了一个民房居住。不知是他自告奋勇,还是县里绅士请他出面,总之他来到明伦堂门前的大院子,对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说几句话,自然是有人翻译的。那天我也挤在群众中间看热闹。我听不清楚这个山东老头子说什么话,只觉得群众还是尊重他。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我记得身边有个人高声说:“要把盐价定下来,以后不准涨价。”另一个人说:“要在明伦

堂门口立石碑,把盐价刻在石碑上。”可见至今还是争论盐价问题,而未提出人民和政府相互对立的问题。群众没有组织,上层阶级没有野心家出来利用民变以达到自利的目的,更谈不上有新的意义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发的群众运动转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了。

明伦堂门前大会以后,风潮终于平息了。卢知事从东坑回到城里来,仍旧做他的官,好像未曾发生过这个风潮。几日以后,李祖尧去衙门内宅看他,临走时他带李祖尧去签押房,从那里拿了十块银洋给李祖尧。

养奇先生事后评论说:“这个人太脓包了。你镇静坐在公案后,即使流氓冲到你面前,他们敢对你怎样?”

我未曾亲睹公堂上一幕戏,上面所记亲兵差役镇压不住,群众冲向公案,是听人说的。但有人说,群众一起哄,尚未同差役冲突,卢知事就逃走了。

事后,似乎过了一段时间,厦门一家报纸登载了漳平县发生的这件新闻。我没有看到报纸,养奇先生说,大概是礼拜堂的什么人写的新闻。其实,当时漳平人以及在县城开店的龙岩人时常往返于漳平和厦门之间,他们把这件事情当着故事来传说,为记者所探知,写成新闻的。福建省的档案工作如果做得好,今天仍能找到登载这件新闻的厦门报纸。

以上所记几次提到养奇先生,未曾一次提到少泉先生,我记不起少泉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议论,似乎他那时已不在漳平县了。

“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辛亥革命前后几年，漳平县没有“匪乱”。那时习惯上不说“土匪”，只说“贼”。那是传说的称谓。我少时常听大人说“安溪贼”。抢劫盐馆的贼是安溪来的，从华封上水的货船有时也被拦劫，那也是安溪人干的。感化里（即今溪南），紧邻安溪，据说也有人去安溪合伙。清朝官厅惩治甚严，时常捕杀。在侦查中发现贼中有一头头竟是漳平城里人，名陈茂芝，家住东门，父亲是有身份的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陈茂丰，同我父亲认识，我见过他几次。家里出了一个“贼”，不仅是一家人的耻辱，连全族人也觉得耻辱。太常陈家恰好是全县最大的最显赫的家族。于是，由他的父亲出面，设法把他骗回家来，缚送县衙，不久就被押去北门外草埔坪杀了头。此事轰动全县。我那时年纪很小，没有去看杀头，但听大人不断地谈论此事，所以至今记得。当时死刑只有杀头，枪毙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的。不错，在钟知县任上，我还看见“站笼”，^① 被执行的四个贼，也是安溪人。

地主阶级是同“贼”对立的，即同农民阶级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斗争方式相对立的。武昌起义，各地响应之后，有远见的地主倒不关心有无皇帝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农民暴动。一天，我听父亲和客人谈话，不知道怎样谈到了太平天国进攻漳平县的故事。我的

① 站笼，即立枷，是晚清时代发明的一种处死人的刑具。一个方形木笼，一人多高，笼顶是个平枷，圆孔恰好套在犯人的头上，初时，犯人脚下是垫着砖头，口鼻可以呼吸。过了一个时期，砖头就撤去了，于是犯人悬空吊着，无法呼吸，不久死去。那时杀头是要刑部批准的，站笼则不需批准。犯人家属宁愿站笼，可得全尸。

曾祖父是一个大地主,据说是城里最大的地主,听到风声,便带领全家逃到我们的老家和春乡去了,好多乡人是他的佃户。他们夜间南望县城,看见红了半边天。太平军攻城失败,逃遁走了,全家人平安无事地回到城里来。我的父亲感叹道:“那时的乡民毕竟厚道,今天就不行了。”当时我不理解父亲的感慨。我看见从和春乡来的族亲,对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恭敬;每年我们去和春祭祖时住在族亲家中,他们也好好款待我们。一旦有事,我们全家逃去和春,住在他们家中,他们难道会换一副面孔么?

不久之后,县里就得到情报,说有个大乡村,农民杀猪会众,商量如何挑空箩筐进城,把富家的东西挑回来。这个情报未必可信,但人心惶惶,大家不是害怕外国人派兵占领我们领土,不是害怕宣统皇帝登宝座,讨伐叛乱,不是害怕北兵南下,骚扰居民,也不是害怕“安溪贼”远来袭击,害怕的是近郊和远郊的农民。城里办起了团练,四门各成立一队,每日操练。有一次在县立小学门前的广场上开大会,养奇先生演说。又有一次在教场练习实弹射击,我们小孩子都跟随着看热闹。经费是县衙门拿出来的,教练是一个外乡人,队员则都是本地人,并非流氓赌棍,但有好多沾染了流氓习气。有枪支,有时发了子弹,但武器如何管理,则我不知道。大约有二百个队员,后来,因农民没有什么举动,城里治安没有什么恶化,以及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这个团练的队伍就无形解散了。

民国四五年,我上中学的时候,漳平县乡村才又紧张起来,但农民不是采取群众进城抢劫富家的方式,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和睦里(即今新桥)有个农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团结了周围的农民,不知怎样搞到了几条枪,便拒绝交纳钱粮,进而拒绝衙门派来的差役入境,起初只保卫一二个乡村,后来几乎整个和睦里都在县政权统治之外了。那时的知事是湖北黄陂人邓炳,前清秀才,很能干,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任命的,穿的虽是长袍马褂,但威风不减于七品知县。他派了两个差役去和睦里办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

死了；他请来了一队兵去进剿，自己坐轿子督战，兵打了败仗，自己驻在一个路亭内，几乎被俘。那时我在龙岩中学读书，这些事情是放假回家后才听人说的。还有其他围剿和反围剿。总之，林智山在和睦里站住了脚，而且一度占据了宁洋县城。有人看见他在宁洋县衙门发号施令，一个漳平人谢信友做他的秘书，听他使唤。我认识谢信友，他是我的父亲的回案秀才，家住江对面，山下一座旧房子，我随父亲去过几次。

林智山站住了脚，于是别的人起来仿效。他们都有枪，有队伍。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依附林智山的。奇怪的是这些头头，每个人姓名的第三字都是“山”字。养奇先生爱说笑话，一天对陈寿山说：“你赶紧改一个名字吧，否则人家要把你当作土匪头子！”那时不说“贼”而说“土匪”了。

“匪区”渐渐扩大，从和睦里扩大到感化里，甚至扩大到居仁里（即今城区及附近各乡）离城不远的几个乡村。但我在家时，永福里没有“传染”到。

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绑票勒赎，我未听说。但近城乡村的“土匪”则是打家劫舍，绑票勒赎的。漳平北门外有个放高利贷的土财主，家住在观音亭边，屋子粉刷得雪白，一天夜里被人破门进去绑走了，以后不知费了多少钱才赎回来。和春乡有个地主，是陈寿山第三个媳妇的父亲，也是夜里被人破门绑走的。陈寿山打听到这帮土匪的底细，于是设计在约定交付赎款的地方把人救出来，而且捉了土匪头子，但这是例外。这类事情发生多起，连城里的有钱人也恐慌起来了。我家一个族叔也是一个富人，家住小院子，此时特别开辟一个门通到多人聚居的大屋子来，以便半夜听到大门响动时可以溜走。但城里毕竟未曾发生破门绑人的事情。

又是养奇先生说的笑话。当时邓炳知事严禁鸦片烟，常常派亲兵冲入人家把吸鸦片的人带走。街上的人知道是“捉乌烟”，就不管了。一天，养奇先生说，如果土匪扮作官兵二三个人，到同春

店门口把见龙先生捉去,只要说“捉乌烟”,就可以大摇大摆走出北门外去了。李见龙是同春南货店大股东,本县商会会长。但那时的土匪毕竟没有这个胆量。

城里的富人也搜集土匪的情报。我知道两件事情。某村姓李的族人请了一个“军师”来家,款待得很好,向军师学习如何进行工作。某村迎接一个贵客,据说是广东“孙仲山”派来的,农民不知道“孙仲山”是什么人。我当然晓得,这不是“孙仲山”,而是孙中山,即孙文,辛亥革命的领袖,此时正在广东活动,反对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由此可见,民国四年以后漳平远郊的土匪活动颇不简单,自然,不一定是孙文直接派人来组织的,多半是一些野心家利用孙文之名在北洋政府统治薄弱的地方组织武装力量,从中获利。

邓炳知事看见武力进剿无效,便采用招抚的办法。我不知道最大的林智山一股是否就抚,但毕竟有几小股是就抚了的。有一股溪南土匪,匪首是当地一个戏班内唱花旦的戏子,招安后住在县城,不知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名字叫做“乌骚贝”。一夜,我在中水门街上新开的面店吃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也走进店里来吃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这就是乌骚贝。”土匪头子受人注意,唱过花旦的土匪头子更加受人注意。我也接触过另一股受招安的土匪,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几个中学生要去龙岩上学,但去雁石的路不平安,衙门派几个携枪的兵护送我们。他们都是本地人,自言是新受招安的,其中一个还告诉我们,他进过新学堂,随即唱了当时学生常唱的《湘江三贤》歌。我未曾接触的还有几股。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北宋时的歌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小股土匪,招安后“官”虽不大,但似乎也未曾被官方骗去杀死。

我一九一九年离家以后,就不知道林智山及其他几股土匪的下落了。当时让城里的富人寝食不安的林智山,现在的漳平人连姓名都不知道,至少我看到的几篇有关漳平县现代史的材料都未

提到林智山姓名。

农民在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中,采取了“股匪”的方式,如果不是迅速发展为广大的群众的运动,那就容易蜕化而为野心家所利用。所以我在家的最后几年看见的几股土匪接受招安,绝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些小匪首并没有做大官,但后来的卢兴邦、陈国辉之流,还不是放大的“乌骚贝”? 这些大匪首难道比北洋军阀派来的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带兵头头更能造福于农民大众么?

“拆城，玉鸣兄！”

这里，不仅是八十老人回忆他的童年，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人回忆另一个社会结构，旧的，过去了的，不会再来的——一种社会结构。上面写的“民变”和“匪乱”二事，深深带着旧结构的烙印，在新结构中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也不会表现为那种方式。

我长大了，读历史，读笔记，读戏曲和小说，觉得宋元及以前的社会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则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缘传》，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写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关系，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就在我的眼皮下渐渐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可能在国内落后而偏僻的地方今天还能发现它的遗迹；在漳平县内今天也可能找到若干残存物，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事物残存于老年人的头脑中，但像我离乡时那样年纪的青年人今天是不会理解那样的社会生活的。他们会觉得我写的回忆发生于遥远的古代，好像我少时读汉魏六朝的历史一样，但是今天的新社会结构毕竟是从那个旧社会结构演变出来的。今天的人应当认识那个旧社会结构。

那时，至少与我所接触的漳平县而论，社会基本上分成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财富基本上以土地计算。评价某人的财产，总是说他有多少土地，——漳平人习惯不是说他有多少亩的田地，而是说他每年收多少斗的稻谷。漳平的斗，大小与江浙一带的斗不同。例如，上海一斗大米旧制十六斤六两，比漳平的斗小得多。漳平的

斗有两种：一种是量米的斗，一斗米三十市斤；一种是量稻谷的斗，一斗稻谷旧制二十二斤，折合市秤是二十五点八七五斤。不仅私人财产以土地计算，而且所有社会基金，如祠堂、庙宇、团体、事业、学产等等，也都以土地计算。收租谷的和交租谷的，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客观上这是互相对立的阶级，但主观上有种种现象掩盖着这种对立的形势。

首先是宗族制度。从社会意义上说，地主剥削农民的社会结构，属于封建社会，但保存在漳平县内的那种社会结构应当称为宗族制度下的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其实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的残存。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会经过几个阶段发展之后，氏族制度便消灭了，惟有我们中国保存其残余直到现代。氏族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形式，使之同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而继续保持其特性。我们在中国古代和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宗族制度的材料。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下去，宗族制度渐渐不能适应了，以致鸦片战争以后惟有像漳平县那样的内地偏僻地方还能保持相当的活力。

即以本县最大的宗族“太常陈”为例。据《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一篇文章所说，他们的先人是从吴兴迁来本省永安县，然后由永安县迁来居仁里和平乡（本地人叫做“罗坪”）。他们在和平乡繁衍生息，并以此为基地发展至东坑乡、小菁乡，以及其他的乡村。他们是聚族而居的，似乎和平乡没有或很少杂姓。他们聚居的乡村，地主姓陈，农民也姓陈，他们同登一个祠堂，他们之间是兄弟叔侄的关系，是一家人，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同外族人斗争。如此一来，对抗的关系便淡化了。宗族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间的矛盾。

最大的宗族“太常陈”如此，其他的宗族亦然。居仁里，以县城为中心，以二十华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大的宗族有四个：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丁坂刘以丁坂头为基地；坂尾刘以坂尾为基地；蓝田陈则是后起的，陆续从永福里搬来县城居住的，没有集

中的居住区,如果有基地,那是在永福里。太常陈的祠堂在他们聚居的城东区,即有名的“大夫家庙”,不仅是各姓祠堂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好的祠堂,而且是全县最好的房屋。我这话也许夸大了。总之,应当除去公共建筑物如县衙门、孔子庙等等以外,也许还要除去永福里陈家祠堂以外。大夫家庙又是最新的祠堂,陈玉鸣时代建筑的。我不知道,以前太常陈祠堂在什么地方。可能,新祠堂是在旧祠堂地基上新建的。丁坂刘的祠堂和坂尾刘的祠堂都在城南区,在上水门和中水门之间;前者叫做“上刘”,后者叫做“下刘”,相距不远,中间只有一些矮小民房分隔着。蓝田陈在城里没有祠堂,他们去永福里祭祖。陈桂芳中了进士荣归后计划在“上刘”的西边建筑一个蓝田陈的祠堂,没有成功。祠堂之于宗族,类似于西方教堂之于教徒。每年祭祖,聚众议事,自然是本族几个头面人物说了算。以前大概也有临时开祠堂,商议大事,如处理子孙中违反族规的事件。小说中还写了族长惩治不肖子孙的故事,我未听说漳平县祠堂发生了这种故事的。

正式的大祠堂有一定的格式:一个大厅,两帝有正房,降阶面下是一个长方形的中庭,中庭两旁有走廊,中庭尽处是大门,有很大的门厅,门厅两旁可设房间,大门外是一个很大的空场,也是长方形,空场尽处是一个大照壁,照壁背后则是大路,那就不属于祠堂范围了。城南区两个刘家祠堂的建筑格式完全相同。空场常用来搭戏台演戏,看戏的人几乎站满了空场。那是居民集资借空场来演戏的,不是刘家祭祖时演戏。大夫家庙系新建筑,中庭小些,大门外的空场也小得多,不作长方形,没有大照壁,而是一个围墙,隔开大路。

城内还有几个破破烂烂的旧祠堂,格式差不多,规模也很大。一个在城北区,堀儿尾,名太史第,姓朱;一个在城西区,大坪头,姓陈,但非太常陈,亦非蓝田陈,据说是感化里陈姓的;一个在城南区,洪厝坪,也姓陈,蓝田陈,有时永福里来人祭祖,但县城内外的

蓝田陈并不以为是他们的祠堂;一个在城西区,名三牧第,姓刘,既非丁坂刘,亦非坂尾刘,从未见祭祖的。这个祠堂规模较小,多年作私塾,也曾办过初等小学(求是小学)。关于这个祠堂,流行一种传说,说它本来是我们郑家的祠堂,明清之交混乱中不知怎样变成刘家的了。因为明朝,我们和春郑家同时出了三个知县,他们来城里合建一个祠堂,叫做“三牧第”,当时刘家没有同时出三个知县的。我这里不过写出“传说”,并非替郑家争这个“产权”。

正式的祠堂是不用来住家的,故正屋之外没有辅屋。以上所说的祠堂都是如此。

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四大宗族之外,还有三个小宗族:丁坂黄、和春郑、北郊李。他们也参加了宗族间的斗争。黄家居住在丁坂尾,出了几个大地主,勾结官府,生活阔绰,连龙岩县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土地。关于黄家的传说很多。据说,他们盖了好几幢“土楼”(什么叫做“土楼”,我想今天还有人知道)用“赤米舂墙,白米抹壁”,“在室女”两臂戴满了金镯子,等等。黄家在城里虽无祠堂,但有一个时期垄断了全县的权力。不幸,一八四二年壬寅的特大洪水把黄家几幢土楼冲毁了,人和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从此衰落下来。

郑家以和春乡为基地,十七世祖才迁入县城,在城西南和西北先后建筑了三座大宅,全族人基本上居住在这三座大宅之中,很少几家住于若干小屋。三座大宅的构造界于祠堂和住宅之间:正屋构造如祠堂,但有辅屋,有的还有外辅屋,正屋也是住家的。郑家在城里没有正式的不住人的祠堂,远逊于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这是表明力量不及这三家雄厚,——也不及蓝田陈家雄厚,蓝田陈家虽然城里没有专用祠堂,而且居住分散,但有永福里大族支持。郑家十八世祖也曾计划在城里建立一个正式祠堂,结果没有实现。

李家聚居于西北郊,我不知道以哪个乡村为基地,城里也没有祠堂,但占有一定的势力。

以上所举四大姓和三小姓以外,并非没有其他的姓,亦非说其他的姓在县内政治斗争中不起作用。我不过说,就我小时所闻的县内政治斗争一般进行于四大姓和三小姓之间而已。

旧中国,至少明清时期的中国,县一级不是官的统治,而是官绅的共同统治。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官的方面。官是皇帝派来的,是代表皇帝的,掌握着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但没有地方绅士合作,官不能顺利统治。官要回避省籍,不仅本县人不能做本县的官,本省人也不能在省内他县做官。教官不回避省籍,但要回避县籍,即本县人不能在本县做教官。因此,外省的人来做官,即使带幕宾来,也是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本地的头面绅士合作,就做不下去。官绅交恶,往往是官的方面失败。至于官权和绅权所占比分,则随具体情况而变异。

一县之内,够得上做绅士的人并不多,但头面绅士、大绅士,可以进出衙门同县官来往密切的,则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需要经过斗争。一般是在他处做了官(京官或地方官)退归林下的人,最适宜做大绅士;其次是有功名的人,举人或贡生,一般秀才还不够格,秀才有条件做大绅士的,可以用钱捐一个贡生头衔,叫做“附贡”。^① 大绅士,出入衙门,包揽词讼,管理公产,鱼肉乡里,由此发财,所以竞争很激烈。这种政治斗争宛如唐宋的宰相大臣之间的斗争。但小县的政治斗争,就我所闻来说,则往往归结为宗族之间的斗争。大绅士背后总有宗族支持。几个大宗族相持不下的时候,则小宗族乘虚而入,作为缓冲。

太平天国失败后,漳平县有名的大绅士是李学惠、刘攀龙等人,他们都因办团练防“贼”有功,出去做了县官的。以后,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太常陈崛起垄断了绅权。陈舜明、陈玉鸣兄弟同时中了举人,前者是文举人,后者是武举人,他们做了太常陈的族长,很

^① 附贡即例贡,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因为不由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故称例贡,不算正途。

快积累了财产，成为本县的巨富。历任知县都要巴结他们。特别是陈玉鸣，成了本县的霸王，饮食起居都是官派。他没有亲生儿子，六个儿子都是买来的，过的都是官少爷的生活。大夫家庙，本县最好的建筑物，就是陈玉鸣建成的。我不知道，这是新地建成的，还是在旧祠堂的基础上重建的。环绕着大夫家庙，民间有许多传说。原来，进东门，沿城墙向北走，可以看到一长排的旧屋子，从屋内铺地的长石条石板看来，这是很讲究的建筑物，据说是好久以前一个武官的宅第，主人衰败了，住户都是穷人，外姓人或主人的后裔。门前是池塘，狭而长，对面就是城墙。全城惟有这一段城墙无路可走。大家叫这个池塘做“枪刀池”，形状像一条枪，枪尖直刺着太常陈的祠堂。为了解除这个“威胁”，大夫家庙前面特别挖了一口池塘，挖成关老爷大刀头的形式，刀刃正对枪尖，并取名为“关刀池”。为了积蓄池水，特别在下水门通来的路上，万寿宫附近的道路，用土垫高。使得两旁雨水不会流出下水门，而流入“关刀池”。人家称为“四水归池”，这大概是一句成语，我说不出其他“三水”在哪里。虽然如此，关刀池水常常干涸，枪刀池水终年饱满。城内要由南门走到北门，向来必须经过大夫家庙一条路。大夫家庙每年祭祖，比城区其他祠堂都更丰盛。有一次，我随父亲去参观，夜里灯烛辉煌，大厅里摆满供桌，在祖宗神位面前供两只大肥猪，分别扮成狮和象。大厅内或大厅外有一处专设陈玉鸣的祭案，墙上挂着陈玉鸣的遗像。

陈玉鸣和太常陈全盛时，自然惹起其他宗族的反对。我只知道两次，一次是同陈桂芳的斗争，一次是同丁坂刘的斗争。同陈桂芳一次，我只知道也是整个太常陈和整个蓝田陈相斗的，但不知其详。同丁坂刘一次，则流传很广。我虽未及见，但听好多人传说，现在还记得这些传说的大意。

太常陈人多，家富，但那时文化不及丁坂刘高。太平天国以后，丁坂刘的地主衰落了，但文化仍旧是高的。刘攀龙死后，仍有

几个举人，秀才也不少，富于藏书读书，人人不仅努力作八股文，而且学习乾嘉学派的考证。他们同太常陈不知为什么发生了斗争。丁坂刘举人也常常出人衙门，但总不如陈玉鸣那样同知县密切，也没有太常陈那种财力，屡得知县欢心，以致斗争中常常失败。最后，丁坂刘抓到了陈玉鸣的一条“辫子”。

陈家住在“学边”，即文庙西边（或学宫衙门的西边），陈玉鸣要建新屋，不知怎样选在西城区，三牧第背后，城墙近旁一个地方，那里是很偏僻的。建筑新屋，要去城外取土，但那里离北门和西北都很远，取土费事，于是这个霸王决定拆去工地附近的一段城墙，通过缺口去取土。这自然省事，又节省时间。丁坂刘抓到这条“辫子”，就控告他图谋不轨，皇帝的城墙怎么可以拆去呢？县里告了无效，就告到省里去，省里派委员来查办此案。此时陈玉鸣才慌了手脚。他求救于县太爷幕宾。一个人替他出主意，叫他连夜把拆去的城墙重新砌好，而且用松明烧烟把新砌的墙砖熏黑；一面用钱去收买省里派来的委员。

这段城墙，我少时看得很熟，常在城上经过，更常在城下经过，站在城下看得更清楚；那个烟熏的部分同其他部分对比非常明显，其他的部分没有烟熏的那般黑。

到了正式踏勘那一天，原告来了，被告来了，知县来了，省里委员也来了，自然还有很多看热闹的群众。委员踏勘之后宣布他的结论说：城墙完好，没有拆毁的痕迹。于是陈玉鸣胜诉了。原告刘举人便从怀里取出尖刀奔向陈玉鸣去。自然没有刺着。官司虽然结束，但太常陈和丁坂刘两家结下的冤仇长久没有解开。

此事发生于哪一年，我说不出来。总是在我出世以前。但我少时常常听大人说起此事，在以后好多年，漳平县口语中也留下了此事的痕迹。无论小孩子游戏时或大人间说笑时，每逢其人闯了祸，陷于窘境的时候，旁人就要说：“拆城，玉鸣兄！”在漳平县的口语中，“城”和“兄”两字是谐音的。

此事之后不久，丁坂刘几个举人都死了，几家地主都衰败了。太常陈还是想方设法打击他们，使之不得翻身。

我这里再记叙这场宗族斗争的两件余波。

丁坂刘有个穷秀才刘志和来城里教私塾，学堂就开在自己的祠堂。他教书很有名，学生之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坂尾刘万里。但更加引起人注意的，还是他的“道德”。当时，陈玉鸣已死，大儿子陈齐旋（鹤汀）继承他做了本县大绅士。这个“学边陈家”，有钱，有势，生活奢侈，态度骄傲，道德败坏。刘志和恰好同他们相反，态度谦虚，生活俭朴，立身处世遵循程朱道学遗教。陈家和刘家成了两个极端。不满意陈家的人就称赞刘家。有一个知县尊敬刘志和，打算向上级推荐刘志和为“孝廉方正”。^①此事被陈齐旋知道了，陈齐旋立即进衙门去，打消知县这个计划。知县只好听这位大绅士的话。直到陈齐旋死后，刘志和才渐渐地由私塾先生做了大绅士。

丁坂刘另有一个秀才刘云纪也迁居城内。他是一个岁贡^②，有学问，受人尊敬。一九一三年选举时，他也是一个代表去漳州投票选国会议员和省议员。当时，刘家已经能够同陈家抗衡了。刘万里和陈齐云竞选国会议员。刘云纪是看不起刘万里的，可能还有别的嫌隙，但他不得不投刘万里的票。他非常痛心。事后，他对人说：“一个字害了他。”这意思是说：“他如不投刘万里的票，陈齐云就会当选了。”

这就是说，一直到民国初年，漳平县的政治斗争都采取宗族斗争的形式。那时没有什么“个人”，个人不过是宗族的一个成员，以宗族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是好朋友，都是

① 清科举名。自雍正时起，新帝嗣位，由督抚举荐孝廉方正，授以六品顶戴。乾隆以后，由地方官保举，经送吏部考察得任用于州县与教职等官。

② 岁贡，清朝科举制度中五种贡生之一。其他四种为：恩贡、拔贡、副贡、优贡，统称五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

我的父亲的座上客,可是到了政治斗争时,两个人就各站一边了。民国二年,养奇先生组织国民党,少泉先生组织共和党。

民国以后,漳平县的政治斗争终于冲破了宗族斗争的框架,同国内其他比较进步的地方一样了。宗族的封建主义在漳平县保持到民国以后,也是漳平县落后的一个证据。

从历史上看,漳平县的名人并不限于居仁里。曾汝檀是和睦里人,陈六翰是感化里人。但居仁里定为县治之后,渐渐地大地主迁移到城里来了。儒学考试都在城里,居仁里遂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睦里和感化里都落后了,惟有永福里勉强跟得上居仁里。永福里土地似乎多于居仁里。但大地主陆续迁居居仁里。而文化也落后于居仁里。政治斗争,充当大绅士,勾结官府等等,必须住在城厢内外才行。永福里的人无此条件。

太常陈是本县第一个宗族,人口最多,土地最富,文化最高(我少时,太常陈的秀才无论绝对数或按人口比率,都是最多的),定居城厢内外也最长久。从“太常陈”、“大夫家庙”、“中宪第”等名称看来,先世是做了大官的。应当研究他们的族谱。

民国以来,这个显赫一时的宗族就衰落了,为什么?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内部矛盾是其中之一。

漳平县的商业资本

我说,我少时所见的本县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宗族”的封建制度。但这是就上层建筑说的。就经济基础说,我们这里早已越过宗族的封建制度阶段了。重要的乡村仍是聚族而居,一个大乡村仍只有一个大姓,但本村大地主已不限于剥削本族农民,本族农民也不限于受本族地主剥削。最大的地主亦非都是本族族长。几个乡村,土地产权交互错杂,基础已经改变了,但由于历史惰性,上层还保持着宗族的性质。全族还以祠堂为中心团结起来,解决族内纠纷和处理族外斗争。这种失去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支持长久的。一般说来,一九一三年选举表现太常陈和丁坂刘的宗族斗争以后,就没有什么严重的表现了。以后的政治斗争就不带着宗族的性质,族内的团结也松弛了。

漳平县剩下来的,还是简单的封建制度。我的意思是说:“社会的阶级划分还是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为主,财富还是以田地计算的,农民交纳的还是实物地租。”宗族团结多少起了缓和阶级矛盾和遮掩阶级剥削的作用,如今连这个作用也没有了。

我少时常常听到上辈感叹今不如昔,特别是怀念太平天国以前的社会,那时有多少大地主,地主家里如何富庶,如何有家教,他们的子弟又如何知书识礼等等。从各方面看起来,漳平县社会确实是衰败了的。一般人只知道以太平天国来划线,好像一切都是“长毛贼”的罪过。他们不知道应当以鸦片战争来划线,太平天国本身也是鸦片战争的后果。鸦片战争以前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开始逐步破坏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经济基础了;鸦片战争以后,五

口通商起了加速破坏这一基础的作用。鸦片烟及其他洋货一船一船的运进来,白银及其他财物一船一船运出去。封建制度的基础因之加速瓦解。不仅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陷于贫困,连地主阶级也日益衰落。不过,小地方人只联想到太平天国而已。

听说,在太平天国以前,漳平县城和四乡之间的差异没有后来那么大。小菁社作了县城,有皇帝派来的父母官驻扎,有城墙包围,有大小店铺,比起四乡自然热闹得多,但那些大乡村从前也是热闹的。并非所有大地主都往城里搬。例如,丁坂黄家,壬寅年(一八四二年)大水以前,就是全县最富庶的乡村。那里的大地主,连龙岩州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地产,他们在丁坂建了多座土楼,他们在物质享受之外还发展精神文明,即聘请名师教育他们的子弟。有个名黄起凤的青年以其聪明和学识震动了全县。那时知县反而常去丁坂拜访他们。丁坂黄家不需要在县城里设立根据地,我们和春郑家,虽然在县城里有了根据地,但仍把和春看作自己的家。有个同族的伯父,比我父亲大好几岁,但也不是太平天国以前的人。他几次告诉我们小孩子说:“你们为什么把和春看作乡下,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呢?”他少时并不把和春看作乡下。那时,他说,我的祖父一辈人三日两头骑马往和春跑。可见,太平天国之后不久,城乡差别还是不大的。在我少时,无疑,我们都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这个变化,无疑同太平天国有关。一八六四年,南京陷落后,太平天国残余力量一部分进入福建省。某日,从永福里来到县城对岸,准备攻城。一个军官从上三公庙旁的小巷骑马冲出来,恰好被守城清军火枪击中,落马而死。听说这人是“二显”,即第二个指挥官,他一死,太平军就撤退了。于是,四乡富人纷纷移居城内,城乡地位差异顿然悬殊。

高高的砖墙,厚厚的城门,就近代的战争来看,它的防御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还能顶事,尤其足以防御“土寇”(即反抗的农民)的攻击。城门每天二更关闭,五更开放,城外的人探亲访

友,很不方便。有几处,砖有缺损,可以爬上爬下,但颇危险。城内外演夜戏时,也有人设下长梯以便进出,但须付费。城里的人往往傲视城外的人。近郊的人白天进出城门,同城里人没有区别,他们也傲视“乡下人”,即远乡的人。城里人问近郊人:“你们听得到更鼓么?”县衙门每夜在门楼上打更鼓,城里的人听得到,城外靠近城墙的人也听得到,但稍远就听不到了。漳平县衙门门楼特别高,更鼓特别响,相传是后坂洋一个大地主出钱添置的,以免被人讥诮为听不到更鼓。但城墙和城门的作用主要还在于防御。这类小县城本来不是为了抵制外族侵略而设置的。漳平县的建制和筑城,志书明言,正是为了抵御“土寇”的。

县城除了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外,还是商业中心。我们有一条“大路街”,从县衙门起朝西直到三角坪,都是店铺;两条支街(“南门街”和“中水门街”)也都是店铺。到三角坪后,大街分成两支:朝西北的叫做“江西街”,也都是店铺,朝东北的叫做“下巷”,也有店铺,但不如江西街热闹。江西街尽处是“三公前街”,也有店铺,不热闹。此外,出西门又有一条“打铁街”,除几家铁匠铺外也有商店,尽头处向左转弯到江边就是松明岭,那里沿街也有店铺,直至盐馆为止。不过西门外的街道,“朝圩日”才热闹,“圩后日”很少生意可做。

全县,除县城外,永福、新桥、溪南三处也有商业(“溪仔内”也有商业),但都不及县城。县城里,有几家布店,有几家南货店,生意比较大;此外,有药店、米店、杂货店、水烟店、豆腐店、纸烛店、裁缝店、棺材店、肉摊、菜摊、剃头店等等。但没有当店,也没有浴室。除一家面店之外没有菜馆、茶楼及一般饮食店。我少时还看到一家鸦片烟店。

这还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商业资本,是封建经济的补充物。中国很早就有了商业资本,我们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期,商人为“四民”之末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一般是受轻视的。在

我少时，地主阶级，尤其其中的士大夫，仍旧轻视商人。士大夫可以放高利贷，即使人家知道了也无所谓，但不可以经商，至多可以拿钱出来给别人去经商，自己是绝不动手的。

县城的商业，每年营业额有多少，我算不出来，大概不会很少。总之，当时除了土地的剥削之外也有资本的剥削。不过财产还是以土地计算的。漳平本地的商人，赚了钱，往往拿去买田，以为田可靠，银子不可靠。商人赚了钱，还是培养子弟去读书，考秀才，做官，至多叫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去接替自己做生意。我不记得漳平县有什么以商业起家的富翁，有什么商业世家。

这里有个特点必须指出来，即漳平县城的商业一向不是操纵在漳平本地人手里，而是操纵在“外面人”手里。恐怕县城从开始出现商业以来就是外面人操纵商业的。最早的是江西人。我们城里有一条热闹的道路叫做“江西街”可以为证。民间还流传了一些有关江西商人和漳平本地人互相斗争的故事。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少时，全城里没有一家店是江西人开的。江西人走后，县城的商业也不是漳平本地人操纵的。在我出生以前一段长时期，操纵县城商业的是“下面人”，即九龙江下游的人。我少时还看到街上有几家下面人开的店。比较大的有一家南货店开在中水门街，店主据说是石井人（今属华安县），那时已经亏损濒临倒闭了，不得已向本县北门外一个土名叫“杜鹃捷”的高利贷财主借债维持。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才倒闭。另有一家卖洋货的，开在明伦堂对面，店主姓张，长泰人，家住洪厝坪。他的大儿子张澄清，小学与我同一班毕业，考第一名，不久病死。二儿子在江中游泳溺死，店终于倒闭了。我少时常常听说：“陈太和”，有名的大店，开在江西街来安堂附近，可能就是来安堂旧址。主人是下面人，但已几代在漳平开店，子弟都在漳平读书，而且应考。可是，本地童生群起反对陈太和子弟考秀才，认为“冒籍”。秀才名额是有限定的，漳平县每科十九人。外籍人考得一名秀才，本地人就要失去一个秀才

名额。这家人住在江对岸,每日摆渡。我少时,陈太和店早已倒闭了,也没有子弟遗留下来,但关于这个店铺和这一家人,我还是常常听到议论的。

奇怪的是《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有一篇文章也提到“陈太和”,说“陈太和”是本县太常陈家的一个支派,就与我所知道的相反。究竟如何,需要查考。

我少时,直到我离开家乡为止,操纵县城商业的已经不是下面人,而是龙岩州人了。据说,龙岩帮代替下面帮操纵县城商业的,其转折点是一九〇〇年庚子近年终时发生的一场大火灾。“大路街”几乎完全烧毁。大概下面帮由此丧失元气而让位于龙岩帮了。

我少时所见,县城所有大店,即本钱较多的店,都是龙岩人开的,其中包含所有的布店和南货店。我想不起有漳平本地人开的布店。大约在我进中学时候,即大约一九一五年以后,坂头顶人李见龙才开了“同春”南货店,其他所有南货店都是龙岩人开的。一切纸烛店都是龙岩人开的。这类店铺,本钱不大,但漳平人没有货源,香、烛、纸、鞭炮是龙岩人的手工业产品。条丝烟也是龙岩人经营的。尚有其他几类店铺也属于龙岩人所有。反之,一切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等等,则是漳平人开的。街上大概有二三家是客家人开的店,我不记得他们卖什么货,店不大。

县城的商业为什么操纵在外地人手里,本地人为什么不能赚本地商业的利润呢?这不是偶然的,这也是漳平社会落后的表现。漳平本地商人一般是兼职的,某些地主拿出一部分地租交给别人去经商或自己经商,由此赚来的钱仍旧拿去买田;小本经商的人赚钱不多,如果某年赚了更多的钱,也是用来买田。大家只认为土地才是财富,天火烧不掉,强盗劫不走。大小商人没有一个全心扑在商业上。龙岩人则不然。龙岩有专职的商人。龙岩人是微型的“徽州人”。在明清两代,徽州府属各县的人是以出产专职商人著名的。所谓“无徽不成镇”,就是说:全中国,凡是城镇即有商业的

地方,都有徽州人。这话自然有点夸大。漳平县城从明代起就有商业了,但我未听说有徽州人开的店。但这话一般说,还是符合事实的:全国大的和中等的城市确实都有徽州人立足。明清小说中常常写到徽州商人。已经有人说出了物质的原因,即是徽州府各县山多田少,人口增加了无法存活,非出外谋生不可。由此产生了专职的商人,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建立了全国的关系网等等。这个特质的原因也可以借用来说明龙岩的商人。龙岩也是山区,虽不能说龙岩的田比漳平少,但龙岩的人确实比漳平多,所受的人口压力比漳平大,多余的人口也不得不出外谋生。所以福建省内许多城镇都有龙岩人经商,他们的足迹甚至越出省外很远的地方去。我认识一个龙岩人,他的家在湖北云梦县开店卖水烟丝。大革命时代,我在汉口遇着省立九中一个老同学,他请我去一个店里吃饭,这个店相当大,是龙岩人开的,但那时的店主人已经不能说龙岩话,只说一口汉口话了。

山多田少,自然只是产生专职商人的一个原因,并非凡山多田少,人口压力大的地区,都会产生像徽州人、龙岩人等专职商人。我们漳平县便是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漳平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足以同地主经济相抗衡的,更谈不上由商业资本发展为工业资本了。那些龙岩人、“下面人”以及好久以前的江西人,他们在漳平经商赚了钱,就把钱送回自己的家乡去,不拿或只拿一小部分钱在漳平扩大营业。

漳平本地商人只开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以及小手工业。县城没有一家书店。私塾学生用的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昔时贤文等书,都是向纸烛店买来的,那里也卖笔墨纸砚,而纸烛店是龙岩人开的。城里直至五四运动那年都买不到一本新书。四书五经以外的古书以及木刻的或石印的旧小说,则有行商,定期地挑着担子,到街上卖。有时也挑到

几家私塾里面去卖，或借用某家铺面摆出来卖。我总是围着这些书团团转，把那些小字石印的旧小说当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祖父和父亲舍不得出钱给我买“闲书”看。县里的新书则是几个在福州读书的学生带回来的。没有《新民丛报》《民报》《甲寅》《新青年》一类的东西，但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我看了一本梁启超的书。那是袁世凯死后出版的几篇他潜赴西南进行反袁活动的日记和文章。

民国初年，县城也成立“商会”。这是漳平县第一个“群众团体”，由官厅示意组织，经过官厅批准的。没有“工会”，没有“农会”，也没有“士会”，即使地主阶级也没有合法的组织。手工业工人有“行会”，木匠、泥匠、船夫等等，都有组织，供奉各行的祖师，快过旧历年的时候要“做牙”，即各自烧香，拜祖师，聚餐，放鞭炮。但这是民间工匠自己的组织，未经官厅承认的。商人组织商会是一种权利，就全国来说，是当时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向封建政府争取来的。但就漳平县来说，则不用争取，而由官厅示意去组织的。凡是商人，无论大的小的，无论本地的外地的，都可以参加商会。商会设在考棚前面西边一所两进的屋子。那是旧时学官的衙门，官厅拨给商会使用的。商会的秘书是县立小学教员林有声，他是本地人，一切事务性的工作都归他主持。当时的同春店主李见龙是商会会长，也是本地人。他当会长颇奇怪，论资本，同春没有龙岩人开的几个南货店那样大，更没有全属龙岩资本的几个布店那样大，可是商会会长不是龙岩人。据说这是龙岩商人有意让给本地人的。但商会议事，龙岩商人的意见还是占上风的。

商会会长地位很高。一九一九年夏初，陈炯明带领粤军攻入闽南快到漳平县时，北洋军阀放的知事邓炳逃走了，县政权便由商会会长李见龙执掌，粤军当夜进城后才交给陈炯明放的姓熊的知事。

应该承认，漳平并非没有专职商人，也不是没有商业资本，不

过其中比较有能力的,资本比较多的,并不在县城活动,而在外地,即漳州附近的浦南活动。浦南有几家漳平人开的店——不是零售的店,而是一种栈房,接待本县山乡运到九龙江下游来的土产,而代替那些乡民备办海货和洋货的。总之,漳平商人在浦南经营的就是这一类业务。我是外行,说不清楚。他们都赚了钱。我只记得三家:陈献丹、李熙顺、陈麻标,钱赚得最多的是陈献丹。他是陈桂芳的堂弟。县城内外头面人物路过浦南多数住在他的栈房。这些“浦南客”也积累了商业资本。

我离家前,县城已经有人议论办工厂了,即要由商业资本过渡到工业资本。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的,据考证,是上海一家米店装备了来自外国的碾米机器。漳平县第一家机器工厂也是碾米厂,设立在下水门内一幢房子,发动机燃烧火油,皮带传动,响声很大,我去看过。厂长或经理就是陈玉鸣的儿子陈子丹。资本显然不是陈子丹的,那时他的家私已经败光了,不过别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声名而已。开业不久就维持不下去,盘给了李见龙。李见龙就是李熙顺的父亲,结果这个工厂还是浦南客开的。另一个浦南客陈献丹,一九一九年也在筹备开一个制笋的罐头厂,利用山乡多竹的资源。这个工厂是否建成,我不知道。

县城,除了龙岩人、客家人、“下面人”活动之外,还有一类外县人活动,这就是永春人。人数可不少,但他们不是靠经商,而是靠做工谋生的。县城所有的剃头店都是永春人开的,所有棺材店也都是永春人开的。剃头店分散于城内各地,租赁偏僻的店面营业;棺材店则集中在江边,城墙下。从上水门外稍西直至天主堂,越过天主堂,在礼拜堂前面,还有一二家。本地人称为“永春店”。剃头店和棺材店,从店主直至学徒,都是永春人。所谓“永春人”大概不是指永春一县的人,而是指永春直隶州所属永春、德化、大田三县的人。他们不包含在“下面人”之内,因为他们不是从九龙江下游上来的,而是从漳平县背后走路来的。当时,剃头被视为贱役,而

做棺材也是不样的事情,所以本地人看永春人有几分像上海人看“江北人”一样。其实那几家棺材店也兼做其他的木工,如桌、椅、柜、床之类,后来还为新学堂制造黑板、课桌、讲台;我还见过他们替乡村农民雕刻佛像,制造佛亭,油漆得很好看。

有特别的一家永春人,则简直是艺术家。他们不住在“永春店”,而单独租赁中水门街一座小祠堂。他们是多才多艺的。他们能雕木版、印木版,大地主家里死了人,要发讣告,就找他们雕印。他们能在红罗缎上贴金字,有个知县任满去职,地方父老送“万民伞”,就找他们贴金字。他们正月间“迎佛”时拿出戏衣把一些穷孩子扮成戏文里的角色,坐在木板上,几个壮汉抬着走在队伍中间,——漳平人叫做“戏坪儿”。他们秋天做“祈禳”时布置道场,用五颜六色的纸把古老祠堂的破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等等。我在少时,他们之中老一辈已经死了,只有一个中年人当家。有如许本事,却未发财,亦未受到本地人的特别尊敬,人家还是把他们看作“永春人”。

其实,永春人同其他的外面人不一样。同样是开店的,其他的外面人是来赚钱,赚了钱送回老家去,永春人则是为了糊口,以手艺替漳平人服务,他们的贡献超过于他们的微薄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商人,宁可说他们是手工业者,是工人。在他们当中是积累不出商业资本的。

旧时城镇还有几种行业,漳平县城都没有,或早已衰落了。没有当店。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当店,开在北门外,新天主堂附近,是一个大地主开的,被天火烧毁了。没有酒菜馆,只有一家面店,开在孔子庙边门对面。有人在另一地方再开一个面店,但不久就关门了。有几家居民承办酒席,但须预先约好,届时到你家或你指定的地方现炒。其中有一家人一九一八年在下巷开了一个菜馆,但没有生意,不久就关门了。有一家打制金银首饰的,开在江西街上,但后来倒闭了。有一家裱书的和一家刻图章的,开在“下巷

儿”，没有生意，终于倒闭。

县城商业最大的主顾，还是四乡的农民。这里顺便谈谈县城的集市。

集市，漳平话叫做“圩场”，赶集叫“朝圩”。这是最古老的商品交换方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不通过中间商人。漳平建县以前，大概小菁社就有了圩场，附近各乡都来此朝圩，以致居民点更加扩大，才会被选为县城。最早的圩场不知设在哪儿，但建城之后显然就设在西门外一片高地上了。漳平人叫做“校场圩”。这片高地相当大，本是官地，没有私人房屋，供给官兵操练之用的。旧时，每个县城，城外都有一大片空地，以为练兵、阅兵、集会之用，一般称为“校场”。考试武秀才，也在这个地方。漳平的校场那片土地比周围高出二三尺，大概是人工填高的。校场西部，我少时还看见一个圆形的壕沟，相当深，人家说是以前的兵骑马持弓箭在沟内奔驰，向靶子射箭的。民国初年办团练，也曾在这里操练和实弹射击。校场东边，盐馆背后的空地上，则是圩场，所以叫做“较场圩”。

县城的圩场是每五日举行一次。旧历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为“朝圩日”，其余称“圩后日”。旧历逢小月，则由二十七至初二只有四日。这个时间，不知何人所定，何时所定，但得到人人遵守。本县，除县城外，尚有四个圩场，即蓝田圩、新桥圩、溪南圩、拱桥圩。各场圩日不相重复，却都是五日一次。来县城朝圩的并不限于附近的乡村，也不限于本县的人，有从安溪县远来朝圩的；反之，县城的人也常去别地朝圩，特别是去蓝田圩和拱桥圩。

圩场内一片嘈杂，声闻数里。场上卖的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禽蛋，有蔬菜，有笋，有柴，有炭，有田螺和石螺，有竹竿和竹编，有木桶和各种木制品，有杂粮和茶叶，有鱼和其他水产品，有各种小动物，等等。一般说来，是乡下人送物资到圩场来卖给城里人，

但在圩场上乡下人也是互相买卖的。例如，一个人烧了一担木炭，挑到圩场卖，得了钱买二顶箬笠带回家去。城里人也有拿自己生产的物品去圩场卖的。但乡下人卖去自己带的产品之后，并不能完全在圩场上买到自己需要的物品。他们在圩场上买不到布匹、海货、铁制农具，以及其他来自外地的物品。这与上海的龙华寺庙会和静安寺庙会不同。在上海庙会上，许多店铺设了摊，把农民需要的工业品摆在那里叫卖。我不记得漳平商店曾在圩场设摊卖货。即使有，也是例外的。乡下人朝圩日照例是要进城买外来商品的，除非松明岭一带的店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要买铁制农具，也需到西门外打铁街上来。

县城那些店铺，朝圩日的生意比平时好得多了。可以说，商店的最大主顾就是这些五日一次来朝圩的乡下人。城里人的购买力还是有限的。

叫做“校场”的那一大片高地，本来是完全空的，官有的，私人不能在上面建筑房屋；操练兵卒，考校武生，机会本来不多，东部一部分作为圩场也不过每隔五日热闹一次。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建筑物。不知何时，西部靠北造了一个关帝庙，靠南造了一个郭圣王庙。寺庙占用官地，不发生主权问题。造庙之后，西部还是空阔的，不妨碍操练、检校之用。东部，圩场南边，后来也造了一个盐馆，占地相当多，“平宁帮”盐商是私人资本，但得到官厅特许，具有半官方性质，占用官地建筑房屋，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盐馆背后，这块官地的东缘，竟有几家私人住宅，不知怎样会得到许可的。

圩场上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自产自销的，这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小生产是不会直接产生资本主义的，它可以产生专业的商人，再由商人产生资本家。圩场上的商品是自产自销的，但不能排除其中有少数人，向小生产者买来产品，然后拿到圩场去卖。

教育与文化

在县城内外，街上走走，很容易从行人中判别哪些是读书人，哪些不是读书人。从他们的服装、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得出来。言谈和举止，须多观察；服装则一眼可以判别的。读书人穿长衫，非读书人则穿短衫。这种有形的或无形的规定，到我少时已不十分严格了，但一般还是遵守的。夏天，穿长衫出门，出了汗就把长衫脱下，挂在左手弯上。出门前，天已很热了，怎么办？漳平的读书人比较随便，不穿长衫出门，但他的短衫也可显示与别人不一样。龙岩的读书人，甚至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则连热天出门也要把长衫挂在左手弯上。

那种社会有两种分化：富人与穷人的分化，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分化。这两种分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读书人一般是富人家庭出身的，但财富和文化不一定成正比，也有目不识丁的富人，又有家无隔宿之粮的寒士。这是规律之下的例外，而例外也可以用规律来解释的。

偶然也有贫农勤俭发家成了富农，富农再靠剥削和放债，成了地主。但他的财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就保存不住，许多方面的人都要向他伸手，敲诈勒索，他无法保存他的财产。但若他有个儿子，读了书，进了学，即考取了秀才，形势就不同了。他的家一下子跻身于斯文的家庭，同案的秀才，以及一般的秀才，都会来保护他。所以富人必须培养子弟读书，不是为了子弟能知书识礼，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财产。

穷人是不会培养子弟去读书的，至多送去私塾读一二年书，识

得几个字,便出来种田或作其他的劳动。穷人也不会培养子弟去应考,因为没有什么财产值得保护。所谓“寒士”、穷秀才,一般都是地主世家的破落子弟,他们的先世曾是富人。

“读书人”,就是有“功名”的,至少是一名秀才。可能有例外,例如,“老童生”,考到老仍不能青一衿,只好在乡村教几个蒙童,聊以糊口。这种人没有“功名”,但不能否认他是“读书人”,他出门在家也都可以穿长衫。不第秀才,或根本不去应考的读书人,历史上的处士或隐士,书读得好,读的比那些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更多,是常常有的。但漳平县没有。我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本县建制以来是否出过这样的读书人,我也未曾听说。

读书,就是进私塾就学于塾师。最原始的形式是“家塾”,即地主聘请塾师到家里来教育子弟,有时附带教育邻居子弟。地主大宅一般都附有书斋,供给塾师居住和教书。塾师同时也是东家的秘书,替东家办理各种文墨。这种形式的私塾,我少时还见过,不在县城内外,也不在大乡村,而在小乡村。大乡村则办“村塾”,一村的人合聘一个塾师,在本村的祠堂里教书,费用由各家分摊。塾师或自炊自濯,或各自轮流供饭。县城内外则采取学生交纳束脩的形式。“学堂开,束脩在”,哪怕你家的子弟只读一天书,你仍要交纳全年的束脩。束脩之外,每年还有几次“节敬”,三大节以及清明、重九、冬至,都要送红包给塾师。每个较大的乡村都有一个私塾,设有圩场的大乡村,则不止一个私塾。最多的是县城内外的私塾,四门都有一个或几个,后坂洋、坂头顶、坂尾都有一个。

普通的私塾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以后顺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一步就要读《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左传》了。那些送子弟进学堂,只为识几个字的人,子弟读完《孟子》之后,就不再读了。普通的私塾也只教小孩子识字,而不教做文章。做文章则是另一种私塾的事。地主子弟读书不仅为了识字,而且为了“进学”,即考秀才。商人、工匠,

以及足够衣食的家庭,也有要子弟考秀才的,那就要进另一种私塾了。以前称为“大学堂”,那里的学生称为“大学生”。乡村,读了私塾的人,如果要考秀才,就须到城里来进大学堂,住在大学堂里,自己烧饭吃。也有小学堂的塾师兼教“大学生”的,但那是例外。大学堂的塾师必须是秀才,而且是比较有名的秀才。县城内外的小学堂,偶然也有非秀才做塾师的。所有塾师都是贫寒之上,所谓“十条黄狗几条雄,十个先生九个穷”是也。

“大学生”一般都要住宿在“大学堂”里,白天晚上都要读书,早晨要练字。他们不仅要熟读四书白文,而且要熟读四书朱注,要能按照朱注解释白文的意义。除塾师讲解外还可参考一部大书,我忘记书名,内容是每段白文和朱注之后都有长篇的解释,塾师的讲解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塾师教学生“做文章”。那时所谓“文章”,就是八股文。塾师先教“破题”,学生会做之后再顺次教其他七股。子弟进“大学堂”之后,亲戚朋友见面就问:破题会做了么?全篇会做了么?八股文之外还要学做试帖诗,即五言律诗。会做全篇八股文和试帖诗,就可以去考“童生”了。“宗师”(朝廷派来的提学使,亦称学政,俗称“学院”)案临府城(或直隶州城)那一年(三年一次),知县就要把治下的“大学生”预考一次,及格的称为“童生”,第一名“童生”称为“案首”。富人可以贿赂知县或幕宾给子弟买得“案首”,院试时“案首”一般都能录取的。漳平县童生要去龙岩直隶州院试,每榜取中十九名秀才。举行院试的这一年,不仅童生要去州城考试,而且全县所有的秀才都要去州城复试,文章做得不好的还要受罚,轻则训斥,重则开除,即取消秀才资格。所以秀才们到这一年大都提心吊胆。不赴考是不行的。生病也要其他的秀才具结、担保。考童生也要秀才担保,保证家世清白;那些操贱役的人家是不能赴考的。做担保的,不是一般的秀才,而是地位较高的秀才,即廪膳生员,每县也有定额,由宗师复试时选择文章做得较好的生员递补。

漳平县每榜只取十九名秀才的规定,是否从开县时定的还是以后定的,我不知道。因录取名额少而竞争非常激烈。有些外籍人久居漳平县,他们的子弟也要求参加考试,童生们不答应,便群起攻击“冒籍”,这种风潮常有发生。

考取秀才,进了学,便超人一等了。劳动人民的子弟,从此跻身于统治阶级;同时富家子弟,进了学与不入学的人,地位也是两样的。秀才娘子,公婆要另眼相看。大的宗族、祠堂都有学田(本地人叫做“书香”),每年租谷要给秀才一份。秀才有自己的制服,一件无领的长衫,一顶红缨帽,祭祖、参加庆典或参拜官吏时就穿起来。犯了罪,是不会有在公堂上打屁股的,除非事先通过学官,革去生员功名。

每县都有学官,正的称“教谕”,副的称“训导”,各有衙门。漳平县孔子庙背后,考棚前面,左右两个学官衙门,各分前后两进,后进供“老师”及其家人居住之用,前进用来办公。辛亥革命以后,学官废除了,两边的衙门后来做了本县商会会所;东边的衙门一度办“去毒社”,即禁烟机关,挂了“奉旨禁烟”招牌,找几个鸦片烟鬼住在那里,不久就解散了。

学官,被秀才称为“老师”,考得秀才称为“进学”,秀才相互间称为“学中人”。——好像有一个“学校”供给全县秀才学习,而由学官教课的。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学官,事实上不是教秀才学习,而是管秀才的。秀才行为不检时,学官可以差遣“门斗”(即学官衙门的差役)召来训斥,可以打手心,可以革除。秀才还是害怕他的。

那时,私塾以外确实另有学校,供给秀才和童生集体学习,却不归学官管辖。这就是书院。书院本来是民间的组织,不是政府机关,可是到了晚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事实上也成为官办的了。所谓“山长”,不过是退休的大官或者著名的文人,他们挂名,领干薪,很少给学生上课。漳平县也有书院,但早已名存实亡了,我少时从未听人说起书院事情,只知道而且看过北门外佛儿架下

的“菁城书院”和东山上朱文公庙背后的“东山书院”。前者房屋尚完好,但无人看管;后者则大部分倒塌了。东门内还有个“紫云书院”,那是太常陈家的私产,民国初年曾在这里办小学,只一年就停办,但仍有人看管。

由此可见,那时漳平县的教育就是私塾的教育,教的是四书五经,学生做的是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秀才。县城内外私塾甚多,最著名的是城南上刘祠堂办的私塾,塾师是丁坂的一个贫寒秀才刘志和。他道德端方,生活俭朴,管教严肃。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出了一个拔贡,即他的大儿子刘子瞻。受了当时潮流的影响,他也组织学生和邀集秀才研究西学,如数学、力学之类,自然是很浅的。我少时,他好像还在那里教书,但以后作了绅士,渐渐地成为大绅士,就不教书了。上刘祠堂换了一个塾师,也姓刘,名晃,字日光,秀才,他只教学生识字。上刘祠堂之外,著名的私塾是城西的三牧第,塾师是温赞尧。那时他还是个秀才,年轻,有学问,教学严格,学生都怕他,家长则尊敬他。己酉年恩科他赴考,得到优贡(我少时知道他是优贡,但现在人家说他是拔贡,他自己也说是拔贡),就不再教书了。其他教八股文的私塾也还有几个,但我说不出来。此时科举已经废了,考试也不做八股文了。

幸而我少时未曾学做八股文,连“破题”也不会。并非因为我未出世,就已废除科举和八股文了。当时那些书香世家,大多数以为科举终会恢复,朝廷终会以八股取士的。我的一个从堂兄,不过比我大二三岁,他的秀才父亲仍旧教他做八股文,他也能成篇做出了。我的父亲的朋友有时也谈论八股文,说得非常深奥。我长大了,为了猎奇,也曾在名人文集中读过几篇八股文。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一辈的秀才居然会做出这样困难的文章,运用这样复杂的四书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贯的。这该耗费多少精神劳动!因此,我能够原谅他们的无知,原谅他们除了四书五经,朱注,几部《学案》等等,总之与做八股文有关的学问以外,缺乏其他

常识,连古学的常识也缺乏。我离家后才读《儒林外史》,其中写八股先生范进,做了乡试主考,还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朝代的人!我觉得吴敬梓写的简直就是我少时所见的秀才。

但我这话不能理解得太绝对了。我说的是一般的秀才,并非所有的秀才。漳平县的秀才中还有少数人以学问渊博著称的。在我少时,漳平全县只有一个举人,即刘万里,但全县最有学问的并不是刘万里,即使以做八股文,以熟读经书而论,也不能推刘万里;以新学而论,更不能推他。己酉科两个贡生,温赞尧和刘子瞻,都比刘万里强,即以老一辈而论,刘云纪、陈华、谢步瀛,都比刘万里更受人尊敬。这些人,除经书和《学案》之外,也精通古文辞,熟悉历代史事。

读书人家里,除了经书和八股文书以外,一般都有《纲鉴易知录》或袁王合注《纲鉴》,也都有一部古文。最常见的是林云铭评选的《古文析义》。我学古文时,塾师就是从《古文析义》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但并非家藏《古文析义》的人都读过《古文析义》。我遇着一个老童生,他告诉我,他有一部《古文析义》,读得很熟。

论文化,漳平远远不如龙岩。这是客观造成的,也是历史造成的。龙岩是直隶州,耕地比漳平多,人口比漳平多,历史比漳平长久,秀才定额也高于漳平好多。即以古文而论,我去龙岩上中学时,教师是从《古文辞类纂》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龙岩同学好多人都有《古文辞类纂》,漳平同学不仅没有此书,而且没有听说过此书。漳平那些老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书。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桐城派古文”,他们学的是唐宋八大家。我记得,我们一批漳平同学初至龙岩中学时,不知“古文辞类纂”五个字怎么读,有一个同学读成了“古文,辞类纂”。

住在县城内外的秀才还有一个光荣的任务,即祭孔。春秋两次祭孔之日,天未亮,所有的秀才都来到孔庙了。大多数是彻夜不眠的。五更开始仪式。主祭是知县,陪祭是学官、典史及其他官

员。他们有人引导,先到大成殿祭孔子、四配、十哲,再去两庑祭七十二贤人以及历代名儒。古代学者得入文庙受祭是不容易的,须经朝臣评议,再由皇帝宣布,各地孔庙才能在两庑设立木主。每一个祭坛前面都站立两个秀才接送祭物,赞礼。在大成殿内侍候的则是资格较老的秀才或廩生。祭毕,分胙肉。每个秀才分得一张纸条,凭条次日可以到孔庙前面“大路街”旁的肉摊上领到一定分量的肉。祭孔之次日,不限于秀才,任何人都可以到孔庙门口买到牛肉。杀牛是犯罪的,漳平城里人要吃牛肉只能在冬天托人去乡下偷买。漳平惟有每年两次祭孔之日可以公开买到牛肉。先一日,孔庙杀牛,我们小孩子每次都去看热闹。杀牛和杀猪不同。孔庙泮池边,空地上,一群杀牛的人都准备好了,然后有人牵来了一只牛(都是水牛,我在家未见过黄牛)。牛站定后,一个人拿着大锤对着牛头打下去,牛立刻倒地,一群人立刻涌上来,用尖刀剖开牛的胸膛。有时牛挣扎起来,近旁的人吓得奔逃,站在外围的小孩子往往被人挤倒。牛只杀一只,但次日在门口卖出的牛肉决不止一只。那是暗中有人杀别的牛,混在这里出卖的,即使被人告发,此时也不会办罪。老太婆知道杀牛,就要念一声“阿弥陀佛”,连称“罪过”;但祭孔杀牛,老太婆就不敢反对了。

秀才进入孔庙赞礼,一般市民视为荣耀。辛亥革命以前,没有人敢作非分之想。辛亥革命之后有几年停止祭孔。邓炳来作知事,才恢复祭孔。那时学官没有了,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主持其事。秀才人数虽然减少,小学毕业生可以填补上去。一九一五年春季祭孔,我也列了名,但睡过了头,没有去参加。次日,我的弟弟去县立小学领胙肉,刘校长还是给了我纸条,但对我的弟弟教训了几句。有些老秀才也不去参加,我的父亲就没有去。

那时,一般市民还是把祭孔看作荣耀的。有一个人姓陈,太常陈,住在堀儿尾附近,平时常在街上东串西聊,爱发议论。不知道为了什么,他那几年特别卖力鼓吹祭孔荣耀论,好像一个人能入庙

祭孔,家中鸡犬也得升天。这话传遍了全城。人家怂恿他:“不久之后又要祭孔了,你何不活动一下?现在没有‘老师’,谁能去祭,谁不能去祭,只凭‘扬官’一句话,你备一份厚礼去求‘扬官’罢。”刘志和校长,人称殿膺先生,但一般的市民称其小名为“刘扬”。我那时尚未毕业,亲见这个人手里捧着一只大月饼及其他节礼,穿过我们的课堂进入校长室去,过了一段时间校长送他出来,自然不会派他去祭孔的。

但那时,漳平确实有人沾着这个荣耀。我的同班同学刘奎光的父亲刘捷登是个读书人,但未考得秀才。他在本县衙门做“传供”,即口头翻译,——县官审案时,他站在公案旁边,戴着没有顶的红缨帽,把县官的话翻译给跪在地下的诉讼当事人听,又把当事人的漳平话翻译给县官听。这是一个肥缺,诉讼双方都要塞钱给他,但上层社会的人是看他不起的。他没有资格进入孔庙赞礼。可是,在邓炳任上,他被委任为本县典狱官,管监狱和看守所,一年祭孔时候,邓炳做主祭,他做了陪祭,比赞礼的秀才更加荣耀了。

秀才高人一等。但富家子弟考不到秀才,仍有补救办法,即出钱捐一个“监生”,所谓“纳粟人监”是也。监生,本是在京师国子监毕业的学生,又称“太学生”,但后来名不副实了。朝廷要钱,只要交上钱去(美其名曰“纳粟”),便可以给你执照,承认你为“监生”,哪怕你从未去国子监读一日书,哪怕你目不识丁,哪怕你只是五六岁的小男孩。起初只有巨富之家才能捐纳监生,据说每人要交上一百零八两纹银;以后价格渐渐降低下来了,小康之家也能捐监生了;到辛亥革命前几年,捐一个监生只须出十几个大洋。监生照样可以戴红缨帽,照样不会给县官打屁股,但不能参加祭孔,似乎只是因为他不是本县生员,而是国子监生员。

秀才可以去省城乡试,即考举人(似乎监生也可以乡试)。考得举人,就不参加祭孔了。“出贡”之后也不参加祭孔。所谓“出贡”,就是学政从各县秀才中挑选几个较有学问的,推荐给国子监,

犹如地方官把本地良产向朝廷进贡一样,故称“贡生”。一般有“五贡”,据我少时所知,就是:优贡、拔贡、恩贡、岁贡、附贡。前四贡都须经过考试,附贡,则是富家秀才援例纳粟取得贡生资格的。乡试时,有些人成绩够不上列入正榜做举人,但可列入“副榜”称“副举人”,待遇同贡生一样,亦可称为“副贡”。漳平,凡贡生(附贡除外)都可以在祠堂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优贡温赞尧就曾在他住家的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竖立那天,他夫妇还设香案跪拜天地祖宗。刘子瞻没有竖立旗杆。

我以上所记就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由此制度产生的知识分子,以及这些知识分子达到的文化高度。

但我所记的时代,帝国主义已经侵入中国,改变了沿海城市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就动摇了上层建筑。新的思想向经书八股文所载的孔孟之道进行挑战。旧时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已经面临非改革不可的局势了。百日维新废除了科举;至于八股文,则科举废除以前就已废除而改为策论了。最后一科乡试,主要试题是《汉唐宋开国用人论》。

在漳平,绝大多数的人是抵制这种改革的。但因为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是朝廷要的,不能不一面照办,一面不以为然。

就在我进入私塾读四书五经那几年,漳平县开办了第一个“官立小学堂”。

新 学 堂

似乎在庚子乱后，慈禧太后不得不接受百日维新的部分改革的时候，省里依照朝廷的指示决定在各县开办新学堂。办法是：挑选几个年龄较轻的秀才去省城学习如何开办新学堂，如何教授新功课。漳平县派了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个人去，都是公费的。另有几个秀才以后也去省城学习，似乎是自费的。我只记得三个人：陈莪宾、陈玉芝、陈禹言，都是太常陈。陈祖光也是太常陈。林有声是太常陈的女婿或外甥，学习回来后还乘坐四人大轿拜客，据说是太常陈布置的，为显示他是太常陈家的人。漳平话叫做“装猴”。惟有刘子瞻是丁坂刘家的人，可见那时两个宗族的敌对仍然明显存在。但养奇先生（陈祖光）和少泉先生（刘子瞻）两人的交道还是很好的。那些自费的学生，据说去以前是互相保密的，到了福州见面互相问道：“你也来了。”永福里似乎也有人去省城，我知道邓国桢是其中一个。

官费去省城学习回来，全县的人把他们当作新科举人来议论。知县要县里绅士同他们一起筹备新学堂，地址设在“考棚”。漳平的考棚是太平天国以后才建立的。据说李学蕙去河南某县做知县，给某县建了一个考棚。以后此县的一个人来漳平做知县也给漳平建了一个考棚。漳平的考棚，后面两进，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两边排列几十排长桌、长凳，每排以千字文的文字为名，再分号码。童生就是在这里考试的。改成新学堂之后，这些长桌、长凳都没有用处了，惟有最后两进的大厅可以作课堂，只能容纳两班学生上课。因此高等小学堂，只招收高等小学生。

甲班学生都是科举未废以前的童生。如果不废科举,则下次宗师案临时可能考得秀才的。其中多数是县城内外的人,也有几个是永福里人。永福里人居住在学堂内。学堂后进,大厅两旁延伸出去,有几个房间可供住宿。高等小学堂似是学两年毕业。课程有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国语(即官话),最重要的还是汉文,当时没设英文课。我不知道这些功课是谁教的。但除了汉文以外,只能由那几个从福州学习回来的秀才去教。我只记得静居先生(林有声)教体操和国语。陈禹言曾教算术,这个秀才一向是以善打算盘著名的。一次,我去学堂看我的父亲,他当会计兼庶务。他叫我去课堂旁听禹言先生教授阿拉伯数字。我以前没有见过阿拉伯数字。教汉文的是一个老先生,姓陈,我忘其名,家住在浮桥头。

甲班毕业了,似乎只有十一人。我记得,一天,姓钟的知县坐在衙门大堂上,毕业生身穿公服,头戴红缨帽,列队经过公案面前,分别从知县手中领取毕业文凭。

漳平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学生,我还记得几个姓名。第一名是李志勋(我记得是“勋”,而不是“坝”),他是李学蕙之孙。其他的是陈玉银、林舜居(我忘记此两人的学名)、郑宗选、刘时雍、陈维馨、陈鑫洗以及几个永福人。

这第一批漳平县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从此便同旧日的秀才一起参加祭孔典礼了。那时宣传说:小学毕业生就是秀才,中学毕业生就是举人,大学毕业生就是进士,外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就是翰林。

可是,漳平县的上层社会是反对洋学堂的。他们根本反对废止科举。认为废科举办学堂,是“逆贼”康有为、梁启超戊戌那年变出的花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应当恢复科举,停办学堂了,然而八国联军又迫得慈禧太后实行这项新政。漳平的学堂是八国联军以后才办起来的。不仅守旧派反对洋学堂,连创办洋学堂的人也反

对洋学堂，留恋旧科举。己酉年（一九〇九年）为庆贺新皇帝登基，举行一次考试，不是考试秀才，而是选拔秀才，从各县秀才中选取优贡和拔贡。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人都去福州赴考了，刘子瞻就在此科考得拔贡。这些创办新学堂的人，不过办理知县交办的差使而已，能够替知县办差又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求之不得的。

我的祖父是当时的红绅士，学堂办成后他挂了一名“董事”（其他几个头面人物也挂名“董事”），我的父亲则担任学堂的会计兼庶务，管理学产。我家应当是属于新派的人物了，可是祖父和父亲宁可叫我们兄弟进私塾读书，不愿让我们进新学堂。

大家都把新学堂看作官样文章，官办的事业，虎头蛇尾的，大家期待着不久恢复科举。

所以甲班毕业以后，县立高等小学堂便无形停顿了。名称还在，房子还在，大门外仍旧挂着那两面“虎头牌”，牌上都画着虎头，下部一面写着“学堂重地”，一面写着“闲人勿进”，——但既无人在那里读书，也无人居住，那些永福学生都搬走了。我忘记了究竟是辛亥革命造成学堂停顿的局面，还是学堂先停顿再发生辛亥革命的。一直到几年之后邓炳来做县知事，这具死尸才还魂，以后才有丙班和丁班毕业。关于丙班和丁班，我还能够说些情况。关于乙班，则我毫无所知，是否有乙班，我也说不出来，不仅现在说不出来，当时我就不知道，不知道哪些人是乙班毕业的。但在叙说民国初年的高等小学堂以前，我要回头说说县城的初等小学堂。

设在考棚的，是漳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不仅县城只有这一个，而且全县四里也只有这一个。按照规定，学生先读完初等小学堂，才能升入高等小学堂的。但当时不能先办初等小学堂，候学生毕业之后再办高等小学堂。漳平县是先把高等小学堂办起来，招收当时准备去考秀才的一批童生为第一班学生，然后去办四个初等小学堂。居仁里只办四个，似乎永福里也开始办，和睦里和感化里似乎辛亥革命以后才办。居仁里四个初等小学堂都办在县城

内,东西南北四门各办一个。东门叫做阳谷小学,设在大夫家庙;西门叫做求是小学,设在三牧第;南门叫做文明小学,设在铁儿馆;北门叫做启智小学,设在太史第。东门是新办的,大夫家庙原是太常陈家的祠堂,过去办过私塾。我的父亲就在那里读书,但以后不办私塾了,此时才新办初等小学堂,创办费也是官费,即由知县调派的地方公款,不是太常陈的公产拿出来的,虽然学生绝大多数是太常陈的子弟。三牧第、铁儿馆、太史第三处则都是私塾改办的。所谓“改办”实际就是门外挂一个某某初等小学堂的牌子,堂上布置一个课室,安置一个讲台,一块黑板,几十张双人课桌(桌面是倾斜的),以及课椅。这一切都是官费做的。原来的塾师就是惟一的教员。是否另有一个挂名校长,则我忘记了。当时,我正在铁儿馆读书,改办后就成了文明初等小学堂的学生,身历其境,尚能记得。塾师就是我的堂叔郑锡光,字履卿,谱名庆丰,是个秀才。他做了教员,教的还是三字经和四书,并不教新编的小学教科书。我不记得辛亥革命以前是否看过新编的小学教科书。那本“人,手,足,刀,尺,布,山,水,田,日,月,星……”的教科书,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的。当时即使有新编的教科书,也不能教,因为学生家长反对新学堂。如果只改变形式,家长还能忍受;如果改变实质,即以教科书代替《三字经》,家长就不同意了。一次要照相(上面要的,费用自然是上面出的),家长知道了,有一部分人临时把小孩子叫回家去,不许他们照相,据说照了相,小孩子的灵魂就会被摄走的。惟一与私塾不同的是上体操课。刘子瞻的堂弟,我忘其名,当时在福州什么学堂读书,寒暑假回家,他义务来教我们体操,把我们带到上水门东边郑家祠堂的院子内,按身体高低列成一队,教我们“立正!”“稍息!”“开步走!”喊“一,二,一二”。附近人家的老婆婆、老大娘、大闺女,以及没有人学的小孩子都围着看。他们以为这个刘家洋学生发疯了,喊着“鸡,鸭,鸡鸭”。他穿一套短衣长裤的学生装,本来就与众不同的。他是漳平县第一个不是秀才出身的新型

知识分子。刘志和老先生对他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不幸，在辛亥革命前那次大流行的鼠疫中死了。

其他三个初等小学堂，我不大清楚，但可以类推。这四个学堂不久也就停顿。招牌取下来，但讲台、黑板、课桌椅，仍旧摆在堂上，照旧进行私塾的教学。——至少，文明和求是两个小学堂是如此。

辛亥革命后两年或三年，邓炳来做县知事，要恢复停顿了的新式教育。他把任务交给刘志和，正式任命刘志和为“县立高等小学校”的校长。这个名称也带着革命的色彩，不叫“官立”而叫“县立”，不叫“学堂”而叫“学校”（似乎仍称“高等”，不称“高级”）。至于那四个“初等小学堂”，则没有人提起。

邓炳知事委托刘校长以全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他“组阁权”，让他自己决定聘任何人做教职员。刘校长是经过一段校长时间之后才能行使这个权力的。

新学无形停顿几年之后，一经宣布恢复，那些旧时的教员便自动来学校教课，不管刘校长是否聘任他们。这并不奇怪。他们并不承认刘校长有任免之权。莪宾先生来教植物学，玉芝先生来教什么课（他还占有一个房间，居住在校内），我忘了，一个蓝田陈的老先生，家住浮桥头的，也来教国文。

学生方面则情况更加复杂。此时永福学生不来了，因为永福那里也办了小学校，其中包含高等小学校。县城内外的老学生，在停顿以前入学的，或简单挂了名的，此时约有二三十人，分为丙丁两班。他们一面挂名在学校，一面在私塾读书。学校停顿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仍旧在私塾学习。私塾自然没有算术和英文，但学校以前也不教英文；有人教算术，但不见得高明，那些曾想考秀才的“大学生”也不重视算术。学校名册中还有一个“戊班”，那是一个子虚乌有之“班”，不知谁在停顿以前编造出来的，为的向省里管教育的衙门存案，以表示办学成绩的。这个“戊班”的学生姓名都

是虚构的。大姓的学生多几个，小姓的学生少几个，县里有的姓一般都照顾到了。例如，戊班学生中留下两个姓郑的位置，一个叫做“郑绍康”，一个叫做“郑绍兰”。

邓知事和刘校长商定学校恢复的办法如下：办好丙班学生的毕业手续，丙班学生不上课了，两个课堂给丁班学生和新招的戊班学生上课。

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此时多数在三牧第，就教于岑仲先生。少泉先生那时尚未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每日过足鸦片烟瘾之后也到三牧第来，主要是办理丙班毕业的手续。

这手续很别致。这班毕业生既不上课，也不考试，只在三牧第，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毕业表格。表格只有一张样张，必须照式画若干张，每个学生一份；上面有姓名、年龄、家长、籍贯，又有每学期考试成绩以及毕业考试成绩，分数都是少泉先生定出来的，叫各人抄录在表格上。少泉先生熟悉每个待毕业的学生的水平，所定分数大致适合，总之没有人表示异议。画表格、填表格很费事，忙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可是，完成后，少泉先生发现表格填错了，全部作废，又要重新画表、填表，为什么填好了的不能用呢？我过去知道，今天说不出来了。那些待毕业的学生是不应当抱怨的，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表格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手续。

漳平县立高等小学校丙班学生毕业了。他们领到了毕业文凭，可以参加祭孔，可以去龙岩中学读书了，可是没有甲班毕业生那么显赫。首先，他们的毕业文凭就不是知事坐在大堂上发给的。我也忘记了，全班有几个毕业生。我只记得几个姓名：陈任秋、陈锦文、郑宗房、叶鸿卿、郑寿南。这是一九一四年暑假前的事情。暑假中，上述五人都去龙岩中学考试，都录取了，暑假后就进龙岩中学读书，编入戊班。

我所以知道而且记得这些事情，只因为这一年我也做了“大学生”，住进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我和族兄郑寿南同住一个房

间,少泉先生白天就在我们的房间办事。我亲见他如何指导学生填表,那些学生又如何毕业的。

一九一四年暑假后,那些没有接到聘书不能继续来学校教课的教员都走了。是他们识相自动走的,还是刘校长赶他们走的,我不知道。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刘校长受人憎恨。暑假后的教员都是刘校长正式聘请的。三个创办人: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其中只林有声一人留任,教我们体操和国语。其实,静居先生此时担任县商会的秘书,事情很忙,勉强挤出时间教书,何必聘请他呢?少泉先生去北京应文官考试了。养奇先生同刘校长不和,自己不来教书,自从学校恢复时起他就不来了。最引人注意的是刘校长聘请了岑仲先生为国文教员,兼任学监,住在学校内。岑仲先生未去福州学习,以前也未曾做过本校的教员,此次高升,只因为他教的“大学生”都须正式来学校上课,而且都须搬到学校来住宿,惟有他能管这些“大学生”。此外,刘校长还聘请了一个新教员,叫做陈纯青,来教英文。这人不是秀才,也不常住在漳平西门外老家,据说在漳州或厦门做什么事情,在那里进过洋学堂,学过英文。邓炳知事来漳平上任途中,陈纯青从外地回家,恰好与邓炳一行人同船,从华封到漳平。在船上两人谈得很投机,邓炳就推荐给刘校长了。辛亥革命前小学不教英文,现在要教英文。我不记得当时谁教算术。图画,则是岑仲先生拿出画谱,教学生自己去画的。音乐,则是新民小学一个教员来兼课。这是一个永福人,我忘记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进过新式学堂。

丁班学生,大部分是三牧第的“大学生”,少数是从其他私塾来的。他们都是过去人了学,即挂了名的。三牧第有三个“大学生”过去未曾挂名,因之不能编入丁班,只好同新招的学生编入戊班。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族叔(与我同年),另一个是陈祖康。我们三人大概因为年纪较小,停顿以前,未曾在学校挂名。戊班本无学生,但停顿以前已经有了学生的一份名册。不知是谁捏造了这个

名册,其中各姓都有,大姓的人多些,小姓的人少些。新招的学生,不难从中认取一个姓名。名册中有两个姓郑的,一个叫“郑绍康”,一个叫“郑绍兰”。我的族叔赶紧占据了“郑绍康”,留下“郑绍兰”给我,我只好取这个近于女性的名字了。我们三人正式入学上课后,便比同样从三牧第来的人低一年级了。论读书成绩,我们三人并不比同样从三牧第来的人更差些。

我们上了一个时期的课。我们的长辈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安排。刘校长同我的祖父郑秉钧,同陈祖康的父亲陈寿山,三人商议,如何把我和陈祖康两人从戊班提到了丁班来,当年就可毕业。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备一份厚礼送给新民小学校长陈龙章牧师。请他以书面证明我们两人是新民小学毕业班的学生,转学到县立小学来的。陈牧师答应了,倒不是为了礼物,而是因为向他求情的人是本县的头面人物,很难拒绝。为了做得好看,免得人家反对“特权”,连我的族叔“郑绍康”也在转学之列。从此时起,我就不叫郑绍兰,而叫郑超麟了(少时,准备考秀才,我的一个堂兄曾名“起凤”,我曾名“起麟”,此次则改为“超麟”);陈祖康也是此时才名“祖康”(他的二哥名祖诒,也在丁班);我的族叔郑绍康则改名为郑雅中。从此,我们三人都在丁班上课,这年年底经过考试,都毕业了。试题是邓知事或其幕僚出的,试卷批了分后还送进衙门去复核。毕业典礼请邓知事莅临讲话,比丙班毕业时隆重得多。但丙班全体毕业(甲班亦然),我们丁班则有三个考试成绩不好,没有毕业。此事当时引起议论。有人写“无头字”在城内张贴,根本反对“新学堂”,留恋旧科举。其中有两句受人传诵,即说高等小学毕业生“得之不足为荣,失之适足为辱”。这是八股文的句法,我父亲很欣赏这两句。当时丁班三个不能毕业的学生,确实由于水平太低,他们自己有数,但三人的家长则认为奇耻大辱。

丁班毕业生姓名,我能记得的有:张澄清、刘奎光、刘清秋、刘子明、郑绍曾、刘仲衡、郑雅中、陈祖诒、陈祖康、叶××(忘其名)、

郑超麟。

此时，县城内外的小学毕业生不能为县立小学所独占了。西门外福音堂也办了一个小学，叫做新民小学，其中有高等班，也能办理毕业。太常陈家，在邓炳来任知事后，也用族产办了小学，从初等到高等，一九一六年也有一班学生毕业。校舍不在大夫家庙，而在紫云书院。此前，一九一三年，天主堂也办了一个小学，也在衙门立了案，但一年就停办了。

岁时记

元旦

元旦,继承除夕,仍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不出去拜年,也没有亲戚朋友来拜年;如果住的是大屋,同分了家的兄弟、堂兄弟等等合住的,则各家互相拜年,首先向长辈拜年。元旦这天不劳动,连大家的丫头也不劳动。劈柴,挑水,扫地,都是前一日做好的。连除夕夜里换下来的衣服,元旦也不洗。烧火,煮饭,洗碗,这一类劳动还是要做的。

元旦全日素食,一般都较简单。小孩子一律新衣、新帽、新鞋袜;大人即使不换新衣,也要穿平时最讲究的衣服。小孩子吃着除夕的赏赐:红柑、面鱼;拿着压岁钱去买鞭炮,拆开药线,一只一只放。十几岁的少年,以及二十几岁的青年,无论已婚未婚,都去外面大路上和空地上赌钱。县官禁赌,但初一至初五这五天内不禁,由此至元宵也不严禁;家长也默许子弟赌钱。好子弟和不学好的子弟,平时是泾渭分明的,这几日内便聚在一起赌钱了。路上赌摊最流行的赌法,是所谓“八面”,官文书上称为“小花会”。用牛角制成一个八面形的陀螺,绕着竹质轴心旋转。八个平面各刻一个人名,都是“花会”中人,四面红的是:“太平”、“吉品”、“日山”、“合同”;四面白的是:“音会”、“有利”、“上招”、“月宝”。摊主捻动陀螺,使之在一只瓷盘内旋转,然后用一只瓷碗盖上。赌客则把钱押在木盘上写着八个人名中的一个人名。陀螺不转后,摊主揭开盖碗,朝

上一面的人名就决定输赢。押中了的,摊主就赔;押不中的,摊主就收。我不记得押中一文钱赔几文钱(似乎押中一名的,一文钱可赢六文钱;押两名的可赢三文钱;押四名的可赢一文钱),但总是对摊主有利的。也有人把赌注押在两个人名中间的,押中时只赢一半;也有人把赌注押在四个人名中间的,押中时只能赢四分之一了。算法很合理,除了根本有利于摊主的一点以外。这种赌法,今天总有人知道,可以补充我的遗漏。

“八面”之外还有牌九、押宝、骰子,这是路上的赌。较有身份的人则在家中玩纸牌,即所谓“叶子”,这是旧中国很普遍的赌法。各地“叶子”形式差别很大,我们那里通行的大概是一种特别的形式,像棋子的形式,有将、士、象、车、马、炮、卒,又有福、禄、寿、喜四色,这种纸牌都是龙岩人开的纸店卖的。铁儿馆是私塾,过年时没有学生,我的父亲就把大厅腾出来,招他的朋友玩纸牌,摆了两三桌。辛亥革命后,麻将牌兴起,纸牌就没有人玩了。

元宵以后照例是禁赌的。但麻将牌不在禁内,大小绅士终年打麻将,一般市民有时也打麻将。人家说邓炳知事也在衙门内打麻将哩。传统的赌钱,元宵后也未曾禁绝。时禁时弛,习以为常。不过这是那些赌徒的事情。我们县里居民有一种特别的成分,没有正当职业,专靠赌钱过生活,土话叫 liu giao, liu 是“流氓”,giao 是“赌徒”。这种人发不了财,也无产可破,但生活还是过得去的。他们聚集在赌场周围。赌场设在后巷口,城墙边,经常有二三十人围着一个中心。我不敢挤进去看。那里总是大声叫嚷,有时打架,某次还杀死一个人。凶手,我认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他从绑腿中拔出一把尖刀,刺进对方的腰里而自己逃走了。这种公开赌场是有差役或亲兵受贿保护的。赌客除那些赌徒自己以外,主要是街上的店员和溪上的船夫。

正月初二则是走亲戚的日子。女婿带着外孙这日来拜年,岳父家一般要设宴款待。朋友相互拜年也是从初二开始的。主人待

客一般是“冰糖茶”，即茶杯里先放冰糖块，晒干的黄豆芽和生的芫荽叶子，然后从茶壶倒入茶水。不知道元旦如此敬客含有什么意义。我的父亲的朋友，这几日来我家总要过足烟瘾，大家见面都是很客气的，没有争吵；即使有什么事情交涉，见面也不提了。有一年，我听父亲说：古人所谓“尧天舜日”也不过像这样的日子。

自然，我所说的是一般地主人家过年的生活，包含商人在内，他们虽非地主，但先世是地主，仍要模仿地主过年，也包含从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提高了经济地位的家庭在内，他们也要模仿地主过生活。一般人家，平时虽然贫苦，总要积累一点钱好好过年的，

但仍有一部分人不能那样过年。我说的不是乡村的人，那里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只说城里人。元旦一早，就有乐工分成几队，一队四五个人，分头到有钱人家去奏乐，无非吹唢呐，敲锣鼓，来时说些恭喜庆贺一类的话。主人照例送红包给他们，他们又千恩万谢到别家去吹打了。有时一个乐队刚走，另一个乐队又进来吹打。主人仍须送红包给他们，不能拒绝他们进来。我们小孩子都听腻了。一次，三伯父教训我们：你们这些小孩子，有新衣穿，有鞭炮放，可晓得那几个敲锣打鼓的小孩子等着今天的红包去买布做衣服吗？

初一至初四，一般店铺不开门，但那些卖香烛鞭炮的龙岩店是开门的，本地的糕饼店也有几家开门，卖面鱼。一种发酵面粉做的，用木模印成鱼形的甜饼，有巴掌一般大，用炉子烘熟的。给小孩的食物，红柑之外就是面鱼。为什么一律做成鱼形，想必又有什么故事。

迎 佛

正月初五，街上店铺一律开门营业了。恰好这日开始“迎佛”。小孩子快活自不用说，大人也不放过这个热闹的局面。

迎佛是有组织的。每个寺庙有一笔“基金”(不是钱币,而是田产,由专人保管,正月迎佛就是由此“基金”供给费用的)。

迎佛队伍,随各庙菩萨而规模不同。一般是:一队旌旗走在前面;接着来的是“戏坪”,即一块大木板,四周有矮栏杆围着,中间扎着石头、花木之类,二个至四个小孩子坐在花石下面,装扮戏曲人物,大体是才子佳人之类。四个壮汉抬着走,“戏坪”多至十几个至几十个;“戏坪”后面还有“大鼓”,那是从祠堂和大宅搬出牛皮鼓来装扮的。大鼓上面只能立着一个小孩子,扮成英武的人物,小孩子身躯捆在一根立柱上,外面看不出捆迹。四个壮汉抬着“大鼓”走,另有一人则用鼓槌边走边打鼓,背后有七八个小孩子敲锣,同鼓声相应,十分雄壮。鼓上的小孩子最常见的是扮成达摩、僧人打扮,满腮胡须茬子,手执禅杖,同鼓声锣声相配合,显出一种刚健的美。我相隔近七十年还清楚记得。漳平县的牛皮大鼓是远近闻名的,外县也有人来坂尾乡定制,与竹帘同为本县特产。县里特设一种税,叫做“鼓捐”,专收制鼓的手工业者的产品税。大祠堂以及一般大中住宅都有一只鼓,每逢初一、十五早晚敲打。上面所说的随鼓的锣,不是普通的锣,本地人称为“钟”,声音比锣更洪亮,因为更大更重,中央突出一个比鹅蛋更大的东西,锣锤敲打在这个东西上面。我在外地也见过这种乐器,但不知道正名是什么。小孩子不能一手提着,一手敲;都是将一个长竹片绑在背后,将锣挂在竹片头上,左手扶着挂绳,右手敲击的。“大鼓”不是每次都有的,即使有,也不过二三架而已。有时还有“镇马”,即小孩子扮成戏中人物,骑在马上。有时还有锣鼓队,那是私人组织起来参加队伍的。以后就是“佛亭”,即木制而油漆精美的轿子,菩萨坐在里面,八个壮汉抬着,一个人持着小华盖在前面引路。我们小孩子最爱看佛亭“起鼓”。走到一个比较空阔的地方,引路的人掉转身来,拿华盖对着佛亭转几下,然后回头快跑,八个壮汉也抬着佛亭快跑追赶他,他再转过身来,八个壮汉也转身向后快跑。如此反复了三四

次,大家都说“菩萨起鼓”了,意思是说:菩萨显灵,表示他快活。少时,家里流传我的一个笑话,即某日我在饭桌上曾说:“吃肉会起鼓,吃菜尾不会起鼓。”佛亭后面就是本地头面人物手执一支香跟着走;再后面就是那些还愿或报恩的人,持“铙”放炮。所谓“铙”,就是一根木棍,顶端装着铁炮,先塞一段药线(导火引线)在铁炮底上小孔内,再从腰里拿下盛火药的牛角,把火药倒进铁炮膛内,塞紧,然后用香头点燃药线,轰然一声。

正月初五迎观音,这是全县城的保护神,规模相当大。观音庙,大家叫做“观音亭”。这是一个特殊的建筑物。北门外有条水沟相当宽阔,平时流水不多,大雨后北面群山的水都由此流出,甚为壮观。漳平人不知何时采用了特殊的架桥方法:用很多又阔又长的石板架在水沟的两岸,就在这些石板上盖起了观音庙,庙门前做行人的桥梁,桥梁上面也有瓦顶遮盖,旁边还有石凳供人休息。这是一个大工程,值得留下做纪念的。不知今天还存在吗?观音亭平时香火很盛,所以每年迎佛,规模很大,但不是最大的。

正月初六迎东门仙妈。但从我记事时起,这日迎佛就废了。东门仙妈宫仍旧存在,宫在东门外,宫门直对城门,我去东门外玩时常进宫里看看,香火还是有的。一次我还看到菩萨座前挂着新的帷幕,上写(或绣)“三山弟子某人敬献”字样,可见连福州人也来拜这位菩萨。但为什么废止迎佛呢?

正月初七迎上三公,正月初八迎下三公,正月初九迎城内三公。这三天的规模都不大,上三公比较好些。县城内外同时有三个三公庙,一连三日迎接三公出巡,这“三公”究竟是什么神呢?我少时听说,“三公”是三个劳动人民,他们看见九龙江上险滩很多,不能通航或通航危险,于是号召众人去打通航道,结果成功了,后人为了报答他们三人做的好事,便立庙供奉。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供奉三公是为了崇德报功,而非出于迷信的。上三公庙门前有一座大石碑,据说上面记载此事,三人还是有名有姓的。我没有看

这石碑,不知确否?不知此碑尚在否?现在还来得及考证这件事情。应当组织力量去访问老人,特别访问老船夫,去调查别处是否有三公庙,去参考其他志书有无关于“三公”的记载。如果我所得传说是可靠的,那么重建三公庙是没有意义的,应当建立一个“三公纪念馆”,犹如都江堰纪念李冰父子一样。

我近日得到一本道光老县志,复印的。我希望能够从中查到“三公”的事迹。可是翻检一下,只找到了三个三公庙,却找不到“三公”本身来历。“上三公庙”下注“道光十年重修”,“下三公庙”下注“道光元年重修”,二者都注“在桂林坂”,“三公庙”下注“县坊”。

正月初十迎大帝爷。这是迎佛的高潮,规模最大的一天。大帝爷宫称“御行宫”(县志作“御兴宫”),在县西北城外,即陈玉鸣“拆城”的下面。大帝爷,据说原是个医生,乐善好施,人民为了他救死扶伤,感念他的功德,尊之为神,塑像膜拜。不知何时被封为“宣封大帝”,人家说这个“菩萨”特别“灵验”。去朝拜的人很多,香火鼎盛。我的母亲早晨起就阵痛,但长久产不出来,于是把大帝爷从城外“请”到城内家里来,供在大厅上,不久“同身”(即神汉)就跳起来,手挥宝剑,从大厅跳到产妇的房间,我就生出来了(不是呱呱坠地,因为闷久了,哭不出声)。但从我懂事时起,我在正月初十迎大帝爷这一天,我家并未提供什么节目,我的家长也没有去跟随佛亭。

正月初十的迎佛,比其他日子,队伍至少长三倍。不仅后坂洋人为自己的保护神提供节目,而且城内四门,城郊各乡都送了节目来。因为御行宫的菩萨十分灵验,报恩者多。

正月十一迎坂尾仙妈,正月十二迎坂头顶仙妈。这两日没有初十热闹,但比初七、初八、初九三日热闹得多。因为三公庙不过动用基金而已,仙妈宫则除动用基金之外,还可调动本乡居民为自己的保护神出力。

仙妈是什么神,我不知道,总是有来头的。每年正月初十,我去大帝爷宫看队伍准备出发时,总要遇着一个十几人的小队伍,从北郊方面走来,静悄悄地,作远游归来的装束。人家说,他们是替坂尾仙妈宫去远乡某山头“割火”,今日才回来的。可见那个山头的仙妈宫是原始的仙妈宫,而坂尾、坂头顶、东门三个仙妈宫不过是“分宫”罢了。我不能希望县志告诉我本县人民崇拜的仙妈的来历,因为县志连三公的来历也不告诉我们,何况“淫祀”。但县志记着坂尾有显福宫,坂头顶有龙兴宫,似乎就是这两个仙妈宫。

我上了中学以后,某年正月十一去坂尾看迎佛,那里有我的中学同学,他们邀我去。我看见国会议员刘万里,手执一炷香,同坂尾的其他头面人物一起,有说有笑地跟随仙妈佛亭行走。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迎佛前一二天,“同身”跳起来了,说仙妈要刘万里跟随佛亭。刘万里于是照办。

城内外迎佛是不过江到坂尾去的,也不到坂头顶去,到校场圩就折回来了。但坂尾和坂头顶迎佛则须到城里来,游遍全城。

正月十三迎城隍公。这是一种特别的迎神。队伍并不长,花样也不多,但很严肃。因为城隍公是正式的神,写入《祀典》的。城隍公和知县平起平坐。按规定,每月初一、十五知县都要去城隍庙行香。漳平县城隍庙是本县最大的庙宇,如果永福方面没有更大佛庙的话。

迎城隍,虽不热闹,却是严肃的。大家不把城隍公看成普通菩萨一样。佛亭前有个仪仗队,高擎十多种兵器或刑具,令人生畏,这是以前几日迎佛所没有的。队伍中似乎也有人扮演无常、判官及其他鬼卒。

正月十三就结束迎佛了。在城内,迎佛必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西门至东门的弯弯曲曲的大街,另一条是由东门沿城墙边通道,经过南门直至西门。一般是先走第一条,再走第二条,但由东门进城的队伍,先走第二条,不走第一条。

迎佛队伍,除上面所说几种节目外,还有人把家藏古玩摆在八仙桌上,如小屏风、香炉、盆景花瓶之类,两个壮汉抬着走;也有人穿起戏装,抹白鼻子,打打闹闹,在队中行走,不过有粗绳子围着这批人,不让人混入。八仙桌上的古玩摆设,一般都是按传统排列的。例如,一架玉石小屏风放在正中间,两旁放着花瓶,前面放着香炉,以及其他的古玩。一次,不记得迎什么佛,养奇先生布置一个八仙桌,上面只有七八件古玩,稀稀疏疏地,毫不对称,使见惯那些传统摆设的人觉得新鲜,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因此发生了一次小争论。

漳平县的迎佛总是在正月上半月举行的,但也有例外。据长辈说,我出世以前好多年,本县曾举行一次迎“郭圣王”的盛会。郭圣王庙在校场圩,关帝庙的南边,我少时去过,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曾盛极一时。据说,那年不是正月,迎佛时菩萨尚未出庙,前队旌旗已经到达浮桥头了。郭圣王是泉州人,在泉州受到狂热的崇拜。我的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我少时曾去泉州朝拜郭圣王,那个乡村知道他是为此而来的,便盛情欢迎他,免费招待他食宿。我想,从福建省志可以查到这个凡人怎样成为菩萨的,为什么远离泉州的漳平县也要为他立庙?道光县志中无郭圣王庙记载,可能建立于成志以后(泉州或是永春之误)。

一九一〇年平时的迎佛,倒是我亲历的。这年第一次流行鼠疫,^①县城内外死了不少人,县里头面人物于是决定迎天宫山观音来祈禳瘟疫。秋天,我随祖父和其他的绅士到坂头顶一片沙滩上迎接从雁石开来的船上的观音佛像,送到北门外观音亭供养。几日之后举行迎佛,盛况不减于正月初十的迎大帝爷。我家也提供了一个节目,就是“镇马”。那日,我被打扮为一个古装书生,右手持一个算盘,骑在马上,游行了一整天。据说扮的是《何文秀算

^① 漳平传入鼠疫始于一八八八年。

命》。

为了表示虔诚,这一类节目总是自己的子弟扮的。至于一般“戏坪”、“大鼓”,则扮演的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每日获得微薄酬劳,午饭吃一顿点心。行头、道具、雇工、酬劳等等,大部分是住在中水门街一个祠堂的永春人承包的,但也有别人承包。我的事情就是东门太常陈家一个叫做“大王茂”的人承包的。马、戏装、道具、打扮、照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我家付他多少钱,则我不知道。

迎佛是否限定于县城及其近郊呢?也不尽然。似乎以前每个大乡村都有迎佛。我们的老家和春乡是个大乡村,以前也有迎佛。迎的菩萨叫做“郑公”。和春东头一个小山上有个郑公庙,我少时曾上去看了一下,平时也有香火。可能是我们郑家的人把自己的祖宗当着菩萨来供养的。

基泰是个更大的乡村,也有迎佛。我少时常听人家嘲笑基泰人的一句话,叫做:

bi lua lan yao yet, yanghut giang can chen, jiu mu lan doe hutding.

基泰人妖孽,迎佛行田塍,妇人随佛亭。

远郊的乡村,也有人为了看迎佛,住到县城亲戚家里的。

元 宵

元宵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江西街有几家纸扎店,平时给人糊灵厝,糊金山、银柜,元宵前也扎了灯出卖,但买的人不多。晚饭时桌上比平日丰盛些,晚饭后小孩子就是放“天中箭”,即“火箭”,一种特制的爆竹,附有一根长麦秆,点着就冲上天空,发一点白光,再掉下来。

有些人这一夜带着小蜡烛去人家菜园里偷菜,偷一棵菜就在原地上点一支蜡烛。主人不会见怪。

元宵过后,一切生活就都上轨道了。私塾开学,商店消除了过

年的气氛,农民备耕,手工业者正常劳动。

清 明

清明前十日和后十日,是扫墓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是定清明为祭扫先人坟墓节日的。今天各地在这一日都要去烈士陵园举行吊祭仪式,中央政府还要派出官员去祭黄帝陵。

但漳平县有特别的风俗:正式祭奠,不是清明节,而是晚秋时节。地主以及一般有身份的人家,长辈死后必须营造正式坟墓来安葬,从相地、求山、定向、穿穴、立碑到墓前席地设宴款待戚友,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耗费很多的精神和金钱,然后才算完成了送终大事。否则下辈问心不安,也不光彩。所以即使家境不好,也要勉力去完成这件大事。许多人家,宁可将棺材寄存郊外的寮屋或暂时埋在某一山头,而努力奔走去筹措筑坟的经费。正式坟墓做好以后,每年在晚秋祭扫一次就够了,清明没有事情。惟有那些做不起正式坟墓的人家,或暂葬待迁的人家,才于清明节上坟供祭。两种不同时间的祭扫,究竟哪一种人家占多数,我很难下结论。

端 午

四月初一晚上居民可以听到一阵鼓声,由远而近,于是无分男女老幼都站起来,跳几下,好像抖掉身上什么东西。大家说,这是“龙船鼓”,在鼓声中抖掉身上的跳蚤,就不会再有跳蚤了。这自然是迷信。却是流传了好多世代的迷信。

“龙船鼓”告诉人:一个月零几日之后“溪”上又要赛龙船了。我们小孩子只知道南边城墙外面那条大水叫做“溪”,进了学堂之后才知道那叫做“九龙江”,而每年五月初五赛龙船是为了拯救两千多年以前在湖南省汨罗江上投水自杀的一个叫做屈原的忠臣

的。我们小孩子只知道溪上看赛龙船，十分好玩。五六条船，特别制造的，船身狭而长，两边各坐着十几个壮汉，上身赤膊，手中拿着一把桨，另有一人站在船头击鼓，又有一个人站在船尾掌舵，并排停在天主堂前的溪面上，一声锣响，群桨齐动，向着浮桥方面冲去。起初船头还是并齐的，不久就看见几条船开向前面，几条船落在后头了。于是两岸观众高声叫喊“快，快”！不到浮桥处，下水门前的溪面上，停着一条小船，不动，船上堆着花花绿绿的东西，首先冲来的船到这小船边就停下来了。小船上的“彩”是头船独得，还是分给后来的船，则我们小孩子没有兴趣去打听。

说是“龙船”，其实是没有任何装饰，更没有扎成龙形。人民虽然不懂物理学，但由经验知道，船上添加一件饰物，就要减低一分前进速度的。

参加龙船竞赛的，都是本地人，主要是近郊后坂洋、坂头顶、坂尾的青年农民，也有少数城内劳动人民。其中没有一个是“大工”，即职业的船夫。九龙江的船运，以漳平县城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从雁石到漳平，下段从漳平到华封（即华安）。两段的船，大小不同，但船夫几乎都是赤尾山人。他们不参加本县的龙船竞赛。由四月初一的“龙船鼓”看来，五月初五的赛龙船是有组织的，即有“基金”（田租）的。近郊各乡青年农民，抱着为本乡争气的思想，四月初一以后就在溪上训练，到正式比赛那日一显身手。但农民不懂得“费厄泼赖”，往往在竞赛之中互相打架。

赛龙船是下午的事。这日午饭很丰盛，虽然不如过年，却有特别的情调。前几日要包粽子，前一日要用菖蒲烧水洗浴，当时要在大门两边挂菖蒲，小孩子额头上要用雄黄写一个“王”字，午饭时酒里也要掺一点雄黄。我们小孩子最活跃是节前几日去街上药店讨香末，拿来装香袋的。姐姐、姑姑替我们缝香袋，做成老虎的形式。香末不是买来的，是讨来的，药店有义务，免费供应小孩子索讨的香末。小孩子讨了这个店，又讨了那个店，甚至一天中向同一个店

讨了几次,店里的人想出办法,给小孩子指头上涂一点洗不掉的颜料,讨过一次就不能再讨了。

端午又是商店结账的日子。过年后向商店赊欠的账,这日要结清,但那同我们小孩子无关。

中 秋

另一个结账的日子,就是中秋。

在中秋以前,有七夕。那只有一部分居民过的。妇女们准备几碟瓜果,夜间在空庭内、露天下、茶几上,祭牛女双星。瓜果中必须有一碟蜜饯桃仁。漳平盛产桃子,每年端午节前后上市,并不好吃,但大家都吃,把桃核乱丢地上。此时,我们小孩子就奉了使命收藏桃核,让伯母叔母于七夕前敲出桃仁,用红糖熬制。祭星之后自然分给小孩子吃。关于穿针乞巧一类事情,只是当作故事在此夜谈说。

七夕之后不久就是中元鬼节了。听说有一部分居民采取什么措施,如在门外烧香点烛,陈列酒肴之类。有时放水灯(似乎是七月卅夜地藏王爷放的),从天主堂下面放下灯,木板上插着蜡烛,外加纸罩。小孩子都到溪边去看,可是水灯流到上水门时大多数已经熄灭了。我们以及大多数人家不过中元鬼节。

中秋节前后,大人闲谈中总要说,我们是八月十五过中秋的,但有些人家是十四过中秋,又有些人家是十六过中秋。据说,这里有“军户”、“民户”之分。我们是“民户”。但什么是“军户”呢?

道光县志卷三第一页记明隆庆六年,漳平全县共有户数三千四百三十,其中六百零四户是“军户”,二千七百九十三户是“民户”,六户是“窑冶户”,二十七户是“匠户”。如此,旧时居民不仅有军民之分,而且另有“窑冶户”和“匠户”,虽然比率很小。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研究户口变迁史。大概有个时期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家有

各种不同的义务和权利,有各种不同的起源,后来虽然一致化了,但生活习惯仍未完全同化。不同日子过中秋就是其中之一。每年送灶君上天的日子也是不同的。大多数人家是腊月廿四,也有过廿三或廿五的。

中秋前几日,亲戚朋友互送月饼。漳平县制作的是潮州式的月饼。饼薄而大,直径有一尺或一尺以上的,普通也有七八寸。很少看见小月饼,最小的也比上海所见的广式月饼大得多。馅料大都是红糖加冬瓜,饼皮很硬,一点不好吃。与其说是供人吃的,宁可说是供人送礼的。上纸做成袋袋,套着月饼,外贴红纸互相馈赠,收到的人又当作礼物,送给另一家人,最后当然吃掉。我们小孩子对月饼没有兴趣。

中秋晚上全家吃一顿团圆饭。如此而已。饭后也不讲究赏月。

私塾学生在中秋前几日要送“节敬”给先生。不是实物,而是红纸包着毫洋。端午前也是要送“节敬”的。

重 阳

重阳前后,我们小孩子忙着放风筝。漳平人不是在春天,清明前后放风筝。而是在秋天,重阳前后放风筝的。放风筝主要是小孩子的事情,但大人也很热心,他们在小孩子背后当顾问,教小孩子如何扎竹架,糊纸头,扎绳子,如何看风色,放上天去。当时吹的是西北风,风筝总是升上东南天空的,因此城南地势最好,我们在家门口城墙上放,城外是大溪,没有山丘和房子障碍着风筝。住在城北的人就没有这样便利了。他们只好拿到西山或北山上面去放。大人,即二三十岁的人,有时自己也放。辛亥革命前最后一任知县,姓钟,山东人,有四个或五个儿子,大家叫他们“少爷”,常在街道上闲荡,秋天特别爱放风筝,而且特别爱到上水门城头上来

放。他们玩的风筝不能同我们小孩子的相比。他们的风筝，糊得讲究，大型，而且做成动物，甚至美女形象。他们的绳索粗得多，而且用一个轮子放出，收回。有时风筝的拉力如此之大，我们小孩子会被风筝拉着走。下水门一带也有大人放风筝，也放动物上天，最好看的是一条大蜈蚣在天上飞腾。放大风筝时，还可以把一吊鞭炮挂在绳索上，鞭炮药线绑着一支香，不知怎样，鞭炮和香会沿着绳索升上去，直至风筝那里，香燃到时鞭炮就在空中响了。

我们上水门小孩子玩的风筝，都是自己扎，自己糊的，只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鱿鱼”，即是一个正方形，一个角朝上，相对的角度周围则挂着五六个长纸条，放上天空，动摇不定；另一种叫做“牙牌”，即做成“吕”字形，整个说来是一个长方形，下面不需挂纸条，放上天空，比较稳定。我们的绳索都很细，母亲、婶娘、丫头，事先替我们搓好的。我发现，上一辈比我们更重视风筝，我的三伯父房间墙上挂着两个风筝骨架，都很大，一个是蝉，另一个是蝴蝶，可是没有一年曾见三伯父把骨架糊起来，放给我们看。

“登高”只是斯文人的事，而且不是斯文人中普遍的习惯，也非年年如此。我记得，有一年，我的父亲烟榻的常客约定九月初九去西山登高。多数是秀才，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在内，但有一二个不是秀才。大家到西山高明寺去，在寺的大殿上铺下鸦片烟榻。和尚殷勤招待。对着这批秀才，和尚不敢不招待，事先有了通知。我不记得一顿午饭是和尚备的，还是城里私家厨子挑了去的。大人在庙里过足烟瘾，说足笑话，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子有兴趣，从庙攀上山的尖顶。

我有一首词回忆此游。其中，“啸傲烟霞，流连诗酒”二句是艺术性的夸大。所谓“啸傲烟霞”就是吃鸦片烟。所谓“流连诗酒”，“酒”是有的，但过足烟瘾的人对酒没有多大兴趣；“诗”则纯属虚构。并非秀才们不会作诗，他们要做五言律的试帖诗，才能考取秀才，但他们平时不作诗，科举废除以后更不会去作诗。总之，我未

见本县文人写的一首诗。——后来去龙岩读中学，却知道龙岩县的秀才们常写诗，知道他们结为诗社，春秋佳日常去郊外分韵赋诗。我曾见我们的学监连天锡先生案头上有一本自抄的诗集，叫做《留删诗草》。

漳平人登高或郊游，总是上西山去的，那里有佛寺，又洁净。也有人去玩东山，那里有莲花岩，有朱文公祠，有东山书院，但无人居住。民间又流传东山出鬼，因为东山是乱葬岗。外地人客死漳平的往往葬在此山上。相传野狗从浅葬的坟墓拖出尸骨。有人打赌，谁敢夜里上东山去，在朱文公祠前举起火把为信号，就可以得到多少多少钱，结果没有人敢上去。北山就是佛儿隔，那里也有建筑物，祀什么菩萨，我曾陪母亲去烧香，母亲在那里“听卦”，即是在山顶上偷听山下行人说话，以卜吉凶。山前面有点坡度，可以拾级而登，山背后则是直起直落的，下面就是北面乡村来城的大道，行人不绝，最适于“听卦”。没有南山，除非把溪对面的山叫做南山。

祈 禳

重阳节过后，城里就热闹起来了。“四隅”（即四门）轮流做祈禳。一次做七八日，四隅共做一个月左右。每次大同小异。

首先要选择一个大宅子作醮坛。西隅醮坛总是设在洪厝坪永福陈家的祖祠；北隅总是设在太史第；东隅设在何处，我记不清楚，似乎在大夫家庙；南隅则时常改变，有时设在上刘祖祠，有时设在下刘祖祠，有一年设在中水门内西边一个大宅。祠堂不住人，腾出来做醮坛不困难，但大宅住满了人家，怎么能腾空呢？然而没有遇着障碍，因为这是好事，屋子做了醮坛会得到菩萨保佑。此外，只借用大厅、两庑和门厅，左右辅屋仍可住家。有一年，我的祖母要祖父去争取把醮坛设在上水门东边我们郑家祠堂。这个祠堂虽有两进，建筑形式也同普通祠堂一样，但住了人家。祖母的希望没有

实现,出于其他的原因,决非由于那里的住户反对。

醮坛用纸装饰起来,五颜六色,很好看。东西两庑的房间也布置得很好看。我记得,有一年洪厝坪醮坛布置一个客厅,椅子上坐着一个纸人,同真人一般大,大厅上挂着三宝佛像,和尚在供桌前面跪拜念经,当地头面人物则在和尚背后跪拜。院子里,高墩上,立着一尊纸扎的韦驮像,金盔金甲,手执金刚杵,十分威武。

和尚是从永福什么寺庙请来的。那时,二十世纪头十年,即我懂事的时候,永福还有两三个寺庙,有和尚住持,能承接佛事,城里的人从中选择一个寺庙聘请那里的和尚来做佛事。居仁里方面,除西山高明寺外,没有和尚能做佛事了。而高明寺里的和尚,不知为了什么,城里人看不起他们。有一次,东山莲花岩来了几个和尚,四处化缘,把破损的房子修复起来,我曾去看过,可是不多久,又无人居住了。东山脚下有个二层楼的房子,住着一个和尚,人家说他很有钱,每年坐轿子下乡收租,但不作佛事。观音亭也有和尚住持,也不作佛事。辛亥革命后,高明寺和尚只剩一二个,地主家里“还库”时,他们才从相识的俗人中勉强凑成一个班子来应命。永福里寺庙和尚比居仁里保存得长久,似乎可以解释为永福里耕地更多,地方更大,因之封建生活保持得更长久。但基督教传人也是永福里先于居仁里的。西门外福音堂的牧师,我少时所见,都是永福人。是否可以解释为永福里比居仁里更早发展资本主义呢?自然,不能如此机械地应用历史的唯物论。

在旧中国,僧道并称,但我少时只知本县有佛寺,却未闻本县有道观。这就是说,本县没有正宗的道士,即没有那种蓄发、留须、长袍的道士。道教还是有的。城内外居民中有一种称为“师爷”(念为 sai ya,以别于衙门内的“老夫子”,那就要念为 si ya)的人,同普通居民没有分别,照样种田,做工,经商,照样娶妻、生子。但人家请他去做“道场”时,他就穿起法衣,挽起高髻,髻上套着一件什么东西,用簪子插紧,手持一个锡制的号角,有时吹着,有时舞着,

口中念念有词,其中可以听出“太上老君”一类的字句。富人家里为了还愿,有时请“师爷”来“禳精神”,那就不是来一个两个,而是一次来五六个,一律穿了法衣,舞蹈,唱歌,旁边还有一人打鼓。我们小孩子更喜欢看“师爷”作法事,因为和尚只念经,不跳舞,也不唱歌。和尚衰微了,“师爷”倒兴旺起来。辛亥革命后,富家“还库”请不到和尚,有些人便请“师爷”来家里作法事。“师爷”有另一套做法,与和尚不同。当时大家叫做“师爷偷吃和尚饭”。辛亥革命后,北门街上还开了一家“师爷店”——开间的店面,里面挂着老君或别的什么神像,像前放着香案,“师爷”穿着法衣,替乡下来的大娘做什么法事。

奇怪的是“祈禳”、“打醮”,都是道教的名词,《水浒传》有个回目就叫做“张天师祈禳瘟疫”,《红楼梦》说“在清虚观打三天平安醮”,为什么城内四隅做祈禳、打醮不请师爷却请和尚呢?似乎因为“师爷”是不见经传的,是冒充道士的,有需要考证一下漳平县的“师爷教”起源于何时,同正宗的道教有什么关系,其他的县份是否有“师爷教”的活动。

醮坛里,和尚在念经,善男信女在跪拜;醮坛外,空场上,则戏班在临时搭起来的台上演戏。台下人山人海。日场之外尚有夜场。做祈禳最吸引人的是演戏。四乡的人纷纷来到城里看戏,白天看不够,夜里再看。回不去的就住在城里亲戚朋友家中。那时,城里人家,不分屋子大小,都要在墙内院子里立一根长竹竿,上面挂着灯笼,照耀着墙外的道路。

看戏,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没有封闭的戏院,戏台是搭在露天空地上的,看戏的人都站在空地上。有时县官老爷要来看戏,那就要在观众背后,较高的地方,安排儿把靠背椅子。县官来时台上的戏就要停下来,插演“跳加官”,即一个戏子,身穿古官服,头戴假面具,手持奏板,跳了一阵,不说一句话,最后展开一个轴子,双手斜擎着,上写“加官进爵”四个大字。县官随即叫衙

役拿箩筐装着铜钱,倒在戏台上发出响声。然后恢复演出。这种场面不常看见。看戏是免费的。

我少时,漳平县已无本地戏班了。听说,以前有个和坪人组织的戏班,称为“子弟班”,已经解散。还有一个“老生”,去外地戏班,有时也随外地戏班回来演戏。据说,他在外地演《沉香闹学》中的刘世昌,演完之后观众不肯散,一定要他再演一出。

到漳平来的戏班,演的是“潮路戏”;有时也有演“饶平戏”的,唱腔、音乐与潮路戏相差很远,本地人不欢迎。“潮路戏”演出汉戏,唱念都用“中州音”,斯文人都能听懂。妇孺也都知道戏中的故事。演戏那几日许多人家都在谈论戏中的故事,以及演技优劣。戏班从来没有直接从潮州府来,那些评戏家时常引为憾事。他们说,潮州有“四大班”,演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历数几个有名的演员,我只能记得其中的一个叫做“阿胶”,是演花面的。他们时常感叹,漳平县何日能请到“四大班”中的一个班。一九一五年秋我考进龙岩中学,这年十月或十一月间龙岩人请了一个潮州名班来演戏,我的父亲是个戏迷,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到龙岩县来,一面看我,一面看真正的潮州戏,以满足多年的愿望。

来漳平的,是几个客家人组织的戏班,我忘记了班名,它们是学习潮州班的。我们小孩子只晓得看故事,大人则要评论演技和扮相。辛亥革命前后,龙岩人苏家组织一个新班,叫做“新梅花”,到漳平来,与客家班竞争,有时在一个空场上搭两个台,唱“对台戏”,有时在两个不同空地同时演唱,以观众的多少定优劣。往往龙岩班获得胜利。这时那些评戏家见面就有谈不尽的话了。我同别的小孩子常常在上午不演戏的时候,跑到戏班住宿的地方去,多数是寺庙,人们在殿上搭地铺睡觉,无分冬夏都要挂帐子。那些演员,在戏台上生龙活虎,有挂白胡子老气横秋的,有插着雉鸡尾威武雄壮的,他们的面孔,我们都看得很熟,但在住宿地,我们看见,他们也都是小孩子,才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比我们不过大三四岁

而已。我们看见他们也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但是在台上他们能够演出那么动人的戏！我们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就在那几年，有一个富家子弟居然跟着一个戏班走了。自然以后还是失望回来。长大了，我不记得在哪一部西方小说中看到了类似的故事。

每年做祈禳时，演戏达到高潮，但并非说平时不演戏。每年二三月间，县城内外就开始演戏。城内，在城隍庙演戏，那里有固定的戏台。请戏班的钱，是大街上的商店付出的，他们借演戏招徕四乡的农民来城，繁荣生意，不愁收不回付出的钱。城外，则在溪对面上三公庙前演戏，那里空地大，常常可以搭两个戏台。请戏班的钱，是“大工”（即上下游的船夫）拿出来的。上游，从雁石、白沙到县城是一班“大工”；下游，从县城到华崙（或溪南）又是一班“大工”。那几年货运很多，两班“大工”收入不少，总之比农民和手工业者多得多。他们拿出一部分收入来报答本行业的保护神。九龙江船夫的保护神，不是龙王，不是妈祖，正是“九龙三公”。城里的人，白天是渡船去看戏的，晚上则除摆渡外，回来城门已关，还须攀竹梯，付竹梯费入城。如此辛苦，看戏的人还是很多。

冬至前后，有些祠堂祭祖时，也请了戏班来演戏。“人戏”之外，还有“柴头戏”，即提线木偶戏。价钱便宜得多。没有“人戏”时候，“柴头戏”也有人要看，尤其我们小孩子更爱看“柴头戏”。我少时还看过罗坪班的“柴头戏”，以后只能看龙岩班“柴头戏”了。

戏台锣鼓响，醮坛的和尚念经和厅堂装饰就没有人爱看了。祈禳最后一夜就反过来，吸引戏台下的观众。纸扎的韦驮以及其他六七个纸扎的人像（都是《封神榜》人物，其中有托塔天王李靖），都要等待和尚做法后焚烧，而最精彩的还是竞攀孤台这个最后的节目。在空地上用四根很长的杉木搭一个高台，台顶约有四层楼高，平板上放置各种食物，原是施舍给“野鬼”的。佛事结束时，和尚在台下念了经，于是四个壮汉便各据一根杉木，迅速攀上台去，先到台顶的人就可占有那些食物了。在攀缘时，台下观众不断欢

呼。我们小孩子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处看不到这样的一种竞技。

祈禳的经费，一定不少，都是居民捐钱出来举办的。东隅、西隅、北隅，居民更多，地主也多；南隅比较少，但南隅捐来的钱并不少于其他三隅，因为最热闹的道路在南隅，而上下游船夫也在南隅捐钱。南隅捐簿上第一名，就我懂事时起，都是我的祖父。捐簿的第一名叫做“缘首”，总是本隅内最有地位的绅士，他挂一个名，不见得捐出的钱比别人更多些。整个祈禳，则由“总理”调度。“总理”是推选出来的，旁边还有许多人辅佐他。南隅的“总理”一般是那些栈房的本地主人，他们供给上下游客商住宿，介绍生意，并同船夫熟悉。“缘首”不管业务，但若县官或衙役有什么麻烦，则由“缘首”去应付。如此规模的活动，从未发生什么乱子，捐款也很顺利。可见漳平县的群众之中也有人才，善于做组织工作。但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这是同菩萨有关的好事，一切都要看菩萨的金面，钱是捐给菩萨的，热闹是做给菩萨看的，遇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须为菩萨而忍耐，争吵起来首先就对不起菩萨。我想，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如此规模的演戏、祭神、喧哗、竞赛种种活动，一定要发生乱子。

事实上，这是农业经济社会中，每年秋收之后居民们一种庆祝和娱乐的活动，集中在城镇上做的；城镇商人也借此机会推销他们贩运来应付市场旺季的商品。戏台附近也有人摆摊子，推销外国进口的货物，以至于外国的赌博，如打弹子、套圈子之类。

似乎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再做祈禳了。

冬 至

冬至前后，祠堂祭祖。那几个大祠堂，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都是很隆重的，有时要演戏。有几个小祠堂，平时无人注意，此时也祭祖，仪式也算隆重。他们的子孙住在外乡，城内的

祠堂平时关着或租给人用,到冬至前后才来城里祭祖。我们郑家,远祖祠堂在和春乡,每年须走二十里去祭祖,每次都要在那里熟人家中住一夜;城里有两个近祖祠堂,每年也要开祭,读祭文,但并非在冬至前后,不知何故。

正式的坟墓,一般在冬至前后祭扫(但也不尽然,有提早的,甚至有春天祭扫),与清明扫墓,将祭品挑回家来吃不同,秋祭总是在坟上烧来吃的。往往要请亲戚朋友一同去坟上吃,客人免不了要在坟前跪拜,主人也免不了要客气一番。生的或半生的祭品,挑到坟上献祭之后,就在坟边垒一个灶,挑来涧水,拾来枯枝,炒熟,然后席地而坐,举行野餐,别有风味。盛菜的,往往不用瓷碗,而用特制的红漆木盘。如果是远代祖宗的坟墓,又没有祭祀田租的,祭墓时各家就分别准备祭品送去,然后一起热来吃。我们郑家住在和春乡,十八世纪才有一支移居城内,不知为什么有几个祖坟墓在北门外山上。我们的坟山也在离城五里的地方,以致每年扫墓时和春乡的族人走了二十里路同城里的族人一起祭扫。

冬至正日,各家都吃“圆子”。先几日就要用糯米舂成细粉,到这一天全家动手搓成圆粒,其中无馅。食时,先用红糖、姜片烧汤,然后把“圆子”煮熟,放入糖汤内。虽不好吃,毕竟是一件新鲜的事,小孩子也快活。

除 夕

冬至过后就准备过除夕了。

不记得在冬至前或冬至后,家里就酿酒。一般地主家庭,一年的酒都是自己家酿的,不到市上去买。媳妇怀孕,就要酿酒,准备产妇吃的鸡酒,以及满月时请客的酒。地主家里都有酿酒的工具,旧式蒸馏锅之类,也都有人善于酿酒。

除夕前约半个月,开始做三大果:糖果、发果、菜头果,都须舂

糯米粉,都须用大灶、大铁锅,旺火来蒸。糖果就是糯米粉加红糖,调成浆,在锅内蒸。发果就是禾米粉(也许是面粉)加酵母,加红糖,调浆去蒸。菜头果则是咸的,糯米粉(一说是普通大米磨成的粉)调成浆后,加入萝卜丝、肥肉、盐、碱,特别要加入很多胡椒,去蒸。这些事情,我们小孩子都插不上手,蒸好也不能随便拿来吃。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裸探”。这个名词取得好。“探”者,试验之谓,裸浆调好,不知浓淡如何,过咸或欠甜么,发酵是否适宜,佐料是否足够,不能等待蒸熟之后再看,须先试验一下。糖裸探和菜头裸探,裸浆是在铁锅内用油煎熟来吃的,大人除了试验以外多煎一些给小孩子吃。这种油煎的裸比水蒸的裸好吃得多,尤其菜头裸。发裸裸浆则不能用锅煎,只能用茶杯盛着在小锅内蒸,味道不见得比大锅蒸更好吃。

十二月廿四送灶君上天要供祭,烧香,点烛,放鞭炮;除夕再接灶君回来。此时前后,城外溪边也常有鞭炮声,说是永春店和“大工”做“牙”(即供祭本行祖师)。

除夕要贴新门联,一些地方要贴“福”字,红纸,方形,尖角向上。又要买许多纸钱,拉开成串,挂在屋门和房门两边。这日,街上热闹得很。不管是否“朝圩日”,农民还是进城朝圩,而且不去校场圩,直接来到大街上。街上店铺忙着收账,家里的大人也为了还账而发愁。我们小孩子就什么都不管了,只知道明日母亲要给新衣穿,今夜有压岁钱可拿(祖父的,父亲的),又可得到红柑和面鱼。

我的塾师

我有个偏见,以为自己的微薄知识都是自学得来的,并非某位师长传授的。我要学习某种知识或技能,绝不求人传授,即使有人自愿来传授,我也学习不好。我宁愿自己去培养兴趣,去搜集人门书和参考书,去钻研。我过去以为这种学习方法才是最正确的方法,而这样得来的知识或技能才真正是自己的。

晚年,我反省,认为这是“偏见”。强调“自学”是对的。俗语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各人。”进门之后自己不去努力,一味依赖师父,一定学不到本事。反之,即使没有师父携带,靠自己努力闯进门去,倒是大都能够成才的。但自学方法强调得过了头,就成为偏见了。我就是这样。

我强调自学,从书本上学习知识,对于著书的人表示佩服,感激,愿意奉之为“师”。但他们并未耳提面命教过我,连新式学校的师生名义也没有。反之,在新式学校教过我书的人,则我想不起曾经从他们学到了什么知识。因此,我并不佩服他们,感激他们,这是事实。但我在进新式学校以前也曾得益于私塾老师,这也是事实。至今我还时常怀念少时授我知识的一些前辈。

我在一九〇五年破蒙。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堂叔郑锡光。私塾就设在我家里。为什么不送到大的私塾去,就教于更高明的塾师呢?惟一原因是在自己家里方便,那时我虚龄才五岁,到别处去祖母不放心。

郑锡光,字履卿,乳名庆丰,比我的父亲小,但“进学”(即考得秀才)比我父亲早。家贫,“书香”(即祠堂每年分给秀才的稻谷)不

够维持生活,非教私塾不可。私塾设在“铁儿馆”,即我的曾祖父自建的书斋。书斋距离我们的住家约一百米,即使不读书,我们小孩子每日也要来书斋玩的。

学生是附近人家的小孩子,西至旗杆厝,北至洪厝坪,东至中水门,都有,还有几个是上水门外永春店的小孩子。他们来读书,只求能够认几个字,没有一个是为了考秀才的。丰叔教这些小孩子,绰绰有余。

我同这些小孩子一起上学,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一样认字,诵读,背书。要说有照顾的话,那就是书背不出时未曾挨竹鞭打后脑。我在这里读了《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次上学后,学生轮流去先生桌前听先生教读一段书,便回到自己桌子上读起来,快放学时轮流去先生桌前背书,然后回家吃午饭。饭后再去上学,重复上午的课程。先生只教读音,没有或少有解释字句的意义。我晚上温习白天的功课。除丰叔外,没有人教我书。父亲和祖父都不管。晚上温习,丰叔也不管。

我现在想起来,应当感激丰叔对我的启蒙教育。我的汉字的读音就是他教的。他的读音是标准的,即本县一切读书人的标准读音。不仅一般的读音,而且特殊的读音,都没有教错。所谓特殊的读音,即一些普通的字,在四书五经中某些地方,特别是人名或地名,需要读特别的音。例如,“费”字,在《论语》中,作为地名,就须读“闭”音;又如“陶”字,在《书经》中,“皋陶”就须读“皋摇”。丰叔决不会读错。他教学生写字,也是一丝不苟的。

丰叔在本县的秀才班子中没有地位,人家看不起他。不仅因为他家贫,而且因为他所知不多。我感激他教我正确的读音,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读书没有读错音,是做秀才的、教书的人的起码条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我的父亲的好多朋友都劝父亲送我去其他的私塾,拜更有学问的先生为师。我自己却不愿意换一个学堂,因为丰叔除了背书之外都不管我,我可以随意游玩。我的父亲恐

吓我,说他要自己教我,或者送去三牧第“阶儿”那里读书。“阶儿”就是羽卿先生,就是温赞尧,当时漳平最有名的塾师,以严厉著称。我没有尝过严厉管教的味道,不知是否吃得消,但一想起我父亲自己来教,我就害怕。他少时教过私塾,他认真起来是很厉害的。幸而父亲自教的话不过恐吓而已,他哪有工夫教我。“阶儿”在己酉年(一九〇九年)又考中优贡,不再教书了。

我从丰叔读书五年,至一九一〇年,祖父和父亲终于送我去三牧第读书了,那时教书的已经不是“阶儿”。

回想起来,我在铁儿馆读书得益不少,在那里识了字,读出了字音。这是丰叔的恩赐,我不能要求他给我更多的了。我至今仍不知道那几年我们家是否付给丰叔相应的“束脩”。

丰叔教的私塾是教“小学生”识字的一类私塾,不能同三牧第及其他几个大私塾相比,那里除“小学生”外还教“大学生”。所谓“小学生”是指那些只求识字的学生;所谓“大学生”则是指学八股文或论说文的学生。但丰叔并非没有教过“大学生”。他的长子嘉林就是一个“大学生”。林兄比我大三岁或五岁,自小就是父亲一手教的,当我读四书的时候,他已经开笔学做八股文了,似乎也能成篇。科举未曾废除以前,八股文已经废除了,改用经义取士,仍以经书出题,不过文章不写成八股的形式。例如,《学而时习之义》,要求把这句话的意义说清楚就好。但“义”毕竟也有一定的格式。林兄放下了八股文,又在父亲指导之下,读了许多当时的人写的叫做“义”的文章,自己也做了好多篇“义”;以后听说“义”也不中用了,要做“论”,而且所论也不限于经书,于是学习做“论”。最后,科举恢复无望,丰叔就带林兄去“官立高等小学堂”报名,编入丁班。

幸而我比林兄小儿岁,我的父亲又没有丰叔那样热心,才得免除学做“八股文”和“义”的苦难。

辛亥革命以后某一年,忽然有一个叫金水的“大学生”,来铁儿

馆拜丰叔为老师了。这个“大学生”是长泰县人，他的父亲在大路街上，明伦堂对面开一间洋货店，家住在洪厝坪大祠堂旁边。金水比我大三至五岁，年龄同林兄差不多，但比林兄开朗、活泼，给人以好感。他完全没有商人气，像个书香子弟。他读了不少的书。不仅读了四书及诗书易三经，而且读了《礼记》。漳平很少人读这本书。这本书我家里没有，在其他同学家里也没有见过，我却在金水案头看到了。金水又曾从天主堂安神甫学习算术，学得很好。他也懂得“新学”，知道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这些知识是哪里来的呢？原来，他的父亲结交了汝舜先生父子。汝舜先生，特别是他的儿子少韵，常去金水父亲开的店里聊天，老店主殷勤招待了他们。汝舜先生，名陈华，住北门内窟儿尾，属于蓝田陈家，是本县有名的老贡生，也是一个绅士，懂得一点新学，大家称他“汝舜先生”，但晚年他改字为季韵，知道的人较少。他是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一九一九年曾做过漳平县的“视学”，主修过县志。我去法国同他有关系，我在下面还要提到他。但给金水以新学知识的，是他的儿子少韵。当时少韵是福州法政学校的学生，同他一起在福州读法政的还有李志坝、陈玉银、陈鑫洗。他在福州学到了许多新学知识，寒暑假回家来就传授给金水。他和金水是好朋友。可惜，就在金水拜丰叔为师那几年中，陈少韵就病死了。

金水和林兄一起去“官立高等小学堂”登记为丁班学生。他的学名叫做“张澄清”。两人后来在学校里同占一个房间，但仍保留在铁儿馆的房间。校长刘志和在学校表扬张澄清“用功”。我们这一班学生大多数是本县头面人物的子弟，但没有一个不佩服张澄清的。他的作文和算术是全班最好的，读的书无论是旧书或新书，都比我们多得多，人又和气，以致我们每个人心悦诚服，这是很难得的。

一九一四年底小学毕业时，张澄清列于榜首。毕业后不久，他结婚，我们都去喝酒，闹新房。可是，结婚后不久，张澄清竟死了，

不知道害什么病死去的。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张澄清的学业提高了丰叔的声望,以致我们这班人也请他评定过一些作文。但是给我更多知识的不是丰叔,而是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这两位先生并不是我的塾师,并未正式教我书,但他们比我的任何塾师都给了我更多的知识,我内心上始终尊敬他们为我的老师。

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是我父亲鸦片烟榻上的常客。少泉先生是每日必到的,他吸烟成瘾。养奇先生未成瘾,偶然吸一两口,虽非每日必到,但两三日内必到一次。他同我父亲少时同在大夫家庙读书,学八股文,两人交情老而不衰。听说我父亲死时养奇先生还为他写了小传或别的纪念文字。少泉先生还是我父亲的学生哩。据说,他少时是刘志和先生自己教的,某年因事不能教,少泉先生曾在我父亲教的私塾寄读了几个月。一日为师就是终身为师。我记得,己酉年少泉先生考得拔贡回来坐轿拜客时,到我父亲的书房下跪。但平时两人之间没有师生的关系。

养奇先生姓陈名祖光,字养耆,乳名和生。他的父亲做平和县学官时生了他,故名“和生”。他的父亲当时已过花甲之年,替他取“养耆”为字,表示老年得子。他长大后不喜欢这个字,改为同音的“养奇”。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读书很多,知识很广,在秀才班子中很有名,所以八国联军之后清廷被迫要办学堂时漳平县选派三个秀才去福州学习,其中就有他。漳平县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以至办理甲班毕业,他有很大的贡献。可是民国初年改名“县立高等小学校”,而恢复停顿后的工作时,他就置身事外了。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大概是因为他和校长刘志和不对。他又不像玉芝、莪宾及国文教员陈先生那样不管校长有没有聘请,一开学就挤进去教书。养奇先生并非对教育没有兴趣。就在那几年,和睦里要办小学来县城聘请教员时,养奇先生竟应聘去教书了。那里的大绅士喜出望外。可是,他只教了半年书就辞职回城。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第一任县知事永定卢某来漳平时,聘请了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作幕宾,许多措施都出于他们两人的主意。他们白天去衙门办事,晚上一般都到我父亲的书房来,一面过烟瘾,一面高谈阔论。我从中获得了不少的知识。辛亥革命前后,人家传说漳平也有革命党。我父亲说:漳平哪有革命党,除非养奇和少泉是革命党。我父亲没有把静居先生包含在内,他们三人是一起去福州学习办学的。静居先生不抽鸦片烟,来我父亲书房的机会较少,发表的议论也较少。但父亲一定另有根据。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自然未曾加入同盟会或光复会,但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议论已经是同情革命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九一一年秋间某一天,养奇先生匆匆来我父亲的书房,说道:“武昌失守了。”说时,即使不是喜形于色,也是没有表示反对或惊慌的神气。正是从此时起,全城一连好几天纷纷议论革命大事。

养奇先生未曾同我谈论过经书和文章,也未曾单独对我发表过什么议论,但我从他与我父亲的高谈阔论中听到不少知识。他喜欢评论时政,熟悉当时的时事,以及政治上和文化上活动的人物。他不管听的人是否听得懂他的话,好像他心中有了这些议论,非找一个地方说出来不可。我想,当时除少泉先生外,没有一个人,包含我父亲在内,能够完全听懂他的话的。我第一次从他的话中知道,中国有个叫做樊增祥的文豪,诗文都做得很好。

民国初年以后,他的豪气衰退了,议论带有讥讽和玩世不恭的意味。例如,民国二年举行选举时,许多选民连姓名都不会写,他议论说:可以拿豆腐干刻成被选人的姓名,然后交给文盲选民带到明伦堂去,涂上墨水,印上选票就得了。这话显然是讽刺主持选举的刘志和的。又如,民初某年,本县邮局仍用清朝印戳盖销邮票,他议论说:这有什么关系,用蟠龙邮票也无所谓。这话是表示对于革命的失望,革命后还不是同革命前一样。

我父亲是倾向养奇先生的。他常称养奇先生“知足”。这话的

意思是表示反对少泉先生在民国初年去北京参加文官考试,后来又去江西做县知事。养奇先生己酉年未考得优贡或拔贡,可能考场上的命运不如温赞尧和刘子瞻,但朋友间还是佩服他的学问和聪明的。几个人议论在漳平办中学的事。有人说本地没有人能教物理、化学。我父亲说:“养奇鬼什么不懂?他学一学就会教的。”

养奇先生并不富裕,亦非寒士,是个中等家庭。先人留给他一个大厅带厢房的宅子,兄弟两人居住。他的弟弟襄甫,乳名赞,是个商人,浦南客,兄弟不知是否分了家。在福州学习时,看见同学中那些富家子弟衣服华丽,他并不自惭形秽,而是故意穿着旧衣以示清高。他未曾出贡,始终是“廩生”,即是高一级的秀才,在祭孔中站在最关键的岗位。我小学毕业后参加祭孔时看见他和另一个廩生(郑宗沂)站在大成殿门口迎接主祭官。

我在中学读书时常去大夫家庙看他。那时,他借大夫家庙一间耳房做书房,在那里接待宾客。我在他的案头上发现他的一本著作,题为《不庸园随笔》。我不敢随便拿起来看,大概他后来无处发表议论,便把感想写成笔记了。不知道《不庸园随笔》保存下来没有。

整个太常陈大族中,要数养奇先生最有学问和才气了,可是他并非族长。太常陈的族长,就我所知,是陈玉鸣;玉鸣死后是他的大儿子鹤汀(陈齐旋);鹤汀死后是舜明的儿子慎修(陈齐云)。民初选举,太常陈挂出国民党的旗帜,是慎修带头的。慎修作为候选人同丁坂刘竞争,又同坂尾刘竞争,结果都失败了。人家说,慎修鼻子太小,运气不如,其实是学识和才华不如对手,而养奇先生却因不属于玉鸣系统退居慎修之后。

刘子瞻子少泉,乳名清淇,但家里的人叫他“和尚”。漳平县同全国一样,有一种风俗,即把宝贵的儿子故意取一个极贱的名。刘志和先生的长子叫“和尚”,次了叫“狗”。漳平县叫“狗”的小孩子很不少,也有人叫“狗屎”的。据说,爱吃小孩子的鬼魔听到了如此

贱名就会弃之而去的。由此又可见民间信佛却把“和尚”看作下贱的人。《诗经》有“瞻彼淇奥”句，故官名“子瞻”，又因苏子瞻是苏老泉的儿子，故字“少泉”。刘志和先生的第三子清荣，就干脆以“子由”为名了。

刘志和先生是有名的私塾老师，设馆于南城上刘祠堂，从学的很多，那里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科举废了，秀才们免除了宗师每隔三年案临一次的负担，经书和八股文都置之脑后了。少泉先生在家时几乎每天都泡在我父亲的书房内，过足烟瘾后便高谈阔论。他与养奇先生不同，不爱议论时政。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是一些历史故事。例如，“时来风送滕王阁”的故事，我是第一次听他说的。同座的人有秀才，也有不第秀才，他们也常论旧小说。一个人问他知道什么好小说，常人难得看到的，他推举李笠翁的《十种曲》。这人设法去借，居然借来了，看了几日觉得不好，便在背后怪他推举得不对，我至今还记得这种事情。当时的人可能分不清楚戏曲和小说，因为都是说故事的。《西厢记》也侧身小说堆中，但李渔《十种曲》则是僻书，居然能在漳平县借到，足见本县藏书颇多，又可见少泉先生于经书八股文之外涉猎很广。但在我父亲的烟榻房，我从未见他看书。他考取拔贡，以及民国后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有人说是他的父亲迫出来的。就他的烟瘾说，什么进取之心都消失了。他的父亲为此很不满意我父亲鼓励他（至少不劝阻他）沉迷于烟瘾中。

少泉先生有时还是教我们兄弟读书的，还是给我们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当一九一四年我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时，住族兄连山（郑寿南）的房间内。他在那里办理丙班毕业事，白日就在连山房间办事，有时晚上也睡在连山的床上。此时他教我更多的知识。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他去北京以后我就未曾再见他的面了。一九二五年，我在上海遇见他的二弟刘子明；刘子明回家告诉我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父亲恐慌起来，去问少泉先生。那时少泉先

生已在江西做了县知事，回家林下优游了。他安慰我父亲，说青年人应当去“闯”的。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街上偶然看见刘子明，那时他刚从南京监狱中释放出来，告诉我他的哥哥此时也在上海，但我没有去见他（也算是我的塾师）一面。

一九一〇年，我终于离开铁儿馆私塾了。家长送我去三牧第读书，此时三牧第换了塾师。是岑仲先生教“大学生”，君亮先生教“小学生”。而我既不受教于岑仲先生也不受教于君亮先生，我的祖父和父亲另聘一位塾师，庆中先生，专门教我两兄弟，座位设在三牧第大厅东正房前面，那里相当空阔。我的二弟名为八岁，实只六岁，第一次入学，读《三字经》。我已经读完了《孟子》，忘记此时是读《尚书》或《毛诗》。庆中先生是本城“名士”，他“名士派头”十足，随随便便，不负责任，爱来就来，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往往教了之后就走，没有或很少要我们背书。教了一段时期之后干脆就不来了。这一年读书，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年旧历十月间，我的祖父做六十大寿，热闹了一阵，接着祖母死去，又热闹了一阵，也没有人管小孩子读书的事情了。

庆中先生三兄弟都是本城有名的秀才，太常陈，家住北门城墙边，本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否则不会三兄弟都考取秀才。但后来家道中落。长名和中，长期住在华崴，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只偶然回城来短时居住。民国元年或二年，我见过他一面，在明伦堂同本县绅士一起议事。次名建中，他是我父亲的塾师，常到我父亲书房来，我父亲还是待他如朋友，不过要我们小孩子称他“先生公”。他看的旧小说很多，有些时候我同他谈旧小说，他都能说出书的内容。一九一三年，天主堂办小学，聘他为国文教员，我去读书，他也是我的先生。庆中先生居末，学问最好，也是我父亲书房的常客。他的女儿就是少泉先生的夫人，结婚久未生育。翁婿二人平时很少往来。

我对庆中先生保留的印象，还是我进中学以后的事情。我父

亲一定要我把中学所做作文抄一份寄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只好照办。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收到我的作文,就把庆中先生找了来,供给他鸦片烟,请他批改我的作文,然后寄给我。原来这是科举时代的把戏:把子弟文章请有名的文人批改,而给以报酬,表面上是为了子弟的进步,实际上是要名人替子弟宣传。这种批改对我毫无用处,但这里也可以看出庆中先生旧书读得多。有一篇作文,我用了“司空见惯”四个字,我父亲不懂,问庆中先生,他不假思索,就在文章后面空白处写下了那一首有名的唐诗,一字不错。有时岑仲先生来我家,我父亲也拿出我的中学作文请他批改。

无论岑仲先生或庆中先生,这种批改对我并无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父亲要这样做,我只好每次把作文抄去。

庆中先生很自负,他说,某次在朋友书房从架上拿下一本《庄子》来看,看完未曾放回书架,朋友问是谁看这本书,他说:“漳平县除了我还有谁看。”庆中先生也会下围棋,一次我在育才舅书房中看他们二人下围棋,可惜当时我不懂。

一九一一年,县城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变化。新学堂仍旧是停顿的,但未正式宣布解散,有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但都不来上课,有教员但都不住在学校,也不来学校。只有一个门房,抽鸦片烟,看守着这个空阔的校舍。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绝大部分在私塾读书。说私塾,首先就要提三牧弟。自从刘志和先生不再教书,上刘祠堂只有日光先生(乳名晃)教一些“小学生”之外,最出名的兼教“大学生”的私塾只有三牧弟。温赞尧做塾师时,教得很好,县城内外的“大学生”集中到他那里去,他们是准备考秀才的。有少数“大学生”是父亲自教的,像张金水那样就学于丰叔,是例外。温赞尧不教书后,当时惟有两个人可以教那些“大学生”:一个是刘岑仲,一个是陈霞阁。一九一〇年是刘岑仲教书,一九一一年不知道怎样,刘岑仲也不教书了,那些“大学生”都受教于陈霞阁。但学堂不是设在三牧第,而是设在北门外佛儿架山下的菁城书院。这个

书院,过去想必有山长,有生徒,有官员莅临等热闹场面,但久已空关了,房屋还是完好的,且有楼房。

这里要提到陈寿山(字福如)的作用。陈寿山是西门的富人,考得一名秀才,成为西门最有势力的人物。三牧第这个私塾就是他背后支持的。他支持羽卿先生,不仅在教学上支持,而且出资供给羽卿先生去浙江候补知县。后来三牧第空出位置,岑仲先生去教书,我猜测,他没有陈寿山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寿山更倾向于霞阁先生。因他与霞阁都是蓝田陈家。一九一一年,他出面组织把空闲的菁城书院开辟为私塾,以霞阁先生为塾师,专教“大学生”。这批“大学生”就是一九一〇年在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官立学堂的内班学生,外加一些新长成的“大学生”。如此一来,岑仲先生即使要在三牧第教书,也没有学生可教了。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岑仲先生因事不能教书,故陈寿山另设一个私塾呢,还是因为那些“大学生”都被陈寿山拉去受教于霞阁先生,以致岑仲先生只好罢教呢?总之,决非因为那些“大学生”不满意于岑仲先生的缘故。这从一九一四年,岑仲先生重来三牧第教书时照样满门桃李,甚至在菁城书院受教于霞阁先生的“大学生”都到三牧第来读书这件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那年,我名为十一岁,实只十岁,够不上做“大学生”,我只好去三牧第受教于君亮先生。陈维馨,字君亮,小名明德,是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毕业生,名次并不高,又是小商人家庭出身,但大家看得起他。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做塾师,教“小学生”绰绰有余。我在那里读《易经》,因为《诗经》和《书经》似乎都读过了。他只教我读,并不解释意义,“小学生”都是如此。《易经》意义尤其难解,我忘记了是否读完。总之,那时我对读书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玩,有时逃学。就在这年旧历八月间,武昌起义,人心惶惶,我干脆不上学了。不记得是我个人不上学,还是君亮先生停止教书。

我过去不把君亮先生算在我的塾师之列,不承认他是我的老

师,以后也不同他来往,路上见面也不打招呼。这当然是不对的,他毕竟教了我几个月的书,师生名分是无法解除的。君亮先生以后到县立小学做书记工作,再以后到基督教会办的新民小学做教员或职员,信了教,在漳平县基督教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菁城书院的私塾只办了一年,次年仍旧空关起来。也许武昌起义后,谣言蜂起,师生都不敢在那里居住了。我没有去过那里,但君亮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是去过的。他们回来在学生面前议论那里的情况。后来,我从曾在那里读书的人知道了一些故事。主要是书院远离居民点,山上又有许多坟墓,民间传说有鬼,大家怕鬼,因而停办。

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刘志和先生说服了我的祖父,由我们两家合聘丁坂黄作朋先生来教我们两家的子弟。学堂就设在洪厝坪刘家背后半个宅子里,是不久之前刘家租来(或典来)的。宅子有大厅和两个正房,有左辅厝,但无右辅厝。作朋先生在左辅厝小厅教我们读书和听我们背书。辅厝的两个房间,一间归作朋先生居住,另一个藏书。藏书室偶然开门时,我探头去看,里面的书很多,据说是从丁坂搬来的。丁坂刘家文化很高,出了好几个举人。

学生只四人,我们兄弟和刘志和先生的两个儿子。清淦和清荣,学名子明和子由。

作朋先生是我父亲最亲密的朋友。他家住丁坂,每次来城都到我父亲书房来,我家送饭到书房招待他。他是秀才,但以画画著名。我少时看过他的好多幅画,山水、花卉、人像都有,署名“延龄季子”。他家境尚好,本不需要出来教书的,似乎他未曾当过塾师,但秀才教书没有问题,他仍有时间作画。刘家父子懂得画理,常常同他讨论画理。他又学习肖像画,少泉先生教他使用比例尺,把照片上的人像放大为画像,这样还可以卖钱。

刘志和先生也关心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品德。他考

问我们，督促我们。他特别严厉对待我，认为我品德不好，会带坏他的两个儿子。

就在一九一二年夏天，我的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

一天，我生了小病，不去上学，躺在隔壁三伯父房间一只谷柜（当临时卧床用）上。发现他枕头边有一本石印小书：《薛仁贵征东》。这个故事，我听人说过，书中有些字是四书五经中没有的，如“些”、“吗”、“呢”、“你”之类，但猜得出意义。整句整行看来比四书五经好懂，于是就在三伯父翻开的那一页看下去，看得津津有味，舍不得放下。一直到母亲来喊吃晚饭，我才从谷柜上下来，小病早已好了。

以前，同一般年龄的小孩子一样，我看到书就厌烦，没有先生和父亲的命令，我自己不会去翻书的。玩，还来不及呢。自从看了《薛仁贵征东》之后，我就减少了玩，最后失去了玩的兴趣，而缠着三伯父，要他去借《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薛家将反唐》《粉妆楼》《双凤奇缘》等书给我看。三伯父自己不买小说，他所看的小说都是向别人借来的。一九一三年，选举时，我父亲当选代表去漳州选举议员。临行时我开了一个书单，约十几本小说，塞在他的行李箱内，我以为他不会买的，可是他居然买回来了。其中有《兰花梦》《林兰香》之类。这些书名，我都是在小说中看到的。当时只我一个人看小说，无法同别人交换意见，因之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小说，更不知道辨别其中的好坏。

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我少时听大人说过的，包含薛仁贵故事在内。有些故事在戏台上也演过。看戏，听故事，也是我玩的一部分。戏不常演，说故事的大人也要高兴时才肯说，我往往不过瘾。现在好了，我从这些小说中就可以满足我的故事欲了。看小说的兴趣盖过了玩的兴趣。从此之后我就不同堂兄弟们一起玩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整天捧着小说看，走路时也看，只有上学和吃饭时不看，我常被母亲责骂，因为不肯帮她做家务，上街买东西也是

勉强的。一次去买酱油，路上把瓶子打破了，回来挨了一顿打。但父亲不干涉我看小说。

看了小说以后，我渐渐地改变了性格。我脱离了“群众”，不向一般大的小孩子玩，而同小说中人物交朋友，跟着他们在北方大地上驰马挥剑，在南方画舫内轻歌曼舞，与书中人物交流喜怒哀乐的感情。别的小孩子的话，我没有兴趣听，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懂，我干脆就不说话了。由此渐渐酿成了我的孤独、怪癖。

在以前的社会里，看“闲书”是一种禁忌。秀才应当专心“举业”，要应付“三年一比”，没有工夫看闲书。秀才中举或出贡之后可以不受“三年一比”之罪了，有空暇看些闲书。我们那里，看小说成为识字而无功名的人的专利，父亲和丰叔是不看小说的。祖父出了贡，看过几本小说。我曾听他给祖母说《二度梅》《争春园》的故事。他看的小说都是木版书。六公是不第秀才，倒看了很多小说，过足烟瘾后常给我们小孩子讲故事，但他正式教育我们的是晚上召集我们来听他讲《太上感应篇》。他有一部《太上感应篇》，正文每句之后征引史书笔记中有关的事实来说明因果报应，其中还有图画，我们小孩子仍有趣味。

但有几种小说，斯文人是可以公开看的。它们是《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今古奇观》也可以看。看小说的人，常常自称为“看三国”，一般人也说他“看三国”，不管他手里拿的是一本什么小说。正如清末民初的上海，凡看报纸都说是“看申报”，哪怕手里拿的是一份《神州日报》。

看小说，首先给我的利益，就是同文字亲近了。每日接触文字的时间多得多了，而且觉得文字是可亲的，可爱的，不是父师强迫我去结交的一个面目可憎的伴侣。读四书五经时，先生只教读音，不解意义，读多了或多或少也能懂得单个字的意义，但字结合成句，则不见得能够理解。现在，没有人教，小说中每个字每句话，我都能够理解——不是一开始就能理解，而是读多了，读久了，自然

而然地理解了。

那时,我虚龄十二岁,读了许多书,识得许多字,但尚未开笔作文,连一张字条也未写过,所识的文字,不知道怎样使用。这年完毕,两家合办的私塾就解散了。不知道是作朋先生不愿教我们,还是我们的家长不愿聘他。一九一三年,我们兄弟去天主堂新办的小学读书。

天主堂神甫,西班牙人安珺琅,奉上级之命在本县办一个小学校,即以教堂为校舍。在县衙门立了案。

外来的宗教,天主教和耶稣教,何时进入漳平县,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也是新的县志应当记载的。据我所知,似乎耶稣教先在本县立足,设福音堂于西门外,主持人是坎儿脚太常陈家一个人,名叫“红蚶儿”。这人虽非秀才,但穿长衫。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群众也要打教堂。据说我父亲同一个朋友站在城墙上对着教堂骂,很快许多人集拢来,跟着骂。也有人从城上扔石头,红蚶儿走出来对骂,群众下去把他捆起来送县衙门,被戴上铁链收监。不久,义和团失败了,红蚶儿放出来,传闻要办那些打教堂的人。于是县里一批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便去漳州请求那里的天主教会派人来漳平县传教。这批人就是最初的教友了。派来的神甫就是安珺琅,大家称他为“安会长”,因为他是“耶稣会”修士。最初的天主教堂就设在现在的团结巷三十一号(即我家)隔壁一所民房,以后才迁到新建成的西门外江边那个教堂。当时教友很多,有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也有秀才,如陈建中、郑馨滨和我父亲,也有富家子弟如陈子丹。但不久之后大多数人都不去联系了,虽然未曾正式脱离。同耶稣教比较起来,天主教是默默无闻的。例如,耶稣教早已建成了一座很大的教堂,并在教堂内设立了新民小学,招收了不少学生,并附设了女学。天主堂还是那样,直到一九一三年才办了这样一个小学。

天主堂小学聘请了两个教员:陈建中先生和郑馨滨先生,都是

本县有名的秀才，又都是教友。他们不知道怎样教新学堂，因此采用教私塾的一套办法来教。只是读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罢了。其中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但不开“修身”课。因为去县衙门立案时说明白了，用教义问答一类的去代替“修身”。还有一点不同，即先生不仅教学生读，而且把所读一段的意思说给学生听。十几个学生，参差不齐，读的尽有高小的，也有初小的。我读高小一年级的书。

算术是安神甫自己教的。他并不按照教科书教，他从加减乘除教起，再教分数和比例。没有教应用题。他能说漳州话，但很吃力，他也能听懂漳平本地的方言。我完全听得懂安神甫的话，也能理解他教的内容。我按照教科书作习题，以至四则运算应用题。那些复杂的应用题，我经过多次思考，居然做得出来了，从中感到快乐。回想起前几年，父亲过足烟瘾后，教我打算盘，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一次，他生气，拿起算盘朝我头上劈下来，被我躲开了。从此他也不教了。他同朋友说：“这个孩子很笨。”我确实不理解，为什么一时说“七六四十二”，一时又说“七六十三”，为什么用三除时要打“三一三十一”。再加放学后正是我玩的时候，父亲板起严厉的面孔叫我去打算盘，心里先就不高兴。在天主堂学会算术之后，我又添了一种乐趣。

两位先生是轮流坐班的。后来，我就不去了。因为他们没有私塾教师那样负责，不懂得新学堂的教学方法，却已学会新学堂教员的不负责任了。

就在这一年，建中先生得了伤寒病死了。他的家在后坂洋，安神甫带着全体学生及其他教友去他家做弥撒。建中先生死后，安神甫没有聘请新的教员，教学工作完全归馨滨先生担负了。

馨滨先生官名郑宗沂，小名如泗，是我父亲的从堂兄。在我们郑家几个秀才中，他是最有学问的。八股文章做得好，大字小字也

写得好,且能作隶书。他很自负,以本县的名士自居,可是考不上举人,也未出贡。不能称为“寒士”,但家境并不宽裕,为了维持他的身份不得不去教私塾。以前是在某个乡村教书的,现在教天主堂小学,但待遇也不见得好。安神甫是很小气的,馨滨先生常表示对他不满意,曾引用古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表示他的不满意。馨滨先生也很灵巧,能修理钟表,有个人愿意开个店,请他修表,他以为有失身份拒绝了。但他丝毫不肯接受新的思想,把维新变法视为洪水猛兽。天主堂小学办了一年就垮了,他没有书教,便学写状子,帮乡下土财主打官司,成了旧社会的所谓“讼棍”。但就“讼棍”来说,他也不如景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离家时,他尚未死。

一九一四年,我做了“大学生”,住进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了。我在天主堂小学读书,刘志和先生是反对的,祖父和父亲碍于建中先生和馨滨先生的情面答应下来。天主堂小学垮了,刘志和先生力主我去三牧第读书。这一年三牧第有了兴旺的气象。刘岑仲先生教“大学生”,陈君亮先生教“小学生”,互不相干。“大学生”中,一部分是羽卿先生原来教的,他们在县立高等小学校内班挂了名,他们一九一一年也在菁城书院受教于霞阁先生;另一部分是一九一一年才去菁城书院读书,做“大学生”的,他们也在县立高等小学校丁班挂了名;第三部分则是新做“大学生”的,其中有刘志和的第二个儿子刘子明,刘万里的儿子刘清秋和他的内侄陈邦璐,有林有声的侄子林乃光,我的族叔郑如隆,还有陈承尧的长孙魁儿——这人跟不上,读了个把月就不来读了。总之县城内外要读书的子弟,除了少数例外,都会集到三牧第来了。

刘岑仲先生是漳平县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刘攀龙老先生的第八个儿子。刘攀龙举人,太平天国乱中办团练立了功,民间传说中关于他的故事很多。但他没有很多的财产,以致他这个最小的儿子考得秀才后不得不以教书为生。岑仲先生在本县秀才班子中不是

最出色的,但大家佩服他有学问,能教书,特别是教“大学生”的书。所以羽卿先生考得优贡不教书后,第一个接替他的就是岑仲先生。岑仲先生也是我父亲书房的常客,他也染上了鸦片烟癮,一直到后来都不断癮。

三牧第办过“求是初等小学堂”。岑仲先生高坐讲台上向我们讲书。他讲的是四书。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厚厚几本的木版书,我忘记了书名,其中有四书白文,白文每句下有朱熹的注,朱注下又有不知何人作的长篇大论解释朱注。岑仲先生就是把这些解释朱注的长篇大论讲给我们听。他讲得很熟。一次,刘万里来看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儿子房间等待时,岑仲先生在讲台上讲得特别卖力。

四书和朱注的解释是学做八股文时候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做八股文了,也不做经义了,岑仲先生为什么还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呢?似乎是出于习惯,又似乎是应学生家长的要求。不久,岑仲先生就不给我们讲四书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以后给我们讲《左传》,讲《纲鉴易知录》,讲过就算,并不要求我们读熟,但我没有兴趣;他也讲古文,从选本中指定一篇,讲过之后要我们读熟,但不必到他面前去背。所以讲古文那一天,晚上书声琅琅。用的是林云铭的选本《古文析义》。漳平县读书人家似乎只有这种选本,同学们都有这一本,惟有我家没有。我从父亲书架上只找到一本《古文笔法百篇》,而且是石印的。每遇我的书中没有先生指定的文章时,我只好借别人的书来读。漳平县没有《古文辞类纂》,那些老先生连“桐城派”也未听说过。

同学们几乎没有例外,必须先生指定的,讲过的那一篇古文,才会去看去读的,读过之后就把书合起来,等待下次先生讲解时才打开书听讲。我起初也是如此。但以后我想:那些先生没有指定的,没有讲过的古文,我是不是看得懂。一天,我试翻出一篇来看,确实很费力,不懂得的字不多,但这些字凑成句子,则不好懂。我

硬着头皮看下去,我的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每句之下都有注,凭靠这些注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但已经懂得多了。辛辛苦苦看了一篇古文,大概有六七成看得懂,当初我看《薛仁贵征东》时,却是八九成能够看懂的,我自己看的第一篇古文,就是王勃的《滕王阁序》。

从此以后,我不待先生的指定和解释,便自己去看古文,读古文。看懂也读,看不懂也读,渐渐地由六七成懂到七八成懂,到八九成懂了。我十二岁读懂了白话小说,十四岁读懂了古文。从此我可以“自学”了。以后,我以为自己的微薄知识都是从自学来的。

恰好,在此回忆中,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不,我的微薄的知识,还是从塾师来的。在所有的塾师当中,我最感激的,还是岑仲先生。

一九一四年我进三牧第,做“大学生”,是为了学习作文,我读过好多本白话小说,后来又读过好多篇古文,但不会作文,连一张字条也未曾写过。那时不做八股文了,不做经义了,要做论说文。论说文怎样做呢?我不懂。那些比我大的“大学生”都会做论说文,惟有我及其他几个新来的“大学生”不会做。岑仲先生特别找我们这几个人谈谈怎样做论说文。他不再讲“破题”、“起讲”等做八股文的方法了,他给我们讲“起、承、转、合”。这种讲法,说到我的心坎里,觉得他很了解我当时的知识程度,我的长处和短处,能对症下药。我很快就开始作文了,第一篇作文写得不好,第二篇作文也写得不好,题目和内容早已忘记。第三篇作文的题目叫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大概写了四五百字,岑仲先生在后面写了七个字批语:“高谈雄辩惊四筵”,特地拿给我的祖父看,夸奖一番。于是祖父就有材料替我作宣传了。岑仲先生说全文中只有一个字用得不要,即我用了一句话:“识时务者呼俊杰。”他说,“呼”字不对。其实,这句话,我是从白话小说抄来的。

我进三牧第以后还是偷空看小说的,兴趣并不减退,但已有辨

别力,渐渐地由低级的小说(《薛仁贵征东》之类)进于高级的小说。看得懂古文,再去看《聊斋志异》,就没有疑难了。读书人家没有收藏《水浒传》的,因为是“海盗之书”,虽然有人讲水浒故事,戏台上也演过水浒故事。我好久没有借到《水浒传》。一天晚上,父亲约好带我去看戏。我进他的书房,等待他和他的朋友过足烟瘾。忽然,我发现桌子上有一部《水浒传》,于是如饥似渴地翻开来看。看戏时间到了,我想不去,但不行,只好跟着大人去了。但我的心还留在水浒书上,不知道戏台上演些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告诉我这部书是向谁借来的。我由《第五才子》再去看《第六才子》,这部书倒是容易借到的。当时把戏曲当作小说来看,这两部书不仅正文,而且金圣叹的批语,对我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我读懂了古文之后,又由白话小说进于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之外,我还看了《夜雨秋灯录》《夜谈随笔》《雨般秋雨庵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等等。但在漳平县借不到《红楼梦》(我进龙岩中学以后才买来《红楼梦》,磐滨先生去龙岩县帮人打官司,来中学看我,发现我看《红楼梦》,回家后告诉我父亲,父亲来信申饬),也借不到《儒林外史》(我去法国后才看到《儒林外史》)。

我看这许多小说,都是一个人看,一个人消化,没有和我讨论和交换感想的人。因为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看小说,他们读书,是人家要他们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读的。先生教他们读哪一篇文章,他们就读哪一篇文章。先生出题目,他们才做文。他们每天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而我每天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则比他们多好几倍。因此,我很佩服他们比我聪明:他们居然能够用浅显的文言,写出句从字顺的文章(我这里说不自动看书的同学,不能完全通用于陈祖康,这个人有时也能自动找书来看的)。

为此,我也养成了孤僻。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们做完了先生交下的功课之后,便向床上一躺。躺够了就三五成群说闲话,我听来都是庸俗的,无聊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我插不上嘴,也

没有兴趣去听。我过的则是另一种内心生活：小说、笔记、戏曲、历史所杂凑而成的光怪陆离的生活。我把这些虚幻的生活看作真实的世界，而真实的生活反而被我看作虚幻的世界。

一九一四年上半年，那几个挂名丙班的学生，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了毕业表格后，就算高等小学毕业生而拿到文凭了。他们暑假中去龙岩县考中学，个个都考取，就此离开三牧第了。下半年，县立高等小学正式恢复。那些挂名丁班的学生都须去学校上课，我也报名入学，编入戊班。戊班有十几个学生，大多数是由其他的私塾招来的。他们都是“小学生”，未曾学习作文的；惟有三个人由三牧第招来：我的族叔如隆、陈寿山的儿子宜安和我。

我们三个人不久也从戊班提升到丁班去，怎样提升的？我在上面另一篇已有论述，这里就不说了。

刘岑仲先生也被刘校长聘为县立高等小学校的教员，仍教我们国文。但在三牧第，他是塾师，我们是他的学生，在学校则他不过是我们的先生之一，除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先生。

我小学毕业后，岑仲先生继续在学校作国文教员，我去法国时他仍是国文教员，以后不知何时脱离了学校，回到丁坂家中居住。我回国后在上海遇见同乡，才知道他已经去世，而且是上吊死的，我不敢问详情，这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旧社会的命运！

在我的几个塾师中，我时刻怀念刘岑仲先生，感激刘岑仲先生，是他教我如何写文章的。我曾想，如果有一日我回漳平去，一定要去他的墓地吊祭一次。

刘岑仲先生并非我最后的塾师，他以后，我还有一个塾师——陈霞阁。

小学是一九一四年底毕业的，中学则是一九一五年暑假时招生。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就要赋闲了，我的父亲命令我仍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此时，三牧第的塾师是陈霞阁先生，他补了岑仲先生留出来的空缺。他主要是教“小学生”，“大学生”不多，有一个龙溪

人，华侨子弟，慕名来漳平学古学的，又有一个漳平华侨的儿子，不喜欢进新学堂而要学古学的，第三个就是陈寿山的儿子陈祖康，他与我同班毕业，但他的父亲认为他年小，要学一年古学，明年再去考中学，此外就是我，同班毕业的其他人都宁愿赋闲。

用现在的话来说，陈寿山是为他的儿子“开小灶”，即请霞阁先生专门教他的儿子做旧诗，另外多付学费。我听过他的议论：“读书人要讲交际，要有本事让人家看得起，最容易表现自己有学问的，就是做诗，祖康应当学会做诗。”

他的大儿子陈鑫洗小学毕业后去福州读法政学校，同别县学生来往，人家赠他一大堆诗篇。

我们在三牧第，习惯互相串门，我去你的房间坐坐，你去他的房间坐坐。有一天我到陈祖康房间去，看见霞阁先生正在那里说话，看见我去就不说了，起初我不以为意，可是不久就明白：原来先生正在“开小灶”，我没有另付学费，怎么可以分享“小灶”呢？于是，一阵恶心，以后看见霞阁先生在陈祖康房间，我就不进去了。我后来做诗是自学的，不是偷学的。

霞阁先生有时以闲谈形式也对我们几个“大学生”说起交友之道。他说，交朋友，要交“下面”人，“下面”人很慷慨，可以一把一把的拿钱送给你，不要交龙岩人作朋友，龙岩人小气，……如此类的话。

在旧社会，一般人是这样实践的，但不这样说，霞阁先生也许以为我们年纪小，不懂，非明白说不可吧？

总之，在这半年内，我从霞阁先生那里未学到什么，我对于霞阁先生说不出好感来。

陈华，即汝舜先生，后改称“季韵”，但大家仍称他汝舜先生，蓝田陈。他是贡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岁贡。他不像景黄先生全无新学知识。在邓炳知事任上，他做了县志的主编，忙于写作，似乎已经编好全书了，但没有付印。陈炯明占领了闽南，派了部下姓熊

的来当知事,此时他做了县视学。他也是县里的一个绅士,属于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吃鸦片烟,但不成瘾。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中学毕业,缠着父亲,要他筹一笔路费,让我去北京考高等师范。我说,考取后,学费、膳宿费都不要交纳,家里就没有负担了。就是这一笔路费,我父亲也筹不出来,每日愁眉苦脸。一天,在街上,他遇着汝舜先生,汝舜先生向他发表一通议论,大意说:培养子弟成才,没有什么意义,况且北京的大学生风气不好,不久之前才闹了大事。后面的议论是指五四运动说的,前面的议论则是指他自己的儿子少韵,福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隔不了几天,汝舜先生忽然到我家来,告诉我父亲:熊知事接到漳州司令部公文,要派一名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知事要他推荐。他昨日去新民小学,劝那里的一个教员,永福人,去留学,这人不愿意去。他想到我,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年费用六百元,官家出三百元,自己筹三百元。

我当时一心想去北京考古学,对于西洋学问没有兴趣,以为去西洋不过学得声光化电而已。那时,我连报纸也不看的。但我想,去外国总比留在家乡当一个小学教员好。我立刻表示同意去了。我父亲知道了家里的三百元可以随后补交,也就同意了。以后漳州再来公文,要每县派两个学生,于是中学没有毕业的陈祖康才顶上去。

我便是这样同汝舜先生发生了师生关系。我从法国以学生的身份写恭敬的信给汝舜先生,汝舜先生也以老师的口气回答我的信。

和春郑家

一

温赞尧所编《漳平县志续编》有一个《姓氏人口统计表》，共列九十八姓，姓下注明何时从何处迁来，也有注“未详”二字的，那大部分是一百人以下的小姓。一千人以上的，只有曾朱二姓下注“未详”，但朱姓是明正德年间由南平迁来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暖洲营朱氏源流》一文。凡注“未详”的，也不过是失考而已，并非表示这些姓的人是漳平县的原始居民。我们可以说，现在漳平县的居民无一是一本地原始居民的后裔，连山羊隔上的畬族也是明朝才从漳浦县迁来的。那么漳平县原来的居民是什么人呢？那也是畬族，古老的畬族，他们已被北方南下的汉族所消灭了。

漳平县，以及整个福建省，再扩大至浙江、江西诸省，甚至整个南部中国，原来都是一些比汉族更落后的民族所居，地广人稀，渐渐被汉族侵入，占据了土地，消灭了土著。有几分像美洲印第安人土地被欧洲白种人所侵占一样。最后，原始居民只有少数残存下来，而整片土地充满了外来的民族。

这种殖民过程，中国东南部似乎进行得更迟缓些，以致我们漳平县尚有踪迹可寻。古老的畬族被消灭（驱逐、同化）了，但在传说和地名上留下印记。漳平县有个乡村叫做“百家畬”，表明本是畬族居住的。漳平县又有“百家畬洞”的传说，现在还不能实指“百家畬洞”在县内什么地方（按“洞”应作“峒”，二字音同义不同。“洞”

是山洞之意,峒则是山中的平地,犹如四川人说的“坝子”)。漳平县民间又流传一首歌谣:“南蛮十八洞,洞洞十八庙,庙庙十八灶,灶灶十八户,户户十八人。”据说“百家畬洞”是南蛮十八洞之一。中国北方汉族一向称南方原始居民为“蛮子”,不管属于哪一个民族。漳平县的原始居民,畬族,就是“南蛮”的一个部分。这个歌谣不过是传说而已,并非说漳平县的畬族真有那么的人口(约十万人),也不是说畬族的社会组织如此整齐划一。又歌谣中所说的“洞”应写为“峒”,即可供耕种和居住的平地。歌谣不过说明畬族居住的村庄很多而已。本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汉族迁居永福初探》一文也说永福原来居民是畬族,汉族迁来后(宋代)尚与畬族杂居,而处于少数地位,但文化更高,武力更强,畬民才被迫迁走。

我认为新编的县志必须专写一个“民族志”,突出民族关系,不仅要特写山羊隔上的畬族,而且要考证汉族侵占以前的古老畬族的遗迹。我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素无研究,不过提出此问题,引起注意而已。这也不是漳平一县的问题,想必省志和邻近各县的县志,也有人注意此问题。漳平旧县志(道光时编的)有“畬客”一条,根据其传说,认为畬族就是瑶族,可供参考。

与此有关,外来的汉族,无论个人迁来的或举族迁来的,他们如何发展,作何贡献,都须研究。族姓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向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漳平这种小县的历史上。县志应当有专章研究本县若干重要的族姓。族谱本来是地方志书的一个基础。道光县志也有许多地方采用了各姓的族谱。

我曾说过,漳平县内的政治斗争,除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之外,基本上是族姓间的斗争,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又说过,漳平县在政治上互相斗争的,有四大姓(太常陈家、丁坂刘家、坂尾刘家、蓝田陈家)和三小姓(北门李家、和春郑家、丁坂黄家)。自然,这是指近代史,更早以前形势又不同了。

我们和春郑家是个小姓,在温赞尧所作《姓氏人口统计表》中

占据第九位。当时只有一千八百人,比陈刘李黄四姓少,但政治作用并不远逊于这四姓(应说六姓,因为陈刘都分为二姓)。

当作解剖麻雀,我可以拿和春郑家做标本来研究族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

和春郑家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口耳相传的和文字记载的。少时,我从祖母听说,我们的始祖是湖南桃源县人,当兵的,南宋间随军来此,在和春乡招赘蔡家,由此繁衍生息。所以在始祖祠堂上供养蔡公蔡婆神位。我们的郡望不是“荥阳”,而是“南湖”。“南湖”者“湖南”也。现在,我看到了文字记载,知道不是这一回事。始祖是个私塾先生,来和春乡教书,给当地一户人家梁兴为赘婿,由此繁衍生息的。参照其他的文字记载,这个说法完全可信,应当推翻口耳相传的说法,但口耳相传的说法亦有所本。漳平县尚有其他郑家,不属于我们和春一系的,邻县也有郑家。各系郑家有共同的传说,认为同出于“桃源”(不一定是湖南省桃源县),且有种种神话。和春郑家有族谱,都是手抄本,从无刻印本。族谱初编于明洪武二十七年,续编于漳平县建制以后(续编序未注年代)。初编有五世祖郑天爵(伯仁)序,续编有十一世祖郑克俊(春岗)序。还有三编,从十一世编至十六世,但无序,当是十八世祖郑苑培(植庵,西亭)所编而未完成的。现在保存的旧谱只有残本,不知道是原来残缺的,还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致残的,但旧谱的几编序文仍保存着,足供研究。

综合这几编序文,可以知道和春郑家的起源及其至太平天国前发展的轮廓。

和春郑家的始祖名郑起岩,字仕表,本是兴化军仙游县唐安乡香田里人,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游学来到龙岩县东部的

居仁里,同当地一个姓梁的人家发生了联系。据续编序说他是:“赘梁家妇苏氏”,那就是说梁家有寡媳苏氏招他为婿的。初编序则说:“继梁兴之后,赘苏氏。”如此也可以解释为他做了梁兴的义子。但梁兴另有儿子。初编序说:“始祖以勤俭为家,置田二万三千余束,拨三千与梁兴子孙。”(这里说的“束”,显然不是指田地的面积,而是指粮食的产量。但不知一“束”合现时多少斤?)

始祖自留二万束,一半给自己的儿子雷震,一半给自己的女儿千一娘。千一娘招范有一为婿。可见当时女儿有平等的继承权,而且不限于招赘的女儿。后来,千一娘只生一女,名千二娘,就把田产带到婆家去了。

雷震生二子,长子公祐娶龙溪李家女为妻,遂迁居龙溪登科洲(有说登高洲的)。惟有次子公贤继承祖业,生一子林茂。林茂生六子:天福、天寿、孝孙、良孙、天禄、天爵。天爵就是初编族谱并作序的人。到此时,郑家人丁才兴旺起来。天爵壮年已由元入明了。他编族谱时已有六十八岁,在洪武二十七年序说:“兄五姐四俱已作古,今日现存者,吾一人而已。因思畴昔同居,兄弟和睦,凡百事务,诸兄拨置,产业日增,家声赫奕,子孙茂盛,六十余口,堂屋二座,规模焕然。”可以想见,这一家是很有地位的,不仅人丁兴旺,田产丰富,而且颇有教养。三世祖公贤,人称静斋先生,“少习儒业,游学于漳泉与化。”六世祖郑文善,天爵三兄孝孙之子,以儒士(秀才)的身份做了真定县的教谕。六世祖郑文璿,天爵四兄良孙之子,以儒士身份做了进贤县知县。六世祖郑文言(惠昌),天爵之子,以贡生身份做了文昌县知县。(见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荐辟类和贡上类,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

这一家人以后渐渐衰败了。兄弟六人起初合为一户,以后分成三户,但到漳平县建制后,一、三、四、五房都绝了嗣,只有二房和六房遗有子孙,他们合为一户。二房后裔不详,现在郑家子孙都是六房郑天爵(伯仁)传下来的。天爵生三子:惠保、惠昌(即文言)、

惠俭(即文礼)。(按文言,惠昌都是正式的名,并非一个为名,一个为字。大概“文”是堂兄弟的排行,“惠”是亲兄弟的排行。)惠俭生思谦,思谦生绍裘,绍裘生四子:伟、保、便、信。郑伟是九世祖,以贡生做了攸县知县,后改任汉阳县知县,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郑保早殇。郑便做了“恩官”。郑信做了广东“五府”(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贡士类有郑信名,注“伟弟”,广州府经历)。这是和春郑家繁盛时期。郑伟生于明天顺七年(一四六三年),死于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年)。漳平县建制在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那时郑伟才八岁。他生时还是龙岩县人,八岁后才算漳平县人。他死后葬于小菁乡的佛儿架山下,前几年因墓地征用,才迁葬于和春乡。

十一世祖郑克俊在续编序中说:“今日子孙百有余口,太学有之,庠士有之。”当初五世祖编族谱时,在洪武年间,和春郑家只有六十余口,到正德年间已增加至百余口了。

郑伟的长子郑科,县志道光版也有传,列在“寿民”类中。那是因为他活到一百岁,从成化丙午(一四八六年)到万历乙酉(一五八五年),实际上是九十九岁。

郑科是“庠士”(即秀才),是十世祖。郑伟另一个儿子郑凤,监生,作了横州州判。郑凤的儿子郑惟敏,作了扶州经历。另一个儿子郑惟诚,作了思恩县经历。俱见县志道光版贡士类。另有一个十世祖郑见春,也是庠士,作了一篇《叙大宗小宗》,也是记述本族源流的,特别详于区别“大宗”和“小宗”,续编收入此文。据此文所说,当时是公推郑伟一系为大宗的。他称郑伟为“伯”,可见不是郑科的兄弟,文后署嘉靖甲午(一五三四年)。

十一世祖郑克俊又名惟德,则是“府庠士”,比“邑庠士”更高一层,即不属于漳平县学,而属于漳州府学。他新编了族谱,并作序,可惜序后未署年月。他称郑伟为“伯祖”,因为他是郑信之子郑立的儿子,作序当在万历年间,即距明亡已不很远了。

郑科生惟明(第五子);惟明生士珩(第三子),邑庠士;士珩生

兆甲(第六子),儒士,活到八十一岁,生于明万历时,死于清康熙时,兆甲生润卿(第三子);润卿生如隆(长子),邑庠士;如隆生四子(宗淇、宗遴、宗选、宗逢)。

郑宗淇,后改名丹桂,字攀宿,十六世祖。这就是我们郑家常说的“攀宿公”了。他生于康熙丙戌年(一七〇六年),死于乾隆壬寅年(一七八二年)。

关于攀宿公,流传了很多神话。

三

但是族谱的文字记载还涉及和春郑家的史前史。我们知道,和春郑家是从仙游县郑家迁来的,那么仙游县郑家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不是仙游县的原始居民。

综合几篇文章所说,原来仙游县郑家是从福州侯官县迁来的。“宋乱”(按当指靖康之乱)时,侯官县郑家有三兄弟,都是做官的。老大是太府卿郑露,老二是中郎将郑庄,老三是别驾郑淑,率家族迁来兴化军。老大定居莆田县,老二定居兴化军,老三定居仙游县,虽分居三地,但共建一个祠堂于莆田县之南湖,因此三县子孙都称为南湖郑家。我们以“南湖”为郡望,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始祖郑起岩系定居于仙游县的郑淑之后裔,算是从仙游县迁来的,但若我们回去认亲,则须到莆田县南湖去拜祭祠堂,我们确实有人去认亲了。

九世祖郑伟作了湖广攸县知县时,丁内艰回籍,服满晋京改授,途中特去南湖拜祖。续编族谱中收有一文记载此事。此文是当地(莆田县)一个名玉的人写的。他是“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北京户部主事”,文写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颀月(即正月),即郑伟死前二年。如此可见,郑伟任汉阳县知县的时间并不长久。按照辈分,郑玉自称为“宗侄”,而称郑伟为“族叔”。

兴化,宋时称“军”,明清称“府”,所辖只有两县,府治旧在兴化,居莆田县北边,后合并于莆田县。南湖郑家,南宋时出了一个有名的大学者,郑樵,中国著名的类书“三通”之一的《通志》,就是他著作的。他住在家乡的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不应科举,自学三十年,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著《通志》有许多创见。他是莆田县人。他死于一一六二年,下距我们的始祖来今漳平县,尚有七十二年,我们是不能攀附的。

仙游县郑家,或宁可说南湖郑家,是从侯官县迁来,那么侯官县郑家又是哪里迁来的呢?那就要追溯到残唐五代去了。旧谱诸序,包含郑玉的文章在内,都说我们的远祖是光州固始县人,唐末僖宗光启年间随从同县人王审知入闽的。

王审知是一股武装队伍的三个头子之一。这股武装队伍说好听时是农民起义军,说不好听时就是土匪。当时三个头子都姓王:王绪、王潮、王审知。他们以固始县为基础集合一股武装队伍,附近有另一股武装队伍,力量更强,要吞并他们。唐僖宗光启元年(八八五年),他们只好“率众”南逃,由江西进入福建。在南逃途中,王潮推翻了王绪,坐第一把交椅。次年,他们占据了泉州,朝廷招安,任王潮为泉州刺史。昭宗大顺二年(八九一年),王潮派王审知攻占福州,遂占据福建全境。王潮死,王审知继位。唐亡后,朱温称帝,封王审知为闽王。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国。公元九二五年,王审知死,子王延钧继位,称闽帝。以后,诸子内乱,闽国就亡了。但随从王审知来福建的光州固始县人仍旧在福建。福建的许多族姓都可以追溯其远祖直至光州固始县。

在我们漳平县,不仅和春郑家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其他某些族姓也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例如,暖洲营朱家就是光州固始县人,“随军入闽,先居南平,明正德年间迁来漳平县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四

传说,明清易代之际,和春郑家遭到厄运,数百余口只剩下十八人。安定之后,才从此十八人中渐渐繁衍起来。

现在,和春郑家可以分为两派:攀宿公后裔和非攀宿公后裔。住在县城里的几乎都是攀宿公后裔,住在和春乡的也有攀宿公后裔。这两派郑家子弟,人数之比,现在不难统计出来。我少时似乎听说,攀宿公后裔对非攀宿公后裔之比为1:1,据说现在是1:2。但就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说,攀宿公后裔仍是高于非攀宿公后裔的。

攀宿公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传说,他本是穷教书匠,穷到只有咸萝卜做下饭的菜,而且不是吃下咸萝卜,是用舌头舔舔咸味就可以下饭了。不知怎样,他考得了一名秀才。当时还没有龙岩直隶州,他是去漳州府考试的。在易代丧乱之后的和春乡,考得一名秀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他渐渐积了钱,也渐渐产生了关于他的神话。人家说,他的钱是神物,借他的钱种田会多收粮食,借他的钱养猪会多长肉,借他的钱做买卖会一本万利等等。于是,他由穷教书匠变成了富翁,广置田宅,多积钱财。一般暴发户是先富而后教的,即先积了财产,然后提高文化。这个暴发户则先教而后富。自己发了财,就不仅要把财产遗留给子孙,而且要培养子孙读书,考取什么功名,提高家族的地位。

攀宿公有两个儿子,长郑经远,次郑经邦,都考取了秀才。这家人,财产有了,在本乡也有地位了,就想向外发展,即要争取全县的地位。首先要在县城内争得立足之地。

关于攀宿公少时贫穷的传说,不见得可靠,至少是言过其实。由族谱的文字记载可知攀宿公的父亲如隆就是秀才,死后三年便能正式安葬,他的母亲陈氏也能正式安葬,他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即便少时家境不好,也不至穷到那种地步。传说似乎含有教

育子弟勤俭持家的作用。

县城设在小菁乡。在设县以前,小菁乡的地位同居仁里的其他大乡村,如丁坂乡、和平乡、和春乡等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设县以后好多年也是这样。小菁乡人不能以城里人自居而轻视其他乡村的人为“乡下人”。可是时间一久,这种不平等地位就暴露出来了。小菁乡毕竟有官衙,有街市,有圩场,有城墙,居民的文化也更高些,头脑也更复杂些。发生“小乱”时候,城门一闭,富人也更安全些。攀宿公和他的儿子就提出了如何到城里找一个立足之地的问題。

此时设县已久,各乡富人都要到城里找立足之地,可不容易,和春郑家毕竟在县城里建筑了三大宅。

攀宿公本人并未移居县城,从他的儿子郑经远起才在县城占据一席之地。首先获得两块很好的宅基,一块在上水门内东侧,建成祠堂式的大宅,前后两进,后进供奉攀宿公,大门上有石刻的“郑氏宗祠”四字。事实上这是祠堂兼住宅的建筑物,左右两边都有“辅厝”。两进之间东西各有厢房,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太史第,以及洪厝坪和大坪头两个陈家祠堂(大坪头祠堂右边有辅厝)。祠堂是专供祭祀之用的,不能作住宅。另一块在葛丘田,本是郑经远住宅,死后才作为祠堂的,建筑结构同前者一样。第三个大宅在上水门内西侧,那是以后由郑经远的第五个儿子和第六个儿子联合建成的,规模小得多,只有一进,但也有辅厝和厢房,以后大厅上也供了两兄弟的牌位和画像。除了这三大宅以外,郑家在城内还有几个小宅和书斋。

郑经远和郑经邦兄弟和他们的儿子也都是秀才。郑经远有八个儿子,前四个是正室叶氏生的,名壮、荷、薇、革;后四个是侧室张氏生的,名菊、苕、藜、芬。郑经邦有两个儿子,名萃、华。这些似非“官名”,例如,郑经邦二子,这里名为萃、华,但县志节妇传中则作钟秀、廷虞;郑经远第五子这里名为菊,县志作苑培。郑苑培字植

庵号西亭,死后称西亭公。他就是我的曾祖父,可以想得到攀宿公子孙都有“官名”,不过无法查考而已。

郑经邦早死,其妻李氏二十二岁守寡,死时七十四岁。县志道光版人物志节孝类有传,说乾隆五十六年“请旌祀节孝”,佛儿架山下有个石牌坊就是为她建立的。现在已拆毁了。

郑经远却活到八十六岁。他是和春郑家开始定居于县城内的,但只有后四子随他居住县城,前四子以及两侄都留在和春。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列于人物志之“乡宾类”,此类只有他一个人。“乡饮”和“宾筵”都是一种荣誉,当时政府赐给地方上有一定地位的富人(我们和春郑家八世祖郑绍裘曾于明弘治五年享受了这个荣誉)。有个知县还送郑经远一个“王国嘉宾”的匾额,传中说:“阖邑推为硕望。”

当县志道光版成书时,郑经远似尚未死。他的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列名于县志编校人名单内,身份还只是“附生”。

中国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各地方都有发展,漳平县也不例外。这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集中,大地主财富增加,不仅培养子弟读书,而且要干预政治。干预政治,首先就要在城市插一只脚。住在乡村,要同县官交往,要管理全县的公共事业,要包揽诉讼,毕竟是不方便的。住在近郊还可对付,远郊就不行了。所以大乡村的大地主,发展到相当程度,就要搬到城里来。这些有钱有势的富家,几代之后衰落,贫穷的子孙再搬回乡下去。本身从乡村迁来,子孙也有乡村这条退路了。

和春郑家的发展就符合于这个规律。五世祖郑天爵(伯仁),本身发了家,子侄中又有三人在外而做官,仍旧居住和春乡内。此时漳平也尚未设县。九世祖郑伟又发了一次家,兄弟三人都做了官,此时漳平已经设县了,他仍未能迁居县城。但郑伟死后葬在县城北郊,似有移居县城之意,又回龙坞做了和春郑家的“祖山”,为本族葬地,不知始于何时,似在明代就是如此了。七世祖妣邓氏死

后就葬在回龙坞,时在明成化丁酉年(一四七七年)。这也表明和春郑家有向县城迁移之意。攀宿公第三次发家,到了他的儿子,终于在县城找到立足之地,足以干预全县的政治了。

郑经远迁居县城,自然不会放弃和春基地。他把正室生的四个儿子留在和春,把侧室生的四个儿子定居县城。相传,侧室张氏是福州人,他去福州乡试或经商(他兼做监商)时娶的。

郑经远死后,财产分给八个儿子之外,公有财产也分成两份,一份为住在和春的前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内四美”;另一份为住在城里的后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外四美”。各族都有公有财产,由族人轮流管理,除供给祭祀、扫墓等费用外,还有一部分名为“书香”,分给子孙中的秀才,及供应他们去福州乡试的费用。公有财产不是现金,而是田产,每年动用租谷,照理是不会减少的。

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就侧室所生的说来,就是长子了。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财产,而且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从“附生”升为贡生,晚年以贡生资格出任古田县儒学教谕。学官也是官。我少时在我家的大堂上左右两边陈列着仪仗,有“肃静”、“回避”、“古田县教谕”、“儒学正堂”等四块牌子。为了作过一任官的缘故,他的地位比他的父亲更高了。他个人的财产是否超过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但外四美的财产是他管的,以致每年收的租谷在门外空地暴晒,占据了很多的地方。相传后来的大富人陈玉鸣当时还是替人挑水的,他经过我家门外,看见那么多的稻谷,感叹道:我有十分之一的稻谷就满足了。以后,陈玉鸣考中了武秀才,他的财产还远远超过我的曾祖父。

曾祖父有一妻一妾,只生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只好过继他的八弟的一个儿子为子。直至五十岁才娶一个农家姑娘为妾,接连生了六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但他晚年,即学官任满回来后,生活并不好过,所有的财产丧失殆尽了。为什么?据说:他尝到了做官的甜头,一心为安排他的第二个儿子(他亲生的头儿子)郑秉卫

出去做官,不惜工本,结果官未做成,家产却荡尽了。

郑苑培生卒时间尚未考出,只知道太平军来攻城时,他尚在世,带着全家逃往和春,只有第六子志广陷于围城中。志广当时十八岁,即生于一八四七年。志广是他亲生的第五个儿子。他是五十一岁亲生第一个儿子的。如此算来,在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失败时,郑苑培约有七十七岁,即生年约为一七八七年,死年约为一八七一年。

他的坟墓在和平乡至和春乡的中途,未毁,墓碑是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立的,上刻“显考钦加光禄寺署正任古田学教谕端和西亭郑公墓”。“光禄寺署正”是京官,他未去北京做官,这里不过是加给地方官的虚衔而已。他的七个儿子都用官名:秉仁、秉衡、秉盘(志铭)、秉诚、秉崧、秉宽(志广)、秉钧(志樵)。他的十三个孙子则用谱名:庆寿、庆云、庆榘、庆燮、庆泽、庆秀、庆添、庆铨、庆深、庆丰、庆悦、庆清、庆端。曾孙二人:嘉谟、嘉猷,是庆寿之子。

郑经远第六子荅郎,不知官名是什么,墓碑上刻着:“试用儒学毅文玉田郑先生”。他生了九个儿子,其中三个是秀才。我少时还看到他的第九个儿子志全,我们喊他“九公”。郑经远第七子藜郎,生有八子。第八子芬郎,名延瑶、字和雅、号德馨,县志说曾任布政司理问。他生有四子,第二子过继五哥外,还有三子。

五

和春郑家始祖是一二三四年(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个人从仙游县迁来的,到今天已有七百五十二年了。温赞尧的县志续编中那个《姓氏人口统计表》记载漳平县郑家有一千八百人。漳平县除和春郑家外,还有郑家,人数虽不多,应从这一千八百人中减去。但此表作于将近四十年前,今日郑家人口又增加不少了,我们和春一系的人口可能达到二千人,大部分人仍居和春乡,小部分人住在城

内,城内郑家几乎都是郑经远的后裔。

研究这个家族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明了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尽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发展分期也是不同的。为了避免争论,我这里说的“封建社会”,仅仅是指那种以田地(粮食)来计算财富的社会。社会的阶级分化,主要表现为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地主剥削、农民受剥削。在封建社会初期,以及晚期中某些落后的地方(漳平县在内),这种剥削表现为家族内的剥削。地主和农民是同一家族的人,同祭一个祠堂,同居一个乡村。漳平话称为“叔孙”的关系掩盖着剥削的关系。地主拿家族的利益做幌子,要农民忍受剥削,同地主团结一致。这个家族同那个家族斗争时,往往是地主出头领导,而同族农民一致拥护的。斗争一般表现为诉讼,有时表现为械斗。地主有功名,有官职,往往能决定斗争的胜负。一般说来,财富和文化是分不开的。财富可以培养文化,文化可以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培养文化正是为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

和春郑家历代不乏大地主,也不乏文化。始祖就是私塾先生,他招赘于梁家地主,借梁家力量积累财富至二万三千束。他的儿子雷震是个“尚舍”,即国子监学生,或称“监生”(原来地位在秀才之上,后来可以用钱买,就不值钱了)。他的孙子公贤则是私塾先生,大概家道中落,又逢宋元易代,不得不去漳泉兴化一带教书,而且迁于“仙帽寨”地方(不知在何处)。他的玄孙有六人,此时大概迁回和春了,家道又兴旺起来。这六个人都没有功名,但次代(六世祖)则有三人做了秀才,而且出去做官,两个做知县,一个做学官。这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事情。以后家又中落。八世祖绍裘,谱称“嗜读诗书,淹通诗词”,似无功名。绍裘生四子,其中三子伟、便、信都读了书,做了官,次一代也有做官的。以后家道又中落。直到入清后,攀宿公才振兴,以至于迁人一支于县城内。

可注意的,是和春郑家历代虽然出了许多大地主,也出了几个

知县、学官、佐杂,但没有出一个举人,更加没有进士、翰林了。至多是几个贡生而已。

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所谓“功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学历”;京官和地方官,则相当于现在说的“职位”。两者并非完全对等的。本县的朱阳考取了翰林,学历算是最高的了,但他只做了知县;和春郑家有郑文璫、郑惠昌、郑伟三人做了知县,他们的学历只是秀才(贡生也是属于秀才一级的)。

今天形势改变了。中国已经跨出了封建社会,即是财富不再以田地(粮食)计算,而是以货币计算了。血统纽带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再是他的家族的一个成员,依附于他的家族。族谱已无现实的意义,即不能用来歌颂祖宗功德,团结族众,抵御外侮等等。今天族谱只有历史的意义,即由此可以知道过去的社会生活,可以补充地方志书之不足。我希望本县各大姓都能整理旧的族谱,并续编新的族谱,为新编的县志提供材料。

和春郑家是漳平县的一个小姓,清初以来曾经干预全县的政治,发挥了与其人数不相称的作用。这个作用现在完结了。

祖父和父亲

母亲难产

光绪廿七年辛丑二月廿七(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五日),我的母亲第一次分娩。她天未亮就发生阵痛,接生老娘早已守在床前了,可是生不下来。全家都在着急,祖母尤其着急。有人建议将“大帝爷”接到家里来。大家都赞成立即派人去接,供在大厅上祖宗的牌位前面。“大帝爷”是西北郊的大村后坂洋(今名福满)的保护神,在本县城内外的几个菩萨中是最“灵验”的,特别在医疗方面。据说,这位保护神生前是本地的名医,死后群众尊奉他,给他封爵,一直封到“大帝”。每年正月迎神时,他的队伍特别热闹,因为生病求医的人病愈后归功于他的恩德。现在母亲难产求神,最适宜的自然还是这位“大帝爷”。

神像供在上面,“同身”(北方人叫“神汉”)跳起来,手挥“宝剑”从大厅一直跳到产房门口,拿“宝剑”在门上敲几下,房内的孩子就生出来了。那时正是午时三刻。

这个孩子就是我。不能说“呱呱坠地”,因为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难产之后,我已经没有哭的力气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出哭声。

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十年,此时才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是男孩子。

以上所记当然是我长大后听大人说的,在那个迷信社会里,这

类的话不用说会有很多的“水分”。

我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生活。这是一个地主家庭，成员之间要遵守一定的传统的礼节。家是祖母管的，祖母是当时典型的地主太太，不仅父亲和母亲要听她的话，连祖父也要听她的，更不用说家里两个丫头了。家庭成员中最苦的还是我的母亲。祖母总是不满意母亲，东也不好，西也不好，并非母亲敢于顶撞她，母亲是脾气急躁的，但她也是地主家庭出身，也熟悉封建礼节，知道下辈必须顺从上辈。她每日给婆婆梳头，听婆婆数落，一声不响，也不敢将不平之气现于颜色。她所受的怨气往往向父亲发泄，父亲左右为难。两夫妇感情是很好的，父亲的朋友都知道，都为此夸奖他。他只能努力读书，学写八股文，希望考得秀才，以提高爱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皇天不负苦心人，父亲终于考得秀才了，可是母亲地位提高不多，仍旧每天要听婆婆的数落。父亲后来告诉我，是我的出生改变了祖母对母亲的态度。我还记得看见每天早上母亲替祖母梳头，但已没有听到祖母数落母亲了。

凭这一点，我来人间这一趟是值得的，凭这一点，我的母亲忍受那场难产的痛苦也是值得的。

我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

一句话：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

这个家庭挣扎着，不甘心破落下去，有个时期还表现了复兴气象，但最后还是破落到底了。

我出生时正值家庭复兴时期。

我的曾祖父曾是全县最大的绅士，全县数一数二的地主，但他晚年已经破产了，土地典卖干净，没有什么留给他的七个儿子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幸而他最喜欢的最小儿子，——就是我的祖父——经过几年贫困的生活（祖母还替人家做衣服），终于考得一

名秀才,他以此利用曾祖父的声望,同本县的上流社会往来,渐渐站稳了脚跟。有了这个地位,积累财富就容易了。

我们那里的习惯是,土地出卖有两个阶段:典卖和绝卖。先典卖,卖价较低,但可以以原价赎回;无力去赎的,买方再出若干地价买绝这块土地,那就有钱也不能赎回了。本县又有一个习惯,即父亲典卖出去的土地,以后哪个儿子出钱去赎回,就归哪个儿子所有,其他的儿子无份。我的祖父就是利用这两个习惯,赎回了他的父亲典卖出去的部分土地,成了一个地主。

可是,七个兄弟中只有他考得秀才(这点还须保留,因为老二和老五也可能是秀才),但也只有他没有儿子。祖母生过一个女儿,但很小就夭折了。反之,老三则有四个儿子,老六则有三个儿子,都嫌多了。于是,老七将老三的第四个儿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有二个祖父:亲祖父,名志铭,官名郑秉盘;过继的祖父名志樵,官名郑秉钧。当我出生时,亲生的祖父已经死了,祖辈七个兄弟中惟有老六、老七尚在。老六名志广,官名郑秉宽。

我的祖父,过继的,在清朝末年,利用县里诸大姓互相斗争的机会,以和春郑家小姓代表的身份,自然成为本县两三个大绅士之一。几任知县看重他,管理本县若干公产,包揽诉讼,以及其他官绅勾结的事情,因此地位很高,收入亦多。本县创办小学时他也挂名校董,并将我的父亲安插在学校内,担任会计。

祖父当然是纯粹的书派绅士,辛亥革命之后绅士换班,就没有人理睬他了。

祖母比祖父小两岁,病死于辛亥革命前一年,这年祖父恰是六十岁,丧事和寿事都办得相当隆重。辛亥革命那年,祖父续弦,继祖母同我的母亲同年,于是家庭纠纷就多了。根本问题,就是继祖母仍旧要摆婆婆的架子,我的母亲就不服帖,于是闹得祖父和父亲也不和,结果不仅分炊,而且我们一家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复

兴时期积累的财产全部都耗光了,我们终于成了破落户。

父亲有一次同我说:那年死去的若不是祖母而是祖父,那么祖母继承祖父的财产,他从旁扶助,就不会像今天那样一无所有。

地主家庭破产了,但架子还在,特别是大儿子还要读书,不能送去商店学生意。我中学毕业那年要父亲筹一笔路费去北京考北高师,父亲完全没有办法。大儿子怎么能不读书呢?我的父亲是秀才,祖父是秀才,曾祖父是秀才,高祖父是秀才,高祖父的父亲也是秀才。我们这一家不是简单的破落地主家庭,而是有文化的破落的地主家庭。

祖父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记得辛亥革命以前,历任知县上任后都要来我家的书房作礼节性的拜访,祖父经常去县衙门拜访知县,“老夫子”(知县的师爷)也经常来我们的书房拜访祖父,逢年过节送礼的人很多……这一切,辛亥革命后都改变了。例如,县知事上任后去拜访其他几家绅士,只叫人送一张名片到我家,或连名片也不送。

我父亲同祖父分家后,每年只在祖父生日去请他来我家吃一顿饭而已。

祖父续弦后生一个儿子,取各庆耆,但三四岁时死去了,他十分悲伤,因为这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不是过继的儿子;我们无动于衷。没有人去祖父面前说几句安慰的话。一九一八年,暑假期间,我在家中,祖父生病,不知是什么病,我同继祖母守在床前,第二日下半夜,祖父就死了,享年六十八岁,葬于我们的祖山回龙坞,他自己预备好的生坟。

关于祖母,祖父原配的祖母,我前面所写是不够的。全家的人,我最爱的就是祖母,因为她最爱我。我进中学后读《红楼梦》,关于贾母和宝玉的关系,我全能够理解。我少时总以为母亲偏袒二弟,有什么争执,母亲总是站在二弟方面,祖母则把二弟看作一般的孙子。二弟后面生的妹妹祖母命令送给人,不久妹妹就死了。

妹妹后面生的三弟，祖母死时只有一岁。三弟后面生的四弟，祖母已来不及见面了。祖母惟独把我当作宝贝。后来大了，我知道母亲也是最爱我的，她不过要抑制我的骄傲而已。

祖母又是我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她识字，会算，能念佛经。我同她一头睡，她教我从一数到一百，教我背诵二十四个节气，背熟三十七“花会人名”，每日念“观音咒”。母亲生二弟后，我就同祖母一道睡，一直到她死前三天。

我的父亲

以父亲为家长的家，是人不敷出的家。父亲历年积蓄的私房钱为了典房子，建新家，都用尽了。祖父分给我们的土地，每年从佃户收取的稻谷是够吃的，我从未见过我家买米吃，但也未见过米店来我家搬过稻谷。父亲除维持一家人伙食之外，还需要为自己准备鸦片烟，而当时鸦片烟是很贵的，又有犯法的危险。我不知道他如何设法维持这个家，他从来不同我谈家庭经济问题。他同我说也没有用。我在中学穿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也不去埋怨父亲。

我听人说，他晚年曾在许家祠堂办一个私塾，教学生识字，又曾在自己新居大屋的厅堂上教书。我想，他不是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会去教私塾的。他死于一九三〇年或一九三一年，我至今还弄不清楚。

我在法国，在苏联，以及回国在上海，一共收到他几十封信，注意保存着，随身携带。这些信如果还在，我今天就可以用来写一篇《我的父亲》，可惜，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唐生智军队要占中共湖北省委房子，我赶紧搬出随身行李，只搬出一半，再去搬时军队已经守着大门，不许进去了。父亲的信和一部分书籍，就是这样永久遗失了的。现在只能凭记忆来写父亲了。

我的父亲,以鸦片烟鬼的身份,无所建树地,在六十岁左右死去,但他的本质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本质胜过我的祖父。祖父一生遵循地主阶级历代传下来的道路走去,毫无自己的特殊表现;父亲少时则是与众不同的。他有勇气,对于那种社会的陋习,敢反抗,敢以身作则来实行改革,因此引起住在城里的郑家子孙赞扬他,依赖他,说他是我们郑家最好的子弟,是能够顾全大局而非自私自利的人。

关于他,人家传说了如下几件事情:

第一,他结婚多年,没有子息。我们那里的人有一种风气,结婚三年后没有生儿子的,就要去买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实例很多。他的大哥(我的大伯父)就买了一个儿子,但后来自己又生了两个儿子。朋友们都劝我的父亲买一个儿子,或者娶一个小老婆(有钱人家,即使已有儿子,也要纳妾)。我父亲不听人家的劝告,人家都把他看作违反惯例的,或不近人情的。结婚十年,他还没有儿子,此时他才吸了鸦片烟。他终于有了一个大儿子(以后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幼年死了)。

第二,他一般是听祖母的话的(他称祖母为“七婶”,称祖父为“七叔”)。他的读书,他的婚姻,他的交游等等,祖母较祖父关心。但“七婶”和“六婶”是死对头,两妯娌之间互争互斗,争得你死我活,以致“七叔”和“六叔”两兄弟也失和。六婶婆患肺结核病死了,她生了三个儿子,只有庆丰叔在身边,我的父亲于是同庆丰叔一起给死者更衣,守灵,不管此举如何激怒自己嗣祖母。不用说,丰叔一家人如何感激了。后来,一九一〇年嗣祖母死了,丰叔也来同我的父亲一起给死者更衣。

第三,我的父亲不畏权势,敢为朋友同当地流氓斗争。当时,有名画家作朋先生,是父亲的最好的朋友,他不知如何得罪了当时黑社会一个有权势的头子,这人扬言要痛打作朋先生,我的父亲带了作朋先生到那个人家中去说理,由于我的父亲的声望和威势,没

有说几句,这人就认错了,愿意点蜡烛,放鞭炮,向作朋先生认罪。

第四,我父亲亲自告诉我,康梁变法那个时期,本县进士陈桂芳曾率领一群秀才去衙门里同知县争论,陈桂芳大声呵责知县,知县不敢争辩连声说好话,我的父亲也同这群秀才一起在衙门看见这场斗争的。他又说: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同一个朋友爬在城墙上,对着基督教福音堂大骂。旁边群众愈聚愈多,最后群众拿起石头,抛向福音堂。

以上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情,这同我后来认识的父亲的性格判若两人。他后来为鸦片烟所困,每日需有一定的时间躺在床上吸烟,还要为我的生活、求学和前途操心,于是少年时那种豪气没有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最后一个塾师霞阁先生一天闲谈时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本县的大绅士,一些人老了,失势了,总有另一些人取而代之。事前,人们总可以猜到什么人上去做绅士,很少猜不到。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过去都以为你的父亲将是本县的大绅士,可是,这一点猜错了。

我的父亲没有接祖父的班在本县做绅士,但他的社会地位还是与一般的鸦片烟鬼不一样。本县最有学问的养奇先生至死仍旧把我的父亲当作好朋友,并为他死后写小传。本县,一个著名人物少泉先生,也是父亲的学生,终生尊敬他。

我的外家

我的基因一半是父亲给的,另一半是母亲给的,二者同样重要。可是,人类社会今天仍实行父系制度,我关心郑家远过于关心太常陈家。

外家也是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当初订婚时是门当户对的。外家住在北门外坎儿脚。这个居民点,大部分居然是太常陈家,小部

分居民是蓝田陈家。那里有太常陈家的大祠堂。外公陈国选也是地主,但非秀才。大舅子仁先生却是秀才中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坎儿脚几个秀才中最有才气的。他生了两个表兄,都比我大。此时,全家已无财产,生活靠舅舅维持,两个表兄已无力读书,但舅舅仍按照当时的风气,娶了小老婆,另找房子居住。几年后,大舅就死了,于是全家生活没有着落。外公已年老,他不得不带领两个表兄在城内大街上开一个卖杂货的小店,开了不久就维持不下去。外公也死了。两个表兄都已成家。大表兄永秋染上了鸦片烟无法生活,据说我去法国后,他也随国民党的邓本殷军队开到广东去了,不知下落。二表兄永华去浦南一家漳平人开的店铺学生意。学了一个时期,知道现代商业的一些诀窍,决心要去南洋群岛谋生。他没有路费,每日缠着我的父亲代筹路费。我的父亲是义不容辞的,但他自己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他不知从何处借来的钱给永华表兄做路费去爪哇了。我忘记了这是哪年的事情,似乎是我暑假在家中看见他出去的。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我中学毕业后也缠着父亲,要他给我筹措路费去北京考北高师,他却毫无办法。可是,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还是筹到了三百元给我带去的。

一九二一年,永华表兄曾从印尼寄了一笔钱去法国给我,忘记了多少钱,但数目不多,够我在法国过一个月的生活。我回国后,至少有三三次在上海写信同他联系,都未成功。解放后,我被捕,家中抄出了印尼的通信地址,审讯者说是印尼托派组织的地址,要我交代中国托派和印尼托派的联系。我说:这是我表兄的地址,你可以去我的家乡打听,我有没有表兄在印尼?他的地址是不是抄出来的这个地址?直到去年,我才联系上了,他已于七十年代去世了,他的儿子也去世了,同我联系的是他的孙子。

在家乡似乎已无外家的人了。那个房子也属于外家,我回忆年少时,我同二弟每年正月初二都要随同父母亲去外家拜年,外公

家早已备好酒席招待我们。同桌的有外公、外婆(不是母亲的生母,是母亲的继母)、舅舅、舅母,父亲、母亲,两个表兄和我们两兄弟。正月初二是风雨无阻的。平时,我们兄弟也要同母亲一道去外家几次。

母亲是外公亲生的,舅舅则是外公买来的。这是旧社会的习惯,没有儿子就买一个。不过大家都看买来的儿子同新生的儿子一样。舅舅也不负外公的培养,考得一名秀才,而且在秀才班子中富有才能。母亲也待他同亲兄一样。

母亲虽不识字,但两家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她知道应当遵守的礼节,受了委屈,也竭力忍耐,有时也向小孩子发泄。她比父亲小四岁,父亲生于一八七一年,母亲生于一八七五年,生日都在旧历十二月。两人感情极好,这就可以补偿母亲所受的委屈。父亲从不打骂孩子,母亲则是急躁的,受到委屈常向小孩子发泄。人家说:“严父慈母”,在我的家庭则是慈父严母。我本来是同母亲睡的,生了二弟之后则同祖母一道睡了。

母亲结婚十年不生育,可是生了我之后,差不多每隔三年生了一胎,生了四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最后,生病时小产了一胎,也是男孩子。

母亲的身体本来最好,但旧社会不注意卫生,当时虽有西医,我们家里有人生病总是找中医。每年夏天全家好多人都要患痢疾,吃中药或不吃药,几天后就好了,不以为意。一九一五年,即我上中学的一年,我母亲患痢疾到秋天还不好,由急性变为慢性,拖到次年,变成腹膜炎,生了腹水。当时,我十六岁,读中学一年级,过了元宵节仍去龙岩县上学。过了约一个月,父亲派专人来催我回家,说母亲病危。次日,我动身回家,母亲见到我一欢喜病就好了些。几天后,我看无事,又去龙岩上学了。暑假回家,才知母病加重,过几日她死去,享年四十二岁。

母亲身体本来很好,为什么四十二岁就死了呢?这是中医误

事。如果现在,在西医治疗之下,痼疾即使变成慢性,也不难治愈。当时,我们县里虽有西医,看的人并不多,尤其我们这种家庭更不信西医,以致误了事。

我这几年还对下辈人说:如果母亲在世,我不会去法国那样远的地方。照理,母亲常常骂我,打我,受了委屈拿我来出气,我应当对父亲更好,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怀念着母亲。母亲死后葬在我们的祖山回龙坞,直到八十年代末,铁路局征用此山,才移葬于别处,同我的父亲遗骨以及我爱人和儿子的骨灰葬在一起,而且留下空穴准备安置我的骨灰。我是无神论者,但在这一点上倒希望人真有灵魂,死后能够相会!(我的祖父和祖母及庆耆叔的遗骸也移葬在这里,至于继祖母遗骨没有葬在这里,倒不是为了夙怨,而是没人知道葬地。)

鸢 姑

我有一个姑母,我说的:不是我父亲的同胞姊妹,那也不止一个。我说的是另一个姑母,她称我的祖父为“爹”,祖母为“妈”,父亲为“兄”,母亲为“嫂”,待我们兄弟如同亲侄。她演了一场“悲剧”,结束了生命。

我有这样一个姑母,除我之外,现在在世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我说不出当时她的年龄,只记得当时已是一般闺女出嫁的年龄了。她对人彬彬有礼,像一个大家闺秀。很少人同她亲近,很少人同她做朋友,我未见人家背后说她好,也未见说她坏。

我曾问母亲这个姑母的来历,母亲悄悄告诉我:“这姑母本是祖母买的一个小丫头,祖母喜欢她,便收她做养女,教她种种礼节,准备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家嫁出去。

好人家找到了,那是同我们家一样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家长

是祖父的朋友，同祖父一起包揽本县公产的，家底比我们更好。家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已成家，生的孙子比我大一岁，二儿子这次才成家。这个家长是三兄弟中居长，一个大家庭共住一座大房子，人多了，难免相互间勾心斗角。

鸾姑嫁去以后，我曾陪祖父去看她。她住在东厢房，老大的家住在西厢房，家长夫妇则住在左边的正房。同祖父一样，我们脱下的衣服都放在鸾姑房内，鸾姑作为主妇招待我们。

祖父是顽固派，这位家长比祖父还更顽固。祖父的辫子，在辛亥革命后好多年剪去了。可是这位家长至死也不剪辫子。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祖父的书房中，忽见那家的大儿子气急败坏地走了来，说鸾姑死了，她自己上吊死去的。

这是晴天霹雳！为什么上吊。他们二人悄悄说话，我们小孩子听不清楚，以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何化法我们小孩子也不知道。这是一件不好听的事情，我们两家都不愿意张扬，不久就风平浪静了。

我却在祖母和媒婆说话之中听到了几句不可理解的话，即媒婆说：“鸾姑要生小孩子而不能生小孩子了，只好走这条绝路。”

那时我不明白：不能生小孩，为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呢？以后大了，我才明白：原来姑丈是个“天阉”，由此引出可能发生的事实，到了非走死路不可。什么事实？那就要自己去想像了。

鸾姑如果是祖父母亲生的女儿，一定要多调查，不会如此草率的。

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至今将近九十年了，还有办法搞清事实吗？——除了吊颈鬼找替身以外。

我的婚姻

我是结了婚三年以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此事，我并不隐

讳,但也不是逢人便说,比较要好的朋友,闲谈之中我就说出来了。不过,在以往写的传记性文章之中,我从不写此事。其实,这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像我所处的时代,所属的家庭,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如果尚未结婚,倒是奇怪的事情。我不说,却是为了后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爱人。

我很小就有媒人来提婚,但尚小,没有说下去。八九岁时,祖母认为不小了,应当提婚了。恰好有媒人来看祖母,便介绍一个近郊人家,也是地主家庭,有个女儿,她与我同年,要我们去看看。祖母派了母亲去看,母亲中意,回报祖母,做定了婚。我十岁时,祖母死了,不久她的祖母也死了。她的家庭衰落得比我的家庭更快。对方日食困难,便通过媒人同我们商量,现在就过门。我们同意了。

在那个社会,这种事情父母同意就够了,决不与我商量。我当时年少怕羞,小孩子之间常拿这种事来开玩笑,我害怕人家笑我,根本就不同意提婚、订婚、结婚一类的事情,我的反对也没有用。于是,我十二岁时,她来到我家,她同一个丫头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我们虽朝夕相处,但结婚前从来未说一句话。

我十六岁时,母亲病得快死了。祖父、父亲,以及其他的人主张我们二人立即结婚。合理的理由是说:母亲死了,家中没有女主人不行;不合理的理由则说:母亲的病,“冲喜”就可以好。“冲喜”的意思就是家里办一件喜事。反正,在那种社会中,一切要服从长辈的决定。我就是这样结了婚。当时实际年龄,我不过十五岁半,她还更小一点。

在这一年,我第一次读了《红楼梦》,结合过去读的小说,知道结婚之外尚有“爱情”。又从小说中知道: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但旧社会的道德势力太大了,认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必然要演悲剧。《红楼梦》《西厢记》就是实例。

参加革命之后,又把“爱情”抛到九霄云外了。回国之后,同伴

纷纷找对象,我觉得可笑。少数同伴,结了婚的,回去将老婆带到上海;未结婚的回家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老婆带到上海来。我也曾动心,但一来没有钱去家乡带老婆,二来以为家乡的人会说:我今做了官,只要老婆去享福,而不顾父亲和弟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我在武汉看见捉人,杀人,想到自己总有一天被捉被杀的,于是写封信给父亲,告诉他以后不给他通信地址,又告诉他我随时会牺牲,家中的老婆任随改嫁。我写了这封信投入邮筒以后,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在同一年回到上海,我意外地找到了情投意合的爱人。第一次认识时就告诉她我家里结了婚,她并不嫌弃,我们相约为革命而牺牲。我三次入狱,她也陪我三次入狱。她一次与我同时出狱;两次先出狱,在狱外等待我出狱。最后一次,我名义上是“释放”了,事实上改劳改形式为严密管制。她陪伴我熬过七年的严密管制,到我完全恢复自由之后,只三个半月,她因心脏病死在我的怀抱中。

我以为我一九二八年再结婚时,我原先的配偶早已改嫁了。我在武汉写给父亲的最后的信之后,再未接到父亲的信,二弟的信也未提改嫁的事。直到上海解放之次年一个堂侄来上海考大学,这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见到亲人。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的第一个配偶的消息。他说:“已经根据你的信上所说改嫁了。”谢天谢地!以后知道:我第二次结婚,早于她的改嫁。

我在受管制的七年中收到她从家乡写来的二封信,我都给了我的爱人去看。她劝我设法寄点钱去,我那时仍是犯人哪里有钱寄呢?她又劝我回答那两封信,我也没有回信。

我的婚姻就是这样简单:先后有两个配偶,从来没有为恋爱而闹过风波。比起古人一生只有一个配偶,要复杂一些;但比起今人比起战友则是微不足道的。在同志朋友中间,我并不隐讳早在老家结了婚的事实,我认为恋爱而妨害政治是不好的,但恋爱是“私

生活”，为恋爱事件而攻击本人的政治主张或做人品格也是无聊的。

可是，一九五二年托派案发生，一部分青年人要“被挽救”，而集中在“管训班”时，管理人员要求他们揭发“反革命”罪行之外，还要求他们揭发领导人的“私生活”，大概以为青年人最爱听这种揭发，以为私生活可以判别好与坏的。我的三个堂侄也在管训班中，他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揭发私生活的人比揭发“反革命”的人更加踊跃。但管训班中“小组长”向管理人员汇报时，说郑超麟的私生活揭发不出来。管理人员于是作结论说：这种人更坏。

未入“管训班”，而在监狱服刑的，也曾喜欢揭发私生活，他们特别找那些同我接近的托派犯人来揭，这人于是揭我在家已经结了婚，又在外另找爱人，而且对爱人隐瞒在家结婚的事实。更有甚者，是家中老婆生的儿子来上海考大学，我则骗上海爱人说这是侄子。于是大家轰起来，指责我“不道德”。有人认为实在不应当同时有两个老婆，也有人认为同时有两个老婆还可以，但不应当欺骗现在的老婆。他们要我证实这个揭发。我只说：我的三个侄子来上海考大学时，都只二十几岁，我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从没有回去，请问哪一个是我的儿子。

祖父和父亲的政治活动

我家的地主家庭地位决定了家长的政治倾向，这就是说，效忠于当时统治政权。他们切齿痛恨造反的“长毛”，也反对维新和革命。武昌起义之后，眼看帝制政权就要消灭了，我的祖父同少泉先生两人进去衙门看知县，少泉先生说几句攻击旧政权的话，知县生气，我的祖父就在旁边打圆场，说少泉先生年少气盛。

到了光复之后，政治活动可以公开，于是绅士之间的斗争，以前是暗中进行的，现在可以公开进行了。可是，我们那个小县，绅

士之间的斗争一向表现为“族姓的斗争”。清朝末年以太常陈家和丁坂刘家的斗争,以陈春江为首的太常陈家重重打垮了丁坂刘家,但未消灭刘家的力量。辛亥革命前,以刘志和为首的丁坂刘家渐渐超出太常陈家。这中间,我的祖父不能说没有发生一点作用。我的祖父站在两种力量的中间,但偏向刘家。反之,我的父亲则倾向陈家。他少时在大夫家庭读书,同养奇先生、慎修先生、子丹先生、筱玉先生等人交了朋友,受这些人的影响,反对刘家。一九一三年,选举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时,两派斗争很激烈,刘家挂起共和党的旗帜,陈家挂起国民党的旗帜,刘家推少泉先生为省议会议员,陈家推慎修先生为省议会议员。不知怎样,两人都没有当选。以后选国会议员时,刘万里当选了。景黄先生是反对刘万里的,但他不能不投刘万里一票,他常对人说:“一个字害了他,即是刘字。”由此可见,共和党和国民党之争是假的,丁坂刘和太常陈之争才是真的。

在这个斗争中,父亲不能不顺从祖父站在丁坂刘家方面,他因此获得“选举人”身份,赴漳州去投票选举议员。他不能不投刘家的票,此时,他心里一定很不愉快的。

中国的议会民主在我们那里,一开始就以旧时的族姓斗争方式来进行,使我当时和以后对于议会民主产生反感。这就为我后来读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文章时反对议会民主的言论打下了赞同的基础。这里说来话长,我就不必说下去了。

我出国后,漳平毕竟有进步。族姓斗争渐渐变化为其他地方所常见的形式。

族姓斗争中,丁坂刘已经击败了太常陈,但并未夺取了太常陈的最后阵地。义仓管理人的重要阵地,多年掌握在太常陈家之手,无法改变。可是,到陈瀛洲死后,刘志和终于夺取过来,交给黄作朋先生。这个最后胜利,同时结束了族姓斗争。陈寿山和刘云纪本来是依附于刘志和集团的,到此就分化出来,使斗争转变为刘志

和与陈寿山的斗争,而太常陈家则为陈寿山助威。这场斗争变文斗为武斗,一直斗到解放的时候。这不是族姓斗争,由于刘云纪(景黄先生)是丁坂刘家,他为陈寿山摇鹅毛扇,此时那一个字(“刘”字)并不妨碍刘云纪帮助陈寿山。

我的中学生活

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

我是中学毕业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现在我说这话给人听时,往往有人反问我:“你是初中毕业后去的,还是高中毕业后去的?”我说:“我是四年制中学毕业后去的。”现在的人多不懂什么是“四年制中学”,我就要费口舌来解释。原来,在我读中学时,只有四年毕业的中学,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我毕业后第二年(一九二〇年),昆明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才决定中学六年毕业,开始分为“初”、“高”两级。久而久之,就无人知道清末民初曾经存在四年制中学了。

四年制怎样变为六年制呢?原来清末民初大学教育的学制规定,中学毕业去考大学的,应考大学预科,读两年后才能升入本科。这两年预科是中等教育范围,昆明教育会议不过将此两年划还中等教育而已。这是有利于教育普及的事。

我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想去考大学。本县一位教师纠正我说:“你要谦虚一点,不能说‘要去考大学’,只能说‘要去考大学预科’。”我出门后都是这样“谦虚”对人说。但在广州候船期间,在船上,到法国以后,发现并非如此,许多人都说:他们勤工俭学赚的钱要在法国考这个那个大学,不一定带“预科”二字。

我这样写是为的说明: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正如我受的初等教育是不完全的一样。

这四年中学生活,对我一生虽无甚大的影响,四年虽不及我从香港上船到马赛下船的这一个月时间对我影响那么大,但安知我这一个月的思想大转变不是以此四年所学积累起来的思想为基础呢?

我一九一四年底在本县县立小学丁班毕业,当时我的年龄只有十四岁,但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全班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在本县无中学可进,这并不奇怪,当时并非每县都有中学。福建省六十多个县,只有少数几个中学。我们附近,龙岩县有个中学,远一点,漳州有个师范,漳州只因有了师范,就没有中学了,除非有外国教会办的“浔源书院”。所以我们那里的小毕业生,要升学的,不是去龙岩,就是去漳州。当然,也可以到福州去读法政学校,但需要很多钱。

我的同班毕业生,只有一人决定去漳州读师范,其余升学的都决定去龙岩读中学,因为费用毕竟比较少些。

我们是年底毕业的,龙岩中学次年暑假才招考新生。我及另外几个人,为的避免浪费学业,便在三牧第私塾读书。此时私塾不是刘岑仲先生教书,刘先生仍在县立小学教国文,私塾先生是陈霞阁(名步韩)。我在那里读半年书,什么都没有学到。一个比我更年少的同班毕业生倒学到很多知识,首先是做旧诗的知识。他的父亲不要他当年去考中学,要霞阁先生教他读旧诗,做旧诗,以及其他旧学知识。

一九一五年暑假期间,我们同班的小毕业生共八人,动身走一百二十里路去龙岩考中学了。

漳平县和龙岩州

漳平县,清朝初年是漳州府的属县,不知道何时另立一个“龙岩直隶州”,直隶于省政府,地位同“府”一样,不过只管三个县:龙

岩,漳平,宁洋。而一个府普通管辖六、七个县。“直隶州”州治设在龙岩,因此称为“龙岩州”。诉讼,漳平本县一审不能判决的,就到龙岩州去审判;再不能判决的,再到福州省城去。朝廷派来的学院(宗师)只按临龙岩州,三年一次,考拔三县的新科秀才,同时复考旧科秀才。所以漳平县的“童生”都要去龙岩州考秀才,漳平县秀才每三年一次也要去州复考,考得不好,重则开革,轻则斥责。为此原故,龙岩的人对于两个属县(漳平、宁洋)就有优越感。一般人对于属县不说“我们龙岩人”,而说我们“州里人”。龙岩州的知识分子、绅士,也看不起漳平县的知识分子、绅士,认为漳平文化特别落后。漳平县的知识分子对此普遍抱有反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长久积累下来的。他们除每隔三年在龙岩有所接触之外,每次乡试或别的考试在福州也有接触。

这种反感也感染了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即辛亥革命以后小学毕业的学生。

全国各府的首县对于属县似乎都有优越感,但不见得有龙岩州对于漳平县那样的紧张。(似乎安庆府是例外:怀宁是首县,桐城是属县,但一般人通称“桐怀”,不称“怀桐”。)

可是我们仍旧要去龙岩考中学。

我们居住在校舍内。这是龙岩中学原始的校舍,进东门后不久就到了。校舍并不大,当时学生也不多,只有丙丁戊三班,似乎是旧时一个书院或别的什么机关改造的。我们只考国文、算术、英文三科。考完,我们还有一整天去郊外游名胜龙岩洞。出南门,过浮桥,走不远的路就到了一个山下,那里,山根上有个开放式的大洞,洞内可以站百把人,洞顶有裂缝,成带状,时时有水渗出。这条裂缝便被视为“龙”,这座山是岩石组成的,故名“龙岩”,县名就是由此而来的。福建这一带不属于卡斯特地貌,没有或很少出现溶洞如桂林附近,所以这个平淡无奇的溶洞便为人所珍视了。洞口平地建立了一座房子,有人主持,游人可以在房内休息,喝茶。次

日,我们便回漳平去,等候“发榜”了。来时,上水,走旱路,三天才到;回时,下水,坐船,当日黄昏就到漳平城下。

等候了不长时间,就“发榜”了。学校寄来通知:八个漳平考生中只有我一人录取入学,其余七人都“榜上无名”。于是,漳平绅士人哗,以为龙岩人有意以此来显示漳平县小学教育多么落后:八个毕业生在中学入学考试中只有一人能录取!大家都破口大骂龙岩人,以致我这个惟一被录取的学生竟被人冷落了。在纷纷议论之中,有人说:我们漳平县自己办一个中学吧,免得受龙岩人的气。这是一种气话,说的人并未想到当时绝没有这种可能。但也有一些人认真考虑起来:经费哪里来?学生哪里来?教员哪里来?说到教员,也有人估计英文、数学找谁来教,但物理和化学是找不出教的人的。我的父亲就冲口而出说:“找养奇鬼去教。养奇有什么学不会的!”当时,连什么叫做“物理”、“化学”也没有人知道!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这个建议。由此,可以知道他当时如何看重他的好友养奇先生,以及当时养奇先生在漳平旧知识分子中如何受人尊敬。但现在想起来,无论养奇先生怎样聪明,要他一面学习,一面教物理、化学,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龙岩,甚至也只有郭庆光一人教中学四个年级的物理课、化学课、几何课、三角课。我在那里四年中未见第二人教这四门课。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一心扑在教书上,在县里没有政治地位,家中又清寒,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一年,解放后,我的两个堂侄在龙岩高中毕业后来上海考大学,我问他们:谁教你们物理、化学?他们说:郭庆光。于是引起我的无限回忆。

一方面,漳平八个考生有七个未被录取;他方面,龙岩中学招收己班学生数额未滿(或者是这一班可以扩大学生名额)。不知道两县的绅士是否有幕后接触,到了要开学时,中学忽然来信通知那七个未被录取的学生,同我一个已被录取的学生,一同去龙岩,他们可以补考。似乎有暗示:“补考”不过“形式”而已,因为他们都把

行李带去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①

我们八个新生，连同戊班的四个漳平学生，一路上去龙岩上中学。

龙岩中学的早期沿革

一九九四年元旦，一位同乡朋友来看我，送我一本《福建龙岩一中九十周年校庆特刊》，一九九三年出版，印装得很精美，以图为主，文字为辅。文字最长的，是一篇《学校概况》。

校庆是十一月一日。原来，我出生之后不过二年，即一九〇三年这个中学就诞生了。

这本《校庆特刊》同我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半盲人了，书中图片只有模糊影子；文字则只能用放大镜看大题目，自然，可以请人读给我听，但要请人读的书又很多，怕轮不到这本特刊了。

送我这本特刊的朋友，也是这个中学毕业的，我问他你读书时校舍在哪里？他说：在“虎岭山头”。我很惊讶：为什么不是在我从前读书的地方呢？^②

我还是写我的回忆吧！

龙岩中学的原始校舍靠近东门，即是我们入学考试时考场和食宿的所在地。我相信，一九〇三年初成立时也就是这个校舍。甲班学生就是在这里上课和食宿，那时还是“龙岩直隶州”，这个中学是“直隶州”的中学，因此也招收属县的学生。我认识一个漳平

① 去龙岩考中学的八个小学毕业生是：刘子明、刘仲衡、刘奎光、刘清秋、陈祖诒、林乃光、郑雅中、郑超麟。

② “虎岭山头”应作“虎岭松涛”，那是龙岩八景之一。有一个山岗从城西北伸入城内，山岗上有松树也有房屋。龙岩最早的小学模范小学（原名权兴小学）就设在那里。口语将“松涛”化为“山头”，但《校庆特刊》那篇《简介》也说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虎岭山头”，好像不知道原有的校舍在旧时试院内。

人刘凤鸣便曾在甲班读过书,但未读到毕业。甲班毕业的学生可考的,有个龙岩万安区人,忘其姓名,中学毕业后曾去福州读法政,辛亥革命后做了某县一任知事,后被聘来中学教书。又有一人,也不是城区人,中学毕业后不知怎样在广东南方政府底下做一个官,一九一九年陈炯明军队攻入福建,在龙岩活动,名片上印着“大元帅府科员,总司令部委员。”不久便因贪污免职,此人名陈经(或陈纬)。

乙班,毫无痕迹可考,似乎辛亥革命前就已毕业或停学了的。

我一九一五年上学时,丙班尚未毕业,我同其中几个人交了朋友,他们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上学的,由此可见,这个学校曾经停办。如果一年一班照常办下去,则一九一二年上学的一班应当是癸班了。

辛亥革命后,这个中学就是龙岩一县的中学了,所以丙班和丁班都没有属县的学生。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中学地位突然有很大的变动,由一县的中学变为闽西几个县的中学,不仅到漳平招生,而且到永定、上杭等过去属汀州府管辖的几个县去招生。龙岩县无形中不仅恢复了过去“直隶州”的地位,而且担当了过去“汀州府”的地位,即现在的专区首县的地位。当时传说,要成立“汀漳道”,道尹驻龙岩,已在城内择地,建筑“道公署”了,但未实现。

中学先行一步。原始校舍太小了,“直隶州”的试院全部拨给中学做校舍。试院的规模很大,比漳平县的大得多,但做校舍,必须重建,于是大兴土木。建校舍需要钱,于是实行募捐,主要向华侨募捐,龙岩华侨很多,发财的也不少,此外还向本地富户募捐。

一九一五年我进中学时,其实是进了这样一个改变了地位的中学。原始校舍已经不能容纳我们新招一班了,新校舍正在开始建筑。我们这一班在“明伦堂”上课,但食宿在试院最后两进没有拆掉的旧房屋里,戊班学生同我们食宿在一起。

试院前面都是考秀才用的“坐号”。这种“坐号”到处是一样,

考举人的“坐号”也差不多。《儒林外史》写周进坐着痛哭的，就是这样一个“坐号”。我读小学时，漳平县的“坐号”尚未拆除，是一县童生“坐”的，龙岩试院的“坐号”则是三县童生坐的，当然大了好多倍。新校舍就是在这个广阔的地基上建立的

最后两进以后也没拆除，现在则做我们的宿舍。我们住在最后一进的两个正房内，那是学院大人按临时住的地方。倒数两进是个楼房，楼上楼下都是统间，那是学院大人的随员办公的地方。现在楼下住人，楼上作我们晚上自修的教室。

我们早上去明伦堂上课，晚上回试院住宿，出入试院大门时都要经过繁忙的建筑工地。我们只见五六处脚手架林立，看不到建筑什么，我们学生也不知道建筑的计划和进度，因之不知道何时可以完成新校舍。寒假到了，漳平县学生都回家过年。次年，一九一六年开学时，我们回到学校一看，大部分脚手架都拆除了，屹立着大门内那座长条型的宿舍大楼以及其他的建筑。我们就不再住最后一进的学院大人居住的上房了，我们都住在新建成的宿舍大楼。我们也不去明伦堂上课了，己班的课堂自始就设在大门左边新食堂隔邻。

当时尚未宣布新校舍建成，已经利用部分建成的校舍了。

大约在这一年，龙岩中学被宣布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获得省财政的支持。^①

从此，到我一九一九年毕业离开后，这个中学就不是龙岩一县

① 福建省教育厅，把龙岩中学改为省立第九中学，同时也推荐三个中学教员来此任教。以前教书的都是龙岩本地人，从此也有外地人了。三个教员是：马毓刚教国语，刘松涛教体育，李厚祺教国文。马毓刚是满洲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刘松涛的课龙岩没有人能教，但为什么派国文教员来呢？据说，教育厅的人问魏校长：贵校还缺少什么教员？魏校长不愿意接受更多推荐，便回答：国文教员有点不够。魏校长意思是：我们自己可以聘请本地人。但教育厅仍派了人来。

的中学,而是闽西七县的共同中学,校舍就是这个由试院改建的新校舍。

一九九四年元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校舍放弃了,另在虎岭山头建筑新的校舍。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呢?大概已经很久了,同我谈话的朋友似乎不知道有这个试院校舍。

承认漳平县落后,但仍不服气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来龙岩上中学的,这反感自然是从漳平县知识分子、绅士方面传染而来。但我暗中下了决心,亲自看看漳平县是否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

我看见龙岩的平地比漳平多得多,因之可耕地也多得多,户口也多得多,财富也多得多,连带着,读书人也就多得多,文化上比较进步,也就不稀奇。但进步多远呢?上课不久,我就从一件事发现了:漳平县的文化确实落后很远。

上国文课时,我发现龙岩同学几乎每人都有一部《古文辞类纂》,教师每次都是从《古文辞类纂》中选择一篇,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大惑不解,我们从漳平县来的学生,没有一人带有此书,我在漳平,在同学中,以及老先生的教书和谈话中从未发现有此书。一般读书人家,藏有古文最多的,是林云铭编的《古文析义》,老先生教我们古文时都是从此书中选出的。因此,我的私塾同学也几乎都有这样的一部书(我在我的父亲的书架上找不到此书,只找到一本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大概是我的父亲某次去福州乡试时买来的)。当时漳平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人知道有《古文辞类纂》这部书。甚至没有人知道古文中有一个“桐城派”。于是,我认识到,不要说别的,就在学习古文这一点上,漳平有名的老先生比起龙岩的老先生来,至少要落后半个世纪!

由此作出结论,应当是:我们既然远远落后,就不要埋怨人家

轻视,至于人家不谦虚,态度不好,那是人家的事情。可是,我不是这样想,我承认了漳平人文化落后,但对龙岩人的轻视仍旧不服气。

有两件事情,表示我的不服气。

一件是一九一六年中学募捐扩大规模,派人去漳平向富户募捐,派的是龙岩县非常重要的人物——苏寿乔,他坐轿子来到漳平县,住在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招待他,帮他去联系富户。苏寿乔住了几天,出了不少力气,结果只募到五十元大洋,太常陈家的族产“紫云书院”的管理人陈璇玑以“紫云书院”的名义提供的。五十元大洋恐怕还不够苏寿乔来往的轿费。校长魏梦云大发雷霆将戊己二班的漳平学生都找了去,连训带骂说了一阵话,我也在场,当时我暗中得意:这就是漳平绅士对龙岩绅士的报复!我可能将这种得意心情向同乡同学透露过。

另一件则是至今为止只藏在我自己的心里,未曾向人说的。那就是后来我在旧书上或杂志上看见有个有名的文学家叫做龚定庵的,文章写得很好,而且看不起桐城派。我匆忙上街去,从书店买到了一部国学扶轮社版的《龚定庵全集》读起来。我心里想:你们龙岩人学桐城派的古文是很进步的了,我现在学龚定庵古文比你们更进步!当时,同学中确实没有第二人买《龚定庵全集》的。我把这部书带到外国去,以后又带回来,一九二七年唐生智军队占领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时,我的随身衣物来不及带出,这部《龚定庵全集》就这样丢失了。但这件不服气的事情,以及漳平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的话,都未曾与人说过。

总之,我是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县读中学的,读了四年毕业以后,仍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离开了龙岩。

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师

现在应当说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了。

一九一五年第一学期，新招的己班学生是在明伦堂上课的。当时，我们的学监是连天锡先生（字哲居，亦可写为拙居）。他是清代的秀才，我在漳平县未曾听人说起他，但常常听人说起他的父亲连鸿佐，那是有名的文人。他有一个弟弟名连天麟，也是本班一个教员，后来去北京应文官考试，在什么部里做一个小官。

连天锡先生对待学生很严厉，后来在新校舍中晚间上自修课时，一个永定学生在黑板上写“专制魔王”四个大字，连天锡先生来点名，看了大发雷霆，在讲台上训了好久的话。

他同时也是我们本班的国文教师，教我们读古文，出作文题，批改我们每人的作文。

开学后不久就过中秋节，连先生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中秋玩月记》。我也杂凑了一篇交上去。几日以后同班的人的作文卷子都批改下来了，我没有收到卷子。我去问他，他和颜悦色地说：“你的文章要‘挂出来’。”不久，果然“挂出来”了，许多同学走去看，也有人去抄。我听人说过，有些学校，学生作文好，教师要“挂出来”给大家看的。漳平县小学无此制度，我以为这是龙岩中学的制度，每期作文都有的，于是，我以后作文更多用力去作。但未见再“挂出来”，同班乃至全校，也不见有别人“挂出来”。这一次例外，我至今不能理解。

连天锡先生室内案头上有一本手抄的诗集，《留删诗集》。我有一次，趁别人说话时翻阅一下，原来是连先生自己作的诗集，第一页引古人诗句：“诗为留删尽数抄”，这是表明谦虚的。意思说：自己作的诗，不分好坏，都抄起来，留待将来删去作为定本。后面的诗，我就来不及看了。由此，我知道连先生是一位诗人。漳平县的秀才会作诗的人不少，例如陈霞阁先生，但未见他们抄了诗集，也未见漳平秀才写过一首诗。

连先生的儿子连寿庚也在我们班内读书，年纪比我更小，同我谈得来，毕业后同我相约去北京考大学，在上海等待我一路北上。

他到上海给了我一信，可惜，我筹不到路费去北京了。

我自学数学

上学，向书店买了一套第一一年级用的教科书，在寝室翻阅起来。

中学第一一年级教的数学仍旧是“算术”，内容同小学学的一样，可能增加一项“开方”，不过是系统化的，由浅入深，各项都有理论的说明。由此项到彼项的过渡说明得更多。我在小学，算术最好，因之算术中各项的次序和相互联系在我的头脑中自然形成了体系，无需要说明。这个课我可以不必学了，学习的时间可以用到别处。

戊班的同乡学生，此时是第二学年了，他们各买了一套第二学年的教科书。我去看看他们的数学课学的什么？原来是“代数”。我听人说过，学了算术之后要学代数，但不知道什么是“代数”。我急忙借了“代数”教科书来看，发现我完全能够看懂。于是看下去，遇着书中的“习题”也去试做，居然做得出来。于是，在不妨碍正课的情况下，就借他们的书学起来，把规定一年学完的代数，我用很短时间就学完了。戊班同乡学生学代数不懂时反来问我，我完全能够回答他们的疑问。

次年，我自己班上学期考试时，先生出的题目中有一个是“四则”问题。这问题，用算术方法做很麻烦，我干脆用代数方法去做。听说，记分时先生很为难：答数是对的，但这是算术题，应当用算术方法去做。结果，林维桢先生还是给我分数。

也就在这一学年中，我学会代数之后，就向第三学年的学生借几何教科书来看，这没有代数那么容易。首先，我不理解几何学为什么归入“数学”呢？其中所言，与“数”无关，说来说去都是“形”。我不明白学了这些“形”有什么用处？但学下去渐渐生出兴趣来，

我渐渐明白：这里学的，既不是“数”，也不是“形”，这里学的是“思维”，是教人怎样去思想。当时，我听人说，进大学要学“论理学”（这是日本人的译名，后来中国人译为“逻辑”或“形式逻辑”），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其实，几何学就是“论理学”，我在中学已经学了“论理学”，这是我在四年中学中最大的收获。那时，我已经能够看出：同学平时说的话有许多是“不通”的，甚至于看出《孟子》《韩昌黎全集》等圣贤书也有好多是“不通”的。

学习第四年级的薄薄一本《平三角大意》，那就很轻松了。这里，只有一种“比率”，即是几何中不见了的数，在《三角》中又出现了，而且形和数结合在一起。

我知道，学完三角，就要学“微积分”，那是属于“高等数学”范围，大学才教的，但这点也难不住我。我向平素有往来的同学去借微积分书，他们没有。我相信平素不往来的中学同学中也不会有微积分的书借给我的。一个龙岩同学告诉我：他听说龙岩远郊某乡村有一个读书人喜欢数学，买了许多数学书来藏在家中。这话即使属实，我也不会去借。

一个对数学有兴趣，又有学习能力的少年，只因借不到数学书，而被扼杀了。以后几十年，我也曾利用业余时间去摸高等数学。上海沦陷期间也曾翻译一本《高等算学入门》，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是微不足道的。

我“躡等”学习数学，是用业余时间的，即别人用来闲谈、下棋、操场锻炼身体的时间。学会之后，我就丢开了，可能在考试时温习一下。中学生，用于数学的时间，一般是很多的。不妨说比其他课程都更多些，这些时间，我都可以用于别处了。

我的第二个国文教师

我的第一学年下学期，即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连天锡先生只做

我们的学监，不兼教我们班的国文了。新来的国文教员，名黄祥墀，字宝枢，一个衰弱的中年人，背有点驼，上课时口才没有连天锡先生好，对待学生也没有连天锡那样严厉。一次上作文课时，他不坐在讲台上，却拿一把椅子坐在课堂边，专心看一本杂志。我的座位离他不远，我偷看那本杂志的封面，原来是《小说界》，中华书局出版的。

连天锡先生，我们从未听人说过，但早知道他的父亲连鸿佐的文名。名父无弱子，他的学问一定是好的。但黄祥墀——我完全不知道。我问同班连寿庚（他是连天锡先生的儿子），连寿庚说：“黄祥墀的国文很好，在福州读书时，作文卷子批过一百分。”直到今天，关于黄祥墀先生，我也只知道连寿庚这几句话。

开学后，第一次作文，我照常凑了一篇交上去，不久批改下来，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第二次作文时，我也凑了一篇交上去。但未等批改下来，我的父亲派人来叫我立即回家，因为母亲病重。次日我就随来人回家了。他来时，到了中学，太阳未落山。我也是想赶到家里过夜的，谁知走了八九十里，我就累了，不得不在附近一个村庄，有亲戚关系的农民家中住下来，这也是父亲的安排。

次日上午到家。母亲看见我一欢喜，病情就减轻了，没有什么危险，我过了几天，又回中学来了。母亲挨到本年暑假才去世。

同学们交还我他们代领的黄先生批改的作文卷子。我看见改的不多，但文后批了十个字，我至今还记得：“笔老气苍，恐非出自心裁。”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小小十五六岁的孩子，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一定是抄别人的！”我心里不高兴：分明是我自己写的，为什么说抄别人的！我想拿去同他讲理。同学们劝我：算了！以后几次作文，他没有批过类似的话。到了初夏，全县开学生运动会，各小学都组队参加。中学班不参加，那几日也不上课。我去运动会参观，经过一处临时用竹篾搭的房子，黄先生看见我经过，喊住

我,说在这里主持“快报”,发生什么事,立即编成新闻,油印散发。他要我帮他采访几条新闻。我忘记是否帮他采访,但他补充的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你的新闻一定写得好的。”他这句话等于说:“你那篇文章确是‘出自心裁’,不是抄别人的。”我的气到此就消了。

以后作文,出的题目是《定孔教为国教论》。我知道当时康有为提出这个建议,报纸上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凑了一篇文章,竭力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作文尚未批改下来,一天,黄先生在操场遇到我,拉我同他兜圈子,他说:“你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结论不对。孔子的教育家,不是宗教家,孔子的学说不能定为国教的。”由此,我知道,他的思想是属于“左倾”方面的,而我当时则是站在遗老遗少一边。

黄先生以后同我还有几次接触,经过忘记了,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话总是很简单的,他对我的态度总是很好的。

一九一九年,我毕业后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路过漳州,那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设在漳州。龙岩人,主要是我们中学的教员,有许多人在陈炯明设立的机关做事。高等法院院长就是郑丰稔,一个庭长是章友文,一个法官是连天锡,黄祥墀也在那里。我去看了黄祥墀,也去看了连天锡。

我还有第三个国文教员,那是一个很老的老头子,姓魏,忘其名,据说是魏校长的教师,不会说普通话,用龙岩本地话上课,我们漳平人听得懂,说客家话的学生就听不懂了。我未曾同这位老先生有什么接触。

无 书 可 读

数学既不占用我的时间,我便除了读书之外无事可做了。不仅数学课,所有讲课我都不听。身体在课堂上,思想早已开了“小

差”或者是教科书底下藏着另一本书,或者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我敢这样做,同这个学校采用的考试制度有关。每学期期末宣布停课考试,一般是两天自己复习,一天考试。考试时总是一门主课配合一门或两门闲课,如图画、音乐之类。闲课是不要复习的。一门主课,全学期学的内容,我有两天复习,开夜车紧张地复习,就够应付了。八个学期中惟有生理学(即人体的科学)一门主课没有六十分及格,我也是这样对付英文。我当时想,中国人又何必学外国文。先生出的考题都未越出教科书以外。反之,音乐、图书、体操、手工等不需要复习的课程,我常常考不及格。这些课程的分数都是同那些主课的分数平均计算的。

这种考试制度不好。因为紧张复习了两天,应付一次考试,考试过后便把复习所得忘记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有恃无恐,我不仅课外看“闲书”,上课时也看“闲书”,先后几次被讲台上的先生发现了,他悄悄地走了过来,拿开上面的教科书。记得有一次,下面垫着的是一本《汉书》。有些先生训斥了几句,有些先生一言不发走开了。

这时,我对于白话旧小说已没有什么兴趣。记得进中学后,发现有一书店,首先就买了一部石印小字《红楼梦》,那是在漳平县借不到的。又向同学借阅了石印的《儒林外史》,那也是漳平县借不到的。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文言笔记上来,且进而转到正史上来。我忍痛买了一套《前四史》。只要是线装的书,可以从有来往的同学中借到的,我都要借来看。至于当代出版的铅印书,有时我也借来看。那就叫做“看书”,不很仔细,看过就算了。我所谓“读书”,就是读古书。有来往的同学身边有的古书,我都借来读了,以后借不到古书,我说的“无书可读”,就是这个意思。

有个同学告诉我:“本校要设图书馆了,有一个房间堆满了书,校方要派人去整理,整理好了就可以开放。”这是好消息,那时我就有书可读了。但是直至我毕业,本校还没有图书馆的影子。

那时龙岩街上,除了一些专门书店之外,还有文具店、布店或南货店,也卖上海出版的新书。那里卖的都是铅印的新式装订的书。那是几个朋友临时凑一笔钱去厦门或上海进货之便买一批书回来的,其中主要是一些文言小说和文学杂志一类的书,销路颇好,合乎当时中学生的胃口。后来的文学史家称这一流派的文学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我则称之为“玉梨魂派”,因为其中最著名的小说是常熟人徐枕亚写的《玉梨魂》。我有一个时候也沉溺其中,买了好几本这类小说和杂志,寒暑假带回家中,父辈文人抢着看(中学的同学是不看的)。

在四年的中学生活中,我感觉孤独,交不上朋友。别人下了课之后,便三五成群聊起来,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我听着乏味。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我知道,我说的话,他们也会觉得乏味的。我干脆不说话,或者跟着他们胡乱说几句。人家就觉得我这个人“孤僻”、“不合群”。

我没有朋友,但也没有仇敌。世界似乎没有我这个人,中学似乎没有我这个学生。我穿的衣服都是破旧的,人家一眼便可看出我是破落户地主家庭的子弟。那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受轻视的。

中学四年八个学期中,我只有一个学期考得第三名,下学期开学就可以免交学费了。毕业考试时,我得到第五名。

因为古书读得多了,我的思想是守旧的,总是认为中国古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看不起新的东西。这样的顽固思想,很难得潜移默化,非有陈独秀那样“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猛药去攻,是攻不破的。^①

^① 关于我在从香港至马赛的轮船上如何接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致使思想大转变的事情,见《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章。

娱 乐

但我也不是那种清教徒，拒绝一切娱乐。

第一是看戏。我和父亲都是“戏迷”。我们那里，看戏不用买票，空地上搭了一座戏台，任随人去看。付给戏班的钱是寺庙的公产，大姓的族户，商店的临时集资，村庄的集资，秋收后的迎神赛佛等等。有时无缘无故在城隍庙固定的戏台上连演好几天的戏。演戏能够吸引郊区和乡村的人进城观看，使市面热闹起来，商人集资并不亏本。

我们那里演的戏绝大多数是潮州汉戏。说的是普通话，即京戏中那种说白的话，不管本地人听听不懂。有时有“饶平班”来演戏，那是用不同的音乐和不同的说白了，我们都不欢迎。

我和父亲夜里看戏，往往看到散场才肯回家。一次，我们在城上适逢城下“大帝爷宫”演戏，只看到后台不见前台。我从演员的服装和道具看出演的是“大登殿”，告诉了父亲，于是父亲逢人便说我对于戏文比他熟悉。

潮州戏的中心在潮州府，正似京戏的中心在北京一样。那里的戏班演技最好，当时称为“四大班”，漳平人从来看的都是闽西几县说客家话的人组织的戏班，他们学习“四大班”而未登堂入室。漳平的戏迷看了不过瘾，他们都希望有天能看到“四大班”。可是，从来“四大班”未在漳平演过，因为漳平太穷，请不来这些戏班，倒是龙岩请来几次其中的某一班。此时，有钱又有闲的漳平戏迷就去龙岩过瘾了。他们回来，就要议论这个演员唱得怎么好，那个演员做的怎么好。最好的是一个唱黑头的演员，叫做“阿胶”的。

一九一五年秋天，即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恰逢龙岩人请了潮州“四大班”某一班来演戏，我的父亲特来龙岩看戏，也来看我，住在中学内。我们白天夜里到城外看戏，戏台在南门外宽阔的沙滩

上,面对城墙,台下可容纳许多人站立。我们没有看到散场,但回城时,已经很迟了。我不懂得唱工、做工。我不明白“四大班”好在哪里,还不是同我在漳平看见的那些班子一样?不过从此可以向人夸耀说:“我看过四大班。”

新校舍建成,住了人,上了课以后好久,学校才庆祝落成,那又是一番热闹。同乡同学在此放假的机会,都回漳平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学校看热闹。学校也从潮州请了戏班,在操场搭台演戏,校外的人都可以进来看,但看的人不如南门外演戏时那样多。有人说这是“四大班”,有人说不是。

似乎龙岩每年在城隍庙或其他地址演戏,不如漳平那样多,我们也不能随便出来看戏。

此后,我的看戏兴趣也渐渐淡薄了。

第二是游山玩水。春秋佳日,我喜欢郊游,有时同别人一道去,有时独自去。

龙岩的山,同漳平一样,也没有什么可游的。那个“龙岩”,我以后还去看了一次,觉得没有意思,倒是东南方的白云山好玩些。山半腰有一小片平地,别处都用来建筑佛寺或道观,惟独此处建立的是一座私人住宅。那是城里苏家的产业。苏家是世代富家,据说以前家里还养了一个戏班。我想,这座山腰住宅是苏家的别墅,城里住厌了到山上住一段时间,换换空气。平时有人在那里看守。

一次苏寿香(他就是当时的家长)招待我们中学生去那里玩,站在门外,俯瞰全城,尽收眼底。我们在那里休息、喝茶,也有人由此攀登山顶。

龙岩城下的溪水是九龙江四大支流之一,比漳平城下的溪水小得多。南门外浮桥以上便不通舟楫。有时,我同几个同学到上游溪水浅的地方,芦苇丛生很幽静之处去玩,我想起了柳宗元那几篇山水游记。似乎曾在那里拍了一个集体照。

龙岩出西门,就是一个大村庄,宽阔的平地,走了很远才看见

一个山岗,导游的同学告诉我:辛亥革命那年有一群土匪盘踞在这山岗上,扬言要攻城,于是商人和富家派代表来此地同上匪谈判。

有时,我一个人在城里大街小巷漫无目的,一面走一面看。那里的房屋比漳平城内的好,而且多。我在辛亥革命那年,不上学,整天在漳平城内大街小巷串游,一条街有几条巷,哪几条巷可以通往别处,哪条巷则没有出路,我都熟悉。但龙岩城里的街巷,我就没有这样熟了。

第三是打麻将。学校是禁赌的,打麻将也在禁止之列。但不知怎样,学生们并不害怕,有几个人家招待学生打麻将。我常去南门外浮桥那边的一个大村里,这个人家的主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蔼可亲,去那里同走亲戚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碰到中饭或晚饭,他端出饭菜,我们就吃,也不付饭钱。也可以住在那里,我没有在那里过夜。

屋子并不大,一个大厅,两个正房,只右边有辅屋,辅屋里有一个小客厅,我们都在那里活动。

听说,有时有人在那里推牌九、押宝。打麻将介于博弈之间,即既是赌钱,又是下棋。赌钱全凭运气,下棋则斗智慧,打麻将兼而有之。

我是把这个地方当作俱乐部,散散心的,但也非每星期日必去,输赢不大。

学 潮

以上几节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关于我个人,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回头说说当时我的求学环境罢,尤其要说说当时特有的事情,习惯和制度,为今人所罕见或不知道的。

上面说过,我带着漳平文化是否比龙岩落后,落后多少这个问题去龙岩上中学的。我只凭漳平的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这件事

便明白漳平文化确实落后、而且落后很远。上学不久我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足以解决问题的事实,我还发现了很多,不妨再说几件。

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上课不久,中学就发生了学潮,即全校学生罢课,反对学校当局。我们新招的己班学生也参加罢课。

我在漳平也曾听人说,现在学校难办,有时学生闹事,罢课,反对校长和学校当局,而且提出无理的要求,非要校长答应不可。这话,我只当海外奇谈。学生怎么能反对先生呢!“天地君亲师”——老师同皇帝和父母一样,是不能反对的。我读小学时,有些学生对于校长刘志和,国文教师刘岑仲有意见,但也只能私下嘀咕,当面还是很恭敬的。我不能想像怎么能闹起学潮。可是到龙岩上课不久,学潮就发生了,我也参加其中了。

这件事也可以证明,龙岩文化高于漳平文化。

学潮是丙班发起的,丙班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入学,此时是四年级,即毕业班。丙班和丁班都只有龙岩本县的学生,因为“直隶州”已经不存在了。丙班有个学生林文渊,一个清瘦的书生,国文在全班中最好,在全校中也是最好的,不知为什么被魏校长开除了。全班学生反对开除林文渊,并串联丁班、戊班,以及我们新人学的己班一起罢课反对。各班学生分别在校外集会,表决参加。我们己班借一个祠堂集会,带头人是陈性清,他有群众领袖的风度,善于鼓动,结果一致同意罢课。有一次,学生群众和学校当局面对面讲理,中间隔一张桌子。我为好奇心,同各班学生的带头人一起站在最前排。我在漳平看热闹时总是站在众人前面的。学生和先生,双方由讲理到对骂,拍桌子,但未打架。如此有两次或三次。后来双方妥协了,魏校长收回开除的成命,不处分罢课的学生;学生则停止罢课,回到中学。魏校长同我关系开始不好,似乎同我在此次罢课中站在最前排有关系。

此次究竟为什么事情罢课(林文渊开除不过是导火线),罢课

是怎样妥协告终的,我至今仍不明白。带头闹事的,并不是林文渊,而是丙班一个名叫邓子恢的学生。大家事后都议论起这件事。我似乎听人说,此事背后是两派绅士之间的斗争,邓子恢的父亲也是一个绅士。

一九一六年新招的一班说客家话的学生也发动了一次学潮,但别的班没有响应,失败了。为首的学生被开除学籍。为什么事情,我当时就不清楚。发动一次学潮也是不容易的事。以后直到我毕业没有学潮发生。

绅权和政权

一九一五年暑假后,我来龙岩上中学的时候,在龙岩街上还看到反对“五七”和“五九”的标语,已经陈旧了,但尚未洗去。“五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的日子,“五九”则是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我从报纸上知道,也听我的父亲的朋友说过,报纸还号召人民起来开展示威,反对日本。漳平没有任何举动,我由标语想到龙岩是开了会的。此事也说明漳平在文化上远落于龙岩之后。

这种运动,表面上是反对日本的,骨子里倒是反对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南方民主派统治下,县知事是支持这种运动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县知事则不支持,甚至禁止。龙岩县绅士倾向民主派,因之同县知事对立,这也是龙岩比漳平进步的地方。漳平县绅士,在县知事面前只有唯唯诺诺。我上中学不久便陪伴同乡同学去龙岩县粮局取回县政权浮收的钱粮。钱不多,但意义重大。他是受一位亲戚的委托去收退回的钱的。他说:龙岩县绅士向上级告了知事浮收钱粮,上级调查属实,勒令退还。漳平县决不会发生此事。

第一学期结束,寒假回家过年忽闻街上传说:龙岩县逮捕了儿

十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作文卷子写了反对政府的言论。我想起了放假前最后一次(或另一次)作文卷子未曾批改发还。过年之后,乡下一个亲戚来我家看见我,他说,他的乡村传说,龙岩派兵坐船来漳平,把我捉到龙岩去了。我的父亲恐慌起来,问我作文卷子上写了什么。我记得,此次作文题目是议论一件时事,我不过将先生上课发表议论的话,写几句在作文卷子上而已,我自己并不恐慌。这种议论犯了什么罪呢?结果平安无事。寒假后上学,才知道捉人是谣传。但我这一班的作文卷子被衙门内一个职员从门房偷去,送给知事,则是事实。这年初夏,我们已住在新建成校舍内了,一天,我看见一个陌生人,约三十几年纪,愁容满面,走来走去。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把作文卷子偷去送给知事的,现在捉了来关在这里,不准他走出校门。下午,杜连如来了,在会客室中坐着,叫这人来,很严厉地用龙岩话训斥这人,一面训斥,一面用水戒尺重重打他手心,不知打了多少下。这人丝毫不敢反抗。原来这人是本县最有名的,设立最早的模范小学毕业的学生,而杜连如是模范小学的校长。打手心本来是中国传统的教师对学生的体罚。这个案件,大概就是这样了结的。

杜连如是中学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是校长魏梦云)。我常常看见魏校长同他,二人在校内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中学有什么大事,魏校长总要同他商量。我从未见其他教员同校长那样谈话。在全县的绅士中间,究竟是魏梦云大,还是杜连如大,则不得而知。

就是这几个人掌握着绅权同知事斗争的。这些绅士倾向民主派,限制官吏滥用职权,为人民争回某些利益,但又不至于同官吏扯破面皮公开斗争。

绅士内部也有斗争,同全国各地一样。辛亥革命之后,龙岩绅士也大换班,旧派绅士让位于新派绅士。

据那本《校庆特刊》记载,魏梦云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担任中学校长职位的。在此以前,校长是杜翰生。

似乎他是前朝的翰林,我少时就知道杜翰生是龙岩县最大的绅士。以杜翰生为代表的旧派绅士辛亥革命以后失势,而以魏梦云为代表的新的派绅士代之而起。中学校长就是绅士的魁首。他把有地位的新派绅士都聘请来当教员,以表示大团结。连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个人也不例外。一个是郑丰稔(笔山),民国初年福建省议会副议长;一个就是苏寿乔,在福建省官场中担任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两人都教课,自然是挂名的。

龙岩县,绅权和政权的斗争,对于人民是有利的,绅权倾民主派,能限制政权方面为所欲为,但对于劳动人民,则绅权仍是反动的。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其斗争对象正是绅权而非政权。农民杀了叶德辉、晏容秋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劣绅”,即绅权的代表人物。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遇见几个福建同乡,其中也有龙岩人,他们告诉我:郑笔山是龙岩土豪劣绅的头子。近年接触到大革命时代我们那几县的斗争史料,发现蒋介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龙岩那些绅士头子主谋屠杀共产党员。

绅士的子弟也在中学读书,他们是否在同学中有特殊地位,则随人而异。魏梦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侄子名魏应乾,在丙班读书。他在班内是孤立的,邓子恢等人把对魏梦云的不满发泄在魏应乾身上。丙班毕业后,有五六个学生,邓子恢和魏应乾在内,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继续斗争。事情闹到警察局去,以致魏应乾退学回家。详情我说不清楚。

苏寿乔的儿子苏福畴,与我同龄,又与我同在己班,则情形不同,他成为班内出头露角的学生之一。有几个学生奉承他。他同我同班四年,我们未曾交谈过一句话。他当然看不起我们这些属县的人,视我们为“乡下人”。龙岩本地学生也有看不起,时常在背后用尖酸刻薄的口吻嘲笑这个,讽刺那个,但他考试的名次并不高。那里有一很好习惯,教师并不因学生是本县大绅士的子弟而在试卷上多批几分。

其他绅士的子弟在中学读书的,既不打击,也不奉承。例如,杜连如的儿子也曾与我同班,后因考试不及格,降了一班。

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后,大家散了,我去了法国。我想,以后再没有机会同外县同学见面了。想不到,十年之后,一九二九年,我又能够同苏福畴见了一面。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第一次被国民党逮捕,那是因为同居一幢房子的同志的连累而被捕的。我用的是假名:王绳祖。外面正在营救,有希望保释。一天,在看守所得通知:军法官来查看看守所,大家回到各自房间去。我回房间去了。据老犯人说,军法官从来不查看看守所的。听到开铁门的响声,我探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进来的军法官不是别人,正是苏福畴。我的假名要被拆穿了,我赶紧把面孔转向墙壁,同鸵鸟一样。不久,军法官到我的房间来了。他说:“现在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官的名义向你们家属骗钱,你们要通知家属,不要上当。”说完就到其他房间去了。每个房间说同样的话。我们这条弄堂说完,去另两条弄堂说,最后去对面女看守所说。我跑蹲到铁门口看他的背影,无疑是苏福畴。有个犯人的案正是苏法官承办的,他已拿到了判决书,我请他拿出判决书看看,签名和图章都是:苏福畴。

于是,我向最坏的方面打算。可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事情,再过几天,我保释了。

我至今不能确定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两种可能:(一)他只看见我后背,没有认出我是郑超麟;(二)他在承办我们案的苏北军法官那里看到我的文件中有郑超麟的姓名,于是借口查看看守所亲自看看王绳祖是不是我,看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自然担心他拆穿我的假名,但他对我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一九二九年,他已知道我不是从前的“乡下人”了。

顺便说一件事,我第二次被捕,那时有个“五堂会审”,以司令部的军法官为审判长。那个审判长名陈汉佐,也是龙岩人,新一辈

的绅士,接替杜连如当模范小学校长的。他不是中学教员,但常来中学,我见过的。此次,我是真名受审的。他只好公事公办,先判我死刑,后改判十五年徒刑。

从狭隘的地域偏见到国际主义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上中学的。我要亲自看看文化上漳平人是否比龙岩人落后?落得多远?不久,我就亲自体验出漳平人文化上确实比龙岩上落后,而且落后很远。如此,问题不是解决了么?反感不是应当消去了么?可是,不。我不服气。我就是带着这“不服气”的心理读完了四年中学,又带着“不服气”的心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在从香港去马赛 的轮船上,我的守旧的顽固思想体系,包含这“不服气”的心理在内,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未曾消失。到法国后,陈炯明派去的三十几个学生被安排在一个法文学习班读书。这三十几个学生,从香港上船起就互相斗争了,在学习班上继续斗争,由暗斗至于明争,由相骂至于相打,不得不劳动与我们同船来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从巴黎赶来圣日耳曼中学劝告双方息争。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斗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斗争的双方是从地域划分的。一方是旧汀州府属人,他们说客家话;另一方是漳州府属人,他们说闽南话。陈炯明统治的地方恰好是旧“汀漳龙”道地域。我们旧龙岩直隶州有四个学生都说闽南话,其中只有一个能说客家话。这一个人卷入斗争中,其余三人则站在斗争之外。

为什么按照地域和语言不同而分化和斗争呢?我当时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都是主张国际主义的,连国家界限也要打破,为什么不能打破这种“府界”呢?渐渐地,我联想到我带上轮船来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于是渐渐地,我也就消除那种县和县之间的地域偏见。可是,正如人体内生过一种病,虽然

治愈,也仍有痕迹存留的。我的思想深处是否仍有这种“反感”和“不服气”呢?这也是应当克服的。

我的四年中学生活并非白过,它从反面积累了我在轮船上一个月思想大转变的基础。守旧的思想愈顽固,则被打破后的碎片抛弃得愈彻底。

许多流亡国外的中国人,到了老年总想回国来看看童年游钓之乡,少年求学之处,青年活动之地,然后安心死去。我倒没有这个要求。我虽非久居国外,但离开漳平恰好七十五年了,可是绝不想回去看看生我的地方。由上海坐火车回去,二十四小时就可到漳平了,父老们劝我几次回去看看那里的新建设。无家可归么?他们请我住招待所。可是,我却不愿意回去。我生在漳平,长在漳平,祖宗的坟墓在漳平,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不仅漳平是我的故乡,中国所有的县都是我的故乡,世界所有的国家也都是我的故乡。

我在中学四年中始终萦绕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今天只觉得可笑。今天,漳平虽然由“县”升为“市”,同龙岩一样。但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是比龙岩落后的,仍旧落后很远。这不是很好么?

回忆录



自序

这十二章回忆录中有十章回忆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光荣的时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认识这时代的意义的人颇不多见。在我看来，它指示了中国的出路。在这时代，历史负担者无产阶级从自在的状态进于自为的状态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诞生，发展，几乎夺得了政权；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仍能以其教训指示未来第三次革命的道路。总之，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比辛亥革命更加有革命的意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巴黎出版几本关于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书，引起当时法国人对于业已遗忘了的四十年代的兴趣。马克思注意了这种现象，他写信给德国友人，指出这是法国革命复兴的征兆。不久果然有巴黎公社了。我希望多有几本书出版，回忆或研究中国的二十年代，让我们能够同马克思一般做出中国革命即将复兴的结论。

中国现在还有共产党，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对这时代，不知道有什么认识？一般说来，它是害怕回忆这时代的，因为其中的一切，无论正的方面或负的方面，都足以证明它现在的错误。我早已不属于这个共产党了，但我很荣幸曾属于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在党内与许多姓名写进历史的革命者共同工作，共同斗争，而且共同做出错误。中国共产党也有它的“古典的”(classique)时期。这里所说“古典的”，并非堪为模范之意。哦，不是的，它有许多错误为未来的革命党所需要避免的。这里所说“古典的”仅是对于后世的共产党而言的。与后者相较，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总是

无产阶级的党,那时无产阶级跃上政治舞台,它的前锋队团结于共产党周围。可是,在这个时代末期,无产阶级先锋队渐渐离开共产党了;共产党渐渐抛弃工人运动而专力于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以至现在成为代表一般爱国者的党。

这十二章书毕竟是我个人对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回忆,间有议论也是发挥我个人的见解。记忆或有错误。为客观事实所限,我也不能征引当时文件或其他史料做我的议论的佐证。好在不会有人把我的回忆看做那个时代的革命史或共产党史。

《恋爱与政治》一章,本拟删去,因为其中颇似上海小报上的桃色新闻,难免被人斥为无聊的。可是我的本意是要写那个时代革命者几种恋爱形态,要从恋爱上显出若干革命者的性格,本无道德观念掺杂其间。我认为在“不妨害政治”原则之下,革命党内任何恋爱都是可容许的。这一章中所写男女主角,大半已成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存者之中也许有几个现在做了 gentleman 或 lady,他们也许以我写出他们少年时期的恋爱为有意诽谤。这里,我只好向他们道歉。若是没有连带关系,可以避免不写的,我都不写了。读者请勿忘记,我也是其中所写恋爱者当中一个人。现在同当初一样,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我是没有一切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成见的。^①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

第十章书^②是在儿子弗来临危时勉强写成的。我一九三七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

① 得到作者同意,本版删去了《恋爱与政治》一章。——编者

② 标题为《左派反对派》。——编者

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的打击。本书最后二章^①，这半年来我都提不起兴趣续写。现在我又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只好让它以未完成的形态留存下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阅后记

^① 标题为《第二次入狱》，《出狱以后》。——编者

一个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国八年，写成世界公历是最容易记忆的，即是，一九一九年。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可以说，是在这一年觉醒的；我个人小小意识则确实是在这一年觉醒的。

这个回忆，如果是在十多年以前写的，我想，我无需要提醒读者，说五四运动就是发生于这一年罢？可是现在，青年的人——我是为他们而写的——有几个知道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呢？有几个知道这个运动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意义呢？

一九一九年，我恰好十九岁。阳历四月间，福建省立第九中学（在龙岩县）“己班”修毕了第四学年的功课，学校特别放了假，让学生回家去，等待六月间毕业考试。我从龙岩县回到漳平县来，很悠闲地过着生活。五月间，不记得那一天，一位老先生到我家里来同我父亲闲谈，说起北京学生闹事，打了人，烧了房子，罢课。说毕，摇摇头，叹一口气。这位老先生是我们县城里极少数常看报的人之一。父亲不看报，我自己也没有看报习惯，回家来固然没有报看，在学校也难得进阅报室去的。阅报室有一二种福州出版的报纸，似乎没有上海报或北京报，福州报也是陈旧而常脱期的。当时到阅报室看报的学生本也不多。

漳平县城当时有三个小学，一个县立的，一个族立的，一个福音堂办的。有几个中学毕业生，同我一样待毕业的学生也有五六个，名义上有一个学生会，但久不开会。我们那时对于这次从北京

出发的大风潮毫无反应。别地方轰轰烈烈,罢课,示威,杯葛^①日货。留在中学的同学写信来,也说本校学生领导了诸小学学生示威,在城外通漳州的大路上检查日货,在县城商会里拍桌子,甩茶杯,大骂商会会长;但漳平县学生没有动作,——不错,西门外福音堂办的新民小学,学生曾列队进城来游行一次,听说牧师发给每个学生每人一包糖果,叫学生从此以后不买日本货了。但那是教会学校做的事情。

六月间我到龙岩县去考试时,那里的运动已经冷下来了。同学们告诉我们这些回家的人以运动中的遗闻轶事,纠察日货的学生每日还是派到城外去,学生会还在开会,但已没有示威,没有罢课,没有闹事。可是这二个月间风气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例如平时不活动的学生都会活动起来,平时不说话的学生,都会高谈阔论,阅报室拥挤了,对于时事的知识普遍了,重要的是有个学生自己主持的学生会。在学生会布告牌上,我看见了若干在大城市读书的学生写来的信。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五四运动。我不知道,除了抵制日货,打卖国贼,拒签和约,等等之外,还有其他意义的五四运动。漳平县学生不会比我知道得更多些。龙岩县学生当时也许有人知道五四运动的其他意义么?有人读过《新青年》,为新潮流所激动么?我不敢说。但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的。

中学毕业以后,我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我想飞,想脱离狭隘的环境,不仅要离开本县,而且要离开本省。在学校时同几个同学约定,到北京考高等师范去,并非因为喜欢“神圣的”教育,而是因为听说高等师范不仅不收学费,膳费,且有津贴,每年费用比中学多得不多。可是父亲筹不出钱来,活动地方公款也没有结果。一个同学(龙岩人)已经先走了,他从上海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他游

^① “杯葛”,英语 boycott 音译,“联合抵制”的意思。——编者

玩“新世界”(游戏场)的情景,我接着,魂梦中也是不安宁的。恰好在此时来了意外的机会。

县视学陈华是祖父的朋友。北京去不成,父亲和我都在懊恼时,他曾劝解我们。他说他本不赞成我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学风很嚣张。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陈总司令有公文下来,要本县熊知事派遣两名半官费生到法国留学去。

陈总司令就是“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有一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颁布大赦政治犯命令,但声明“共匪”和陈炯明不在赦免之列。不久之后,陈炯明也在香港死去了。陈炯明所以有十恶不赦大罪,只因他指使部下叶举在广州围攻大元帅府,把孙文迫到军舰上去。但这是后来的事。在一九一九年,陈炯明不仅不是国民党的叛徒,而且是国民党惟一的武力(其实当时国民党,就党来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团结于孙文周围的一派势力)。当时广东地盘被桂军占据了,而有革命历史的粤军在本省不能容身,只好挂“援闽”招牌向北洋军阀防地的福建抢一角地盘。粤军占据的是旧时汀漳龙道辖境,总司令部设在漳州。

陈炯明是新式军人,他不仅主张民主主义,而且主张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他一到漳州,立即造马路,设公园,开运动会,出版日报。马路上不许走人力车;公园里竖了一个四方石碑,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这里,我们可以嗅得出吴稚晖,李石曾一流人的无政府主义气味。为了响应吴李诸人的勤工俭学运动起见,陈炯明遂命令他管辖下县知事每县派遣二三名学生到法国留学去。这就是福建省半官费生的来源。

勤工俭学,是吴李诸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及大战刚结束后想出来的。大战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曾在中国招了“十万”华工去;中国留学生断了接济的,有些人也在法国工厂找到工作。法国无产阶级流过不少的血,毕竟争到了比中国好多倍的劳动条件,能够让中国小资产阶级学生也感满意。这就造成了一种思想,认为

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后,只消以一半时间到工厂做工,就可以取得充足的工资去维持另一半时间的生活和求学费用。李石曾留在法国组织这个运动,例如交涉入境,接洽工厂,学校等;吴稚晖已经回国了,他在上海某报发表《拙庵客座谈话》,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宣传勤工俭学思想的。《拙庵客座谈话》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销行颇广。据那些提倡的人估计,当时佛郎汇价低落,即使不做工,每年有中国银元六百元也就足够在法国读书了。

陈炯明就是以这个估计为基础来派遣半官费生的。他要每个学生每年自筹三百元,其他三百元则归县知事筹措。

己未年旧八月十八日,我同另一个半官费生在县城水门外上船,父亲,三伯父,二弟送行,一别遂成永诀了。各县学生在漳州会齐,陈炯明在旧道台衙门总司令部开欢送会,摄影,请吃大菜。开会时有许多人演说,后来听人说演说人中有一个是朱执信,但未曾留下一点印象在我脑子里。

我同其他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到香港来候船。几日后,陈炯明驻广州的代表黄强邀我们到广州去,住在增步工艺学校,他就是那里的校长。他请了一位广东女先生教我们法文。我们学了三个星期的法文。在广州时候,福建籍国会议员曾开会欢送我们,议员之中有一个是林森。

* * *

直至十一月四日我们才得上法国大邮船。保罗·列嘉号从上海开来,已经装载了一二百个学生,如今香港添加了福建,广东两省五六十个学生,四等舱几乎容纳不下了。

船上三十三天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五四运动”是在这邮船上经历的。

上船以前,我始终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香港和广州一定有当时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可买,但我没有买,同行的人也没有买,即使买了我也是不会去看的。我在香港买了翻世德

堂本的《老子》,《庄子》和《列子》,买了商务铅印本的《经史百家杂钞》,买了商务小字本的《老残游记》,连同家里带来的国学扶轮社印的《龚定盦全集》和一本印得很坏的《白香词谱》,一起携到法国去。陈老庄列三书将来要说到外,其余的书都于一九二七年唐生智部下军队占领汉口湖北省委机关时遗失了。

在大邮船上,我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我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学生,不仅与福建学生不同,而且与我看了《留东外史》后所想像的外江学生也不同。他们是眼光远大,思想活泼。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过的问题,知道了许多从未听人提起过的古书和新书,知道了有另一种生活在法国等待他们,同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在他们那里,我看到了许多新出版的杂志;有几种杂志竟如此普遍,而我熟知的礼拜六派杂志竟如此之少,不觉惊讶起来。

有一天,我借了一本流行的杂志来看。这本杂志名《新青年》,翻开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名陈独秀的人写的,题目忘记了,内容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之类。

在中学,国文教员黄宝枢先生曾出过定孔教为国教论一类的题目,我自然是拥护康有为这个提议的。国文教员在我的文章上面加了许多圈发下来,但在操场上遇到我时,同我说:“孔子是教育家,不是宗教家,他的学说是不可以定为国教的。”我才知道,原来老先生里面已有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次看见陈独秀文章,我想又是讨论这个问题了。看到后面,才知道是根本反对孔子。读书人反对孔子,古已有之,《庄子》里面不是有许多反对孔子的话么?但激恼我的,是文章最后几句话。作者说: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韩愈《原道》篇内对于佛老说的话,如今被人引来反对韩文所拥护的孔道自身了!上船日起,我第一次学写日记。这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大骂陈独秀。

但这一切，我都未曾表现在外面。同乡学生对于这类问题不感兴趣，有一类学生连《原道》也未曾读过。外江学生方面，我听他们说的多，自己说的很少，很少，因为我本来不善于说话，当时的“官话”程度也不够我发挥有系统的意见。但《新青年》杂志，以及这一类杂志，从此吸引了我，愈有反感，愈想借来看，渐渐地对于线装书不感兴趣了。十二月七日在马赛登陆时，我的外表虽同香港上船时一样，内心则完全改变了。潜伏的个人意识已经觉醒，从此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而再不是父师及其他长辈给我安排的家族链条中一个环节了。

我想，我必须说一说这个意识觉醒过程中专属于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觉醒自然是出于时代的原因，事实证据是：同行的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半年，一年之后，几乎全体都会写白话文，都会谈新思潮，甚至也有人走到共产主义来了。但觉醒的激剧，严肃，以及决然不肯退回到家族链条一个环节的作用去，则必须拿我个人的原因去解释的。

生在累世书香而趋于没落的旧式地主家庭里，又是长子，少时读书并不太笨，祖父和父亲自然寄托了很大希望在我身上。这是中国旧地主家庭的传统希望，即希望子弟由正途功名出身，到外江去做一两任官，回来买田，起屋。科举停了，这希望受了打击。祖父常说：“你出世可惜迟了几年，否则……”但给我的教育仍是同科举没有停办时候一样。先生不仅教了四书正文，而且教了朱注，以及什么人做的讲疏。五经中读了诗，书，易，春秋左氏传，但没有读礼。古文，选教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幸而未曾学做八股和经义，只做些论说。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三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人家的子弟还在私塾读书。当然是因为学堂里学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学问。可是民国三年，学堂改组，我们的私塾

先生刘岑仲被聘当国文教员，家长们也已觉悟除了学堂毕业之外别无正途功名了，于是送我们随这位先生进学堂去。我一进去就是高小三年级，读了半年就毕业。一九一五年第一次离家到一百里外的龙岩县去进中学，那里的国文教员更进步些，因为教的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作文题，除了模仿古文的记，叙，论等以外，还有关于时事的题目。

新旧学堂有形的教育以外，家庭和社会的无形教育则是更重要的。人们有意无意直接间接从各方面灌输你以那个圈子所需要的人生观和道德，使你成为造好的链条中一个环节。

我符合了人们的希望么？一般说来，祖父和父亲是满意的。我恬静，服从，上进，总之任随他们摆布，他们叫我演什么角色，我从来不拒绝。我觉得演这种角色是最自然的事情，犹如人必须穿衣吃饭才能生活一般自然，无所用其反抗，而且不能反抗。他们不满意我的，是我过于缄默，不会酬应宾客，没有办事才干。母亲不满意我一天到晚捧着书看。我想，我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与“一天到晚捧着书看”大有关系的。

十岁以前，我同其他的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一般爱玩，顽皮，好零食，讲究穿衣服。看戏，听故事，决不会是我特别的嗜好。可是十一岁，我变了样。夏天，有一日，生小病，躺在三伯父房间，不能跟着堂兄弟出去玩，正在无聊时候，看见枕头底下有一本石印小说：《薛仁贵征东》。那是三伯父新借来看的，他看到第四回没有合拢来，卷成一筒塞在枕头底下。我拿起来居然看得懂，虽有许多字，例如“这”“那”“呢”“吗”之类，在经书里未曾见过，但这故事我听人说过许多遍，戏台上也常演，不懂得的字是能够猜出意思的。我一口气看下去，当夜很晚才睡，第二日再看一日就把四本小书都看完了。从此以后就缠着三伯父去借小说，以后自己买小说来看，买了许许多多的小小说，都是章回体的。从此以后对于小孩子游戏我都不感兴趣，因此一天比一天同堂兄弟和自己的弟弟疏远了。

小孩看小说,现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别处也是平常的。但在我们那里不平常。十一岁孩子看小说,而且看了许许多多小说,手不释卷地看小说,外面做热闹,演戏,不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我们县城内外没有第二个,因为在小县里,读书人家是互相认识的。不久之后,我就成了藏书(小说书)中心之一,大人们看小说的,也来向我借书。

小说给我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像的世界。我如此沉迷在这个世界之中,以致忘记了现实的世界。这就造成了,而且发展了我的弱点:沉默,短于世故,孤僻,落落寡合。小说使我没有朋友。儿时游戏的伴侣已经离开了我,学校同学也不了解我,因为他们并不看小说,或没有看那么多的小说。他们大都只看先生教过的或指定的书。但是他方面,小说使我不满意于现实,于我们那个圈子的生活和理想,于人们给我安排的前途,因之对于神圣的道统发生了怀疑。这不满,这怀疑,不过藏在心里罢了。我对于老庄哲学的偏好,以及中学毕业后想远走高飞,以及主动主张远赴法国(这是我第一次出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以前一切都是父亲替我安排好的,此次父亲虽然不反对,但也不热心促成),——也许就是这个心境的外露罢?

应当说,我看的并不限于小说。起初自然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总之,都不是先生或同学教看的书。反之,凡是先生或同学介绍的书,我都怀了成见不屑去看,或者当作应尽的义务勉强去看。所以我的一切知识大多是从自学得来的,我把学校看做供给食宿和闲暇的处所,甚至认为学校教育没有用。现在想起来,这是偏见。看的书既然与人不同,性情,嗜好,思考方式也就显得与人两样,虽然不愿与人冲突,没有一个仇人,但也不能与人融洽,没有一个朋友。外表上,我是迟钝,麻木,无所可否的一个人,但我过着内心的生活。如果不是处在这个时代,那么在现实世界折磨之下,想像力就会渐渐衰退了,渐渐同那

些没有想像的人谈得投机了，于是也懂得世故，善于酬应，同周围一切融洽起来，书呆子习气渐渐免除，历练相当时候一样也会学得办事才干，结果继承了祖父和父亲，在小县城时当一名小绅士。

幸而五四运动救了我。我说的不是打章宗祥的，罢课游行的，抵制日货的，爱国的五四运动。我说的是请赛先生和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同梦魇似地压在我身上的孔子道统被我踢开了，连带着做这道统补充品的老庄哲学也被我抛弃了。从此我只过着一种生活，我所行的只是我所思想的。而这是经过严肃思考和内心斗争而达到的，并非为了趋时和从众。

这个斗争过程并非一日二日的事情。从写日记骂陈独秀起到完全接受陈独秀的见解，中间经过了几个月，直至读过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后，一切怀疑才消失了。到了法国后虽然觉得人家样样比我们强，孔夫子究竟敌不过赛先生和德先生，但总觉得有一种“国粹”，一种东方文化，一种精神文明，一种神秘的东西，是西洋所没有的。这种东西，我认为包含在周秦诸子学说里面。因为在中学曾读过一本书，仿佛说佛教不如我们的老庄杨墨；至于哲学，即西洋理学，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比起我们的先哲来，也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胡适告诉了我，诸子学说就是哲学，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去研究，其中许多问题，西洋哲学不仅讨论过，而且更有进步。这种“国粹”已经失去神秘性了。

* * *

在巴黎住了一个星期。十二月十五日，我们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就由华法教育会派人送到圣日耳曼中学来。圣日耳曼离巴黎四十五分钟火车，坐电车一个钟头也可以到。那里有个王宫，古时法国国王常在那里居住，路易十四就是在这宫里出世的；现在改做博物馆。王宫和城市都在高岗上，俯视塞纳河以及河彼岸的平原。巴黎来的火车开到对岸须卸下好多节，然后添加一个机车在后面，帮助前面的机车，把火车从隧道推向高岗去。上面就是这条铁路

的终点。车站旁边就是王宫，而隧道上面则是连接于王宫的花园；花园并不很大，但沿着河滨山岗有一条很长的箭道，箭道尽处是个大森林，古时国王行猎的地方。整个圣日耳曼本处于森林旁边，从车站穿过市街，经过我们的学校出城去，也有大路通入森林的。每年春天休假日，巴黎人常来此踏青。我们来前三个月，协约国才同奥国在这王宫里签订了和平条约。

我们食宿都在学校里。学校特开一个大寝室给我们住，一个膳堂给我们吃饭，一个教室给我们读书。除了法文以外没有其他的功课。法文先生当过兵，打过仗，据他说杀死过好多德国人。他是个十足的沙文主义者。法国同学年纪都比我们小，生活完全同我们分开。有三个塞尔维亚人，两个阿尔班尼亚人，一个波斯人，也住在学校里，但他们是同法国学生一起上课的。

福建学生有一种一时拆不开的关系，即是陈炯明派了一个人从漳州护送我们上船，我们第一年的官费由他领来直接汇给巴黎华法教育会，我们自己的钱也是交给他代汇，所以到巴黎后全凭教育会办事人支配，我们没有选择自由。教育会把我们全体（除了一个女生）送到一个学校来。圣日耳曼中学是临时交涉的，校里以前没有中国学生，此次一来三十几个，除了一个外江人外，都是福建人。但一个多月以后又来了三十几个人，那是各省都有的。

福建学生对于外江学生采取排斥态度。几个同乡在一处常常拿外江学生当作嘲笑对象，以此引起别人的反感，认为福建学生是“野蛮的”。野蛮不仅是粗暴之意，而且是不开化或文化程度低下。有一个湖南学生发表了这个意见，给福建人听了去，群来质问，几乎要动武。但福建人并不团结。三十几个人分为汀州派和漳州派，漳州派中又分为东党和南党。党派斗争在广州香港时候就开始了。船上为了选举学生会闹了许多别扭。进了学校把戏更多。这种以乡土为分界的党派斗争，发生在学生里面，似乎是很不可解的。但这有客观根据。首先，言语不同。旧汀州府属各县学生，都

说客家话,只有一个或两个能说漳泉话。旧漳州府属学生则没有一个能说客家话。两方面只好借“官话”交换意见了。其次,更重要的,是所受教育不同。汀州学生受的是内地中学教育,同我所受的差不多,注重国文,教国文的是些老先生,他们总有些线装书知识;漳州学生受的是通商口岸中学教育,教会学校式的洋场教育,教国文的也是些西装革履少年,他们恐怕不教《古文辞类纂》。汀州学生有理由视漳州学生为浅薄的,漳州学生也有理由视汀州学生为落后的。例如汀州学生大多读过《原道》的,他们看见我的箱内有《庄子》和《老子》,晓得说里面有反对圣人的话,因为韩文公提起过。漳州学生则没有这个联想。他们看见我的《白香词谱》,硬说是白乐天著的。但两处学生都不知道龚定盦是谁。漳州学生称我做“博士”,因为我带了线装书来。他们很看不起线装书,汀州学生则没有这个成见。在这斗争中,我是旁观者。我不是汀州府人;也不是漳州府人,而是夹在两府中间的龙岩直隶州人;论教育,我是同汀州学生一样的,但我不会说客家话,我可以说漳州话。我的一个同乡既会说客家话,又会说漳州话,有个时候同漳州人一起反对汀州人,有个时候同汀州人一起反对漳州人,两派斗争,他也造了许多原因。有一次不记得为了什么问题两府学生在课堂里演全武行,我则躲在角隅观看。校长写信到华法教育会去,现在的党国元老张浦泉那时在巴黎,他亲自到圣日耳曼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江学生在另外一个课堂上课,他们带来了许多新书,新杂志,但也有线装书。他们并不因为我们野蛮,抛弃我们。他们同中古基督教传教士一般向野蛮人说教。福建学生渐渐地也闹起“五四运动”来了。在福建本上似乎也是此时(一九二〇年春)才有“五四运动”传到的,因为国内的同学们纷纷有信来讨论新潮流问题。有一封信写了别字,把“新潮流”写做“新条留”。

写白话文,谈新文化,虽成了时髦,但府际斗争仍继续下去。到了暑假,华法教育会存款完了,一切归我们自理了,联系福建学

生的线索才拆开,而各人自寻命运去。这些人后来怎样,我知道得很少。其中有一个曾在我以后走到共产主义来,但经过打击后又回到他的父亲替他安排的命运去干光耀门楣的事业了。

暑假以后我同两个同乡仍旧留在圣日耳曼,此处既无中国学生,我们就跟着法国学生上课。物理,化学,数学,我在中国都学过了;法国史地,学了没有大用;法文读些古典著作,也没有兴趣。到了寒假,我就离开圣日耳曼到巴黎东南二个多钟头火车的墨兰去,那里也有一个中学,也收中国学生,但我不进学校,而另外租一个房子住着,自炊,自学。墨兰是个省城,风景没有圣日耳曼好。

暑假没有离开圣日耳曼,是为了存款不多;寒假终于离开圣日耳曼,则是为了存款将罄了。

大战以前,中国使用的墨西哥银元,每元可兑二个半佛郎。一九一九年,维尔塞和约签订之年,我们在香港时,每元可兑八九个佛郎。次年,佛郎大跌价,每元可兑至十五佛郎。我们到巴黎时,华法教育会派的招待员,四川人吴铁生先生,同我们说:“现在生活昂贵,巴黎每个月生活需要三百佛郎了。”接着,他又说:“但是三百个佛郎不过中国三十块钱,这点钱在上海也是不够生活的。”但我们在圣日耳曼每月纳费平均一百五十佛郎,膳费,宿费,学费,洗衣沐浴费都在内。这是华法教育会替我们一次缴纳的。其他费用则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干时候向教育会支领一次。一九二〇年年底,我的存款不够缴纳次学期学费,只好离开学校了。我们,我和其他两个同乡,希望自炊时候每月开销能更节省些。墨兰离巴黎远些,生活程度更低些。我们每人住一个房间,我住的是顶楼,有老虎窗对着运河,每月房租三十五佛郎;有一个同乡住二楼房间,每月房租四十佛郎。房租是大宗支出,其余是很省的。我们每月每人共总只用一百佛郎,一切都在内,理发,沐浴,洗衣,邮票,也在内,惟有衣服,书籍,交通,医药等费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废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面包,洋山

芋糊,有时炒卷心菜,那是特别的享受。不过用的是猪油,不是橄榄油。至今还记得面包是一佛郎又三十生丁买一里弗(半公斤)。三个月之后,实在熬不下去,才隔几日吃一次肉,其他支出也增加了些,但每月决算也就增加百分之三十了。墨兰城跨塞因河两岸,我们有一次在河边散步,遇见一个病容满面的中年中国人,通了名姓,方知他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曾琦。他来这儿养病,生活条件比我们好多了。他从此成了我们的朋友,互相拜访,同作郊游,借了好多期《少年中国》给我们看,又抄了好多首七绝诗请我们批评。我也抄了几首诗词请教他。他曾写了通信发表在中国什么报上,说法国俭学生每月生活一百佛郎就够,即合中国六七元。勤工俭学生看了这个通信大骂曾琦混账。他们不知道是我们几个人作的孽。

当时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办的《新世纪报》早已不出版了,但都尔城的汉文印刷所还存在,每周出版一个刊物,同上海小报一般大。我记不起这报名,但记得编辑人是太玄周无。他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曾琦的朋友,曾琦常在那个铅印报上写文章。有一篇文章也许是曾琦写的,曾把当时在法国的学生分成三个“阶级”:官费生,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勤工俭学生。前者好比资产阶级,后者好比无产阶级,半官费生和自费生则好比小资产阶级。我们和曾琦都是“小资产阶级”。

当时有个统计,举出各类学生的数目及其百分比。我现在不记得了,但记得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远超过前二“阶级”学生,约有三千人,本部十八省,除甘肃以外,都有人,最多的是四川人和湖南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他们一定是同我一样,想飞,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国;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样没有“翅膀”去飞。“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叫喊的。他们大都集中在上海候船,也有集中在北京或保定的。在我以前已经有二批或三批人出国了;在我以后出国更多批数。这个潮流,

一九二〇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

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法国各地中学固然开放大门让中国学生进去，因为究竟是一笔有利的生意；但法国工厂并不开放他们的大门。战争停止尚未满二年，法国已经闹不景气了，工厂正要裁人，那有位置来容纳这些黄面孔的劳工？勤工俭学生们把带来的一点钱读了几个月书之后，便真成为“无产”阶级，不得不到华法教育会来请求救济了。间有极少数人能找得工厂位置，大多数人则每日领二三佛郎津贴，吃面包和开水。有一部分人住在会所里。会所本名“华侨协社”，教育会是协社的一个单位团体，听说是一位有钱寡妇为了同情中国，捐这幢屋子给华侨团体，我到巴黎第二日，协会欢迎会中这位太太曾上台演说。华侨协社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与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远，在(Lagarenne - Colombes)镇盘特街(Rue de la Pointe)三十九号。我所以记得这般清楚，因为三年多通信都是在那里转的。这是一幢三层楼小洋房，立在一个小花园当中。但此时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树枝间拴着绳索，绳索上面晾着衣、裤、袜子、被单。喧哗吵闹引起了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板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地下撒尿；马桶间腌脏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这是得之传闻的。我常去华侨协社，那里马桶间虽不很干净，但不如所传之甚，至于走廊，则无大小便痕迹。

勤工俭学生都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即所谓“丘九”。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李石曾已经回国到北大当教授去了。他的朋友刘厚首当其冲，遇了许许多多麻烦。当时刚到法国的蔡元培和吴稚晖曾出席会议解决这些麻烦问题。

这些名人到法国来，是同运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问题有关系的。他们计划拿退还的庚款在中国另招一批学生去；勤工俭学生则很有理由控告他们，说他们当初提倡勤工俭学，目的就在运动退还庚款，现在目的达到，就把利用过的工具丢弃了。

有两个斗争必须提起来说。

一是“二八运动”，发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仿“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之例，应当说是“二二八运动”，可是当时通称“二八运动”。这日各地勤工俭学生约齐到巴黎来向中国公使陈箴请愿，提出几个要求，结果被法国警察驱散了。

二是“里大运动”。这年秋天，那个海外中国大学已经办成功了，校址是里昂城对河小山上圣伊涅伦炮台改造的；吴稚晖率领的一群学生已到法国，或者已经进学校里去了。勤工俭学生被人抛弃定了。一日，里昂城警察很惊讶地看见火车一批一批载来许多中国学生，他们都到河那边山上装修中的炮台去，进去之后就不肯出来。但不久，警察就晓得怎么一回事了。他们把这炮台包围起来，把里面的中国人作成了俘虏。几日之后，法国政府下令把这些俘虏驱逐回中国去。

这两个运动，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不是“无产阶级”，我是“小资产阶级”，如曾琦或他的朋友所说的。

里大运动之后，一部分捣乱分子驱逐出境了，勤工俭学生气焰低落下来，同时不景气似乎好转，工厂渐渐能容纳黄面孔的工人，全盛期的群众运动已成过去了。

但在此时，我自己则从“小资产阶级”降落为“无产阶级”；同时——有内在的联系么？——不仅从民主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思想走到社会主义的行动了。

十二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们从巴黎北站出发，身上带的中国领事馆护照，说是经过西比利亚铁路回国去，其实我们是去莫斯科进东方大学的。周恩来和我们同行，他是从法国回归德国去。此次一起派遣十二个人，熊雄和王丰本在柏林，袁庆云先到柏林接洽俄国入境护照，我们从巴黎车站出发只有九个人，连周恩来在内十个人。

赵世炎，他是我们的领袖，他刚交卸下“少年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现在做我们这个旅行团团团长，对外交涉大部分是他办的，尤其当需要英语时候，因为其他的人都不能说英语。他是四川人，一个大家庭子弟，全家住在天津或青岛，学北方人说话，但脱离不了四川口音。我在法国认识“川老鼠”很多。一个川老鼠，不仅可以从说话口音和字汇辨别出来，而且可以从性格辨别出来。这个性格是什么？我想，凡外省人交过四川朋友的，都会知道，但要拿言语形容出来，则是很困难的。我第一次听世炎说话，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可是相处一个时候以后，觉得他的性格与我过去认识的四川人全不像。他确具有领袖能力：能调和大原则下种种不同的倾向，能量才使用，机警，有急智，是个好演说家，主持会场和办理外交，他是最适宜的了。关于他缺乏四川人特有性格那一点，我曾有一次向他提过。他说，他是四川某县人，这个县份在四川边境，同外省生活比同四川腹地生活更接近些；此外，他又生长在外边。

这一年，他约有二十三、四岁。在火车上，他指着头上新呢帽告诉我们说：这是走遍巴黎好多帽子店才买来的。普通尺寸的

帽子,他不能戴;但他的面孔和他的身体,与那颗大头不很配称。比起头来,面孔是小的,而且渐渐收束成一个尖下巴,有点像后来叶浅予漫画中的“王先生”。我未曾见他戴过眼镜:眼睛,鼻子,双颊,都很平板,不能说他漂亮,但演说时自有可爱之处。虽没有病,身体也不强壮。他到法国以前的生活,我不知道;似乎是北京某中学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出过风头,与当时北大学生领袖邓仲澂,许德珩等人有交谊。

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吴稚晖演说大骂陈独秀兼及他的两个儿子,其中有几句话道:“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要说他们是小偷。”(见文明书局出版的《吴稚晖白话文钞》)这是胡说。陈独秀并不丑,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看看《实庵自传》单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亚东图书馆出版)。有一个女同志曾说他的眼睛是特别可爱的。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他不上。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并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总之,我们十二个人中还有比他更丑的哩!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只有同王若飞闹着玩时才有说有笑的,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这两兄弟感情很好。两人一起脱

离家庭,不仅脱离他们的旧官僚家庭,而且脱离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几年全国正在宣传他主张“万恶孝为首”,宣传他组织“讨父团”。一九二一年陈炯明问陈独秀关于传说的组织“讨父团”事情。陈独秀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见《实庵自传》)他的儿子虽未曾组织“讨父团”,但未出国前对于父亲的态度,正不减于父亲对于嗣祖父的态度。这是政治思想的冲突。父亲是民主主义者,儿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父亲在中国前进到共产主义,儿子在法国也退回到共产主义来,于是父子间的隔阂就完全消失了。乔年完全跟着延年走。延年在法国的转变,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南洋群岛和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延年死时还是童男子。乔年后来在北京与史静仪同居时,我第一次从延年口里听到他不满意“弟弟”的话。在此以前我也未曾听到别人说过不满意“弟弟”的话。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弟弟”,因为我们都跟着延年喊他做“frère”(法语——弟弟)。到莫斯科,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яблоке”(俄语——苹果),是为了他的双颊颜色呢,还是为了其他的故事,则不记得。这一年,延年二十五岁,乔年二十二岁。

王若飞年龄是最难确定的,骤然看,他似乎同我们一般年纪,即二十五岁上下,但仔细看他脸上的皱纹,牙齿的颜色,尤其生活经验和习气,则显然比我们老得多,这一年应有三十岁,至少也有二十八岁。他从舅舅黄齐生及其他贵州政客学会了许多斗争本领,但他能干,而且忠实于共产主义,并不减于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青年。这是一个矮子,头颈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肤白净,满口贵州官话。他爱喝酒,同我一样。他爱说笑话,顽皮,好闹。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次有趣的是袁庆云。他也顽皮,好闹,可惜同我一般,是口吃

的。这是标准的川老鼠,具有一般四川人的优点和缺点。他是赵世炎的朋友,跟着赵世炎走到共产主义来,我想不是由于同乡的关系,而是由于政治思想的关系。他是一个高个子,活动,广交游,尤爱接交外国朋友,虽口吃却不怕说话,到莫斯科后他比我们更早会说俄国话。“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会场就是他寻觅的:警察局里一个大厅。但是旅莫支部小组会中他受人批评最多。

袁庆云的同乡王凌汉更是标准的川老鼠。他是一个跛子,跟随世炎参加一切组织,最后加入“少年共产党”。开会时爱发言,但令人有不着边际之感。成立大会后,某次蒙达尔支部开会,尹宽说出他对于大会的感想,曾有一点说:代表中有些人并没有明白我们现在这个组织同过去种种组织有什么不同。尹宽就举王凌汉做例。

赵世炎,袁庆云,王若飞,陈家兄弟,出发前本在巴黎居住,我到巴黎去时会面多次,大家厮熟了。王凌汉不住在巴黎,但成立大会时我已经见了他一面。

以下三个人则是新会面的,他们从外省来。不错,出发以前,我已经在第二次大会上会见他们了。

余立亚,一个湖南人,高而大,热情而强悍,这方面具有湖南人性格,但另一种湖南人性格,如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所代表的,则在他身上找不到踪迹。他开会时很少说话,因为没有什么自己的系统的意见可说;他诚心实意接受他人领导,奉了使命时是很忠实执行的。

高风,也是湖南人,也是热情而强悍的,但与余立亚不同,即爱谈理论问题,从宇宙起源起至人生哲学止都爱提出来同人讨论,可是我们对于这类问题都没有兴趣,他于是感觉到了某种失望。我未曾看到他以前,就记得他的名字,因为内部刊物曾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主张我们现在就规定一个日子向统治阶级宣战,到了那一个日子大家都要起来暴动的。

与高风形影不离的，是陈九鼎。他是河南人，这是十二人当中惟一的北方人。这两个人同在一个工厂做工，为了喜欢讨论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遂结合极坚固的友谊，不仅生活分不开，连名字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常说“高风陈九鼎”，仿佛这不是二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人的名字。高风是个强壮的农民模样，陈九鼎则是瘦而矮，而且生了鸡胸。

以上八个人（袁庆云在柏林等我们），连我九个人，连周恩来十个人，从巴黎北站坐车向德国去。我们买的是去柏林的车票，这个车票有三天效力，即是说我们路中可以下车游玩，只要不过三日，仍旧可以坐车去柏林的。比利时查理鲁亚城劳工大学有我们一个支部，那里的同志预先有信来，要我们路过时下车去看他们。我们去了，那里的同志，刘伯坚，熊渭耕等开会欢迎我们，领我们参观大学和城市，又到郊外去拍了一照。不记得是否在查理鲁亚城过夜，但是次日早晨到科伦，下午换了车就走了，确是未曾在科伦过夜的。科伦离比利时边境不远，我们一下车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首先言语不通。我们在法国旅行以及此次经过比利时，都说法语，并不觉得困难，到德国则没有一个人懂得德语。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我们在科伦吃了一餐饭，共付五万或六万马克，这也令人惊讶。此时是德国通货膨胀初期，到了十月间更不得了。可是到了莫斯科，一只小面包也要卖七百万卢布哩！我们参观了有名的科伦大教堂。

到柏林，我们分开几个地方居住。我住在熊雄寓所里，在夏洛登堡，康德街。夏洛登堡一名新柏林，到老柏林去时须经过一个森林，但有地道电车和架空火车可坐。我在法国未曾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不仅我，勤工俭学生和半官费生或自费生，据我所知，都未曾在法国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房东是个军官寡妇，有个少女待嫁，天天在客厅弹钢琴。她们为了贴补生活，把家里最好的房间高

价租给外国人,不记得房租每月几个马克,但折算为佛郎,在法国也只能租一间恰配勤工俭学生住的房子罢了。熊雄自己烧饭,生活很俭朴,同他住的房子不很配称。他原来住在法国,为了与李鹤龄同谋暗杀陈策,供给李鹤龄手枪原故,事发出走德国,但李鹤龄口供里并未牵连了他。这件事含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的意味。我到柏林时,熊雄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向我津津乐道这件事。他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个人恐怖的,实在说他至死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天真的人,同小孩子一般天真,即是诚实,无邪,纯洁,热情,而又幼稚的。他追求一切新的革命的事物,结交一切激烈的勇敢的革命的朋友,但没有判断力,分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什么是克鲁泡特金。他永远是一身猎装,长靴,房间里挂着马鞭,每日临帖练习大字和小楷,好书岳武穆满江红词,早起,下雪,天未亮,一个人到柏林郊外很远地方踏雪去。可是,无论那一国文字和语言,他都学不好,说中国话也夹杂了很多江西土音。后来在莫斯科上课或开讨论会时,问他问题,他常常站起来目瞪口呆,最后声明:“忘记了”。

袁庆云和王若飞住在王圭寓所里。王圭是湖南人,德国话说得很流利,他是我们惟一的翻译,没有他,我们只好做哑子。赵世炎听了德国话,说他有一点听得懂,因为许多地方同英国话一样,他想学德文,别人则对于德文毫无兴趣。我们是路过德国的,在柏林停下来,是为了办理去俄国的护照。当时法国尚未承认苏联,巴黎没有苏联外交官,柏林才有。王圭认识第三国际人员,那是张伯简,萧子暲,遗留下来的关系。护照办了许多日,我们闲着无事,由王圭和周恩来带着游玩柏林博物馆,动物园,名胜,古迹,有一次去游博茨坦,那是仿照维尔塞造的离宫,但不及维尔塞多多了。

周恩来又带我们去吃中国菜。菜馆不是临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来招待的是几个德国姑娘,菜单上每样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编了号码,点菜时只消告诉号码就够了。那里,我们遇见

几个中国留学生，又看见中国寄来的报纸，我们紧张地读着其中关于吴佩孚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的记载。

周恩来是带我们来中国菜馆开会的。他到柏林来，张崧年夫妇不理他，也不肯同我们见面。周恩来召集青年团德国支部开会，解释他在第二次大会开除张崧年案中的态度。德国支部没有几个人，也许有几个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张崧年夫妇，周恩来，王圭，熊雄之外，只有一个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会，很迟，一声不响。周恩来竭力为自己辩护，熊雄和王圭自然谅解他，另一个同志，提出几个简单问题，就不再说话，显然是不谅解他。我们离开柏林以后，这个同志也就退出“少年共产党”了。

从柏林到莫斯科去有两条道路：一条陆路，经过波兰走廊，立陶宛，列多尼亚，从什么地方入境，直到莫斯科；一条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彼得格拉登陆，从那里坐车去莫斯科。我们选择了陆路。到柏林住满十天，又继续向东去。经过波兰，立陶宛，没有停，直至列多尼亚的里加才停下来。我们是上午到的，须待下午或晚上才有车去俄国。这时已是春天，巴黎和柏林都是绿叶满树了，里加还是冬天气象。我们站在大河铁桥上，看见大冰块在河里缓缓流着。这里，法国话不通行，德国话也不通行，俄国话我们又没有一人懂得，倒是英国话比较通行一点。因为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吃中饭时，赵世炎能够同仆欧说英语，旁边两个舞女也懂得英语，她们立刻同世炎亲热，要世炎和她们跳舞。世炎脸红了，这件事后来好久成了我们嘲笑对象。如果换上王若飞是不会脸红的，可是王若飞也不懂得跳舞。

到俄国边境上，车停下来，行李都搬下来检查。这是第一次遇着检查，以前经过许多国境，虽看护照，却未曾检查行李。检查员知道了我们是东方大学学生，似乎未曾检查下去。我们第一次看见红军：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面有一个红星。别的旅客又坐车去了，我们不能走，因为剩余的钱不够买车票。车站有

人殷勤招待我们，允许减费或免费，但须请示什么机关，当日不能动身。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东方大学中国同学。这一晚就在车站上空车厢内过夜。

中国同学，在莫斯科车站迎接我们。其中有萧子暲，他是从法国去的，他是我们的亲人。此外都是从中国去的，有好几个，我只记得一个是任弼时，用高音说话，一个是王一飞用低音说话。出车站，王一飞同我一路走，不仅挽着臂，而且挽着腰，这种走法是在法国、德国时未曾见的，在中国也未曾见，但在俄国则很常见。

旅行生活告终，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不仅从资产阶级国家初次到无产阶级国家来，而且从工厂生活过渡到学校生活。从没有系统的自己研究到有一定课程的读书和求学。我们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

十二人！但是哪里去了呢，这十二人？

袁庆云，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出发，过湖南郴州时，传染虎列拉死去了。

高风，同年在保定被捕，被北洋军阀枪毙了。

熊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后，从黄埔军官学校出亡，途中被捕，被李济琛枪毙了。

陈延年，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在上海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赵世炎，于陈延年被杀之后不久，也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余立亚，也是这个时候死于杨虎手里。

陈乔年，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被捕，被熊式辉枪毙了。

王凌汉，一九二八年在无锡工作失踪，传说被土豪劣绅暗杀了，后来才发现他抛弃工作逃回四川去。

陈九鼎没有消息。

王圭，我曾于武汉时代见过一面，做了什么军官，后来没有消息。

王若飞，一九三七年尚在延安，不知还在人世否？

最后，我在这里写我对于十二人的回忆。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时，我以为王凌汉，陈九鼎，王圭都已死去，而传说王若飞为了左派反对派嫌疑又被斯大林充军于西伯利亚，曾于回忆中发生比现在更多的感慨。那时，我想，我们仿佛是一班小兵，赵世炎是班长，我们并肩作战，结果一个个中弹死去了，只剩下一二个成了俘虏。现在做俘虏的恢复了自由，而有几个人虽然失踪，却无确定死讯。确实战死的只有七个人，但也是超过半数以上了。

K.U.T.V.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创办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旧俄帝国境内高加索，西伯利亚一带诸落后民族的劳动者之用，正如另有一个“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为了教育帝国西境立陶宛，列多尼亚诸民族的劳动者之用一般。旧俄帝国境外的东方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等等学生，在里面究竟占据少数。这些外国学生中有许多是为了参加巴库“东方民族会议”，彼得格拉“远东民族会议”，而来俄国的，其中甚至有第三国际大会代表。

中国学生成分，同我们在法国那些勤工俭学学生一样，都是五四运动后纷纷往上海或北京走的大潮流中人物，不过他们稍微晚了一点，赶不上勤工俭学潮流，因之比我们多占得一点便宜，即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成熟了。陈独秀出狱后，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些学生，或其中最进步分子，此时就不去找李石曾，吴稚晖一流人物，而去找陈独秀了。陈独秀当时曾在上海进行一种半工半读的组织，参加这种组织的人就是后来的S.Y.的基本队伍。S.Y.自然是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的，但当时不名C.Y.(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名S.Y.(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是为了适应环境，因为当时准备做公开的团体，——而且是为了其中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只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而不肯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工作。从中国直接去俄国的学生，就是这些S.Y.分子。他们分做几批出国，当时从中国到莫斯科还要经过俄国白军防地，路上遭遇种种困难和危险。有一批人在某

地被武装队伍扣留起来，他们不懂得俄国语，不知这个队伍是红军还是白军。但人们很详细搜查他们，结果在一只皮鞋后跟里面搜出了第三国际代表发给他们的证件，才知道是自家人，于是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了。他们在路上耽搁时间很久，有一批人在赤塔或伊尔库次克住了几个月才去莫斯科，有几个甚至未曾到莫斯科，而留在远东区做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我们来到莫斯科时，“东大”有三十几个中国学生，一部分是湖南人，大多是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办的平民学校学生，一部分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此外是些零星的分子，此外还有四个从西伯利亚来的华工，其中两个做过红胡子。

这是经过几次淘汰之后剩下的中国学生。最初，东大有几个中国学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很多，至少比那时多二倍。他们恐怕从中国出发起就在不间断的内部斗争之中。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自然是斗争的对象。但斗争并不以此为限。思想的异同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公开的斗争夹杂着阴谋和诡计。从混乱中生出秩序，从平等中分出领袖和群众，出令者和受命者。我们来到时，这个斗争已经结束了，失败者被排挤出去，他们回国后就退出了运动，胜利者也有回国的，但大部分留下来。我们只能从胜利者方面知道一点斗争情况，从他们谈话语气中又知道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不认识那些失败者，但从胜利者方面观察，从斗争逻辑推论，以及根据其他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未到莫斯科以前东大中国学生中间的斗争一个判断。这个斗争，从整个方面来看，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类型是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威权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另一种类型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威权，容易屈服于威权。在那时俄国场地上，这种斗争中前一类型人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若以为这是一

种阶级斗争,也未免过于夸大了,因为两种类型人物出身的社会阶级大体是一样的,虽然胜利者方面确有人从牧童或校役出身。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我们来到时,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留下明显的斗争痕迹在那三十几个学生精神之中。首先,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班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不论如何装得和颜悦色,总有不可亲近的神气。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一路上也视赵世炎为我们的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当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视赵世炎为我们的班长,而且是我们自己选出的班长,并非上头委派的班长,更不是旅长,师长,军长,或总司令。莫斯科同学那种领袖观念,我们根本没有。张崧年当初正是要我们承认他是这样的领袖,才被我们开除的。但引起我们惊奇的,还不是莫斯科那几个领袖,而是莫斯科那些绝对服从的群众,他们不仅开会时绝对服从,连私下说话中也不敢有不满意的言语。但从行动和言语以外情感的表现看来,我知道他们并非心悦诚服这些领袖的;恰好相反,他们内心深处含有怨恨和鄙视。这是内部大斗争留下的印记。

大斗争造成了三个领袖:卜士奇,罗党,彭述之。三个都是湖南人。我们到时,卜士奇才回国后不久。我始终未见过这个人。他回到北京,即与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发生恋爱纠纷,在党内闹大风潮,后来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一个什么官。

坐第一把交椅的是罗党。一个湘潭人,贫农子弟,但始终隐讳他的出身。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戴一顶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别人多,高而瘦,皮色苍白,嘴极大,尤其当说话时候,唇红,牙齿很大,见人先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沉起脸来同你说正经话。他爱对人说,他身体不好,常生病,常去什么地方养病。事实上,我们不

很常见他。他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又是俄国共产党东大支部主席团一分子，事实上是全体中国学生对外的代表。外国人喊他布哈洛夫，中国人仍喊他罗觉。

拉第二把提琴的是彭述之。罗觉高而白，他则矮而黑，穿一件皮质的衣服，戴一顶皮质的平顶帽子，说一口很难懂的宝庆话。凡有开会，他必说话，而且说的话很多。这是一个书香子弟，少时在家崇拜乡贤魏默深，立志做一个经师；五四运动后把线装书丢掉，去读杂志上翻译和介绍的杜威，罗素文章；后来不晓得怎样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这是胜利者当中文化最高的人物。在那个斗争中，他不是一下就站在胜利者方面来的。起初他也受他们所排斥，好久才同他们合为一起了。但罗觉给了他一个绰号：“孔夫子”。这个绰号一方面表示他的“文化”，他方面也表示胜利者看不起读书较多的人。我们当他的面不敢叫“孔夫子”，总是叫“述之同志”，外国人则叫他做彼特洛夫。

罗觉是高高在上的，很少同我们见面，谈话。彭述之则相反，他虽然另外住一房间，但常常找我们法国新来的人个别谈话，每个人都轮到，而且轮到好几遍。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旧时中学的学监（现在称“训育主任”）。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都是群众。不错，还有几个特殊的人。但大多数人都是绝对服从的。王一飞和任弼时是青年团负责人，但事无巨细都须禀命，自己毫无创意力。王一飞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矮小，庸懦，但俄文和俄语比较好。他没有俄国名字，学校注册仍是“王一飞”。任弼时，湖南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子，以俄国大批评家柏林斯基为名，但人家弄错了，喊他布林斯基。其他的湖南学生和浙江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上面说的特殊的人，一个是李仲武。他是公子哥儿，梁任公的内侄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同秋白一路去俄国当记者，秋白回来，他留在东大读书。他的俄国话

说得顶漂亮。他又顶会适应环境。后来回国曾在广东当加伦将军翻译,不久就辞退去海宁结婚,而同我们脱离了。一九二六年我们多方设法去找他,他都不见面。

一个是彭泽湘,岳州人,从北京去的,永远穿一套学生装,十足的中国政客风度。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来俄国不久,是“今日”派一个人物,在《今日》杂志上写有文章,但已经“否认了”“今日派”的主张。他的绰号是“法西斯特”,我们当面喊他。他有能力,也有知识,有一次同我讲起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时,他说他要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用经济来解释。他可以成为反对派(即反对罗觉和彭述之)领袖,但没有群众拥护他。此外,领袖们对他是另眼看待的。不久,青年团改组,他做了“训练部长”,上任后召集我们个别训话,不像学监,倒像军法官。

四个华工中,两个适应环境了,其他两个当过红胡子的,始终不能适应,最后公开起来反抗,结果被派去海参崴做工作了。

但真正的反对派是蒋光赤和抱朴。这是另一类型的学生残留下来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情调和其他的人如此不配称,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别的人都是住在脱维斯卡耶街第十五号,惟有这两个人住在广场旁边那个女修道院里。他们聪明,活泼,与那些湖南人不同,与那些浙江人也不同。蒋光赤是安徽六安人,抱朴是江苏无锡人。蒋光赤是惟一的诗人,抱朴是惟一的世界语者,二人俄语都说得好,俄文都学得好,能直接与俄国人交涉,无需要罗觉为代表。每逢开会,他们都有意避不到会。大家见面时谈几句笑话,此外就不谈了。几个月之后抱朴就回国,到了海参崴写信来反对他们,连带着也反对共产主义。但他未写信来时,“旅莫支部”已决议开除他的党籍了,罪名之一就是他暗中鼓动两个红胡子反对负责人。蒋光赤于次年回国前一次会议上,也把他的反对派面目显露出来,说谁是忠实的党员,须待国内工作表现。

回国后,蒋光赤并不是好党员。他起初还在做党内工作,后来

就去做文学家了，——虽然是“革命文学家”。罗觉和彭述之成为革命的重要干部，我们从法国来的也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干部，但原在莫斯科的学生，除了二大领袖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尤其那些绝对服从的人。任弼时，王一飞在外。

* * *

我们十二人到莫斯科时恰逢春假，东大学生正准备去彼得格拉旅行，我们赶紧办理好入校手续也跟着他们坐车去彼得格拉了。

办理入校手续时有一点应当提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姓名。是为了中国姓名难记呢，还是为了别的原故，教务长瓦克士给我们每个人取一个俄国姓。据李仲武翻译，这十二个姓乃是一九〇五年彼得格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十二个委员。赵世炎名辣丁，陈延年名苏汉诺夫，陈乔年名克拉辛，王若飞名尼姆泽夫，袁庆云名雅诺夫斯基，熊雄名雪尔维尔斯特洛夫，陈九鼎名喜斯金，我名马尔洛托夫，其余四人名什么，想不起来。

在火车中和彼得格拉参观时，我们渐渐与原来的中国学生厮熟了。我们住在斯摩尼学院三楼上一个房间内，后来才知道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房间发号施令的。彼得格拉比莫斯科整齐，洁净。我们参观了冬宫，彼得保罗堡垒（里面是空的），几个工厂，一个博物馆，内有未来派绘画，看了一次剧，演的是莫里哀的《贵族市侩》，又出城去皇村一次，至于尼夫斯基大街则是差不多天天经过的。当时不知道十月革命事迹，对于参观的地方没有什么感想。

从彼得格拉回到莫斯科来，春假已经完毕了，我们开始上课。课程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俄文，似乎没有其他的科目。我们在法国差不多都学过俄文字母和拼音，我自修了半本文法，但俄文教员从头教起。第一课解释本校的略字：K. Y. T. B. (K. U. T. V)。俄国革命后盛行略字，取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完全大写，每个字母后有一点（有时

无点),一看便知是略字,如“苏联共产党”叫做 К.П.С.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叫做 ЦИК СССР 之类(后来我们叫“国民党”做 К.М.Т.就是依照这个办法);或取每个字前二三个字母拼合成新字,有时不知是略字,去查字典,又查不出,如“共产主义青年团”叫做 КОМСОМОЛ,“共产国际”叫做 КОМИНТЕРН 之类(学校课程表把经济学写做 ПО ЛИТЭКОНОМ,历史唯物论写做 ИСТОМАТ)旧派的人常常摇头,认为这是破坏了俄文的完整。我们的大学的四个略字:К.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字母,У.是“大学”第一个字母,Т.是“劳动者”第一个字母,В.是“东方”第一个字母。俄文教员第一天纯用俄国语居然能使我们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但以后这俄文课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裨益。在某些人看来,功课教得太慢了,在另一些人看来,功课又教得太快了。至少我个人没有得到俄文课的益处。我们说话大部分从外国同学学来,看书则全凭自己研究文法,强记新字,不会自动研究的人,如陈九鼎,熊雄,即使细心听讲,仍是学不好的。

除了俄文课,我们都有翻译。当翻译的是李仲武,王一飞,任弼时,抱朴,有时罗觉,但很少,有时蒋光赤,更少,因为罗觉事忙,蒋光赤常住医院。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人从来未当过我们的翻译,因为他们上课时几乎自己需要翻译。先生说一段话,翻译就译给我们听,然后先生再说,然后翻译再译。如此上课,一个钟头只当得半个钟头,何况翻译自己未必句句了解,即使了解也未必句句忠实译出。教我们经济学的是个姑娘,教我们唯物史观的是个老太婆,她们把我们看做鞑靼学生或蒙古学生一般,只教些极粗浅的常识。有个犹太人叫做什么斯坦的,教我们国际工人运动史,用法文教,他们推举我当翻译。这个教员有些新的材料和见解,而我为了翻译原故更留心听,所以留给我更深的印象。可惜他在职工国际有职务,常常迟到,而且几个月之后就不来了。(我曾见一张照片,其中有列宁,有他,有西欧来的客人。)直到我回国为止,我们始终

未曾与其他民族的人混合上课，一来因为大多数人始终没有直接听讲能力，二来因为中国学生可以自成一班，我们十多人外，后来还有法国来的二三十人，以及中国新来的十几个人。

我们吃饭，穿衣，住房子，不待说都是学校供给的。吸烟的，还有烟草可领。此外每个月有一元五角新卢布零用钱，后来增加至三元。剪发，沐浴，洗衣都是学校供给的，零用钱无处可用，我全用去买书，有些人则用去买巧克力糖，每个月零用钱至多买二包或三包糖罢了。李仲武和彭泽湘常吃中国菜，他们身边藏有中国带来的钱，别人则不敢问津，我连中国菜馆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到后几日，延年同我说：“他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他是指饭食说的。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二人脱离家庭以后说的。他们在上海冬天还穿单衣，到法国后似乎始终自己烧饭吃，当然吃得很坏。我们则没有这两兄弟那般感觉。不错，饭食确比法国勤工俭学生一般食的好些，但初到时我们没有白面包，只有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我们久仰黑面包大名，现在是第一次识荆，勉强吃下去，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不通大便，一二个月后才习惯了。老同学说，这是最好的哩，他们初到时，黑面包里草料更多，菜更不好，而且每人配给一定的分量，不能吃饱。我们到的那年暑假以后，渐渐有白面包吃，第二年黑面包就绝迹了。不仅从吃的方面，而且从穿的方面，也可看出那几年苏联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第一年穿的是红军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红军尖帽子，而且每人衣服并不一律；第二年，我们就一律穿黑呢衫裤和大衣了，虽然是很粗的呢。初到时，街上还有旧卢布，票面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用新卢布，后来就通行“切尔沃涅兹”^①了。

有一件苦差使，就是厨房值日。除了罗觉外，彭述之也不能免。我们约三个星期轮值一次。早晨天未亮就须到厨房去，劈柴，

^① 苏联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流通的票面十卢布的纸币。——编者

削洋山芋,去堆栈搬面包,切面包,早午晚三餐穿起白衣服,摆设汤匙和洋瓷盘,分发汤和菜,陪着笑脸受人吆喝,服侍了七八批人之后,自己才能吃饭。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二个钟头。晚饭后直至十一点钟才能解放回去睡觉。

在娱乐方面,我们常有免费电影可看,有时也有戏票发给,看话剧或歌舞剧。春天在西郊麻雀山上游玩,据说拿破仑曾立在此山看莫斯科大火灾。

俄国民众对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有什么感想呢?抱朴曾在校外某医院养病,接触了许多小市民。据他说一般人怨恨我们这些外国学生,说是苏维埃政府把俄国人的钱,俄国人的面包,拿去供养外国学生,以致俄国发生了饥荒。

* * *

在东方大学中,中国学生自成一个单位。不错,日本学生,朝鲜学生,印度学生,土耳其学生,波斯学生,也是自相接近的,但那不过像北京或上海诸大学中广东同乡或云南同乡自相接近罢了。中国学生则有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章程,一国共产党员居住他国,就应当参加他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既然在莫斯科,就应当由中国组织证明和介绍,编入俄国组织,而不应当在俄国设立什么支部。“旅莫支部”是怎样存在的?它是合法的么?它得到俄国共产党承认么?——这些,我都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提出来问,也不敢提出来问。我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但不参加东大青年团支部。在外国同志看来,我们不过是一些同情分子罢了。赵世炎和熊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也与东大共产党支部无关。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是同情者,在中国人眼中,我们都是同志。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人,旧同学和新同学,平素接近的人和平素不接近的人,很巧妙地编在一处,每星期开一次或两次会,小组会议之外还有全体会议或其他性质的会议。每次开会常

常两个,三个,四个钟头,紧张,兴奋,热烈。有什么工作做呢?没有工作做。有什么学问研究呢?没有研究什么理论问题。开会时间大多数消磨在“个人批评”上面,所批评的并非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些抽象的心理形态,例如:你个性强,你骄傲,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被批评者也想出类似的批评以批评批评者。结果大家面红耳赤,心里种下仇恨种子。总之,大家学会了孔夫子写《春秋》的笔法:诛心;又学会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过不是用来责己,而是用来责人。

中国同学中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这种个人批评,是我到俄国后最认为新奇的事情,比俄国社会的和学校的生活更令我惊异,因为俄国生活无论如何新,我都是想像得到的,惟有那种关系和那种批评是出于我的想像能力以外。其他从法国来的或从中国新来的,是否有这个感想,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也许同我一样,会解释说这是俄国革命经验之一,应当学习,并带回中国去的。我们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赵世炎,王若飞,后来,尹宽,汪泽楷等人,在法国同生龙活虎一般,到此也不敢企图反抗威权。他们反抗张崧年,但不敢反抗罗觉和彭述之。不过我们这些新来的人究竟同旧时的群众不同,并非盲目服从的。

张伯简,现在名“混格混格”,是第一个反抗者。他常生病,常住医院,很少到学校来同我们一起上课。他反对罗觉,写了几封信骂罗觉,要罗觉答复。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未曾看见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问题。罗觉不回答他的信。罗觉说,打笔墨官司是中国知识分子恶习,他不愿学这恶习。萧子暉也曾反抗过,受了严厉的批评。世炎,延年都有自己的主张,晓得在服从之下贯彻自己的主张。我是最难于适应环境的,在小组会上受人批评最多,我接受了许多批评,但有两点我始终不接受。

第一点,是我多看书,多学俄文,少活动,少同人说话。我们未

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了。”我相信,学校当局如果允许的话,彭述之会提议废除一星期六点钟的俄文功课的。我们开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超过上课了,课堂学的又是极粗浅的常识,但人家还在希望减少上课时间和增加开会时间。人家以为你们只消读一本瞿秋白和王一飞合译的《政治常识》就够了。这本稿子抄了几份,给我们读。我虽然觉得这种主张不合理,却未曾公开反对,不过继续学我的俄文和看我的书,不理睬他们的劝告和批评。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做 professor(英语——教授)。

第二点,是我和抱朴的友谊。我们初到莫斯科时,原不晓得中国同学中间的人事关系,大家走来迎接我们,我是分不出谁是领袖,谁是群众,谁是当权,谁是在野的。陈九鼎从人丛中走出来,指我看一个人,说这是抱朴,懂得世界语。我走过去,问他“Ĉu vi parolas esperanton?”(您会讲世界语吗?)—“Jes”(会),他说。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他是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我是法国来的中国学生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后来我又觉得他比别的人多知道一点,又没有那些领袖的不可亲近的神气,也没有其他的人性命是从的态度。他住在女修道院。与蒋光赤和一个工人同志同房间。蒋光赤在医院医眼睛,我好久以后才看见。那个工人同志,则后来知道是派去监视他们二人的。我常到他那里去,一谈几个钟头;他常带我去游莫斯科城市,又带我会见莫斯科世界语学者:波拉可夫和尼克拉索夫,以及一位匈牙利亡命客,也是会说世界语的。我和他常去参加晚会,世界语的或非世界语的。那时世界语国际组织中新分裂一个团体,名 Sat(“全世界无民族协会”),里面有共产党员参加,同情于苏联。Sat 机关报主笔,新游苏联回去,写

了苏联游记,发表在杂志上,我从这杂志知道了好多事情。我曾与这位主笔通信(可惜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又介绍我与巴黎一个世界语工人通信。我和莫斯科世界语者说起这位主笔,他们说不久之前才招待了他,于是他们引我去参观他们的编辑部,印刷所。波拉可夫写文,尼克拉索夫写诗,自己排字,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个高级共产党员,也是世界语者,保护他们。这个人,我曾听他世界语演说,有官僚气,不如其他的人可亲。抱朴又认识一个外蒙古人,同外蒙古政府有关系的,我和他说世界语,抱朴则和他说俄语,因为他的世界语不很好。他常来学校找我们,后来问我北京政府的消息,我就渐渐同他疏远了。

不久,我就知道抱朴在旅莫支部中的地位,但我们的友谊毫不变更。人家警告我,开批评会时用侧面的话批评我,最后彭述之找我个人谈话,明白说出抱朴政治上危险的倾向,要我同他疏远。我拒绝了,我说抱朴是党员,我还是团员,我应当受他领导,如果他有错误,党组织为什么不先纠正他呢?几个月之后抱朴回国,旅莫支部宣布开除他。他回到上海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写文章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反驳他,两人打了很久的笔墨官司。在莫斯科时,这两个人本是好朋友。一九二五年,抱朴再到俄国,在中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里供职。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放出来,经过大门口收发处时,人家给我一封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面一个名秦涤青的人写给我的,说他正在设法营救我出狱。我从未听到这个名字,幸而后面有个附语,说他就是抱朴。这信,我撕碎在中央军人监狱门口了。

我和抱朴的友谊延迟了我从团员升为党员的时间。初到莫斯科时,十二人中似乎只有赵世炎和熊雄是党员。暑假以前,陈延年兄弟,王若飞,袁庆云先后升党。暑假在乡下,有一天罗觉笑嘻嘻走了来约我和余立亚同他去树林里玩,我不去,心里有点诧异。后

来余立亚告诉我,说这次罗觉是代表党组织同他谈话的,以后他就升为党员。我直至次年列宁死后才正式入党。其余的人或者与我同时,或者比我更后些。

* * *

一九二三年暑假,全校学生到乡下避暑,我们坐了一二个钟头火车,下车后又走了一二个钟头的路,才到东大的校产,——一个小村庄。我忘记了这村庄的名字,但记得有个地主邸宅在一个森林旁边,中间是客厅,两旁有四间或六间房子。离这邸宅四五百步处有一所二层楼屋子,上下都有七八个房间。中国学生都住在楼上。此外就是一些俄国特有的木屋,ИЭБА 我们每日有几个钟头做“体力劳动”,掘地,拔草,挑土等等。因是校产,那时大都种甜萝卜。饭食同城里差不多,但开始有白面包吃。

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这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某私立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马克思主义。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今日派”一分子。原来当时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北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出版了《今日》杂志,领袖是国会议员胡鄂公,以下则是一些日本留学生和北京官僚。《今日》杂志站在左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向导》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军阀御用的国会里当议员;胡鄂公则征引列宁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议会运动的话替自己辩护。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密使图谋调解,甚至请“今日派”派代表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大会。这种幕后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泽湘也许就是“今日派”的代表,与陈独秀同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我们到时,彭泽湘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产党,但在革命中未曾发生什么作用。

林可彝是第二个“今日派”来莫斯科的。学校当局叫他到乡下来,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在乡下先听了这个消息。彭述之赶紧

召集全体会议,商议如何对待这位非同寻常的中国同学。彭述之说:“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而我们是些无名小卒,他会看不起我们,应当用集体的力量去征服他。”于是分派了职务,例如哪几个人同他谈话,谈什么话之类。我是奉派同他谈话的少数人之一,因为他是福建人。我的使命是同他谈唯物史观问题,看他在这方面知道了什么,又问他关于“今日派”的情形。有个同志从我的房间调开,腾出一张空床给他。他来了,一个白面书生,典型的福州人。我以同乡的身份招待了他。同房间的人同他说“今天天气……”一类的话,我则有时将话题引到理论上去。谈了几次的话,我发现,关于唯物史观,他是一无所知的,至于经济学或其他学问则另外有人去做结论。说到“今日派”时,他干脆否认与这个团体有关系。

过了几个星期,彭述之向我们宣布介绍林可彝为青年团员(虽然那时他已过了二十三岁)。他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内,第一次参加小组会时,他承认,他不仅加入“今日派”,而且是那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之一。暑假后,他与我们一同上课。他使我联想到柳宗元一篇短文章:《黔之驴》。

一九二四年暑假中,他与我同路回国。他是不愿意回国的,奉了命令后提出许许多多反对理由,没有用,终于收拾行装同我们一道动身。到了赤塔,他向旅行团团长陈延年请求要同李仲武一路,坐中东铁路火车经过满洲里回国。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主张他须同我们一路经过海参崴回国,但延年允许了他。结果,李仲武回国了,他留在赤塔,后来到海参崴与抱朴鬼混,回国后在北京报上写文章反对苏联,一九二六年做中国代表到日本去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山大学当教授,写信给《向导》解释“误会”,同年秋天唐生智屠杀共产党员时候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拖去枪毙了。据说临死时,与他同受刑的一个中山大学学生还在嘲笑他。他到俄国来,简单是为了取得留学生资格的。

由林可彝很容易想到陈启修。陈启修也是北京的大学教授，也是日本留学生，也是来俄国研究学问的。他带了李大钊一封介绍信，到东大我们的寝室里来，向四方鞠躬行礼，问“哪一位是罗觉先生，哪一位是彭述之先生？”我们招待了他。他不来我们的大学读书，而是在外面租了房子，自己研究，但常到东大来玩，我们当中自然有人常到他的寓所去。在争取他的工作上，我没有奉到使命，因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四川人。不久，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入党以前呢，还在以后？——旅莫支部曾请他讲学，讲了五六次，题目是“中国经济”。每次讲后，彭述之都要上台去，用友谊的态度提出他的不同意见。我们未曾从这讲演得到什么，但彭述之却有机会向我们表示：他是能与北大名教授并驾齐驱的。陈启修回国后与中国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关系，知道的人很多，无需我在这里说了。

暑假将结束时，上城去的同学带了消息回来，说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主任代表姓蒋名什么，此外是沈玄庐，张太雷，此外还有一个姓黄的。熊雄说：“孙文手下姓蒋的人，莫非是蒋尊簋，那就很好，因为他欠了我三百元，我可以讨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我们回城去上课几日，就开欢迎会，欢迎这四个代表。会场就设在我们的寝室。一张长桌子旁边围坐着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人则坐在床上。沈玄庐生有胡子，很威严，我们在《新青年》上常读他的文章，此时他已退出中国共产党。张太雷，魁伟而漂亮，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黄登仁是个秘书一流人物，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主任代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白净面皮，中等身材，说一口不合标准的官话。他不是蒋尊簋，这使得熊雄失望。我们也失望，因为没有中国菜吃。他叫做蒋介石。这个名字不见经传。熊雄本是国民党军官，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开了会以后，我们议论：孙文为什么派一个无名的人当主任代表。有人猜想，真正的主任代表是沈玄庐，这个姓蒋的

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双十节,国庆日,代表团请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吃饭。代表团公馆是旧时某贵族的邸宅,虽小却很华丽。我们在大厅吃了丰盛的大菜。饭后余兴,沈玄庐舞剑,舞时剑脱了手落在地下,他拾起来舞完了一套。我们不敢笑出声。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蒋介石邀我们到大厅旁边一个小厅里去,向我们讲演国民党历史,结论是请我们加入国民党。他站着说话,一手扶着椅背,样子忠厚而懦弱。我们私议:孙文为什么派这样无用的人。

旅莫支部派定了几个人同代表团往来,去“争取”他们。这几个人内自然有罗觉和彭述之。为了“策略”,决定几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即以“国民党同志”资格同代表团往来。我不知哪几个人党。“争取”结果,已经退出共产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了。双十节以后,除了张太雷外,我未曾再见代表团人物,只听说他们的交涉不很顺利,姓蒋的发牢骚。几个星期后,他们就回国去了,张太雷留下来,住在 Hotel lux,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代表,我们常到那旅馆去看他。一九二五年春天,罗觉回国,在广东黄埔军官学校遇着蒋介石。罗觉到上海来,告诉我:“他一见我,就问我,‘病好了么?’他还记得我在莫斯科生病哩!”

张太雷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消息。彭述之召集全体会议,做报告。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李汉俊虽然有功于党,例如《共产党》杂志出版时没有钱,他把卖文所得来付印刷费之类,——但我们还是要反对他的。第一次,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内部斗争。但我们当中决没有人赞助反对派的,因为加入国民党是已经讨论过的,决定了的政策,而李汉俊个人对于我们又没有什么威权。

* * *

暑期后,西欧又有一批中国学生来到莫斯科,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了,有二十几人或三十几人,我认识的人几乎都来到:尹宽,李慰

衣,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二次大会时二个工人同志中的袁子贞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个工人同志名汤儒贤。从比利时来的有刘伯坚和李鹤龄,——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在比利时加入组织的。其他的人,我以前都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是马禹敷。他们同我们一样受旅莫支部“训练”,但尹宽,汪泽楷,薛世纶,照样学俄文和读理论书,不理睬领袖和群众的批评,可惜他们来得晚,至回国时俄文未曾学好,全靠法文来读理论书。

从法比两国来的人,经过德国时住在德国共产党员家里。此时是马克跌落最烈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跃跃欲试,我们在乡下已经听到城里来的人说德国就要爆发革命了。有人在红场听拉狄客演说德国状况,《真理报》和《新闻报》没有登载这演说。新来的中国同学说,他们在德国同志家里看见德国同志都在准备救护用的绷布和药品。我们紧张地读着每日报上德国来的消息。德勒斯登工人政府的成立和解体,汉堡的巷战。彭述之还买了一本学德文的书,而且学了几课德文。十月过后,关于德国的幻想完全消失了。以后渐渐听到俄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争论的消息。我们这个“斯大林大学”共产党支部,是莫斯科反“托洛茨基主义”最激烈的少数支部之一。有一次支部开大会,加明涅夫代表当权派出席,拉狄客代表反对派出席,发挥各自的立场,争论得很激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事后,听参加会议的中国同志说起双方辩难的话,这些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拉狄客说:“你,加明涅夫,俄国以外谁认识你呢?托洛茨基是全世界闻名的!”

我在法国的确不晓得加明涅夫。不错,列宁第二次病发时,《人道报》曾登载有三个人共同代理列宁的职务,三个人中有加明涅夫在内,但此外别无印象了。我不知道有斯大林。至于托洛茨基,则与列宁一般著名的,我对于他的印象比对于列宁更深刻些,因为读他的文章更多,更受感动。我读了他的《从十月革命至布勒斯特和会》(法文译本名《布尔塞维克党的登台》,中文译本名《俄国

革命记实》),又买了新出的法文本《一九〇五年》,但没有读。我在托洛茨基的论文和小册子里面感到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如此浓厚,为他人文字所未有的,除非列宁能胜过托洛茨基,但列宁没有发表意见。

那时莫斯科街上还悬挂大幅托洛茨基像,虽没有列宁像那么普遍,也不很少。东方大学近旁广场上,就挂了一幅。加明涅夫,斯大林,季诺维埃夫的像,我没有在街上见过。我那时正在读《法国革命史》,看见布里索,丹敦,罗伯斯庇尔,赫伯尔等人互相残杀,十分诧异,这是法国革命最初三四年间的事情。此时俄国革命已经六年了,我想决不会重演法国革命故事的,这次争论不久就可和平解决的,只要列宁病好,一切都没有问题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何等天真!

列宁的病始终不好。我在法国动身以前就从报上看见列宁病危的消息。我同人说:此次要去参加列宁葬礼了。暑假,在乡下,已经有人传说列宁病不会好;据说,布哈林在某处演说,说列宁脑组织已经破坏,即使不死也成白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时候,学校里纷纷传说:列宁于昨日死去了。不久就证实这个消息。管理洗濯的女同志,一个五十多岁老太婆,一面哭,一面告诉人她当初同列宁共同工作的经过。下午上街,街上早有大幅白布布告。学校当局派遣学生看守电话,非有正式许可书,谁也不许打电话。我也轮到了这件差使。不久,列宁遗体从乡下抬到城里来,陈列在全国总工会会所的大厅里。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都去瞻仰遗容。我们排成长队,等了许久,才得进入会所,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个门走出去。我看见大厅中央床架上停着列宁遗体,周围都是鲜花,只有脸露出来,同到处挂的像一样,同我初到巴黎时在光明书店买的相片一样,只是眼睛紧闭,面无血色罢了。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去送葬,那日最冷,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行列时走时停,几乎走了半日才能走到红场。有个农民装束的

人，一不小心，把冻僵的耳朵碰落了。

列宁下葬那日，红场上挂了大幅标语，大意说：列宁死了，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继续列宁的遗志。但列宁死了，俄国共产党只有更趋于分裂。即使群众能赞助反对派，政治警察，格别乌，仍然是操在当权派手里的。不知何时，袁庆云奉命做中国学生中的格别乌。上面机关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个新疆人张开运来东大读书，监视我们全体中国人。

我亲见了死的列宁，但也亲听了活的托洛茨基的讲演。这年四月间，东方大学开成立第三周年纪念会，共产党支部请了托洛茨基来讲演。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站在台上如同一只凶猛的狮子。此时我几乎可以完全听懂长篇演讲了。几日后校刊把演说印出来，我译成中文带回国，后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

布哈林也来东大讲演过。伏洛夫斯基在瑞士遇刺后，我在红场示威运动中看见鲁那查斯基演说。苏联宪法第二周年纪念日，我在郊外某地看见季诺维埃夫演说。五一示威和十一月七日示威，在红场阅兵台上看见斯大林及其他要人。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曾来东大中国班演说，他说的英语，赵世炎当翻译。

* * *

列宁死后几天，《真理报》发表孙文打来的电报，说国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为了列宁逝世停会三日致哀。

从此以后，我们更多注意中国了。中国出版物，我们一向按期收到的有党内的，及党外的重要日报和杂志。有一天，彭述之气愤愤地同我们说：我们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变成普通的无聊的空谈哲学文学的杂志了！原来，停刊了好久的《新青年》，于瞿秋白编辑之下改为季刊出版，已出一期和二期，第二期首先登载小说和文学批评。同时出版的内部刊物《党报》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应否存在》。彭述之也很生气，说党的存在也被人当做问题提出来讨论了。旅莫支部于是决定写文章供给中国刊物。我提议《新青年》

应出一期列宁专号，以纪念新逝世的世界革命领袖。他们赞成，随即分配了文章，并派我负责催稿和整理的工作。文章分配了，没有人动手写，我到了期限就去催迫他们，他们喊我“讨债人”。列宁号以前还要供给一点稿子。我译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辩证法的文章，尹宽也译了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世炎也写了一篇文章，寄回中国去。此时瞿秋白在广州，陈独秀把莫斯科寄来的稿子不分皂白都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了。在此以前，我为了常看《人道报》原故，曾假造一篇法国通信寄给《向导》发表。

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国工作开展，需要人。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前，东方大学中国同学有一批奉命回国去，其中有蒋光赤、萧子暲，尹宽，熊雄，张伯简。暑假，我们到另一个乡村避暑，那里也是东大的校产，离车站更近些，几幢木屋立在小树林中间。我们在那里受了军事训练。

张国焘在北京被捕，李大钊亡命来到莫斯科，不久王荷波，还有一个姓姚的工人同志也到了，他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的。

暑假未过完，我就奉了回国命令。同时回国的，有彭述之，陈延年，汪泽楷，薛世纶，李仲武，林可彝，于履中，蔡枝华，傅大庆，周兆秋，等等。这是中国代表团决定的。我的名字是彭述之提出来，他此时计划着去占领《新青年》编辑部，而我在列宁号准备工作中表现出不是完全无用的。

代表团除李大钊外都回国了，彭述之一人和他们同行。他们乘中东铁路车，由满洲里入中国境，这条路有相当危险性，但快得多；我们则先至海参崴，由那里乘船到上海，这条路毫无危险。

约在七月底，我们从莫斯科动身，乘车直达赤塔，由赤塔换车至海参崴，路上费了二十日左右，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延年是旅行团团长，我是会计，一路上负责下车去购买面包，香肠及其他冷菜，提开水的有另外的人负责。小站停车不久，大站则常停留二

三个钟头，在伊尔库次克甚至停了一天，我们下车来游了这世界上最冷的大城市，而且在贝加尔湖旁一个饭店吃了饭。

到海参崴来，没有船去上海，只好耐心等待。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住在沿海列宁街海员俱乐部里。这一个月生活并不寂寞。海员俱乐部图书馆有很多法文小说，此外，北京街还有一个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里面办事的是梁柏台和何今亮，这两人本是三年前去东大读书的学生，留在远东做工作的，都是浙江人。与他们同来俄国的，还有吴芳，湖南人，此时做远东华工劳动视察员，不常在海参崴；又有任作民，湖南人，则在伯力做工作。海参崴“五一俱乐部”还有一个王骏，北方铁路工人，曾当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会议，京汉路罢工失败后再到俄国来避难兼做工作。俱乐部要把我们几个人留下来在海参崴做工作，因为那里需要工作人员，他们请国内派人来又没有效果。我们临走时，国内终于派了一个人来，湖北人张子余，也是为了京汉罢工失败亡命上海的。

海参崴有许多华侨，都是北方人，他们聚居在一个区域，区域内有两个京戏舞台，几家菜馆，几处浴堂，商店则不可胜数。进了那个区域，完全同到了中国一般，以外的街道则保留着俄国风。王骏和梁何两人请我们去馆子吃饭，去浴堂洗浴，去戏院听戏，都得到殷勤的招待，而且都不花费钱。吃了饭，只消说一声：“挂我的账！”就够了。我问他们：“你们是一年三节付账的么？”他们说：“这账根本不需付的。”我起初很天真，以为俱乐部既是为中国工人和小商人谋利益的，这些劳动者自然爱戴俱乐部办事的人，不肯接受他们的钱。后来才知道不是这回事。中国人怕了又恨了这几个人。中国人本反对苏维埃政制，他们当中有好多是红胡子。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四个工人之一，名吕贤基的，一年前到海参崴来工作，恰于我们到后几日被人暗杀了。格别乌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但捕获不到。何今亮请延年和其他的人到凶手常去的中国茶馆喝茶，侦探消息，因为我们初到无人认识。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九月间,赵世炎和任弼时也从莫斯科来,他们住了几天就从海参崴坐车经过一面坡入东三省境内了。我们还在等船。到了一只船,载来了二三十个中国学生,都是到东大读书去的。其中有李求实,一个美少年,一九三一年在龙华枪毙的四个作家之一。

九月中旬,有一只英国煤船从海参崴开往上海,不载客,我们找船上中国水手想办法,他们只答应私载三四个人,于是分二批回国,汪泽楷,薛世纶及其他的人先走,我和延年及其他的人等待几日后俄国船开时再走。他们同做贼一般偷偷走了,我们则堂皇住在船上做俱乐部用的厅堂里,睡的是沙发。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到了上海。

薛世纶来泰安栈看我们。他已派了工作,做中央主席团秘书;汪泽楷已经到安源去做工作。薛世纶以秘书资格通知我们新派的职务。延年去广东当区委书记,我留在上海,在中央宣传部里做事情。第二日,我们人和行李都搬到慕尔鸣路一个弄堂房子来。

五卅前后

我来到上海时正值齐卢战争，马路上张贴着工部局戒严布告。卢永祥处于不利形势，战争渐渐逼近上海了。但租界内平安无事。

慕尔鸣路房子两楼两底，厢房沿马路，且有一个过街楼，从楼上前厢房通出去横过弄堂。彭述之就住在这过街楼内。楼上厢房空着，中间放一张大方桌，桌子旁边几把不整齐的椅子，靠过街楼方面有—张空床，现在我的铺盖就摊在这空床上面。后厢房是瞿秋白的寝室，他的爱人死去不久，现在是鳏居。客堂楼住着蔡和森夫妇。楼下客堂间住着李隆郅夫妇。张太雷的母亲，老婆和孩子则占据楼下全厢房。亭子间住着两个娘姨，一个是服侍瞿秋白的；另一个，龙嫂，是毛泽东从湖南带来，现在替我们烧饭。我们在李隆郅房间里吃饭，吃饭时总看见李—纯凸着大肚子睡在床上。客堂间不会客，客人来都到楼上厢房。我的床边那张大桌子除了会客以外，还可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又能做我个人的工作台子。这个屋子没有电灯，我们夜里都点火油灯。

李隆郅同延年握手，同我握手。我们在法国都会过—面。他是湖南醴陵人，高大，强壮，皮色颇白，声音洪亮，眼睛炯炯有光，嘴唇肥厚而红润。我已经说过他在法国的事情。驱逐回国后，他在江西安源煤矿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后来到汉口，正当京汉铁路罢工时候或以后，他几乎被捕；现在上海与项德隆二人共同负责工人运动工作。和我们同来的蔡枝华当日就由他带去住在小沙渡一个工人俱乐部里。

下午，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

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没有人同我们介绍。他看见新来一个“小孩子”,在会客用的大桌子上校对《向导》周报。我则知道他是瞿秋白,北京俄文专修馆高材生,五四运动中与郑振铎,耿济之同办《曙光》杂志,后来当《晨报》记者,由《晨报》派到俄国去采访新闻,在俄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做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翻译,著有《赤潮集》和《赤都心史》;回国后编辑《新青年》季刊,是我们的理论家,现在上海大学当社会学系主任。后来好久,我才知道他那时是很不得意的。他才从广东被中央严令召回上海来,因为他在鲍罗廷指挥之下代表共产党中央做种种活动,而中央并不同意这种种活动。

蔡和森正在发老毛病——气喘。他睡在床上,一个白衣黑裙旧派女学生模样的人端饭给他吃,进出都经过通厢房的侧门。这个女学生并不注意厢房空床上已有被,大桌子上也有人工作。我知道她是向警予。第二日或第三日,有一位客人来访,龙嫂送上名片,“林祖涵”。向警予请客人就在我工作的桌子旁边坐下来,不久客堂楼走出了一个小而瘦的人,一面喘着气,一面很起劲地同客人谈话。他的话比客人说得更多些。最后客人默然了,随即告辞。恰巧张伯简来拿校样或其他事情,便问起和森——因为这就是蔡和森——关于客人的情形。和森好像话还未曾说够一般,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说:“这是一个中派,”云云。我核对了《向导》之后,已经知道他把当时国民党分为三派:反对共产党的人属于右派,赞成《向导》主张的人属于左派,二者之间都是中派。他说孙文自己就是中派。其实当时林祖涵已经加入共产党(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蔡和森还不认他是真正的同志罢了。

这个人是蔡和森,颇出我意外。在我的想像中,他是囚首垢面而谈马克思主义的新王安石。那日看见,他脸是洗过了,头发也不很长,显然是乡下秀才的装束,与洋场才子瞿秋白相反。

蔡和森是《向导》周报总编辑,在机关意义上说,他就是我和张

伯简两人的“顶头上司”。我担任校对和搜集材料；张伯简管理印刷和发行，我来到前校对也是他。他另租房子居住。这个云南人带有几分四川人性格，他那时成了我的密友，我们相互倾吐对人对事的意见。他比我先到上海二个多月，告诉我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他说慕尔鸣路房子是有名的布尔塞维克机关，反动派很注意。

开主席团会议，陈独秀来了，王荷波来了，林育南来了，蔡和森从客堂楼侧门走出来，彭述之从过街楼走出来，他们占据了我的工作桌子，我自动回避到瞿秋白的房间去。瞿秋白不在家时多。陈独秀，王荷波，蔡和森是主席团委员，林育南代表青年团出席主席团会议。彭述之以什么资格参加这个会议呢？他是国际派来的，以未来的中央委员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袁庆云也是画家，他曾根据照相画了一幅陈独秀像，装了镜框，挂在我们东方大学寝室内。现在我觉得他画得很像，虽然真的陈独秀比画的陈独秀更苍老些。此时，陈独秀不过四十多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白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常带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这是全国革命的青年人所奉为导师的，又是道学先生所深恶痛绝的。关于他，当时已有许许多多神话和传说了。我现在亲眼看见了他，亲耳听了他说话。这个人：我第一次识了他的姓名，读了他的文章时，便写长篇日记骂他，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后来渐渐觉得他的话都有道理，现在竟在他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了。

* * *

一九二四年秋天，大家都觉得中国是在一个革命或一个大运动前夜，至少我和我所接近的人有这个感觉。一方面，从袁世凯传下来的北洋军阀统治已经衰落，分裂，眼看不能支持下去了；他方面出现了中国前古未有的一种新势力：近代无产阶级。经济性质

的群众罢工久已存在了；至迟从五四起，我们看见了政治性质的群众罢工：上海工人罢工为了援助北京学生的运动和要求。一九二二年有香港海员大罢工，终于迫得英国帝国主义屈服。一九二三年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受了屠杀，却不使整个工人阶级气馁，反而激发了热情。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且领导全国一般民众的斗争，而且参加和发动民族的民主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斗争和共产党活动前面，一般的中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对于北洋军阀统治的畏惧渐渐消失了，渐渐敢起来反抗，渐渐寻求一个出路。这些中间阶级的觉醒就表现在国民党改组上面。改组以前，国民党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辛亥前后那个革命的组织，久已因革命失败和党员背叛而趋于瓦解了。有孙文和他的几个亲信人，有模糊的民主政纲和淡漠的革命回忆，但没有国民党。苏联无产阶级的经验，金钱和军火，以及中国共产党员的努力，才在“国民党”这个旧而空的招牌下制造了一个新党，一个模拟俄国布尔塞维克组织的党。一九二四年一月间，这个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中国才有国民党组织；中央设在广州，各地有省党部，市党部，县党部，区分部等。中央执监委员会中，共产党员虽占据小半数，但重大决议都是出于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手。各地方党部则几乎完全操在共产党员手里，——除了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些所谓“右派分子”能与共产党员抗衡。除了国民党改组以外，广州黄埔还设立一个军官学校，经费是苏联的，枪械是苏联的，重要教官是苏联的，但校长是中国人蒋介石，新从欧洲回来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也派在那里工作。

“二七”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走上“国民革命”道路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是五四运动的产物。爱国的，反封建礼教的，改革文字的，提倡科学和民主的运动，于短期间后就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运动。北大教授陈独秀和李大

钊从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北大学生领袖中极左倾的分子,张国焘,邓仲澂,范鸿劼,高尚德,罗章龙,等等则从爱国运动走到劳动运动。北京没有工厂,他们只好走出城外去组织铁路工人。长辛店车站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由此出发,工作普遍于北方几条铁路。北方的劳动运动本是处女地。但南方,工作则没有那般顺利,他们在劳动运动中遇着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党”遗下的人物,或者未改组前的国民党员走到工人运动去的。这些人挂些工会或工团招牌,但没有群众。在广东,则有近于旧式行会的工人组织,在“机器工会”领导底下,这是群众组织,但抵抗共产主义的侵入。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当然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旗帜的。当时,国民党并不存在,共产党领袖和群众又很看不起那些残留的国民党人物,连孙文在内。他们视这些人物为落伍者,为前时代人物,而他们是向前走了一大步的。当时若有人说,中国必须先经过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必须先复活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其中,去领导这个革命的组织,——我想,他们一定会认为胡说的吧?总之,第一次大会时是没有人这般主张的。后来,提出这个主张的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荷兰共产党党员马林,他当时一方面奉了第三国际命令指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他一方面奉了苏联外交部命令同中国民主派领袖联络。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应加入孙文经他劝告而图谋复活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出通告,要党支部和团支部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了。第三次大会中,马林要求正式议决这个路线。他遭遇反对。反对的,不仅有李汉俊、而且有张国焘,甚至陈独秀。最后,马林拿出了第三国际命令。十多年后有一位历史学家到荷兰去问马林,关于这件事情,马林否认他曾以第三国际权威强迫中国共产党接受这个路线。但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

那样的政府，因之需要第三国际及其中国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的存在，——则是不可否认的。至于从中国革命，以及从世界革命观点来看，是否有另一种路线值得采取，则没有人提出，因为当时都是一致认为：苏维埃外交利益就是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利益。可是，事实上，恰恰从那几年起，苏维埃外交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开始分离了。

我初回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这个进化，——或宁可说退化。“二七”失败以后，劳动运动暂时消沉，张国焘表示消极，不久就被捕入狱；反对加入国民党最烈的人李汉俊退出共产党。国际路线通过了，党内意见一致了，整个工作都朝这个方向进行。《向导》周报本是中国共产党专为“国民革命”运动而创办的刊物，现在就成为正式党报了。我在法国已经经过了这一个“进化”，回国后对于国民革命和加入国民党路线已经视为当然的路线，虽然内心深处保持着疑惑，——因为我是研究了世界一般发展走到生产主义的，而不是研究了中国特殊发展走到共产主义的。

在上海，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共产派（或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环龙路四十四号党部机关有左右两派斗争。我未到上海前，右派人物在那里殴打了邵力子，他们本以为邵力子是国民党老同志，至此才知道他也加入了共产党。《民国日报》两个主笔，叶楚傖是右派，邵力子是左派，这两个人本是老朋友，但受了本派指挥，互相斗争；编辑中，张太雷，沈泽民是左派，陈德征等是右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挂虚名，他本人同情左派；总务主任邓中夏（即仲澐），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教授施存统，张太雷，恽代英，彭述之，蒋光赤等是左派；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同情左派，但英文学系主任何世桢则是右派。各机关斗争，左派都占上风，因为右派是些旧人物，本身还没有团结，没有一个中心领导机关，重要的，又没有群众。他们气愤极了，只好用殴打手段。我未到上海前，他们已经打了邵力子；我到上海十几日，他们就打死上海大学学生黄

仁。这日是双十节，上海天后宫开纪念会，主席是喻育之，秘书或其他职务是童理璋，都是国民党右派。台下，上海大学学生提出一个什么意见，童理璋喊打，于是有手臂刺花的大汉多人打伤了十几个上大学生，当日伤重死了一个四川人黄仁。中央主席团恰巧在我的工作桌子上开会，陈独秀尚未来。一个人怒气冲天跑了来，报告天后宫打架事情。这人是施存统。

黄仁案发，左派反攻，《民国日报》赶走了叶楚伦，上海大学赶走了何世桢。何世桢把英文学系学生带走，另办持志大学，但以瞿秋白也离开上海大学为条件。瞿秋白离开了，不久邓中夏也离开了。总务主任换了韩觉民，共产党员；英文学系主任换了周越然，中立分子；社会学系主任换了施存统。上海大学学生说，瞿秋白去职，也是存统在背后捣鬼的，因为存统想做主任。我那时虽然编入上海大学支部，但不知这捣鬼详情。环龙路机关的斗争也是左派胜利的，但我也不知道详情。

工人运动中也有斗争，但那不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进行的。共产党拿自己旗帜做工人运动。上海本有“工团联合会”，是个空机关。我们本想占取这个机关，但不能够，于是专在工厂群众做工作。负责的是李隆邳和项德隆，一个湖南人和一个湖北人，一个管沪西，一个管沪东。南洋烟草公司罢工，虽然失败，我们却争取了群众。以后工作就逐渐开展，几乎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了。从此，另一派的工人运动家就失去了与我们竞争的能力。

* * *

黄仁案发生，斗争激烈之后，为了防备危险，《向导》编辑部便迁出慕尔鸣路房子，到民厚南里（哈同路）来。这是张伯简找的房子，房租很贵，两个统楼每月四十元。二房东是两代寡妇，住在蔡和森夫妇楼下；我和彭述之住在另一间统楼，楼下是其他的房客；龙嫂替我们烧饭，毛泽东回湖南去，把她留下来给向警予。张伯简也搬到民厚南里来，但在前面隔二条弄堂一个亭子间内。当时，民

厚里很有名,叫黄包车时,无需说什么路,只说民厚里,大多可以拉到。新出的《醒狮》周报及其主笔曾琦也在那里,幸而我未曾遇见他。张伯简说,民厚里住的人很复杂,尤多官僚政客,因为朝西去再没有弄堂式房子了,朝东也需到西摩路才有弄堂式房子,周围很远都是大洋房或空地。上海大学在西摩路,所以民厚里住了好多上大学生,我们常听见人唱国际歌。

中央开会,我后来并不回避,但搬家后,中央在另一个地方开会,起初在威海卫路一个柴炭行楼上,后来在闸北广东街,那里是秘书处,秘书兼会计,起初是薛世纶,后来是任作民。全党经费那时每月九百多元,北京和广东两地是否在内,我不知道,但其他各地则都在内的。独秀,和森,述之,每月领四十元;张伯简,向警予和我,每月领三十元。伙食自理,每月约摊六元至十元。工作虽不很忙,也不很闲。我的校对工作,除《向导》外还有《新青年》,以及临时性的小册子,如第四次大会宣言及议决案之类。至于搜集材料,则是购买和储藏经济类的杂志,如《银行周刊》,《钱业公报》,历年海关报告之类,不仅买新出的,而且买旧出的,往往买五六年出版的全套杂志,这些东西始终没有人去翻阅和利用。此外就是剪贴报纸。

我在《向导》写文章,起初是以“马道甫”名字假冒读者来信,后来用真名写些关于小问题的文章,五卅运动起写些记事性质的文章,有时写些国际问题的文章,此外翻译外国人的文章。不错,我到上海后,读者来信,除了二封以外,都是我回答的。“寸铁”本是独秀包办,但我也曾写了几条。《向导》不登理论文章,政治文章轮不到我写。《新青年》里,我翻译的文章不少,自己写的则带着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意味。倒是《中国青年》上有几篇文章,是我用力作的,署名则连。

《向导》的灵魂是蔡和森,每期都是以他的文章为中心。独秀文章写得很短,很随便,有点近于敷衍塞责,倒是他一人包办的“寸

铁”(三五十个字的短文)含有精彩的文字。

彭述之如愿从瞿秋白手里夺得了《新青年》。我们搬家以后就付印了一期：“国民革命号”(季刊第四期)。那里面主要的是从莫斯科带回的一篇长文章：《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这篇文章后来成了瞿秋白的小册子《反彭述之主义》攻击的对象，以后还有机会说到它。暂时只说张崧年对于这期杂志的感想。张崧年写信给陈独秀抗议新出的《新青年》文字庸俗。他举出首页一篇启事为证。这是预告本杂志将由季刊恢复月刊的，用半文言写，其中有什么受人“爱戴”一类的话。张崧年是旧《新青年》的健将之一，他很注意文字格调，他认为《新青年》本是白话文的模范，不应当用文言写启事，即使用文言也应当用好的文言。不用说，这篇启事自然是出于新主笔的手笔。月刊第一号是“列宁号”，其中大部分稿子是我们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以后彭述之就病了，二三四诸号是秋白和我两人杂凑出版。

内部刊物之外，我曾在《民国日报》付刊《觉悟》上写文章，又曾与上海法文日报记者笔战，关于孙文过沪事情。我写过几封法文信去，都登载了。

* * *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①

会场设在闸北广东街背后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开了三日或四日会议，未曾发生什么意外。

统楼改成的课堂几乎坐满了，但我不记得究竟有几个人。确

^① 此处时间有误：大会系十一日开幕，二十二日闭幕。——作者新注

实记得参加会议的，中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湖南代表：李维汉，朱锦棠；湖北代表：陈潭秋；广东代表：杨殷；北方代表：高尚德；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法国代表：周恩来；山东代表：尹宽；S.Y. 代表：张太雷。上海代表不记得是谁。李启汉也参加大会，不记得代表什么。张国焘有信来向大会致敬，本人则未到会。旁听一次或二次的，有张崧年夫妇，沈玄庐夫妇，黄平。张伯简和我当大会记录，他只记了一二场，其余都是我记的。记录稿子，后来未曾整理出来。莫斯科支部代表彭述之兼任大会秘书长。

国际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来了一次，瞿秋白翻译他的演说。政治议决案以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由秋白译成中文的。在理论问题上和政治问题上，大会简单接受国际的训令，中央委员没有不同意见，各地代表也没有不同意见，开会经过如此平静，好像举行一种典礼，一种仪式，以至我这个记录员，记录了全大会十分之八九的发言，也没有保留深刻的印象。但在枝节方面，我倒记得几件事情，而且记得很清楚。第一，张崧年以旁听人资格，曾起立发言，其中有几句涉及加入国民党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次大会是争论中心，此次则除了张崧年以外没有人提起了。我们认为这是久已解决的问题，并不感觉兴趣，何况提出的是张崧年，又何况张崧年在大会上本无发言权。但瞿秋白还是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是最适宜于回答此问题的人，因为他是最拥护这个路线的。他回答的理由本是我们所熟知的，他又举出实例来证明。有一个实例，我至今还记得，即他说：“譬如我们要刻一个图章，内有共产党或其他字样，在上海就不能拿到刻字店去刻，在广州就不成问题了。由此可见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第二，国际代表提出了反对托洛茨基的议决案，要大会通过。其他的议决案，都是以前起草好，油印发给代表的，惟有这个议决案是临时提出，由主席(不记得是谁)朗读一遍后，征求有无异议。会场中人自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争论，虽然不知道争论的内容。我经常读法文《国际通讯》，其中

已有连篇累牍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文字。因为苏联党内问题此时公开到国际上来了,各国共产党都有正式议决案送到第三国际来,表示“反托”态度,中国共产党自然也要表示态度,虽然大会代表没有几个知道这争论的意义。草案宣读以后,隔了好久没有人说话,最后彭述之站起来说了一篇话,不外是托洛茨基有这点或那点错误应当反对之类。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当时代表们有什么感想,我不知道。后来,北方区开除张崧年前派人去谈话时,张崧年曾表示他对团体有几点不满意,其中一点是说:“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领袖,现在我们反对他!”他这话,也许是指后来《新青年》译载季诺维埃夫,斯大林等人文章说的,也许是指大会这个议决案说的,不过他在大会上并未曾替托洛茨基辩护。第三是张太雷和小地方代表的冲突。张太雷是漂亮人物,各地来的代表则未免有些土气。他常拿他们当作开玩笑的对象,替他们取绰号。这些绰号都很确切。例如他称李维汉做“实力派”。李维汉是大会中引人注意的代表。大会虽没有理论的或政治的争论,但小的事务性的争论是有的。每遇争论时,李维汉先不说话,到最后才起来斩钉截铁说几句话,他的话都有决定问题的意义。是为了他有判断力,能说话呢?还是为了他背后有群众?张太雷认为李维汉的话有重量,只是因为背后有群众。但李维汉厌恶这个“实力派”绰号。第四,杨殷在上海被广东同乡殴打成伤,大概是为了广州两派工会冲突问题。最后一日,他才包了头来参加大会。

最后一日,大会选出九个中央委员,四个候补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其他一个记不起来。候补的,只记得王荷波和朱锦棠。常住上海的五个人成立“主席团”: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从四次大会到五次大会差不多两年半中间,全体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二三次会议。那次革命如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五人主席团领导的。

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是中国的不断革命的活的化身，象征着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迅速过程。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从学生群众走向工人群众的先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持人，多次罢工的领导者，为革命工作被捕至曹吴倒台才释放出来。这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

蔡和森是旅法勤工俭学生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勤工俭学生运动，倡导了旅法共产主义组织，因里大运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他也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虽然他的群众性质和范围都与张国焘的群众不同。

瞿秋白是五四文化运动参加者，北京名记者，聪明，博学，在学生群众中有地位。他现在成为共产党领袖，固然是由于他的历史和他的能力，但也有一部分由于他接近国际的和俄国的同志。

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在上海，这五个人我几乎天天见面（张国焘于大会开后许久才来上海）。主席团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陈独秀的意见具有决定性，开会很少争吵，但现在想来，在表面的一致之下早已埋藏分歧意见了。

总书记底下有个秘书处，起初只有一个人，任作民，会计兼秘书；后来特意调了王若飞来，另成立秘书处，同会计处分开。王若飞手下还有二三个技术人员，管理秘密通信，文件保管，油印之类。组织部长是陈独秀兼任，但始终未成立组织部。一九二六年底或

一九二七年初，调周恩来来负组织部责任，虽然周恩来不是中央委员。但周恩来忙于别的更实际事情去了。宣传部是四次大会前就设立的，部长是彭述之，名义上我是宣传部秘书，但只管《向导》，《新青年》，丛书，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宣传工作。后来，在武汉，我才从米夫老婆学得一点宣传工作；在上海时，不仅我不懂得什么宣传工作，连部长自己也不懂得。此外部长上任不久，就害了一场大病，住了八个月医院，才出来工作。工农部，张国焘负责，事实上是招待各地工会工作同志的机关。妇女部，则有一时装在瞿秋白爱人杨之华皮包里，有一时装在彭述之爱人陈碧兰皮包里。

青年团则有独立的生活。党第四次大会后，团也开大会，改“社会主义的”为“共产主义的”，从此称 C.Y.，不称 S.Y. 了。张太雷做了青年团书记。但不久就撤换别人，如任弼时，贺昌，刘昌群，陆定一等。刘仁静也在青年团编辑《中国青年》。团内生活，我很隔膜，但这些负责人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常到他们那里去，谈电影，谈小说，谈女人，好像中学时代的朋友。

第四次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工作发展很快。一九二四年春，我正式加入共产党时，国内外党员共三百余人，旅莫支部就占十分之一。大会统计，则有九百余人。到第五次大会时号称十几万。第四次大会前后，党内重要职务几乎都给莫斯科回来的，尤其从法国经过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占据了。在中央，彭述之坐等当选为中央委员。赵世炎负北方责任，陈延年负广东责任，尹宽在山东，王若飞在河南，不久罗觉占据上海，湖南李维汉本是法国回来的同志。湖北也有旅莫支部的人，但不起作用。其他小地方负责的，如汪泽楷在安源，高风在保定，李慰农在青岛之类，更多。这批同志从外国回来后，国内的同志纷纷退让了。此时有了“旅莫支部派”或“莫斯科派”名称，好像党内一个派别，支配了其余各派。

其实，我们未回国前，党内本没有多少干部。重要的是张国焘一个系统，那是从北京出发做北方几条铁路运动的同志。张国焘

之下有罗章龙,李震瀛,张坤弟,吴雨铭,等等。这些人为了过去工作关系,无形中成为一种派系,有时的确与莫斯科回来的人成对抗形势。南方做劳动运动者,为了没有北方那种成绩,并未形成什么派系。李隆郅,刘少奇,陆沉等,曾在安源做过工会和俱乐部工作的,相互间有些联系。此外,就是广东,北京,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方核心,他们是欢迎莫斯科回来同志的。

机器装置好了,等待原料来生产。此时,原料恰好成熟了,可以多量供给这机器。

* * *

我初回国时恰值江浙战争,卢永祥是孙文的同盟者,战争失利,放弃了杭州,退保上海,不久连上海也不保了;北方奉军也处于不利的形势。我们正担心,直系军阀全胜下的政治局势会窒息了革命胚胎。可是,上海战争停止之后不过几日,霹雳一声,直系军阀倒台了。总统曹锟被囚,吴佩孚出走。推翻他们的,是本系的军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这变化如此突兀,如此出人意外,以致蔡和森昏迷了头脑。他在《向导》上攻击美国帝国主义阴谋独占中国,因为他指冯玉祥此次倒戈是美国帝国主义指使的。邵力子同志走来抗议,说冯玉祥并非受美国指使,而这政变是有利于革命,我们不应当攻击。和森气愤愤地说:“力子同志难道以为中国军阀背后能够没有帝国主义支配么?”冯玉祥此次行动究竟是独立的,还是受外国势力支配的,二十年后,至今还不清楚。但《向导》不久就抛弃了蔡和森的立场,则是确定的事实。从北京来的报告,从广东来的报告,以及从上海苏联领事馆或伍廷康方面来的消息,都不能支持蔡和森的立场。不久孙文离开广东,经过上海和日本到北京去了。他发出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一九二五年春初,他死在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和追悼孙文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是共产党员领导的。这两次普遍全国的群众运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增加了共产党的党员。

但这是国民运动,是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做的工作。

在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则拿出真面目来。“二七”失败后两年,工人运动复兴了。此次不是交通工人的运动,而是大城市工厂工人的运动,首先是上海纱厂工人的运动。这是李隆邳和项德隆辛苦经营的成果:沪东和沪西两个俱乐部都发生了作用。俱乐部吸引了在工厂的工人;罢工发生,受俱乐部影响的工人立即起了作用,我们则在这些工人的背后指挥着。资本家凭过去经验,以为坚持二三日,工人会屈服的,可是不,工人能够支持下去,虽无工会和储备金,仍能支持很久很久。最后,资本家只好屈服,同罢工工人代表谈判,承认了条件,签了字。工人提出的条件并不忘记“承认工会”一条。资本家,外国的和中国的,都很诧异:工人哪里来的钱维持罢工期间的的生活,又从哪里学得这些斗争方法,而且各厂工人用的方法大体是一样的。工人得到了胜利,都很高兴,不仅高兴他们的条件得到厂方承认,而且高兴他们有力量,有方法,能使厂方屈服。更进步的工人就加入了共产党。与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同时,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是更有助于共产党发展的。此时,上海最大的罢工是小沙渡日商内外棉纱厂。

我没有直接参加这两种群众运动。各团体代表开大会时,我常以无名的观察者资格去旁听。有一次,我,蒋光赤,沈泽民三人组成一个宣传队,向国民会议促成会机关领了纸旗和传单,在西门附近马路上向行人演说。一群野孩子跟在我们背后跑,索取传单去包糖和花生米。潭子湾开追悼顾正红大会时,我同初回国的王若飞也去“观察”一下,可是几乎出了乱子。我们两人都穿西装,一到会场,就引起人注意,几个工人跟着我们,严密监视着。荒场上有无数的人,当中搭一个台,李隆邳穿的衣服同台上和台下工人一样:蓝布短衫裤。刘华在演说。监视的人中出来了两个,叫我们跟他们到人群外空地,问我们是什么人,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我们两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一个麻皮青年说:“那么你认识台上演

说的是谁吗？”我说：“他是我们的同学：刘华。”我为祛除他们的疑惑，又说：“你看，那是李成，他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两个人似乎释然了。不久，隆郅（李成）从台上下来，找我们到旁边一个房子去，那是工会办事处，他要我们回去报告几件事情。

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自己。每有重大的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同开会议决定的。常开会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深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至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

每次大罢工或大运动结束后，无论胜利或失败，上海区委（五次大会前，区委比省委更大，上海区委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的组织，至于后来的区委，则是市委下的一部分，如沪东区，法南区之类）都要召集一次全体会议来检讨。会场设在横浜桥近旁中国地界一个小学内。这是名副其实的全体会议，即凡属党员都须到会，但也不过坐满一个大课堂罢了。我当了几次记录。独秀做政治报告，区委书记庄文恭做工作报告，他或别的人做关于运动或罢工的报告。有时宣布处罚或开除某某同志。有一次秋白做理论报告，讲世界共产主义史，从柏拉图共和国讲起。各人报告完毕后，同志间有提出问题或发表意见的。我记得，有一次邵力子气愤愤地站起来抗议我们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员。我不记得人家怎样回答他。我们虽没有正式决议不许国民党员参加工人运动，事实上上海工人运动是完完全全在共产党手里的。是国民党员自己不来呢，还是我们拒绝他们参加？——则我不知道。

区委书记韩白骅，浙江人，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曾去莫斯科读书，不久就回国；《向导》初办时，他是发行人，“二七”失败之后，在上海被捕，坐了几个月监狱才保出来，现在改名庄文恭。一个小学

教员模样的人，忠实，努力，但无大才，五卅以后工作开展，他不能应付，遂被撤换。

* * *

一个大运动或革命，往往会出人意外地爆发的。中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就是这样出人意外地爆发起来的。这话并不是说，革命本身是出人意外的。恰好相反，我们早知道中国不久就要爆发一个大运动。我曾对张伯简说：“辛亥革命八年之后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至今也过去不少时间了，应当来一个什么运动才对。”我这话当然不是出于时间理由，而是根据种种潜伏的因素的。但这革命恰恰爆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而且以那种形式爆发，则是没有一个人料想到的。

我丝毫不知道五月三十日的准备。这日早饭后，蔡和森告诉我：“超麟，你没有事情可以到热闹马路看看，今天各学校学生要到租界里宣传。”我立刻穿了衣服出去。蔡和森虽没有说，我已经明白这是我们的中央决议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我们手中，上海学生联合会也在我们手中，许多学校有 C. Y. 支部，各学校的国民党区分部差不多都可由我们指挥。我们已经动员几次学生上街宣传了，如国民会议事件，孙文逝世事件，援助罢工事件。但那是在中国地界街上。我们召集了几次群众大会，而且游行示威，但那是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我们尚未曾在租界范围内演讲，开大会和示威哩。上海大学学生有一次排队，举着标语，到浜北中国地界去参加追悼会，路过戈登路巡捕房时，被干涉，且有四个学生被捕。我同张伯简说：“我们何时能在跑马厅开群众大会！”

在租界讲演，无论如何是件新的事情。我一个人到大马路来，没有看见什么；从大马路弯到四马路去，也没有看见什么；直至棋盘街交通路口，才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学生站在凳子上演讲，一个印度巡捕正在干涉他，要他到巡捕房去。从过路人口里知道这种事情今天发生很多次了，他们说大马路也有。我再转到大马路去，在

日升楼遇着俞秀松，他说下午三点钟要在新衙门示威。我们二人于是走到北浙江路会审公堂去，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又慢慢地踱回大马路来；可是走到先施公司附近，看见人特别多，都很紧张，到处说着：刚才老闸捕房门口开了枪，打死好多学生。我们赶紧到老闸捕房门口去，——不是现在的门口，而是在大马路上，现在开钟表店的地方。那里已经没有群众聚集了，地下有些血迹，尸首都车走了。我同俞秀松分了手，一个人在马路上走，一面想：又有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材料了。我走到北火车站来，在去吴淞的小火车站那里看见一群学生互相谈说刚才的屠杀经过。他们是耳闻和目见的。我才知道，马路演讲的学生被捕多名，都在老闸捕房里，其他的学生涌到门口来要求释放，过路的人也停下脚步，看热闹或跟着叫喊，人数越聚越多。一个外国三道头下命令叫巡捕向人群开枪。由此造成了惨案。

后来知道，死的大多数是看热闹的市民，学生很少，但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死了。

我回去，将采访所得结合次日报纸新闻，写了一篇惨案记事，发表在次期《向导》上，后来华岗写他的大革命史时就把我的记事完全抄录了。

这次惨案发生得很凑巧，恰好触发了积聚下来的火药。并非惨案能爆发革命。比此次更惨的案，历史上还多呢，但并未爆发革命。革命能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屠杀而爆发，一者因为此时上海资产阶级对租界当局赌气，资产阶级成了反对派，提出种种要求。原来在外国资本卵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此时已积累了相当财富，要求独立，或多享一点剥削权了。他们看见在共产党主持下的国民运动扩大了，看见上海外国工厂工人罢工大都得到胜利，于是敢于抬起头来。屠杀前几天，中文报纸纷纷反抗工部局董事会新增的巡捕捐和新颁的印刷附律，又要求华人加入董事会。那时商人有新的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与官式的总商会并

立,而且比总商会左倾。这个组织与国民党老同志有关系,共产党并不能指挥他们。惨案发生,这个组织的人很愤慨,他们也是反映店员的情绪。他们答应罢市,但是总商会不答应,当日,当夜,学生和工人代表来总商会跪求,痛哭流涕,很久,副会长方椒伯才答应下命令罢市。次日,全上海一律罢市,报纸取消了报屁股,日用商店虽做买卖,但上了门板。外国兵在寂静的大街上巡行,如临大敌。

二者因为——这是更重要的——无产阶级恰已准备好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好像知道五六月之交要爆发革命一般,已经准备好了战斗组织。比屠杀和罢市更出人意外的,就是次日忽然出现一个“上海总工会”向全上海工人发施号令了。全上海无论哪一部门工人都服从它,都执行它的命令,都向它报告。它成了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好像魔术师变戏法一般,转瞬间出现上海工人总司令部,而且是有绝对威权的司令部。这里哪里来的呢?

原来这年五月一日,广州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的人和代表,即使不全是共产党员,也是可以受共产党指挥的。另外一派的劳动运动者,与老国民党有关的人,此时被排挤出劳动运动以外,他们在工人斗争面前表现没有力量。小沙渡日商纱厂罢工时,他们坐了汽车在工人区发传单,警告工人勿上共产党的当。无须我们解释,工人都明白这是“走狗”做的事情了。劳动大会产生了全国总工会,又决议上海代表团回上海后应进行组织上海总工会。五月底,代表团已经从广州回来了,正在筹备这个组织。在春天罢工潮中产生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群众工会本已不少,各区都有,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影响底下的。上海总工会将是这些工厂委员会(因为这些都是以厂为单位的组织,不是以职业为单位的组织,其实是工厂委员会,并非职工会)的联合和指挥机关。原定于六月初成立,因为还有些形式上的手续未曾完备。惨案一发生,就不顾这些手续,而立即宣布成立了。它的罢工命令立即得到服从。它的

委员长李立三立即成了全上海工人领袖。——这是一个假名，几个钟头以前，新取的名字；小沙渡区工人如果看见，认识他本名李成；那也是一个假名，安源矿工如果看见，认识他本名李隆郅，那才是他的真名。罢工当然不像罢市那么整齐，一个早晨通通罢下，而是参差不齐，分做好几日罢了的。商人有几十年的总商会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早已成立，工人则不过几个钟头以前才有总工会罢了。

与总工会同性质的，还有“国民通信社”和《热血日报》。我们新有一笔经费做“国民运动”之用的，中央决议要办一个通信社和一个小型报，本在筹备之中，事情发生都提前成立了。一个印刷厂，则无法提前成立，直至二十余日后才能印报。

通信社和小型报同在一处办公，同是几个人负责的。我丢下了宣传部工作，到报馆来。报馆设在闸北香山路近旁，离区委机关近，离我的哈同路寓所很远。主笔是瞿秋白，编辑除我以外，区委还调来两个同志：沈泽民和何味辛。张伯简管发行。为什么叫做《热血》呢？因为已经有一个《公理日报》出版了，那是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印的，商务当局拿出一万元来办的，编辑者之一是沈雁冰。沈雁冰虽是同志，不能不说灰色的话。秋白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公理呢？解决问题的，只有热血！”《热血》销路超过了《公理》，印刷厂（他人的）印出来几乎不能供给需求，但二十几日后被巡捕房发现，老板吃了二日官司，工厂被封，罚款了结。这些损失由我们赔偿。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勉强印了一期，以后《热血》就停刊了。每日社论几乎都是秋白一人手笔。我和泽民写一般的论文，兼编辑区委和总工会交来的新闻，何味辛专编辑新闻，有时仿《十八摸》，《孟姜女》一类小调写些反帝国主义歌词。

罢工一层层地扩大，由外国工厂，到西崽和阿妈；电灯和自来水等待总工会命令，但为市民需要着想没有下命令。有一部分巡捕也到总工会来接头，说他们可以运动罢岗。总工会分好多部办

公,几乎不能应付。李立三奔走于陈独秀和虞洽卿中间。因为中国工厂没有罢工,虞洽卿“同情”于工人运动,代筹一部分的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又贡献了一些意见;李立三去北京活动时,他还写了介绍信给当时的财政总长李思浩。英国纱厂和香烟厂继续罢工是大有利于中国资本家的。“大英牌”香烟没有人买,英美烟公司只好大登广告,改名“红锡包”,说是纽约注册的,虽然香烟盒子上还写着“London”。

总工会实际负责的,是刘少奇及其他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这部分人受张国焘直接指挥。何今亮从海参崴回来,派在总工会工作,改名何松林;他从俄国学了好多工作经验,连张国焘也佩服他,以后他就不能同“上总”分开了。上海大学有大批学生在“上总”工作。有一次流氓来捣毁上总会所,打伤了几个上海大学学生;又一次李立三被流氓架到开大观园浴室的流氓头子常玉清那里去,被迫称常玉清为“老头子”。此时中国警察还不干涉。到了九月以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逮捕李立三,情形就改变了。从此,总工会人于密书状态。两次游行示威,以群众力量去启封总工会会所,都未成功。

商人和工人虽得不到结果,先后复业,但上海这个运动对于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广州有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及继起的香港大罢工;汉口也有屠杀和罢工;内地起了骚动,要求新出的书报;青年人又群起到外面来,但此次大都是向着黄埔去的。

* * *

《热血日报》停刊,我也退出了国民通信社,但并不能恢复五卅以前那种清闲。蔡和森于六月初去北京西山疗养了,彭述之病在医院,《向导》只有独秀和秋白二人写文章,他们把文章交来,便什么都不管,于是编辑责任落在我头上,缺少的篇幅由我翻译外国文章或自写些不相干的东西凑足。他们二人忙时,文章没有写来,全期报都由我一人包办。幸而除此以外别无宣传工作。可是上海地

方工作又把我拖住了。我加入了改组后的区委,书记仍旧是庄文恭,组织谢文锦,宣传我,工运李立三,妇女向警予,此外加入了二个工人同志:顾顺章和张佐臣。李立三不过挂名,他很少时间参加会议。我的工作颇简单:写宣传大纲,代表区委出席部委会议,指导商务印书馆支部工作,以及其他零碎事情。例如李立三受通缉时,我送他出走,替他定了房舱,派一个工人同志暗中随他到汉口去,但不许他和一纯同一个房舱。工人同志回来后告诉我,船一开动,立三就和一纯在一起了,因为一纯同房是个男旅客,立三很不放心。这个改组后的区委仍然不能胜任工作,因为庄文恭和谢文锦都是庸才。十一月间再改组,从山东调了尹宽来,庄文恭调到浙江去,我仍在里面。不久,尹宽为了在山东闹恋爱受山东同志攻击,称病(或真病)辞职了,王一飞接替他,此时我也退出了区委。我退出地方工作,是瞿秋白在中央争的,因为宣传部工作过于荒废了。直至一九二六年春,罗觉从北方来,上海地方工作才得到适宜的人,而走上轨道。不久赵世炎路过上海,也被罗觉扣留下来做组织工作,尹宽替了我的位置做宣传工作,从此开始上海工作的黄金时代。罗觉回国后,以字行,叫做罗亦农或一农。

从此,我专心做党报和宣传部工作了。——除了每星期在上海大学教几点钟书以外。五卅以前,我在“上大”教书是代课性质。彭述之教“社会学”,一九二五年春季开学后,上课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他荐我去代教他的功课。所谓社会学,就是唯物史观,也就是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三班共九个钟头。暑假后,上大迁到闸北青云路,彭述之病好了,他教三年级,我正式教一、二年级。此时上海大学差不多是共产党的党校。校长于右任不在上海;副校长邵仲辉(力子)是共产党员;总务主任韩觉民是共产党员;社会学系主任施存统是共产党员;社会学系教授,李季,高语罕,蒋光赤,尹宽,王一飞,箫朴生,以及彭述之和我,都是共产党员;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是过去的共产党员,现在与共产党合作,但学生认为他

暗中阴谋破坏共产党的影响；英文学系主任周越然是无所谓的人，他那一系学生有反共倾向的，都跟前主任何世桢离去了。学生中，社会学系压倒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他二系的学生也有好多共产党员，其余的多半是同情分子。上海大学是没有在北京政府立案的大学，那些贵族大学学生看不起它，称他为“野鸡大学”。功课的确是不认真的，青云路校舍尤其简陋，学生外省来的，比江浙来的更多些，尤多四川，湖南一带的学生，总之这是勤工俭学的缩影。此次革命下层干部中，上海大学学生占的成分，正如北伐军下层干部中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占的成分一般，黄埔政治教官里面而且有几个上海大学学生，例如欧阳继修。所不同的，就在黄埔学生的军事知识确实是从学校学来的，上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则不是从学校学来的，至少不是从正式功课学来的，而是从课外的活动和研究学来的。除了李季以外，其他的共产党教员都是敷衍塞责。李季译了《通俗资本论》，作为讲义，我们则说明不编讲义，上课以前也未曾有好好的准备。学生如果从我们得到什么益处，那么得自正式功课的少些，得自课外研究性的和纪念节的讲演，更多些，因为对于这些讲演，我们多少预备一下。彭述之不久连三年级功课也交给我了。以后李汉俊来，我也交出了一切功课。但李汉俊教了二三个月就走，社会学仍旧由我担任，直至上海大学被封闭时候。

一九二五年将近双十节，彭述之才从医院出来。他从二月初进医院直至此时才出来，五月三十日激起的巨浪未曾有一滴溅到他身上。他出来时，宣传部机关新搬到福生路。这是从老靶子路通到闸北去的一条小路，离中央秘书处，工农部，区委，上总都很近，比住在哈同路便利得多了。这是三层楼的弄堂房子，楼下开会，吃饭，会客，有时打麻将；二层统楼彭述之居住；三层统楼蔡和森夫妇居住，但和森还在北京，只有向警予住着；我住在亭子间。向警予介绍上海大学一个女学生杨馥兰来做技术工作，每日二三

个小时，主要剪报和贴报。不久杨馥兰走了，沈雁冰或杨贤江介绍一个老太婆来做这工作。两人都是同志。张国焘在这里吃饭，陈独秀常来，或开主席团会议，或闲谈，不久和森也回来了，惟有秋白住在法租界菜市路，来的时候少些。

大的运动过去了，我的生活和工作上了轨道。除了上课须早起以外，每日都是在十点至十一点之间起床，上午看看报就过去了，下午跑印刷厂，逛马路，找老朋友谈天，工作都在夜里，直至二点钟或三点钟。我吸烟，饮酒，看电影，上游戏场，打麻将，有时在郊外散步，直至很远很远。我很少一个人玩，饮酒有酒伴，看戏有戏伴，郊外散步也有同好者。同我玩的，都是些独身汉，至少没有爱人在上海的，如蒋光赤，尹宽，王若飞，颜昌颐，石琼等等。在秘书处看各地来的报告，知道全国工作发展；从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口里晓得上海工作情形；在瞿秋白家里谈话是属于另一种性质，他知道丰富，机锋犀利，常告诉我们以他自己和别人的一些轶事，从他那里又知道新出的文学杂志的内容，因为我们除了政治的出版物之外其他都不看的。

蒋光赤的小说出版，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于蒋光赤本人，对于他的诗和小说，对于一般新文学，怀有很深的成见，即使有空闲，也不愿去看他的书。陈独秀翻一翻《少年漂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老蒋送我一本，我勉强看完了，下次见面时并未给他所期待的赞语。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我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发的牢骚。秋白比较同情他，也能同他谈论中国的文坛。有一天，他先走了，秋白同我说：“这个人太没有天才！”光赤写了一本小说，关于我们那几年在上海的生活，其中秋白占了近乎主角的地位，也有我的一个影子。他问秋白用什么书名才好。秋白主张用《短裤党》。这是法文“SANS - CULOTTES”误译了的。虽然

如此,蒋光赤仍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路先锋,创造社的转变是一年后的事情。

在那种生活中,我每月仍能抽出时间来翻译《共产主义 ABC》。促成我翻译这本书的,是自己的印刷厂有多余生产力。运动比较沉静了,传单需要得少些,排字部和印刷部都很空闲。经理同志问我有什么书印,我说现成的书没有,不过我可以临时译出来,随译随印。我选定了《ABC》。这是一本解释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纲的书。第一章绪言,解释什么叫做党纲,第二章起就是《ABC》,《ABC》以后就是党纲本身。党纲篇幅同《ABC》相等。俄文,法文,英文,德文译本都是这样。我大胆把绪言和党纲都删去了,只剩下这部分解释的文字。随译,随排,随校,随印,许久才印出来。我未曾想到这本书能在中国发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一九二七年,上海有一家小报曾统计那几年中国销行最大的书:第一本是《三民主义》,当然,但那大部分是官费印出来赠送的;第二本就是《ABC》,中央发行部并没有赠送规定,不过定价很低,每本二角,各地翻印的是否有赠送则不可知;第三本是张竞生编的《性史》。

《ABC》在那次革命中有一种意义,是一般人未曾注意到的,即:这是惟一的文字,告诉人共产党要的是什么?当时,觉醒起来的城市和乡村民众,有很大的求知欲,要知道这次革命究竟领他们往哪里去的。但他们在国民党宣传品中找不到满意的解答,即使这些宣传品是共产党员写的。他们去找共产党自己的宣传品,找《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以及北京的《政治生活》和广州的《人民周刊》,也得不到满意的解答,因为那里只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推翻军阀。共产党的要求仅仅是这样么?“共产”二字就是这样解释的么?《ABC》出版了。于是他们明白,原来共产党果真是废除私有财产制,要“共产”,而这革命是客观发展必然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工人和农民怀抱了这个最后的目的来

参加目前仅仅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后来，湖南农民比党领导机关更前进一步去发动土地革命，以及八七会议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跳跃，不可说非这本书种下的种了。

《ABC》以后我还译了几本书，如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农民问题》及最后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我当时自己定了两个原则：不署译者姓名，不另支稿费。这是有所感而发的。

福生路房子住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搬到横浜桥附近一个洋房式弄堂房子来，那里每家门口有个小花圃，房间西式建筑，可以装浴盆和抽水马桶。我们租的房子还可以通至隔壁宽阔过街楼。弄堂里住的大都是日本人和西洋娼妓。彭述之主张搬家，为了扩人宣传部和实行同室办公制。过街楼布置成写字间形式，放了四五个写字台；后半截另外隔开，设了图书馆，把以前头的经济杂志和莫斯科带来的俄文书，摆了好几个书架。瞿秋白介绍一个同乡羊牧之，上大职员，来做技术工作；区委调了上大学生黄文容来做更高一点的技术工作，又调沈雁冰来做“消息科”（Bureau of Information）主任。除沈雁冰外，都住在这屋子里。沈雁冰每日来办公几个钟头，我只好改变了生活习惯。但此时已经进入“暴动”时期了。

* * *

上海的“暴动”观念是从孙传芳“秋操”引起的。一九二五年秋天，浙江督军孙传芳托名“秋操”集中了军队，突然袭击江苏的奉军，一二日后就占领了上海，几乎没有什么战斗，把奉军逐出江苏境外，而自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了。张国焘说：下次上海发生战争，我们应有准备，把败退兵士的枪械缴下来，自己武装，再同得胜的军阀说话。当时他尚未曾想到“下次”已经是北伐军和北洋军阀的战争了。

暴动的准备是“军委”的工作。“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

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但军委的成立是我回国以后好久的事情。我在莫斯科时，俄国军事学校尚未开放给中国学生。这开放是在以后或正当我动身回国的时候。无疑，这是与黄埔成立有关系的。在莫斯科学军事的，有从中国新去的学生，如颜昌颐；有从西欧转来的学生，如聂荣臻；也有东方大学旧学生，如肖劲光。王一飞从东大调到军事学校当翻译，自己因此也学了军事。进军事学校的学生经过了严格挑选。身体强壮是个条件，但重要的须家庭贫苦，又无达官富人亲戚。我不知道学军事的共有几人，也不记得中央底下何时设立一个军委。似乎是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设立的，最初负责者是王一飞和颜昌颐。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因此我不知道军委的活动和上海暴动的军事准备，虽然有些人和我接近，让我知道一鳞片爪。颜昌颐常带我到军委机关去，又曾请我去他办的训练班教课，因为有一门“秘密通信”讲义是用俄文写的，王一飞及其他懂得俄文的人来不及，只好把讲义交给我，叫我去教。我也因此懂得了一点秘密通信方法，可惜忘记了许多化学药品名称。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但暴动的政治准备则是区委的事情。

罗亦农做区委书记，完全改变以前的作风。他有魄力，有胆量，大刀阔斧地干。他把党内组织工作付托于赵世炎一双可靠而能干的手；工会日常的事务，何今亮很能够应付，重大问题，赵世炎可以裁决。工作一天发展一天，机构一天完备一天，共产党在上海成为一个大力量；区委书记罗亦农并不沉溺在上海工作，如同以前儿任书记一般。他插足在过去属于中央管辖的“外交”工作，例如同上海国民党要人联络，同左倾的大资本家接头，同流氓领袖拉

拢,等等。在陈独秀“失踪”时期^①中,几乎是他包办这些工作。首先他布置了比较我们更阔绰的住宅,住着太太和丈母娘,还有小舅子。他穿一生长袍马褂,浓眉毛,大嘴巴,不笑时候令人生畏,很像中等公馆的老爷。赵世炎同他住在一起,比他朴素得多。何松林,王若飞,尹宽,我,是他的公馆熟客,在那里叫菜,喝酒,陪他的丈母娘打牌。

此时北伐军已经进展了,占了湖南,江西,不久打下汉口。上海工作已经把重心放在暴动上了。广东政府派了纽永建来上海秘密指挥,杜月笙保护纽永建安全,我们同纽永建合作时,也就和杜月笙发生了关系。一九二六年十月间或十一月间,我们主张立即暴动,占领上海,纽永建不赞成。我们准备秘密行动。停在高昌庙的兵舰有我们的同志,陆地也有相当部署,希望以少数人冒险发动一下,可以使动摇的北方军队溃败或归降的,因为纽永建正在游说上海驻军。可是海军开了几炮,陆地响应不起来,军委里少数同志在南市同警察相持了一下,结果失败了,奚佐尧被捕,在龙华枪毙。数日之前我才同他在军委机关打过麻将。这就叫做第一次暴动。海军开炮时,罗亦农正在纽永建家里,纽永建听了炮声面色都变了,他知道是我们做的事情,怪我们预先不通知他。

第二次暴动准备得更充分些。那是一九二七年二月间,杭州已经落入北伐军手里,我们号召总同盟罢工,同时以武装的队伍去进攻警察局。那一夜,我在指挥机关,辣斐德路冠华里新办的党校里帮忙。我看见一队队的人分派出去了,大家都不敢睡觉,等待好消息到来。可是没有消息。到三楼去听,仿佛有枪声,但拿不定。

① 一九二六年初,陈独秀害伤寒病,自己进了医院,一个多月才出来,临去时虽曾通知任作民以养病事情,但未曾说进医院。在医院期间他也没有写信。我们都认为他被人谋害了。大家非常着急,四处打听,都无消息,延年经广东去北京开会,路过上海也帮助寻找。最后,延年已经上天津班轮船了,一个交通才赶到船上通知他以他的父亲“出现”的消息。

次日一清早,各队的人回来,有的说等待的人没有到,有的说警察局已有准备,不敢动手,有的开了几枪就退了下来。王荷波的弟弟气愤愤走来,说他在军舰上已经准备好了枪械,并未见浦东方面有船来搬运。

三月第三次暴动就成功了。我们攻下一切警察局,围攻了东方图书馆和北火车站的驻军,缴了不少的枪械,成立二三千人的纠察队。

暴动是中午开始的。下午和当夜打得很激烈。我们坐了汽车到闸北去看了一下,黄昏就回来了。这日夜里,我来往于中央宣传部和施高塔路恒丰里之间,那时陈独秀住在中央宣传部,恒丰里则是区委一个机关,传递前方战斗消息的。我们整夜听着闸北传来的疏疏密密的枪声,有几个时候枪声密得同爆竹一般,恒丰里把重要的消息派人送宣传部,陈独秀有时也有指示。我也传递过几次字条。深夜三点钟左右,陈独秀曾写字条叫人送到闸北去,主张把我们的武装撤退到大场方面去,以避免牺牲。可是前方没有执行。我们站稳了阵地,北兵渐渐失败了。次日,下午我又到闸北去看。东方图书馆内北军尚未曾投降,铁门锁闭着,十几个兵都在楼上,看见有人到铁门口来,就开枪。围攻者都埋伏在墙角,或对面商务印书馆工厂里。人家警告我,不要从图书馆前面经过。我绕道至图书馆背后,一个暴动指挥机关,在那里看见赵世炎和周恩来。不久顾顺章来,报告他和图书馆驻军谈判经过。一九二五年总工会被封后,顾顺章为了工会事情或别的事情受巡捕房通缉,离开上海;北伐军到杭州时,他在杭州市内领导暴动响应;现在他是上海准备暴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了。他写了一个字条自己送到小铁门去,劝北军投降,告诉他们北火车站驻军已经投降了。其实当时北站还在相持。他带了里面回答的字条来报告,说北军拒绝投降。他们几个人在商议办法,我则同其他的同志在闸北街道观察。街道是寂静的,偶然碰到三三五五一群人,手里都携带长短枪。我们

转到东方图书馆西边一条小街道去,那里也有一个暴动机关,几十个武装工人会聚着,赵世炎也在里面。一个商务印书馆工人大跳大闹,说是手枪给人缴去了,要求派人去报复。原来在闸北街上活动的,还有其他队伍,不受总工会管辖。他们并非来暴动,而是来缴北军武装做别用的。他们人数比我们少得多,而且没有互相联络。世炎制止愤慨的工人,不许他们启衅。正在此时,东方图书馆前面一阵喧哗,中间夹杂着枪声。我们赶紧去看,原来图书馆已经攻下了,或北军自己投降。一大群武装工人簇拥着几个北兵,从图书馆方面走了来。于是除北站以外,闸北都落入暴动者手里了。我要到北站去看,但有人反对,我们遂回北四川路去,过铁路后忽听到一阵枪声从北站方面传来,愈来愈近,大家都逃进一条弄堂去,关起了铁门,看出去。不久,许多北兵沿铁路奔了来,有拿枪的,也有没有枪的,有几个人灰色棉大衣外面染着鲜红的血。开枪的显然不是他们。这阵北兵走过后不久,弄堂外的人纷纷传说:北兵坐在铁轨上不走了。我们走出去看时,果然离我们三四百步处,那些北兵坐下来,枪都放在地下。这是投降表示。许多市民走到北兵面前去,夺取他们的枪枝,他们并不反抗。到了总工会派人来受降时,许多枪枝已给不相干的人夺去了。我们于是再过铁路到闸北去,由宝山路走到北站,那里已经是薛岳部下占领着,几个湖南兵向我们叙述他们的战斗经过。车站前面有北兵未曾掘成功的战壕。靠租界的铁栏杆旁边有二个无头死尸,上身赤裸,但从裤和绑腿看来,不是兵,而是警察。通北河南路的铁丝网上挂着八九个死尸,那是北兵企图逃入租界时中弹死的。铁丝网背后,外国兵架着机关枪。我们从北站再到香山路机关去,准备从那里回北四川路。将近黄昏时候,忽听见东边传来枪声,大声正在诧异,不久来了报告,说是吴淞开来一列车北兵,已经下车向我们进攻了。急忙下命令布防。我们几个局外人也急忙躲到别处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早晨逃往吴淞去的一列车北兵,开到什么地方路轨断了,

不知怎样又开回上海来，来到商务印书馆背后，路轨已掘断，只好下车退往天通庵车站防守着。这车兵很不少，枪械也多，如果向闸北进攻，暴动者是不能抵抗的。幸而兵无斗志，又不知虚实，而且已经天黑，他们采取退守的策略。后来，天通庵车站的北兵缴械给日本兵，而退入租界去了。C.Y. 中央机关正设在天通庵车站附近，肖子璋和他的俄国老婆住在那里，他们恐慌了一夜。

次日，闸北情形完全两样了。街上很热闹，并非商店开门，而是武装的工人，非武装的工人，以及学生，妇女等等举行示威。我跟着队伍从宝山路经过北站到新闸桥方面去。武装的人，有短衫的，也有绿色的邮差衣服。游行后，我到上海总工会新会所——湖州会馆，又到纠察队司令部——东方图书馆。这两处地方门口都架着机关枪。总工会留我帮忙，当夜我住在湖州会馆。这一夜时刻在恐慌之中。有人来报告，说有一队流氓要来进攻湖州会馆，缴我们的枪械。湖州会馆其实没有什么枪械，也没有什么人。我们向东方图书馆求援。不知怎样，纠察队没有派来，倒是第一师工兵营派了十几名兵来，龙大道和我共同招待这带兵的班长或排长。

上海胜利确定了；苏州，南京也都攻下了。但立刻发生了新斗争。蒋介石到了上海，白崇禧做了卫戍司令，他们仇视我们的意向一天比一天明显起来。一天夜里，周恩来跑到我们的横浜桥房子来。自从暴动以来，陈独秀就在我们的房子居住了。他占了我的床，我则睡在办公室里一张竹床上。周恩来来，我们还未曾睡。独秀，我，以及其他宣传部的人员都在办公室里。恩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他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来的同志，无论在西伯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周恩来主张直接送他到

汉口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的国民党要员见面。独秀赞成这个意见。以后恩来每日必来,有时来几次。谈话时我不在旁,不过我知道他的意见并没有实行。有一天,他同独秀出去了。独秀回来,说他去看汪精卫,汪精卫告诉他,已经同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及其他的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做声。独秀说:吴蒋二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日夜里,独秀写了很久。那就是有名的“汪陈宣言”稿子。次日,周恩来拿回来时我看见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的。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报纸发表出来时,陈独秀对我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这篇宣言目的是为了辟谣,为了保证两党合作到底,为了说明总工会纠察队并无进攻龙华之意。其实,这是蒋介石有意放出来的谣言,以为进攻纠察队张本的。

驻扎闸北的第一师调开了,第二师调来。师长刘峙是后对共产党的。有一日,我在我们新开的书店里,帮着毛泽民照料生意。一个兵士买了书后不肯走,要同我们说几句话。他在柜台旁边低声同我们说:“你们要小心,纠察队夜里睡觉要把枪和子弹放在身边。”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下去。其实,我们早从他处得知蒋介石计划进攻。有个黄埔学生蒋友谅是我们的同志,司令部召集军官开会,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发表反共言论,蒋友谅起来驳他,立即被他下命令扣押了,其他同学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恩来,报告蒋介石的阴谋。自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报告。周恩来写了一封“致陈独秀蒋介石二先生信”,很长,很激昂,但未曾在什么地方发表。在这局面之下,我很忧虑,曾向尹宽表示我的忧虑。尹宽安慰我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即使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时的军事的胜利,在政治方面说则他是失败的,我们是胜利的。”尹宽主持的省委机关报已经开始暗中攻击蒋介石。这个报纸是拿商务印书馆的

铅字和机器印的。

四月十二日早晨,我在横浜桥房子醒来,听到闸北方面有枪声,问起别人才知半夜里就有枪声了。不久,赵世炎的爱人夏之栩送了区委命令来调我去工作,据她说,这枪声是青帮流氓发的,都是盒子炮,人数不多,我们准备冲出去把他们通通缴械。我问她驻军的态度。她说军队守中立。等我走到闸北时,情形大变了。二十六军,周凤岐部下,已经加入流氓方面,攻破了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以及其他纠察队驻所。我到宝兴路找到恩来时,恩来才从商务印书馆对面的医院跑出来。他对我说,现在要在马路上发传单,贴标语,反对新军阀,不必顾虑到别的什么了。我立即工作去。宝山路示威和屠杀,我没有看见。

约在屠杀后二日或三日,清早,有三个人来横浜桥房子,唤醒了。一个是陈延年,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聂荣臻。他们刚刚从汉口来,路上听说了四月十二日反动消息,估计我住的宣传部房子比较安全,便到这里来。他们要我带他们去见罗亦农和赵世炎。我请他们在我家里等待,一个人到罗亦农家里去。世炎也在那里。我告诉他们有这三个人来,现在我家,要见他们。亦农看看赵世炎,世炎看看亦农,大家都明白是为了什么事情。亦农叫我带三个人到他家来。我回来,带这三位客人去他家里,才知道在汉口的中央免了罗亦农职,派陈延年来接替。他们三人从汉口动身时还不知道四月十二日的事情。此外,延年又拿出一个中央命令来,那是与我有关的,即是命令:尚留上海的中央工作人员: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彦,妇女部杨之华,速即到汉口去。从罗亦农家里出来,我陪了李立三去三友实业社买了一条新棉被,重要的是去精益眼镜公司配了一副黑色眼镜。

约在四月二十二日前后,我同 C.Y. 中央陆定一同志做伴,恋恋不舍地离开上海去武汉了。陈独秀于发表汪陈宣言后便去汉口了。

武 汉

C. Y. 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和我天天见面,我们一同采访暴动新闻,一同编辑宣传刊物,一同起草宣传大纲和拟订标语。那个时候中央,区委,C. Y. 三个宣传部几乎是不可分离的。陆定一是交通大学学生,年纪很轻,很聪明,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不会说话,同我一样。我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只好上台去敷衍几句,他则始终不肯上台演说。我和他同乘英商怡和公司轮船去汉口,在船上,大家都说他是我的弟弟,因为我们穿的西装是同样的衣料,同一个西服店缝的。

船上客人装得满满地。前后有两条英国兵舰保护着我们这条船以及其他几条船,为这故统舱票临时加价,卖到四十五元一张,已经超过我们一个月的薪水。

客人里,熟人很多。我的铺位对面,陆定一的铺位下面,是宋云彬,国民通信社社长。当初,他同旧社长邵季昂办交代时,记得是我领他去的,总之我在场。我以为他不记得我了,我也装做不认得他。船上数日,我们谈起今天天气一类的话,他忽然说:“我认得你!”我也说:“我也认得你!”于是不客气,喝他的白干和吃他的花生米。

这三张铺都在船尾右边。走到左边去时,原来罗大口也在这船上。他仍是那样嬉皮笑脸的,同上面铺位的李大炮说笑话。一个喊“大口”,一个就喊“大炮”。他们两人又向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子问长问短。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

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地。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像鱼行老板。”他说:“你知道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杨普生也在这里。”

统舱里有许多青年人,西装的,中装的,学生装的,问起来都是“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坐庄的”或“贩瓷器的”。客人们蒙被而卧的很多,像我和陆定一在统舱,房舱,客舱,甲板各处乱走的很少很少。但这只限于最初一日。船过南京并不停留,我们大家都躲在船里面,因为浦口和下关常常开枪相射。过了南京之后,蒙被卧的人把被揭开了;守住自己铺位的人也到甲板上走走了。一个“卖水果的”青年人跑到我身边来,问我:“听说郭沫若也在这船里,不知确否?”我很诧异,一个卖水果的人为什么关心郭沫若。陆定一介绍我见他的同学,一个沉静寡言的青年人,我忘记他的真名,也忘记他的一九三一年在龙华狱里的假名,但记得假名叫做什么弟。在甲板上,我忽然看见潘家辰,那是出我意外的。问起,才知道他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我说:“小潘,你……”他立刻提出抗议。他说:“现在人家都叫我老潘,不叫我小潘了。”他说,他已经有了爱人,还留在莫斯科,是山东人,叫做庄东晓。我说:“你艳福不浅。”他问我怎样知道庄东晓?我说:“去年在上海遇见袁庆云和任卓宣,庆云同卓宣开玩笑,笑他在庄东晓面前碰了钉子。庄云说庄东晓是最漂亮的女同学。”提起袁庆云,潘家辰就告诉我说,他和袁庆云私人冲突,袁庆云伪造一封信插在他的衣袋里,一面报告格别乌捉他去,在牢内关了好多日,后来伍廷康保他出来。

小潘介绍一个矮子来见我,说是陈绍禹,又介绍一个瘦子来见我,说是刘国璋。说都是俄文好,又能干的同志。

船过芜湖,上来了一批人。开船后,罗亦农和李立三一个大口,一个大炮,跑来找我,带我到一个房舱去,那是刚从芜湖上来的客人。我认得一个是吴琪,曾在蒙达尔同我一起做工。但他们去

见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叫做张曙时,江苏省党部委员。这几个新上船的客人都是江苏省党部里面的人,南京清党时雇小船出走的,在江里走了七八口才到芜湖。

芜湖,大通,安庆,九江一路过去后,这些“开鱼行的”,“卖水果的”,“做茶叶生意的”,等等,都高谈阔论了,他们的政治常识超出了他们同职业的人水平以上去。可是还有几个人始终蒙着被头,或者一声不响。王震东告诉我:“那是一些反动分子,蒋介石派到武汉捣乱去的。”后来,我知道,和我同船的有人尾随他们上岸,知道了他们住处之后,报告湖北总工会纠察队捉了他们。

到汉口,上岸时,伍廷康从大菜间走出来,我同他点点头,他也同我点点头。这是意外的意外。

* * *

到了汉口,我无家可归。中央宣传部已经不存在了,部长彭述之忙着答辩,忙着张罗老婆生孩子的经费;部员黄文容调去做陈独秀的私人秘书,羊牧之调去秘书处做抄写,《向导》的汉口版早已出了,编辑的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无需要我,我从此脱离了《向导》。从回国至今将近三年,没有一期《向导》不是我校对的。我在秘书处住住,在长江书店住住,在印刷厂住住。

第一天,黄文容带我到“六十一号”去,我不记得路名,但记得那屋子在唐生智公馆隔壁。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每层有一间大房子,一间或二间中房子,一间或二间小房子。进门,有五六个北方大汉一律短衣,出来盘问,看见我是黄文容带来的,便不问了。楼下是饭厅,其余房间都是这些卫队居住。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二楼是住家的,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黄文容住在另外一个小房间。

每人寒暄了几句话,楼下就请吃中饭。碧兰和一纯不在家。我们五个男子汉在一桌吃饭。述之同和森辩论起来。述之口口声声不离“仲甫同志”或“老先生”,独秀正色说:“我有我的意见,述之

同志不要把我拉在一起！”饭后，黄文容给我一本瞿秋白新著的小册子。正书名，我不记得，只记得两个副书名：《第〇国际》和《反彭述之主义》。

说到这里，我应当退回上海去，追述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怎样造成的。

* * *

陈独秀同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了手，走到社会主义来。在社会主义方面同他合作的，有周佛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这些从河上肇，山川均一流人学来的考茨基式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老国民党员，戴天仇，沈玄庐，邵力子等。共产党成立，那些留日学生都参加了，老国民党员则若即若离。不久，陈独秀与这两部分人都分了手，而去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张国焘领导下的一批人合作，以及同第三国际派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合作。陈独秀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他结交的朋友看得出来。在这一切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同陈独秀分离的，——就是李大钊。他不仅从《新青年》起，而且从《甲寅》起，就是陈独秀的朋友了。中国共产党内只有他有资格同陈独秀争领袖地位。但他是如此谦虚，如此心悦诚服陈独秀，以致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是站在陈独秀方面。除他以外，一切大小领袖都是陈独秀的学生，翻译或顾问。conseiller 或 ministre（法语——顾问或大臣）。第一任“大臣”是李汉俊，从共产党在酝酿时起至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第二任“大臣”是瞿秋白，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至一九二四年夏间；第三任“大臣”是彭述之，从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起至左派反对派统一时候。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托洛茨基这个判断是最正确的。他是个实际的政治家，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在理论方面，他远逊列宁和托洛茨基，但中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没有一个及得他，不仅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他在党

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我想，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底下决不会有大的争论以至分裂的。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争论都同国际代表有关系。我已经说过马林和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次争论结束之后，似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全党一致采取“国民革命”路线。这个路线具体说来就是：先把有名无实的中国民主政党（国民党）充实起来，拥护它夺得全国政权，然后在它统治底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推翻它，而取得政权。这是第三国际的路线或宁可说是俄国外交部的路线。俄国外交部把重心放在前一阶段，即如何将中国造成初期基玛尔式的土耳其，或外蒙古人民共和国；至于第二阶段，则不过是陪衬的，并不重视。中国若有一个外蒙古般的政府，则第二阶段，如彭述之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将来自己的革命”，的确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但中国共产党，至少它的领袖陈独秀，接受这个路线时，恰恰是把重心放在第二阶段。既然，如列宁同志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所断言的，一个国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有社会革命，那么我们赶紧做苦力罢，赶紧努力把孙大炮捧上去做大总统，只为了让我们能开始准备我们自己的革命。正为这个原故，我们虽以全力干国民革命，虽加入国民党，但要始终站在在野党，反对党地位，要独占工农运动，不许国民党插足，以使用中国自己的群众力量推翻国民党全国政权。

我们看见，在表面一致的“国民革命”路线底下，开始就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倾向：国际的和中国的。

中国的倾向以陈独秀领导的上海中央为代表。蔡和森同陈独秀一般坚决。彭述之从莫斯科带了一篇文章回来：《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他不仅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自己的”革命，而且说这个“非自己的”革命也是“天然”归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无产阶级天然领导国民革命论，正投合中国同志胃口，成为那几年党内指导的理论。上海区委，湖南区委，北方区委，以及山东，

河南等处,都与上海中央同一个倾向。

国际倾向以鲍罗廷领导的顾问团为代表,广东工作同志,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都附和他。他们很不了解别省同志对于“第二阶段革命”的憧憬。至少他们不如此重视这个憧憬。但他们也说不出理由来反对这个憧憬。我在上海,遇见各地来的同志,从未听到在理论政治问题上有反对中央的表示或暗示,——除了陈延年。平山和恩来,唯唯诺诺,即使有什么不满意也不敢露出来。延年就不同了。第四次大会,延年没有来,直到廖仲恺遇刺后他才来上海。有一日我们得到俄国领事馆方面通知,说延年已到上海几日了。我们恐慌起来,害怕国民党右派在船上或岸上谋害他。正在恐慌时候,一天,我在《民国日报》上看见林木寻马道甫的广告,正要去广告上写的地址找他时,张伯简已经带他来了。还是那个滑稽神气,不过肚子更大些,两条腿更细些。我带延年去见他的父亲。父子两人见面之下,那种感情是很难形容的。这可以打破一般人对于陈独秀蔑弃人伦的传说。他们说话时,我走开了。夜里,延年住在我家,我从他第一次听到不满意上海中央的话。但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只记得,他征引鲍罗廷的话,说《向导》文章千篇一律,不外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个意思。广东对中央的批评,如果用近来的名词说,应当是:“不懂得政治的现实主义”。

延年称赞我,说我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写得好,他说他仍旧不会写文章。这是老话,延年读的书多,说话有机智,思想深刻,我喜欢听他说话,但我未曾见过他写的文章。在法国办《少年》时,他替别人抄文章,自己不写一篇。在莫斯科,大家练习写文章,乔年也会写,他始终不肯写。我们骂他虚伪。此次他称赞我,是为了要我替他写报告,因为他没有带书记到上海来。他说从广州寄来的报告都是书记代笔的。我拿起笔来,他在我的亭子间内,一面抽烟,一面踱方步,一面叙述廖案经过。我照他说的话写,没有润色,结

果是一篇很生动清楚的报告。

两父子见面是否争吵,我不知道。在秘书处,独秀看广东来的报告,常拍桌子发脾气。有一次,延年派了代表来,谈话时我恰巧在旁。独秀指着我对代表说:“这就是超麟同志。他几次写信来要调超麟到广东去,岂非故意拆台么?”独秀在盛怒之下常说无理的话。

但是国际的倾向渐渐胜过中国的倾向,或宁可说广东的作风胜过上海的作风,尤其在北伐出师以后。五人主席团在,瞿秋白是属于鲍罗廷倾向的。我已说过,我初回国时,秋白在上海郁郁不得意。那时,他刚被严厉命令从广东调回上海来,因为他在鲍罗廷指挥之下以中央名义在广东活动。据说独秀,和森都大发雷霆。秋白根本不赞成其他领袖的国民革命观。他人聪明,俄文和俄语都好,同俄国同志关系深,明白第三国际这个国民革命路线的用意。但他服从命令回到上海来,直至北伐,都做些如彭述之说的“高等技术工作”。北伐之后才拿出反对派面目来了。

北伐问题,是这二种倾向,这二种作风不可避免的冲突点。《向导》明显反对北伐。独秀这篇文章引起震动。广州国民党中央开会正式提出来讨论,决议由当时国民党中央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正式写信给《向导》周报提出抗议。我们收到了这信,独秀以“记者”名义回答了几句,放在“读者之声”栏内,同那些学生,店员,写来的讨论问题的信一同发表。这一栏是我的地盘,这个时期内,“记者”就是我。许多同志以为是我回答的。其实回答这封信,以及回答另一封关于陈公博的信,“记者”是独秀自己。这是仅有的例外。

受《向导》反对北伐文章所打击的,最重的,不是广东国民党,而是广东共产党。延年,平山,恩来等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没有话回答国民党的责问,因为他们不仅不反对北伐,而且极力拥护北伐,北伐计划本是鲍罗廷向国民党提出的,总之是俄国政府的主

张。

陈独秀则从另一种观点去看问题。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案”，五月十五日的“整理党务案”，已经给了我们太明白的教训了。广东政权从多头的统治已经变为蒋介石一头的统治。“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已经失去了操纵国民政府的力量。俄国军火和金钱，这个甘饵，自然还是国民党政府所需要的，所不可缺少的，但是需要程度，不可缺少程度，已经不如前此之甚。蒋介石已经明白表示他的独立性，尤其他的反共意向。广东资产阶级，以及全国资产阶级信任了他，国民党元老，即所谓“西山会议派”也信任了他，他从别处也有可能得到军火和金钱，虽然数量少些。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已经成为全国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部分了。“要打倒北方段祺瑞，首先要打倒南方段祺瑞！”——如高语罕某次演说中说的。高语罕为此演说，不得不抛弃黄埔教职，回到上海来。在此情形之下，所谓北伐有什么意义呢？北伐就是同蒋介石和解，就是抬高蒋介石地位，就是供给他以比前更多的军火和金钱。蒋介石利用北伐名义又可以禁止后方罢工和抗税，限制工会和农民协会活动，监视共产党；万一前方军事不利，仍旧可以退回广东，那时就靠得住要消灭广东共产党及一切民众力量了。北伐胜利本是没有人料想到的，何况北伐并不是新鲜的事情。过去孙文“北伐了”几次，但每次都是作为一种姿态，真意在于对内，消灭异己的武装。

当时，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究竟是赞成北伐正确呢，还是反对北伐正确呢？——这个问题，在现在也是难于答复的。

中央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恰巧在宣传部开会。陈独秀一个人发表意见后，张国焘提出反对。两人反复辩论了几次，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国焘是他的学生，不敢回骂，声音愈说愈低，终于默然了。以此方法解决问题不止一次，这是独秀的缺点，因为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我不记得那日秋白是否表示了反对独秀的意见。近日整理秋白遗稿，在他的《瞿秋白文集自序》

中有几句话,说他有一篇论北伐的文章为《向导》拒登,稿子失落不见。但我在遗稿内发现了这篇稿子。那是拥护北伐的。

出乎一切人意料之外,北伐进行得很顺利。唐生智倒戈,湖南方面差不多没有什么战争,不久武汉攻下了。我们在湖南做的矿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收了效果,同时上层拉拢手段也相当成功,我们投合了那些小军阀的野心,把他们团结起来同“蒋总司令”对抗。“独立团”,纯粹共产党官兵,建立了战功,扩充成师,最后成军。三一八屠杀以后沉寂了的革命浪潮又汹涌起来。看不出北伐对于我们有什么不利的,至于利益则很明显。上海中央对于北伐的忧虑显然是无根据的了。有一天,伍廷康参加了中央会议,散会之后,闲谈中,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觉得革命有急转直下于短时期内成功的可能么?”我从间接知道这件事情。当时我很诧异:国际代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口头谈的,笔下写的,虽有许许多多“国民革命”字样,但是秃头无字的革命则是专指我们自己的革命的。这革命须待北伐成功之后才开始哩!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伍廷康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证明上海中央此时还保留着过去的传统意见。我记得那时我同彭述之谈起蒋介石反动问题。彭述之说:“等到打下北京之后再同他算账!”

北伐胜利,姑不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有利,还是有害,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实无疑的,即是上面说的“中央的”倾向已因此被“国际的”倾向压倒,广东的作风压倒了上海的作风,陈独秀的威权开始衰落,瞿秋白和张国焘明白站在反对派立场。辛辛苦苦在下层群众做工作,同工人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冒着殴打,拘捕,监禁,枪毙等危险,有什么用处呢,既然绑着皮绑腿,挂着斜皮带,握着皮鞭,也能革命,而且更有效力些?外江工作同志到广东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的,都很惊讶这些广东“同志”,这些“革命家”,他们是半当权者,做革命工作没有危险,至少没有从官厅方面来的危险,除了蒋介石大政变以外。试拿广东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上

海总工会委员长何松林相比一下！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贤在广东结一次婚用了一千元。在广东做惯了工作的同志，到上海或其他地方来，也许有相反感想，认为“你们为什么这样傻。”我听了许多上海同志从广东回来所得的印象，至于广东同志，则我接触的很少，不知道他们对上海有什么印象。延年并未曾腐化，他还是老样子。谭平山来上海几次，我们敲他竹杠，看京戏，上馆子。延年疏通我去广东工作，我毅然拒绝了。

北伐胜利转移了一般人对于“革命”的观念。彭述之的革命公式：“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成了瞿秋白嘲笑的对象。广大群众的武装暴动确实是变成没有必要的了。杭州和上海的暴动者不过尽北伐别动队作用。湖南农民的革命只限于替北伐军报告军情，做向导，缴溃散的北兵枪械。

一九二六年底，来了三个俄国同志，住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一个青年人是少年国际代表，我在 C. Y. 中央机关常看见他宣传反对伍廷康。其他两个，我未看见，他们在领事馆开会时我没有去，但记得一个人，假名就叫“马克思”，是个理论家。独秀，秋白，彭述之常到领事馆去，同他们讨论革命根本问题。独秀和述之保持旧路线，秋白同新来的俄国同志一致主张新路线。伍廷康似乎在根本问题上同独秀一致的。此时，广东有信来，提出我们对于国民党态度问题，这信，秘书处曾发给各地讨论，上海赞成中央意见，北方来信坚决拥护中央，反对广东。后来听说“马克思”曾发表这个意见：陈独秀不能执行新路线，但另换一个领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在党内的威权太大了。

这几次讨论之后不久，瞿秋白就称病，不做工作，不见客，约有好几星期长久。一天，大清早，我正在睡觉，王若飞把我拉起来，叫我同他到菜市路看秋白去。我总以为秋白肺病又厉害了，此时一定呻吟在床上；可是进房门看见他坐在写字台前面写文章。我很惊讶。他说，有时床上睡得厌烦也起来坐坐。我们进去时，他写的

东西已经藏起来,此时他从抽屉拿出稿子来,说他正在翻译哥勒夫的《辩证法唯物论》。这是好久以前,他为了需要稿费贴补生活,问我有什么书翻译,我从书架上选了这本给他的。谈了一些不相干的话,看了他几首“集龚”^①的诗,我就同若飞走开了。若飞那时也许比我知道得多些,但未曾告诉我什么。我则怀疑瞿秋白此时并未生病,而是加紧工作。原来,他上午正在写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下午才译哥勒夫或找人谈话。我从C.Y.方面渐渐听到了不满意中央和上海区委的话。我问陆定一这些话是哪里来的,他说是C.Y.某人说的,而某人是从瞿秋白那里听来的。

秋白于上海二次暴动至三次暴动中间去汉口,张国焘跟随北伐军到汉口,和森和平山从莫斯科回来,同鲁易,汤曼,多里奥等一路从广东到汉口。这几个人在汉口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指挥一切,不等独秀来到,而且正利用独秀在上海指挥暴动不得脱身的机会。独秀于四一二前几日才去汉口。

* * *

我常去“六十一号”,在那里揩油吃饭,在那里同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谈天,有时旁听中央重要会议,也常办些小差使。一次,奉了命令到离此不远的西门子房子去交涉一件什么事情。那是鲍罗廷公馆。翻译已经不是张太雷了,而是上海大学学生李炳祥,他是华侨子弟。我在门口雇了黄包车,一个卫士,北方大汉,不仅跟在车后,而且用手推着车子走。我想,我是属于当权的党了,但不知道怎样,总觉得这车子坐得不舒服。卫士推我回到六十一号,适逢秦治毅代表军委来查勤务,因为这些卫士是属于军委管辖的。

第一次旁听会议时,我有异样的感觉。照旧是陈独秀当主席,

^① 秋白也是“龚迷”,同我一样;定公的诗,他比我熟得多了。那日,他告诉我,中国旧诗,尤其定公的诗,意义含糊,也可利用来表现我们的思想。我记得他集了一首诗咏农民暴动,其中有一句是“忽闻大地狮子吼”。后来,他在福建被捕,临枪毙前几日还集了几首定公的诗哩,而且把“莫抛心力贤才名”改成了“莫抛心力作英雄”。

列席者照旧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不错还有谭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神气多么不同!独秀已经不是有威权的领袖了,不过是一个普通主席,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他的意见只有彭述之赞成,别人则一致反对他。别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后来,回上海,颜昌颐才告诉我,那时一切重要会议以前,平山,秋白,国焘三人都先商议过的,他住在他们三人常会面的屋子,但是这三人回避他,说话不让他在一旁。我在狱中又听何资深说起平山在某酒馆开了户头,同他接近的人吃酒都可挂他的账。我们记得他是新设的农政部部长。黄文容告诉我,有一次开会,国焘拍桌子骂独秀。这是报复了讨论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

那时武汉政府的重大设施,是“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每党派几个领袖出席。我没有机会旁听这个会议,因之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从我到汉口后,五大开会以前,我是清闲无事的。旧工作无形中脱卸了,新工作还没有,每日游玩,只是缺少游玩的钱。不久,尹宽也来了,他是上海派来的大会代表,但也没有工作,同我一样。我们交换感想,互发牢骚,同别人说话则很慎重。王若飞很慎重,我向他发了一点牢骚,他微笑不答。我们来往的都是旧时认识的人。一次,我同尹宽去《民国日报》馆访沈雁冰,沈雁冰也是皮绑腿,皮带,军服。他即请我们到一家广东馆子去,顺便也到附近什么报馆请了孙伏园来。雁冰介绍我们二人是上海总工会代表。一次若飞带我去鲍罗廷公馆,那里有个什么会议,我同他到鲍罗廷一个房间去,取了一瓶葡萄酒,两人喝得精光,由我写了一个俄文字条插在空瓶内,“谢谢鲍同志。”

四月底至五月初,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人家给我发言权代表资格,自始至终我未曾利用这个资格发过一句话。第一日开幕礼是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的,校长王觉新是同

志,他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众代表。这日,我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老汤曼,曾见过马克思,当时他还是小学徒哩,如今头发都白了。他不懂法国语。鲁易懂得法国语,多里奥自然懂得。到武昌汉阳门起坡,雇了黄包车去第一小学,那时正在拆城,砖头满地,黄包车不好,老汤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车,擦破了手腕一块皮。

这一日大会完全是仪式。陈独秀当主席,致开幕词。国际代表团各人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代表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即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进会场来行礼。国民党,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闿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不说话。

选举主席团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宣布开会后,湖北省代表团主席罗章龙就站起来提出主席团名单。我不记得人数和人名,但记得除陈独秀外都是反对派(即反对陈独秀的人),一切忠实执行上海中央路线的人都不在名单之内。这个名单通过了,蔡和森当选为大会秘书长。

共产党大会是“秘密的”,就是说不许报纸登载的。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都是共产党员当编辑,或能受共产党指挥的。后来有个什么报纸,为了透露 C.Y. 开大会消息,受了处罚。这种秘密,一面是为了免得加重武汉政府赤化色彩,一面是为了防备反动派袭击。武昌开大会也带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日第一小学就没有代表踪影了,会场已移过汉口来,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从开幕式至大会真实开始工作,中间还隔了几天。

黄陂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地方,油印也在里面,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有一间或二间房子,那里住着几名卫士。我们时刻防卫着反动派来袭击。门外,

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练机关枪。

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都是大会秘书长蔡和森的杰作。标语全文记不得了,但大意是记得的,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台下座位都坐满了,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其中很多军服,皮带,绑腿的人。C.Y.代表,那些小孩子,模仿上海小报体裁,写了许多字条传观,报告会场种种笑话,例如某某女代表“目不转瞬对着美男子李求实”,某同志“正在向油印处一个小姑娘进攻”,等等。大家对于大会都视为一种宗教仪式,仿佛进教堂听牧师宣讲或看神甫做弥撒,并不视为决定革命命运的会议。事实上确是这样的。真正的决议是在大会以外做的,大会不过是宣布和登录决议的机关罢了。演说的人不起劲,争论的人不热烈。瞿秋白的演说并没有小册子里那种锋芒,彭述之的答辩使人觉得他与瞿秋白意见相差不多。代表们如果对于当时迫切的问题有兴趣,在这大会上是得不到解答的。

扬子江心停着几十只帝国主义军舰,它们会对汉口和武昌开炮么?奉军已开到河南,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反革命政府,现在是北伐重要呢,还是东征重要呢?我们的过去朋友蒋介石居然敢屠杀工农,枪毙我们的同志,那么现在朋友汪精卫,尤其唐生智,是可靠的么?他们不会屠杀我们么?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问的,可是大会演说者不仅没有解答这些问题,连提也不提起。我只记得,一个四川同志,在粤汉车站附近区里做工作的,曾在台上骂“狗鸡巴徐谦”干涉铁路工人行动。此外,李维汉演说里我也听出一些微妙的暗示,并于我们和唐生智中间的并非完全融洽的关系。但没有下文,没有结论。人们显然是有意避开这个重大问题的。人们显然不肯于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决裂之后考虑一下我们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前途。

我不知道心里怎样有这许多牢骚。散了会或休息时候,我常找些熟人,可靠的朋友,在院内草地上坐着谈天,把牢骚发泄了一部分。后来,回上海,尹宽在党内刊物上写文章曾引用我的牢骚,说我在汉口早已预言唐生智将同我们决裂。其实在私人谈话中提出这个问题,以致预言的,并非我一个,最早的也绝不是我,但我并不去更正尹宽的话。

有一次草地上谈话时,罗亦农插进来。他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我说:“你从哪里知道的?”他说:“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大会进行得很慢,常常休会半天或一天,我很奇怪,走去问王若飞。王若飞愤愤然说:“内里还没有谈判好哩!”这里所谓谈判是指未来领导机关的人选说的。

外国人鲍罗廷,鲁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代替他的人,有与国民党接近的谭平山,有提出完整新理论的瞿秋白,有做过湖北省委书记,中国劳动运动元老,张国焘。可是,他方面,陈独秀在党内外的威权是很大的,明白攻击他的错误,这在现时是不合宜的,何况这三个候补领袖中间还有问题,——他们不肯相下。结果决定:保留陈独秀做领袖,但剪除他的一切羽翼。

选举那天,大会主席团提出名单来。过去在上海区和北方区负重要工作的同志都不在这个名单内。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

都不在这个名单内。陈独秀在这个名单内。这个名单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以致国际代表团主任鲁易不得不站起来抗议。鲁易说了很多的话,最后说:“像彼特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罗亦农)两同志,这个名单里面竟没有列入。他们过去负了如此重要责任,即使错误了,新领导机关仍须他们参加的。”有国际代表如此干涉,这两个名字终于加入名单内了,表决时也通过了。

未曾选举以前,李维汉就向王若飞表示他的愤慨。他说,他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采取的是“清君侧”策略。但是他,李维汉,不便说话。说这话时,我不在旁,这是若飞事后告诉我的。李维汉在湖南工作,属于上海的作风,不属于广东的作风,当然站在独秀方面,可是他距离得远,又有实力,别人拉拢他,不久新中央就选他为组织部长,从此他也参加“清君侧”运动了。

没有读过线装史书的人也许不懂得“清君侧”三字意思。这是东方专制时代一种反抗策略。人们不敢反对皇帝,只要排斥皇帝重用的大臣;不敢说皇帝错误,只说是大臣陷皇帝于错误。瞿秋白的反彭述之主义小册子就应用这个策略。他反对的是陈独秀,但拿彭述之做替身。大会开过后,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转变了。陈独秀仍是总书记,但执行着鲍罗廷路线。过去陈独秀和鲍罗廷的斗争终止了,广东作风风靡一切了,代表上海作风的人都调离中央面到各地方去了。总而言之,共产党同化于国民党了。这个“同化”含有繁多的意义。第一,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亲密团结的党,其中有阴谋和诡计,有暗中勾结,倾轧,竞争权位,正如我们当时所鄙薄的国民党一样。第二,共产党认真接受三民主义,拿孙文学说去证明中国有非资本主义前途,去辩护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征引孙文学说,不仅是为了对外宣传,而且是为了对内教育。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第三,党内组织渐渐采取国民党方式,连名称也是国民党常用的,例如中央主席团现在也称“常委”。第四,新加入的同志同所谓左派国民党员之间已没有什么大差别了。

最令我气愤的，是汪精卫来大会演说的日子。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赳赳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个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们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新中央成立后分配工作。彭述之派去北京，代替李大钊位置，罗亦农派去江西做省委书记，王若飞派去上海，陈乔年留在中央组织部做秘书，尹宽派去广东省委做宣传部长，我派去湖北省委做宣传部长。

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主张派我这个工作。这是一个相当重要位置，照大会情形看来，决轮不到我做的。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到“六十一号”去，找到瞿秋白，向他辞职，请求他派我到上海工作去。在上海，延年，世炎，若飞，以及其他多人都是老朋友，那里总比别处多保留一点过去的作风。我曾劝尹宽勿去广东，一同留在上海。但是秋白听到我的请求，立即变了色。他说：“大家都来拆台好了！”我又去找独秀，希望他能帮我忙，让我去上海。但他劝我留在武汉。无可奈何，我只好携带铺盖和箱子过江去武昌了。从此开始了新的工作，——不，工作是属于我的旧行业，但工作环境和对象则是簇新的。

* * *

共产党在湖北没有基础。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对于当地共产党运动似乎是很大打击。律师施洋被捉去枪毙。刘芬(伯垂),许白昊下狱,好久才释放出来。我在上海中央秘书处看各地来的报告,觉得湖北同自己地位比较起来,可说是最没有成绩了。我们只有几个人,陈潭秋,任开国,董用威(必武),许白昊,向忠发,等等,但没有什么斗争,没有什么重要的群众组织,例如安源之于湖南工作。湖北工作发展是北伐军到来以后的事情。下层工作人员是从湖南派来的,上层工作人员则是张国焘从广东带来的一批人,这批人也带来了广东作风。

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一开始工作就拼命增加党员人数,同志介绍的不够,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征集。应征的人是不会缺少的,因为共产党已是当权的党。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党员,但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五万。恰好同上海区一样。上海区一定有浮报,湖北浮报得更多。质比量更重要。上海同志是在地底下工作中发展的,投机分子自然也有,但一般是能吃苦肯牺牲的。湖北同志后来也有许多死得很壮烈,可是大多数是局势一变就烟消云散了。湖南同志很有理由看不起湖北同志。在某种意义下,尤其乡村运动,湖北工作是湖南工作的扩大,起初鄂南有几县还是受长沙指挥的。不过湖南对于广东作风有相当的抵抗力,湖北则很快接受了这个作风。

武汉成立中央后,张国焘不能兼顾,将省委书记职务交付于罗章龙,他手下的大将。大会开后,秋白要将这个重要位置给他的好朋友张太雷。为此问题,这两人中间起了争执,结果国焘让步。张太雷做了省委书记,但罗章龙也做汉口市委书记,工人,店员,以及一般市民运动自然归市委管理,留下给省委的是外县工作,即农民运动。市委设在汉口,省委则设在武昌。

张太雷并不欢迎我的合作。第一次开省委会议,他宣布“常

委”由三人组成：书记张太雷，组织陈潭秋，农民蔡以忱。这是违反惯例的，我不做声，而且暗喜，因为可得更多的空闲，让我游玩和观察。可是次日，开常委会议，他来找我去开会。我说：“昨天不是决定我不参加常委么？”他说：“他们说，那样不行。”他没有告诉我，谁是“他们”。

省委机关在武昌粮道街半山上一座两进大宅内，对外说是“鲍顾问”一个公馆。这是湖北什么小军阀的住宅，当作逆产没收来的。进门有七八个卫兵驻守着，后进房间住着本机关工作人员，如各部秘书，干事之类。我住在大厅左边房间里，军事部长周维桢和我同住。他在蒙达尔工厂同我一起做过工，住过那个木棚。他是四川人，那时思想离社会主义很远，后来才加入，由法国去莫斯科学军事。他是前任省委组织部长或宣传部长。新秘书长徐活萤，也是四川人，上海大学学生，也住在这机关里面。张太雷住在武昌湖上园，一座有湖水，有洋房子的花园，那时拨给俄国军事顾问团居住。陈潭秋住在武昌郊外自己的家里。

各部办公室在大厅左边小门出去一个洋房。武昌常有那种洋房子，建筑在旧式大宅后面或旁边空地上，在宅外完全看不见。建筑可以代表文化。这样新旧文化同在一个围墙之内，令我有奇异的感觉。旧宅大厅内摆着笨重的红木桌子，椅子，房间家具也是旧式的；新洋房楼上楼下则摆着写字台，新式椅子，甚至沙发，还有卫生设备，虽然有那设备的小房间特别的不卫生，我每次登坑宁愿到旧茅厕去。我想见当初屋主人如何努力保持着旧文化，但为了享受近代生活特别在旧文化旁边建立这个新文化，又严格把二者划分开来。洋房前面还有空地，布置着假山花木。

宣传部一个秘书，六七个干事，早已齐备了。我的办公桌子上放着新置办的纸张笔墨。秘书恽代贤，是恽代英的弟弟，从广东来的。几个干事，除了一个是湖南来的，一个是武昌某大学学生外，都是广东来的。女干事是李求实的爱人陈逸，一个男性化的女孩

子,她也是广东来的。

汉口有市委,武昌有县委,汉阳又有县委,我不知道那么大的省委机关做什么用?各县来的人都同组织部接洽,很少来找宣传部。我们七八个人简直没有事情做。太雷每天来一二个钟头,有时不来,他在汉口时候多,在武昌时候少;参加中央会议多,做省委工作少。开常委会时,他只报告些不着边际的话,凡是报纸上不能发表的消息,他虽知道也不告诉我们。我到武昌后,脚趾头烂了,起初右脚后来左脚,出门非坐黄包车不行;有一个时候,连下山到街上叫车的路也走不动,每日守在机关里,好久没有过江去。老朋友大多离开武汉了,留在武汉的也没有工夫来看我,以致发生了这样的离奇事情:在地底下工作时还知道世界的,中国的,以及党内的重要事情,如今担任了当权的党内一个颇重要的职务,反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除了不受人欢迎的几种日报所登载的一些不相干消息。身居“赤都武汉”,犹如住在桃花源里。

张太雷一定也是感觉省委机关太空闲的。他提议召集湖北全省党代表大会。这大会开了好多天。瞿秋白代表中央来做报告。多数决议案和宣言,要我起草,我忙碌了好多天。太雷说:“开省代表大会,就是召集各县负责人来训练的意思,所以宣传部应负大部分工作。”

省大会以外,宣传部每星期召集一次“宣传会议”。这是米夫老婆贡献的意见。米夫老婆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的顾问,她每星期带了翻译过江来,找我谈话,教我很多的宣传工作,我采纳了一部分。有一次,米夫自己叫潘家辰找我和乔年两人去谈话,我忘了谈的什么。宣传会议是武汉各机关做宣传工作的会议。汉口市委宣传部,武昌和汉阳两县委宣传部,C.Y.省委宣传部,全国学生联合会,湖北总工会,军队政治部,等等都有代表来。汉口市委宣传部分是向警予;学生会是陈德恩,总工会是梅中林,他是梅电龙的哥哥;政治部代表比较惹人注目,因为是军装,常来的是潘汉年,有一次

高一涵代替潘汉年参加会议,他也是军装。我做政治报告,各代表报告本周宣传工作,最后我指示他们下周宣传要点。完全是官样文章。如果记得我和政治的隔阂,我自觉如在桃花源里面一般,那么就可以明白我的报告和指示是如何不着边际的了。

政治在发展着,发展得很迅速而不利于我们。夏斗寅宣布反抗政府,从新堤开兵进攻武汉。武汉没有兵,军队调到河南北伐去了,军官学校学生武装起来,张国焘督促叶挺带着第二十军出去打,结果打败夏斗寅军队。吴佩孚部下改编的于学忠军队,在襄阳宣布独立,重新挂起五色旗。五月二十一日夜里,唐生智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动手,围攻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扑灭共产党在长沙城内的武力。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宣布反共,倾向于南京政府。武汉商店纷纷停业,不愿使用国库券和汉口中交两行钞票。在汉口的唐生智军队,传说也要动手了。有一天,张太雷报告邓演达弃职出走。他说:“邓演达表示得比我们更左,更激烈,但他这种行动是有害的。”

共产党中央没有邓演达那种勇气,宁愿委曲求全。秘书长蔡和森下命令总工会纠察队自动交出枪械给唐生智军队。

在这紧张局面下,省委机关从武昌迁到汉口来,撤消了汉口市委,省委自己兼理汉口本身工作。张太雷向我表示:“过去忽略本地工作是错误的。如果将开省大会的精力拿来训练汉口工人同志,一定得到更好得多倍的效果。”新机关设在总工会附近上海式弄堂房子内,地方小,规模缩小,工作人员裁去了好多。武昌县委似乎也撤消了,县委书记马峻山调来做秘书长。工作紧张起来,张太雷天天来,每天办公时间也比以前长得多,种种仪式放弃了,我的时间不再消磨在“部务会议”,“宣传会议”,“讲演”,“训练”,等等,而是跑各区,同区委书记接头,参加他们的会议,有时出席支部会,解决工人斗争以及其他琐细问题。开会是半秘密的,免除了仪式,近于上海的生活,因为我们准备着从公开的党变为秘密的党。

我提起了精神,停止了牢骚,起劲做去。搬到汉口不久,有一天,张太雷带了罗亦农来,宣布中央新任罗亦农做湖北省委书记,他自己则被调到广东工作去。局势改变了,作风也应当改变,在大会受了打击的人又渐渐重用起来了。组织部长陈潭秋也调了别的工作,接替他的是四川大麻子刘伯坚,我在法国的老同志,在莫斯科的老同学,后来做旅莫支部负责人。冯玉祥失败去俄国,刘伯坚代表中国学生招待他,两人谈得投机,到冯玉祥带了俄国军火,金钱和顾问回国,他也奉命同冯玉祥一路回来,立即做了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地位几乎同邓演达一样。此时,冯玉祥已经同蒋介石开了徐州会议,把刘伯坚赶走了。刘伯坚带了新娶的夫人,于右任的亲戚,夫妻一对麻子,来到武汉。宣传部长没有调动。

罗亦农上任后就在武昌旧时省委机关召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这是他在上海常做的。上海从来不开什么省代表大会一类的仪式会议,有大事就召集各部委,各党团,以及其他负重要工作同志开会,名曰“活动分子会议”。这种会议不载于党章,没有规定参加者资格,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区别,也没有选举。省委书记在这会议上报告一切为“活动同志”所必须知道的事情,然后发出训令,教人去执行。这种会议,对于暴动前后上海工作很有推动力量。这是为工作必要而开的会议。自从我参加湖北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报告中暗示了他对于过去湖北工作的不满意。他称赞湖北工作“框壳大”,我们好好努力可以使这框壳“充实”而真正成为共产党组织。

这个大框壳毫无用处。跟随军事和政治势力起来的党组织,一旦军事和政治失势,就都瓦解了。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所谓“左派”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开除共产党员。七月二十日我们准备一个总同盟罢工以为回答。事前,我们召集了各区委书记讨论此事。从他们的报告看来,我们觉得总罢工是有把握的。他们虽不很踊跃,但没有一个人反对,连怀疑也没有。二十日一清早,

我和罗亦农二人到码头,街道,工厂,以及工人市区去观察。可是没有。不仅没有总罢工,连部分的罢工也没有。这日,汉口有没有一个工厂罢工呢?一个工人罢工呢?我知道是没有的。即使有,也绝不是奉了共产党湖北省委命令的。罗亦农没有赵世炎做帮手,没有上海那种从下层斗争发展起来的组织和党员,仍是一筹莫展的。他的影响只及于各区委书记和委员,而这些人自己根本不能影响于汉口工人群众。在那种局势下面,总罢工不成,是可以了解的,是不会引起大惊异的。最令人惊异和气愤的是那些区委和工会负责人,他们保证能得若干工厂,若干工人,参加罢工。汉口的破产是太可耻了。我指的不是两党的决裂,不是斗争的失败,不是国际路线行不通,而是我们在汉口工人群众中根本没有基础。幸而外县,即鄂南靠近湖南诸县,对于反动有相当的抵抗。省委一个委员符向一,广西人,奉命到咸宁或蒲圻去组织农民暴动,成功了,而且劫了一次火车,得了一些物资以为暴动费用。罗亦农去那里巡视时,由我代理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不算是完全丢脸的。

国共分家的内幕,我不清楚。省委机关搬到汉口来后,我本有机会同中央方面的人接近了,但我没有利用这机会。自己工作紧张起来,没有空闲时间是一个原因;其次,朋友都走了,只剩下乔年在组织部,他也忙得很。陈独秀那时已经搬出“六十一号”,同黄文容另租房子居住,秘密起来,虽然每天还同国民党要人见面。他一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时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的同志。省委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见。这虽是无系统的,琐细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来定是当时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因为我们在这些要人身边都布置了密探。

就我所知的说,分共经过是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封锁了长江下游,武汉陷于破产,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中交两行正式钞票之外还发行国库券,工商业都入于停顿状态,资本家把这一切归

究于共产党,说工人和店员的捣乱是共产党煽动起来,上海南京的封锁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工人自己哩,对于共产党也没有好感,他们把共产党仅仅看做第二个国民党,并不看做自己的党。工人把总工会看做一个衙门,一个机关,是北伐军到后才有的。武汉政府的势力建立在军队上:张发奎和唐生智。共产党武力,叶挺和贺龙,是张发奎军队内一个部分。汪精卫以下的国民党领袖依赖张发奎赞助。张发奎也对共产党表示友谊。但是唐生智部下军官是反共的。他们都是湖南乡绅地主出身,自己的财产在家乡受了农民威胁。他们切齿痛恨共产党而同情蒋介石反共,但他们不敢发难,害怕共产党在民众间的势力,又害怕共产党联络张发奎解决他们。许克祥先发难了,他们还装着中立,以便许克祥失败时卸除责任。可是许克祥成功了,从此唐生智及其部下决定了态度。在武汉来搞“马日事变”显然比在长沙更容易些,如此容易,以至于连这事变本身都不必要了。张发奎武力在武汉比唐生智少,决不会为了袒护共产党同唐生智作战的。至于张发奎部下的共产党军队,唐生智不大放在心上。此时恰巧莫斯科来了训令,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五万工农军,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领袖,及其他两条。国际代表鲁易拿这电报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回去大发雷霆,这件事早已有人报告我们的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了。某次中央开会,鲍罗廷,鲁易及其他外国人都参加。鲁易正在侃侃而谈时候,周恩来把这事情报告出来,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请示国际,国际来电停止了鲁易代表资格,但已无济于事。有一天,中央秘书处或组织部通知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发生反革命可能,嘱他们躲避。张发奎军队也感觉到孤立,就借“东征”名义离开了武汉。他们开到九江和南昌就占领了朱培德的地盘。叶挺和贺龙随张发奎到江西去,在那里举行“八一”南昌暴动。这是以后的事。

秋白,国焘,平山,都离开武汉到庐山去了。与国民党有接触的一切头等和二等人,一窝蜂到庐山去。《民国日报》主笔沈雁

冰,后来改名茅盾,曾有一篇游记写他此时的庐山生活。陈独秀躲在汉口未走。我们几个做省委工作的人,与公开的政治生活向无缘分,无需要走,何况责任所在也不能走。

我们在汉口听到了南昌“八一”事变消息。此时秋白已经从庐山回来了,他一个人回来,其余的要人都在叶贺军中。八月七日前一日或二日,罗亦农告诉我,中央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由我代表湖北省委参加。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会议”。

* * *

会场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西式店铺旁边有个扶梯,走上去,一个外国人坐在前楼看书,不理我们。这是屋主人,一个美国公民,曾写一本小册子关于中国革命的。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们到后楼去,那里已经到了好多中国人。我们以后又有人来。人数到齐后,走进来一个身材魁伟的俄国人,皮肤如此白净是俄国人中少见的。秋白正要向我们介绍时,这位俄国同志就自己说:他名尼古拉。后来有些文件常拿N字代替他,他就是罗明那兹,七八年后为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斯大林枪毙了的。

到会的,除我和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两人外,都是第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除陈独秀外,都到会了,连我们二人在内,一共十八人。我不记得这十八个人是谁,因为时间如此短促,发言的人又不多,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秋白当翻译,自然参加;罗亦农参加,毛泽东参加,李震瀛参加,此外则记不起来。

这次会议惟一目的是为了通过一个很长的决议案。罗明那兹早起草好了,秋白早翻译好了,写得很清楚放在桌子上。罗明那兹说了一番话。瞿秋白读了决议案,然后让大家发言。毛泽东有发言,我忘记了他说的什么。罗亦农的发言,则我很清楚记得。他说:“国民党是不能维持他的政权的。”说完,他自己译成俄语。罗明那兹立即斥责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有可能稳定它的统

治。”

罗明那兹是第三国际派来接替鲁易的。他带来新的国际路线,叫中国同志接受,而且做成中国同志自己决议的形式。事实上,许多同志到会时才听国际代表说出这路线,才听到瞿秋白宣读的决议案。表决时,我也举手;我是因为国际代表提出的,才举手赞成,并非因为深思熟虑这个决议案,从衷心认为正确的。我想,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应当以真名称呼实物;是上级机关命令叫下级接受的,就应当做成命令或训令形式。“八七决议案”(或“告同志书”)后来印了很多,历史家总有幸运找得一份看看。我不记得其中所说新路线内容。没有主张退出国民党,是确定的。退出国民党的训令是九月间才收到的,我还记得九月中旬我同秋白到汉口俄国领事馆去,我在候见室中坐着,他走进里面去,出来后告诉我:“国际有电报来叫我们退出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已经都把我们开除了,“八七会议决议案”还在说我们并不放弃国民党旗帜。

“八七”时,陈独秀虽在汉口,虽是中央委员,却不参加。这个会议正是为了反对“他的”路线而开的。但自始至终,无论言语和文字,此次会议从未提起陈独秀的姓名。中央委员陈独秀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也未曾有人问过。我从私人谈话中早已知道国际为了陈独秀的“错误”停止他的工作。会议以后不久,陈独秀就回上海去了,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同他一路去。

记得“八七”会议以前某一天,周恩来曾请我们三人:罗亦农,刘伯坚和我,在天隆里门口一家四川馆子(甲秀楼?)吃饭,以吞吞吐吐的话说起党内的斗争,批评过去的错误,结论主张对于“二老”不为已甚。“二老”指陈独秀和谭平山,因为这个新领袖也受国际打击了。刘伯坚刚到汉口不久,不知道党内情形,他人又天真,听了这些话愤慨起来,我则表示出会心的微笑。

* * *

“八七”会议后，非名义上，但事实上，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独秀的地位。平山和国焘都在军队中，蔡和森不知道哪里去了，汉口中央除他以外只有李维汉，后来罗亦农也加入常委，这二个人资格都不及他。他要在大混乱之后整理一下，于是我又从地方工作回到中央来了。

罗亦农告诉我，秋白要我回中央去恢复《向导》，他不肯放我走，秋白坚持，他无法只好提出条件，要中央拿乔年同我调换。这话不一定可靠。我想是罗亦农为了刘伯坚无能力做组织部工作，向中央讨乔年来，而秋白提出我为交换条件的。这交换实行了。刘伯坚不知道调到哪里去，李维汉手下人多，不难填补乔年空缺。我的省委宣传部长位置，是华林补去的。

《向导》早已停刊了。独秀倒后，张国焘包办一切，《向导》也在他包办之内。人家编好的稿子送给他审查，他拿来塞在皮包里面，一两星期没有工夫去看，渐渐就停止出版了。编辑的机构也解体了。中间曾几次找人编辑，想恢复。一次去找沈雁冰。但沈雁冰有老婆，有几个小孩子，一家人需要生活。张国焘舍不得出这笔钱。他们早就想到了我，这个光身汉。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此次秋白来后，计划实现了。可是我一着手，就明白那时恢复《向导》决不可能。反动潮渐渐高涨了。我们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三个机关在我管理底下：长江书店，印刷厂和一家纸行。长江书店已经关了门，存书搬的搬，偷的偷，闹得一团糟，我只好不去管它。印刷厂和纸行都有麻烦问题难得解决。问题是旧日同志来敲竹杠，不答应时要去报告军队来查封“共产党机关”。我把纸行结束了，把印刷机器装箱，准备送回上海去，同时遣散了经理和工人，因为中央也有迁回上海的消息。我同秋白说：“《向导》没有办法恢复。”

秋白夫妇要我住到他们家里去。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

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汀。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我与潘家辰住在客厅里,小潘在毛子那里当翻译,是毛子和秋白中间一个交通员。住了几天,小潘带了一个女孩子来,庄东晓,刚从莫斯科回到汉口。同她一路来的还有好多女孩子,她们经过蒙古沙漠到甘肃,陕西,河南。此时冯玉祥已经反动了,但不加害她们,仍保护她们出境。她们来到汉口时,汉口也反动了。

寝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华的十五岁妹妹,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之华说是她的亲戚,姓盛,家里很有钱,但跑出来参加革命。这两个孩子同住在一个房间,不久就私订了终身。之华准备给他们旧式结婚,以增加这个房子的保护色彩。男孩子是中央一个机密交通,一天慌慌张张跑回来,说:“不得了!”原来,他从毛子拿来五千元,包在一包报纸内,路上被人抢去了,不敢见秋白的面。他急忙收拾了衣物,头也不回地走了。秋白夫妇回家,知道了此事颇不相信。女孩子哭哭啼啼怕他去寻短见。杨之华的哥哥那时在农政部或劳工部做小官,出去找,结果在去上海的轮船上找到他。第二日回来报告。之华怪他哥哥为什么不把这孩子拉上岸来。女孩子替她的未婚夫辩白嫌疑。后来回到上海遇见他,发现他在邮政局有存款,这女孩子才相信五千元果真未被盗劫的。但男的已经忘记订婚的事情了。

罗亦农同我说:“秋白爱用那些亲亲戚戚!”次日毛子就补送五千元来。秋白说:“这钱要害了那孩子一生一世的。朵斯退也夫斯基小说里有类似的事情,那个犯罪的人一生受良心谴责……”

印刷厂和纸行事情结束后,我清闲无事。秋白家里常有好菜吃,罗亦农家里也常有好菜吃,每天同潘家辰在马路上,长江边,游

玩。

炎夏过去,秋风渐渐起了,每晚长江边游人也渐渐稀少起来。随着秋风来到,武汉呈现一种荒凉。这荒凉不仅是由于季节的关系。做了一个时期热闹的首都之后,武汉恢复了它原来的地位——一个外省城市。一天下午,在凉爽天气中,我从秋白家里缓步到兰陵花园罗亦农家里来,因为这天中央在他家里开会,罗亦农备了好菜,约我去吃。转入兰陵花园时,我看见他的门口草地长凳子上坐着两个人,一时不很注意去看是谁在那里谈话。可是一个人喊了我的名字,原来是李鹤龄。同他谈话的,是军委同志欧阳钦。李鹤龄在痛哭,在流涕,在承认错误。他说,他一时动了感情,发了少爷脾气,登报脱离党,其他反动行为是没有做的。“前几天在我家里打了我一枪,可是我并不怨恨,党应当这样处置我。幸而我只受了轻伤,现在完全好了,请求恢复党籍,无论派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去做。”他刚才在大街上遇着欧阳钦,邀了来在花园里谈话。我说:“你写一封信来,我可以转达你的意思。”他同意,而且约欧阳钦二日或三日后,黄昏,在长江边什么码头会面,取他的报告。我们正在说话时,李维汉从对面走来,看见有我,就不注意别的人,而走入罗亦农家里去。到我进去时,他们问我为什么久久不来。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吓了一跳,一致认定李鹤龄这个举动不是出于诚意。他刚刚看见李维汉走进来,一定知道了这里是个重要机关。(我自己是等李鹤龄走后,到他处绕了圈子才进来的。)于是抛弃了很好的饭菜,大家分头从后门溜走了。后门正对着“八七”会议的那个房子后门。美国人已经离开汉口了,现在做中央工入部或工农部机关,这机关的负责人是李震瀛。

欧阳钦如约会见了李鹤龄,取了他的报告,后面没有签字,但确是他亲笔写的,我本认识他的笔迹。中央决定派他到海陆丰去,那里容易监视。我到上海后几日,在中央处听说李鹤龄同他的爱人也到了上海,住在某某旅馆,不久就去广东。我没有去看他。以

后很久,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说李鹤龄在海丰被彭湃枪毙了。是为了新的罪状呢,还是为了旧的事实?或者只是为了他根本不可靠而有反动能力?则我全不知道。

九月二十日前后,我和秋白二人同船回上海来。之华为了收拾行李和搬运那个西式公寓里的家具,须待几日后才能来。我们二人住在官舱里。秋白不出房门,三餐都在房里吃。我则到处乱走,但除了在统舱看见管理纸行的同志外,全船没有遇见熟人,满船是寻常旅客。同去时相反,这长江轮船也恢复故态了。

进潮或退潮？

我随着共产党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往上海来。秋白嘱我租一幢小洋房居住，因为中央准备于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再从上海迁往广州去而留我在上海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各埠机关。我租到了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现名亨昌里）末弄第一家房子，一种弄堂式的洋房。黄文容和我同住，几日后有一个姓黄的女同志也来居住，她不久就同中央交通处张宝全结了婚。

中央迁广州事情既然是渺茫的，这屋子就做了党报编辑部兼宣传部。但除了编辑一个党报之外很少做什么宣传工作。

我主张另出一个刊物，不必恢复《向导周报》。秋白同意了。我们二人拟了几个报名，结果采取了我提出的：《布尔塞维克》。编辑方面也比较旧时的《向导》进步了些，不是单篇文章漫无系统杂凑成功的，而有一种统一性，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每期有不署名的社论；有署名的论文；有各地通信；有读者来信；有时有追悼死者的文字。二十四开本格式，同《语丝》一般，即一张大报纸，裁成二十四张。我们每星期开编辑会议，互相审查写好的文章，分配下期的文章。秋白代表编委参加中央常委，又代表常委向编委做报告。社论，除了一篇，都是他写的。编辑委员会，除他和我以外，还有湖南来的曹典琦，谢觉哉和广东来的罗绮园。

我以编辑委员会主编或宣传部秘书资格，还管理一个印刷厂和一个发行所。印刷厂是原在上海的，发行所即是长江书店从汉口搬来的。汉口搬来的印刷机器尚存在海关未曾取出，后来好久才由几个同志集资开办一个营业用的印刷厂。

中央初迁回上海期间是个混乱期间：理论上，组织上，人与人关系上都是混乱的。三个常务委员，瞿秋白同毛子接头，比别人先知道重要消息和国际文件，遂被人视为一种政治中心和理论中心，但他没有总书记名义，不能建立像独秀过去那般威权，他与其他常务委员是平等的。罗亦农将湖北省委书记责任交付于陈乔年，汪泽楷也在湖北做组织部长，他自己则来上海做中央常务委员，他代表的不仅是湖北和上海两方面实力，而且被人视为“陈独秀派”的代表人物，渐渐地他扩大了权力，在中央内设立“长江局”，自己做主任，又设立“组织局”，自己做主任，形式上简直是苏联的斯大林。李维汉是第三个常务委员，他从湖南带了许多人来，安置在中央机关，这些人以前都是未曾在湖南外面做过工作的。

秋白和亦农有什么决议，必须经过这个中央机关去执行，换一句话说，即必须经过李维汉手下这些湖南人去执行，他们对秋白还好，对亦农则是怀有极深的成见。亦农无论设立什么长江局和组织局，结果都没有用处。

亦农只有一个方法能巩固他的地位，就是真正成为所谓“陈独秀派”领袖。但他不肯这样做。第五次大会以后，他动摇于两派之间。他从江西调来湖北做省委书记，一方面固然由于人家需要他，人家觉得张太雷的广东作风行不通，需要前任上海区委书记来接替他；但他方面，亦农一定向国焘和秋白有什么保证，决不会站在独秀方面反对他们的。亦农同我无所不谈，只有在这方面保持绝对沉默。

我们初到上海时，两派——陈独秀派和反陈独秀派——并不明显对立。过去，在武汉的阴谋组织，此时已经解体了。中心人物：秋白，国焘，平山，各走各的路。秋白留在汉口，占据中央，后二人则都在叶贺军中。平山做了“八一暴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国焘则躲在幕后挥鹅毛扇。叶贺若是如愿攻下广州，他们二人将在广州成立中央，而排斥一切不在军中的领袖。可是叶贺在潮

汕溃灭了。平山和国焘辗转来到上海，他们二人负了这个失败的责任。平山干脆被开除出党，国焘留党察看不知多少时候。这一方面是国际要找替罪羔羊去负潮汕失败责任，正如将陈独秀当作武汉失败的替罪羔羊一般，他方面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要利用这个机会排除竞争者的。与平山接近的人也受了打击。太雷为了防止平山的朋友在广东捣乱，便把杨匏安和罗绮园派到上海来。这就是罗绮园来宣传部的原因。罗绮园是广东群众领袖，他文章也写得好，而且很幽默的。住在宣传部时，对邻居说他是我的“表兄”。不久，“表嫂”也来了，还有四五个“表侄”。他知道中央为什么派他在宣传部工作。有一次曾向我表示他并不是平山一党，他和匏安向来看不起平山。此时反陈独秀的空气淡下来了。过去其实并没有明白反对陈独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对“机会主义”。八七会议的决议案未曾提起陈独秀姓名。下层同志也许莫名其妙，但与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汉失败责任不能归独秀一人担负；明白：独秀退出领导机关，完全出于国际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后，自己也是这般相信，至少表面装做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即去访问独秀，态度又是很恭敬的，同以前在上海一般。他从独秀家接回黄文容，来做我的帮手。《布尔塞维克》出版时，他也请独秀写文章，但独秀每期只写些《寸铁》一类的东西交来，署名撒翁，此外还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三民主义，糊涂道地，……》歌，每期都登载补白里。他住在福生路，以前宣传部房子前面，不常出门，只有一次来亦农家里吃饭，又有一次来我住处住三天。初到上海半年内，我未曾听到人家有对他不敬的话，空泛的反对“机会主义”文章或通告也是很少见的。每有大事，他常写信给常委贡献他的意见，但都未被采纳。

虽然如此，但内部斗争往往与他有牵连。“陈独秀派”小组织并不存在。首先，老头子自己反对进行小组织。在武汉时代，他毫无意思团结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实行抵抗。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

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他有很好的政治经验,有很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是缺乏根本的系统的理论分析。

武汉失败,到了上海,他有新的认识,常常根据这种认识写信给常委。可惜这些信没有保留下来,我看过后也忘记了。我只记得里面是些琐碎的意见,没有理为系统,定成公式,可是同当时常委的意见是枘凿不相入的。那时他仍没有另外进行小组织的意思。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工作精神。

但“陈独秀派”,无形中仍是存在的。江苏省委,即以前的上海区委,几乎全体是拥护陈独秀的。邓中夏是省委书记,但大权操在王若飞手里,若飞继承过去亦农,世炎留下来的基础,干部同志服从他,如同当初服从世炎一般。邓中夏讽刺自己说:“我,邓中夏,不过是副书记罢了。”事实上连副书记也不是。他努力造成一部分干部,同若飞对抗,但不成功。湖北省委,陈乔年,汪泽楷,任旭,是陈独秀派。北京,彭述之是陈独秀派。常委中罗亦农被人视为陈独秀派。倘若亦农果真是如一般人所期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难恢复武汉以前的作风了。王若飞就是为这个目标而活动,乔年来上海后,他们二人曾与亦农有几次谈话,把亦农向这目标拉去,亦农拒绝了,而且向秋白告密。新中央于是警戒起来,准备斗争。

各地失败,领袖们集中在上海,有的受了处罚,有的失去了工作,他们大部分住在重庆路附近一幢两楼两底房子,闲着打牌消遣,——其中不少坚决反对陈独秀的人物,如张国焘,李立三之类。他们表示拥护中央路线,愿意帮助中央来打击“陈独秀派”,首先打击罗亦农。周恩来来上海,立即加入常委,大家向他控告罗亦农。

若飞和乔年领导的力量不肯做亦农后盾，亦农于是成了孤家寡人，“组织局”取消了，“长江局”，他和李维汉平分，总之他退为普通常委的地位，而且渐渐更低下去。

彭述之在北京受了攻击，带了妻女回上海来，也在赋闲。亦农和他是仇人，若飞乔年鄙视他，他在这斗争中不能发生作用，只能抱住独秀一条大腿。如果说有一个“陈独秀派”，那么领袖是王若飞，老头子本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

我对于这种组织斗争毫无兴趣。若飞常找我喝酒，酒醉发牢骚，把许多的话都对我说了。他知道我虽不愿积极帮助他活动，也决不会把他的计划泄露出去的。我认为这几方面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来，他们的斗争只为了竞夺党内的位置。我一想起，立即头痛。老头子提出一些颇奇特的意见，但没有系统，因之我也不去重视他的意见。现在想起来，那时革命失败之后，惟有他一个人在思想，别人并不思想。秋白并不思想，他不过翻译第三国际训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或政治论文。蔡和森正在北京党校讲中国机会主义史，后来油印多本分发，但他不是思想革命问题，而是为了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我翻了几页，就丢开不看了。秋白仔细看了一眼，同我说：“和森这本书也是反对我，和森一向反对我。”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地方反对了秋白。那时有许许多多可以思想的问题，但没有别人去思想。

思想是如此混乱，以致于我负编辑党报责任的人不晓得文章怎样写才好。《布尔塞维克》创刊号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国民革命失败后我们应当怎样？》从题目可以知道文章内容。我是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之后，我们接到了中央通告，仿佛革命并非失败，而是更进一层发展的。我们离胜利是更加近的。我等待中央或其他同志写信来反对我那篇文章，但没有信来，也没有人提起，更没有人指出党机关报文章和中

央通告之间的矛盾。大家是如此忙于组织斗争,以致轻视思想和理论,竟没有一个人看出这矛盾!

但我自己得了教训,对自己说:“以后写文章要慎重啊!”慎重至于以后几期不写文章了。这就是说:我只写些零碎的文章,或常识性质的文章,或决不会有问题的文章。并非我看了通造之后忽然改变意见,认为革命并未失败。恰好相反,我仍认为革命是失败了的,但国际和中央(因为中央没有意见,一切关于理论方面的意见都是从莫斯科来的,或上海毛子想出来的)说革命更接近于胜利,总有道理,也许是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可以宣布革命失败。但以后看见中央布置确实是以革命更接近胜利为前提的,我心里又发生疑惑。他们果真是这般想么?何以我想的同他们想的如此不同?不仅中央方面说革命更向高涨,即使反对中央的人,江苏省委方面,若飞和乔年,也是认为革命更向高涨。有一天,若飞又带了酒来,我们一面喝着,一面闲谈内部种种事情。话题转到陈独秀致中央的信。我说这些信都是琐琐碎碎的,有些主张,我还明白,有些主张,我不明白。他说,他并不赞成独秀信中的意见。“不过他看得有时比别人深刻。譬如,前几天,我到 he 家里,他说革命是向下落的,我说革命是向上涨的,我们争起来。他问我:‘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士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于是我恍然大悟:革命是在低落的。”我只简单说:这个观察不错。我未曾向他提起我在《布尔塞维克》上写的文章。但我从此更注意独秀的信了。独秀自己并未曾把这意见写在信上,若飞也未曾将他的信念正式发表出来。江苏省委和中央的斗争,不知何时开始具有政治的和理论的性质。也许是在若飞有了这个信念以后罢?

我不写文章一连好多期,但无需要向人解释,因为从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到了广州暴动消息传来,我不能不写了。一方面,秋白忙着开会,没有功夫写社论,非我写不可;他方面,我觉得,过

去是我错，因为革命确实是在高涨的。我提起笔来写社论。过去的社论都是对于中国的或世界的时事分析。这种文章我写不来。我把自己心里想的问题写出来。不记得这社论的题目，但记得内容是援引此次广州暴动做证据，证明中国只有二个前途：一是张作霖准备建立的“大龙帝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交给秋白审查，我就付印了。下次开编委会时，秋白出席，没有说什么。再下次开会，秋白就报告：“某日，常委开会，罗迈同志（即李维汉）提出上期《布尔塞维克》上，超麟同志写的社论违反了国际路线。国际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前途是工农民主专政，但超麟同志文章里则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常委决议要我负责更正。本期社论，我就要写一篇更正上一期社论的文章。不过，超麟同志这篇社论给了我很好的启示。因为我每期写社论常常找不到适当题材，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栏来讨论理论问题。”我提出了若干疑问。秋白解答：工农民主专政是列宁一九〇五年提出来的，俄国那时尚且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哩，何况中国。秋白社论里说起：某期本报社论未经编辑委员会审查，其中大体不错，但有一点须加更正的，云云。次期，我想写一篇文章，放在讨论栏，反驳他。为此，我去翻书架上的俄文《列宁选集》，翻出了好几篇论工农民主专政的文章，仔细看了一遍，于是没有勇气写这篇反驳文章了，因为列宁是如此肯定俄国只能行“工农民主专政”的。从此我更加确定不敢写文章，直至脱离《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时候。^①

从过去发展以及此次广州暴动看来，中国革命政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列宁在俄国革命前所写的文章推论出来，则中

^① 我写的社论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登载于十一期，瞿秋白写的社论题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登载于十四期。我说的是大龙帝国和国民党政权，一边无产阶级专政，除此没有第三条道路。——作者新注

国革命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难道列宁这个理论是错的么,或者我不该这般估量革命前途么?

这个问题时常萦绕着我,直至一九二九年读了托洛茨基文章以后,才解决了。

但《布尔塞维克》上这次笔战,两篇不署名文章间的笔战,丝毫未曾引人注意。没有人写信或文章来,也没有人向我问起此事。秋白已死;维汉即使尚在,也不会记得此事;我记得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曾萦绕我好多时候。

* * *

此次中国革命爆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失败就告结束了。结果,除了国民党政制代替北洋军阀政制统治中国,南京代替北京做首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与革命前不同。自然,国民党政制是比北洋军阀政制更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此次中国革命在一般世界革命史上占据什么地位呢?我从上海去汉口途中遇见刚由俄国回来的潘家辰,他在轮船甲板上告诉我莫斯科的人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的见解。他说:“国际同志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我从这话第一次知道了这个革命,这个为我亲自经历的革命,竟如此受人重视。但对这见解,我存了怀疑,虽然未曾向潘家辰说出我的怀疑。四五个月以前,我才在上海区委办的党校里担任《世界革命史》一门功课,才温习了一遍革命史知识,法俄二次大革命的史迹和意义还很新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不敢拿此次亲自经历的革命去同那二次大革命相比。何况那时一般同志,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同志,心目中的革命乃是指此次北伐成功后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工人和农民如何斗争以促成北伐军的胜利,我们并不认为北伐就是革命,至多认为它是“国民革命”罢

了，而国民革命乃是从反动到我们自己的革命，到秃头无字的革命之过程中一个中间阶段。将中间阶段称为“革命”已很勉强了，怎能称为“大革命”？到了武汉，看到许多引起牢骚的现象以后，我这个见解更形确定。随后，武汉失败了，最后，广州又失败了，中国革命能不能称“大”的问题对于我就不成其为问题。可是，其他的人仍旧称此次中国革命为“大革命”，不仅在广州失败以后，而且在现在失败了十几年的时候。惟一记载此次革命的中文著作，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华岗的著作：书名就叫做《中国大革命史》！我以为革命未失败前国际同志的见解是可以原谅的，失败多年后还称“大革命”则不啻表明对于革命史的无知，或者抱持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此次中国革命，在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上，虽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于世界革命史中，但在其反面的消极的意义上，即关于领导机关所犯的种种错误，倒是很重要的，则是大有关系于未来中国革命以及同中国一般地位的国家的革命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对立起初表现于三个争论问题，此次中国革命问题就是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左派反对派》一章中详说，此处先作一般的观察。

领导机关的错误对于此次革命失败应负很大责任，首先因为此次革命的爆发并非客观的自发的，而是革命党自觉准备下来的结果。革命党主观和革命客观之间的关系，此次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爆发时，更加明显。巴黎攻陷巴士狄堡垒和彼得格拉一连五日的罢工，示威，暴动，比较上海五月三十日的租界讲演及继屠杀而起的大罢工，更多含有“自发的”性质。讲演和罢工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准备和领导的，至于巴黎和彼得格拉那两次暴动则没有一个政党去准备和领导，虽然也可说是过去革命者努力的成果。中国革命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在爆发以后还保持着，而且保持得颇长久，直至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北伐引起的新浪潮时候。这个计划性或自觉性照理应当

保障革命的胜利,可是反而促成革命失败了。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这里,每个人都会回答说:“因为领导机关犯了错误,”——虽然对于“错误在那里”和“领导机关指的是谁”,各人见解不同。

“宿罪”(根本的错误)乃在于没有正确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议决参加“国民革命”,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两大口号。这是划时期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本是十月革命的产物,国内外革命者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各方面感到没有出路时受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影响才走到共产主义来的。他们发起了或加入了共产党,本怀抱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可是现在这些理想收藏起来了,暂时不谈了,而回去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而斗争。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新路线,虽然对于何时再拿出原来的理想,以及怎样从“国民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两大口号之中“打倒军阀”是隶属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们仅仅把军阀看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仅如此,凡一切灾害,一切可引起斗争的对象都是归结到帝国主义去的。买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农村破产是帝国主义侵略结果,等等,等等。总之,人们转移了工农群众对于本国压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国主义,外国压迫者。中国一切灾害,归根结底,也许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如此单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本国压迫者只当他们是帝国主义工具来反对,往往会造成错误的结论。试举一例来说。农民生活的困苦既是由于农村破产,而农村破产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则农民斗争对象自然是帝国主义了,而不是切近敌人,地主阶级。农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要提出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直至湖南农民自发地没收地主土地拿来平分之后才提出土地问题,可见并非偶然的,可见是与一味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共

产党落在农民群众之后提出土地问题，其说明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土地革命自身，而是为了农民没收土地可以削弱地主阶级势力，而地主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在乡村的代理人，即结果也只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被认为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能相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这个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携手完成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就是拿这个“国民革命”理论来准备，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一部分农民，果然应召而起了。他们轰轰烈烈反对帝国主义，上海和香港的罢工潮也确实惊吓了帝国主义。在这时期，群众一般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很少走在共产党前面，我们绝对未曾听到“过火”论调。

可是这种一味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上海和香港的罢工都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效果。群众革命潮渐渐衰退而落人平时的轨道。到了一九二六年初春，运动已成强弩之末了。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时，秋白叹息说：“在这退潮时候，屠杀案是不能激起广大群众运动的！”果然，五月三十日上海屠杀案，只死了一二十人，能够激起那么大规模的运动；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案，死了更多的人，却只得到各地空泛的抗议罢了。

北伐划分革命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相当意义下，我们可以说：五卅爆发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北伐后才爆发新的革命。这个新革命则是自发的。我的意思是说：群众提出比共产党领导机关所提的更激烈的要求，甚至为这些领导者意想不到的要求，而且走到这些领导者前面去。严格说来，只有这个新革命才当得起“革命”之称，以前的革命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罢了。

新革命爆发于湖南农村。湖南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之一。在长沙的核心，从五四运动走到社会主义，并不比《新青年》

更迟些。中国共产党重要干部里,湖南人最多。在地理上说,安源煤矿是在江西境内,可是矿工大多数是湖南人,又有株萍铁路联系于湖南株洲,自始即成湖南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地盘。李立三是醴陵人,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就在安源做工作,鼓动罢工,组织俱乐部和合作社,那里有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支部,工人同志朱锦棠且被第四次大会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李立三走后,工作是刘少奇负责;以后,与我同船回国的汪泽楷奉了中央命令到那里去做支部书记,他也是醴陵人。安源矿工几次斗争得了胜利,成了很大势力,可是五卅那一年或次年春天,终于失败了。矿主,盛宣怀的儿子,勾结了江西军阀,解散俱乐部,枪毙委员长某同志,好多矿工离开安源散回自己家乡去。他们都在安源受过宣传和训练,即使在矿山是无所表现的,回到乡村也能成为农民导师和领袖了,何况其中有许多活动分子。这便是湖南农民运动超过其他各省的原故。北伐军进湖南,毛泽东在广州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也跟了来,他们也有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南农民被鼓动起来欢迎和响应北伐军,参加战争,缴除溃败北军的枪械。可是出于鼓动者意料之外,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竟不以这种军事行动为限,而提出自己要求了。他们的要求很迅速地升级,不久就提出土地和政权的要求,有几个县份甚至夺得了土地和政权。

革命失败后,许多研究家钻进故纸堆中,从《二十四史》,《九通》等线装书中发现出:中国古代农民曾几次进行过土地革命。可是,以前,我们一般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农民暴动,都以为是像明末的“流寇”,并不知道农民要求土地。我们读了俄国革命运动史,看见俄国农民如此渴求土地,又看见民粹派各种组织都以土地问题为主要政纲,心中都很诧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要求土地,中国革命者不讨论土地问题?中国革命者一般不知道土地问题,以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湖南农民的土地斗争震动了全国,不仅震动了地主阶级,而且震动了共产党领袖。共产党在农民土地斗

争中尽的是制动机作用。虽然如此，这运动还是向前发展的。共产党下级干部和党员，与农民接近的，也有许多赞助和领导农民自发的要求。湖南各地都组织了农民协会，都有武装队伍，有几个地方农民协会实际掌握了政权。北伐军向江西和湖北发展，这个土地斗争也跟着蔓延去了。同时，在彭湃领导底下，广东东江农民运动也更进一步发展，也到了土地斗争。

北伐军到了武汉，这个中国中部大城市，又触发了一个大群众运动。这里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有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也是群众的自发运动，即也是违反共产党鼓动者本意的。武汉以外，湖北诸小城市也有这个运动。

反抗群众要求的地主和店主，或过去劣迹昭彰的人，都受了惩罚。最轻的是戴了纸帽子游街，重的枪毙。枪毙了不少的人，最著名的是叶德辉，一个渊博的古学者；中国另一个渊博的古学者王国维为了这件事情在北京投湖自杀。古学者间既有狐死兔悲之感，则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中国革命进到了“国内战争”规模。我说的不是国民党军队和北洋军阀军队之间的国内战争，而是工农群众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上海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大城市，此时也爆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罢工”，即就是说：工人罢工为了改善自己生活，不管这工厂是帝国主义开的，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开的。北伐以前，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就已走上这条道路了。这罢工，共产党还能够指挥着。

这新革命的特质就是阶级斗争，即中国工农反对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甚至国内战争；与此相较，前期的革命可说是民族斗争，即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后期的革命，除了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斗争。决定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走到反动而屠杀工农的，绝不是那个民族斗争，而是这个阶级斗争。如果革命只限于“国民革命”，即只限于

“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亦即只限于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那么蒋介石也许真会打下北京之后再同我们算账的。可是中国工农群众不肯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所愿望的，自限于“国民革命”范围以内。

我知道，有些人要说：“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之正是反对帝国主义自身呀！”不错，不错。可是，我们这样说也是不错的，即是：“后期革命中，收回汉口，九江等租界的运动时，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帝国主义援助群众的仇敌中国资本家和地主的。群众在帝国主义身上反对的是中国资本家和地主。”非彻底进行阶级斗争，非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管理资本家工厂，中国便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因之也便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换一句话说：非超出“国民革命”范围以外去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便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在此次革命中共产党领导机关所不明白的，但工人和农民，他们明白，他们以行动表示这个认识。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并非仅指那些中国领袖，而兼指莫斯科的指导者，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总之指一切将中国革命限制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人。

上面说第二阶级的革命是北伐触发起来的，也许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当初若是没有北伐，就不会发生这新的革命。这结论是不正确的。不错，倘若共产党领导机关保持着那种错误路线，也许需要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来触发这新革命。可是，在正确路线底下，这新革命仍是可以准备，发动，而且领导的，同五卅爆发的革命一般。反之，在实际发生的形式之下，这个革命给人以恶劣的影响，给人以一种错误的革命观。

北伐以前，一般人，至少在上海作风下工作的干部，对于“革命”还有正确的认识，即认为革命主要是以群众暴动手段来实行的。党把主要力量，把优秀的干部，配备在下层群众运动上或党内

工作上，次一等的人才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这是为了准备以群众力量实行起来的我们自己的革命的。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革命观。可是北伐问题发生了。上海中央反对北伐。后来北伐居然胜利，而且由北伐引起了更进一步的工农群众运动，于是一般人，连上海中央在内，改变了原来的革命观。割据了一个地域，组织政府，编练军队，然后出发征伐，以夺取全国政权，——这个方式被视为主要的革命方式；而群众武装暴动退入于响应革命军的别动队地位。从此，党就把最好的干部派去做政府的和军队的工作，而留下次等的人做群众运动了。这个革命观甚至影响了国际同志。在莫斯科乡下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制造一种理论，援引中国特殊国情来做这个革命观的根据。这个理论是说：中国革命，与别国革命不同，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之可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北伐影响，他方面也是模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大规模的“红军”运动正适合于这个革命观。中国共产党割据江西和他省一县或数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和编练红军，然后出征长沙，南昌，以至南京。至于大城市如上海的工人运动则不过尽响应红军的别动队作用罢了。这个“革命”后来自然没有成功，红军长征到陕北去。现在国共再合作之后，人们已不谈革命了，即使暗中还谈革命，那也是割据“边区”，组织“边区政府”，编练八路军和新四军，候机会出征西南，东南，或东北的。广大群众运动仍是被视为响应八路军或新四军的别动队。不幸这个革命观在中国也有历史的类比，除了北伐以外还有辛亥革命，那也不是群众的行动，而是军事的行动。这个错误的革命观何时能抛弃，中国革命就何时有胜利希望。

可是我紊乱先后了。以上关于革命过程和革命观所说的话，并非那时（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我能说出的。我这个见解成立于看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言论以后，而且好久以后。这是第二次入狱后在狱中思考革命的结果。至于那时，我

虽思考着,虽怀疑着,但得不到明白的结论。

* * *

党内的斗争到了一九二八年春天形势改变而不利于“陈独秀派”。打击是从上海警备司令部来的。江苏省委机关被破获,许多重要的干部被捕,乔年亦在其内。若飞几乎被捕。一群人犯尚在巡捕房时,据说巡捕房索价二万元可以不引渡。中央不肯拿出这笔款,我相信是拿不出这笔款,或者毛子不同意,但若飞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意牺牲这批同志,为了便于解决党内纠纷。结果,引渡了。三个人: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在龙华枪毙,其余的人判了徒刑。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罗亦农也被捕,解往龙华枪毙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开第六次大会。大会地点定在苏联。从春天起,各地代表陆续出发了。毛子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其余的重要领袖都去了,中央只留下李维汉,各地负责的都是些新提拔起来的分子,或无经验,或无能力,于是全党感觉到很大的空虚。我留在国内做老工作,常委开会有时叫我去出席。常委负责的,李维汉以外还有一个香港工人罗登贤,新从广东来。应当有第三个人,但我记不起是谁。讨论的都是些琐碎问题,只有济南五月三日惨案问题有政治意义,此次我也被叫去出席。

以党报编辑资格出席常委以外,我以宣传部秘书资格又得了一个新工作,即指导创造社的工作。

创造社本是文学的团体,过去只出一些文学的杂志和文学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我看得很少,偶然看看也不合我的胃口。连写

实主义我都认为过时了，何况浪漫主义？我特别不喜欢郭沫若的诗，因为白话中夹杂着文言辞藻。此外，我回国以后完全被革命吸引了去，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北伐以前，创造社一派文学家与革命无缘，倒是他们的对头，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人与我们接近，例如沈氏兄弟就是我们的同志。自然，他们不是以文学家资格同我们接近。有一次，雁冰和光赤两人在福生路宣传部房子谈文学。雁冰说了些不满意创造社的话，光赤则替创造社辩护。雁冰走后，光赤说：“他算什么文学家！不过介绍些外国文学罢了！”沈雁冰那时的确只是“外国文学介绍家”。但他是老同志，远在我回国以前，曾担任过上海地委书记。我回国以后，他做商务印书馆支部书记，又做上海国民党工作，很努力而忠实。我曾代表上海区委出席商务支部，有个时候他也在中央宣传部内担任一点工作，我们常常见面，可是从来没有谈过文学问题。武汉失败，他回到上海后，无形中脱离了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在四马路一家绍兴酒馆遇着宋云彬，他就是雁冰一篇写牯岭文章中的“云郎”。我们谈到了雁冰，宋云彬就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几日后，我带了《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到窦乐安路景星里或景云里去访他。这是三层楼的房子，他的书室设在第三楼上。他告诉我，回来后已有五十多天没有出大门一步了，因为上海认识的人多，怕麻烦。我问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情，他说在写小说。他说：“最近出版的《小说月报》里有我的小说，你试猜看那一篇是我写的？”我没有功夫去买《小说月报》来看，因之没有去猜，直至以后好久才知道他用茅盾做笔名，发表他的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后来我是在单行本形式读了这三部曲。我曾将此次访问沈雁冰事情告知秋白。秋白说《小说月报》上有一个署名丁玲的人写了一篇小说，描写五四运动时候人的心境，写得很逼真，不知是谁？那时我对于文学如此无兴趣，竟懒得去读这篇小说。以后好久，我才知道丁玲就是曾经追求过秋白的蒋冰之。那日沈雁冰还是同我谈政治，他不满意

于八七会议以后的路线,他反对各地农村进行暴动。他说一地暴动失败后,即使以后有革命形势农民也不肯参加暴动的。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志明白反对中央新路线。他这反对暴动意见后来写在他的《从牯岭到东京》文章中。李立三当权时代,党所指导的文学刊物都攻击他,中央而且训令日本支部不认他做同志。一九二九年,我遇着杨贤江,他刚从日本回来,问起雁冰时,贤江竟视他同敌人一般。

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回头再说创造社。北伐出师,郭沫若不知如何做了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是这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向来不过问政治的,也谈起革命来了。一九二七年底或一九二八年初,《创造》之外还出了一个新杂志,一种月刊,我不记得名称^①。这是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写稿的都是些不见经传的人,创造社的人,如成仿吾,不过写了卷头语一类的东西。里面的文章,我不很看得懂,勉强看一二页就要头痛起来,因为句子长而复杂,文法和术语都很特别。宣传部其他的人看了,也与我有同感。我们的结论是:这些人都是初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日文也许很好,但中文尚未曾写通顺。我们当时决料不到这种佶屈聱牙的文体会在中国流行起来,成为此后五年间时髦文体,为青年人竭力模仿的,直至需要“大众语”运动来纠正它。

可是这新杂志里面有反对鲁迅和蒋光赤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反对很有理由。

鲁迅对于此次革命采取一种旁观的冷笑的态度。后来的人替他辩护,说他比谁都早公开讥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动倾向。其实,他讥刺的不仅是国民党的反动倾向,而且是整个革命。蒋光赤则回国后抛弃严肃的党内工作,而挂着“革命文学家”招牌,引起一般同志的反感。那时他创立了“太阳社”,办了《太阳》杂志和书店,借

^① 此杂志名《文化批判》。——编者

了党的权威做护符，在他底下，杨邨人和钱杏邨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文学二方面，比他懂得更少。无疑创造社的人是比他们多懂得一点。

秋白临出国前二三星期，曾在编辑委员会开会时告诉我们，说创造社请求我们中央派人去指导。他说，郭沫若同我们有关系，在上海时常同恩来见面；那批日本留学生回国，沫若本劝他们同党合作，不必另办刊物；现在我们有两位同志在创造社里面：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前者本是郭沫若的秘书，后者则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两人另办一个小型刊物。会议结果推举我去指导。我拒绝了，而推举秋白自去。我是如此不习惯于同党外的人办交涉，尤其同文学家办交涉。秋白以即将出国为理由来推辞。我只好应承下来了。但我一直延宕着，没有去做，直至四月底或五月初，江苏省委催了几次，才同他们约定一个时间见面。

临去一天早晨，我接到一封短信，称我“同志”请我去创造社时先到他家，施高塔路十二号，谈谈。这信写得很随便，好像写给多年老友一般。我看信后署名：“独清”。王独清，我知道这个名字，虽然未曾见过面，也没有间接的关系。但我没有先到他家里去；是为了同李民治约好时间呢，还是为了别的缘故，我直接到永安里去，在那里会见了十几个人，都是第一次会面的，连李民治（即一氓）和欧阳继修（即华汉）也是第一次会面的。创造社的人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彭康，李初梨，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成仿吾仿佛是他们的代言人，说几句欢迎话，替全体的人做介绍。接着，他说，他们设立了一个研究会或讨论会，讨论种种问题，希望我去指导他们。我谦虚一番，结果不能不说几句。我根据第三国际几次通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篇讲话是国际路线的，因之是斯大林主义的。我只能代表党的正式意见去同党外人说话。说完了，我请他们讨论。李初梨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今天的话，他以前未曾听人说过；他一向只懂得一点抽象

理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如此明白的解释,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心里非常感激。这显然是客套话。其他的人则限于提出几个不相干的问题。

这个会开得如此有礼貌,是我几年来参加党内种种会议所未曾遇见的。一九二六年有一次,国民党在闸北开会,曾请我去演说,柳亚子做招待,也很客气,但演说完后台下未曾有人说话。我这日在创造社的感想是:我没有来,他们一定先分配了职务,成仿吾和李初梨的语是预先想好的,为了取悦于共产党。他们欢迎我,只为了欢迎党。这个感想,我一直保留着直至两年以前。两年以前,一个偶然机会,我遇着苏州高君,他曾在苏州反省院,与李初梨一处。有一天,反省院当局召集全体犯人开会,叫一些反省期将满的犯人登台演说,以决定去留。有的人说了些无耻的话,惟李初梨侃侃而谈。李初梨说,他从日本回来本是空泛研究社会科学的,在上海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来创造社的一个人(他说,他忘记了这个人姓名)谈了一次话,才坚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说到此时,反省院当局就叫人把他扶下台来了,因为他的感情十分激动。高君十分钦佩李初梨,可是他说的这个故事,感动了我。假如李初梨说的这个人是我,那么他那天在北四川路永安里说的几句话,就是从心坎里说出来的,并不是普通应酬话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党外人本来看不到国际通告,过去内部的理论争论,虽然印成小册子在汉口公开发行,他们也未必见到。以后,我才送秋白和述之两人著的书到创造社去。这两副纸版都是从汉口带来的,秋白的书在上海再版,述之的书在上海印的只能算初版,因为武汉时排好尚未印。我不主张印述之的书,但秋白看了纸版,发现其中有许多机会主义,极力主张印出,为了便于继续打击述之。

从永安里出来,我一个人到施高塔路去。入门,一个胖子从床上起来,拖着拖鞋,迎接我,向我投射疑问的眼光。我报了姓名,于是一阵热烈的握手,我们立即成了老朋友。这个创造社人物穿的

是很随便的中装，其他的人物则是很整齐的西装，他高谈阔论没有拘束，他们则很矜持而有绅士气。不仅初见面如此，后来熟了也是有这个分别的。

王独清在他的家里等我，以致没有到永安里去；他听我说已经去过那边，颇有一点失望。他说：他有好多话要同我说。我们先闲谈法国的事情，谈蒙达尔，谈共同认识的朋友，谈他的爱人吴若膺，——吴虞的女儿。可是，成仿吾和张资平两人走了来，无疑是为了告诉独清以今天开会经过的。我稍坐一下就告别了。

以后，每隔两星期，我到永安里一次，没有人缺席，王独清也来了，每次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发表意见，互相辩论，最后由我做结论，而这结论都成了确定不移的。我明白，这是一种仪式，为了表示创造社愿意受党领导罢了，并非真正的讨论会或研究会。我渐渐失了兴趣。会开至七月底，我奉常委命令去巡视福建工作时为止。我不在上海，这个研究会或讨论会就不举行，——这点也是证据，证明我猜想的不错。

有一次去访王独清，他请我到新雅喝咖啡，那时新雅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才开张不久。他把创造社内幕告诉我。他说：“创造社的人可以分做二部分：一部分是‘已成作家’，如沫若，仿吾，资平，伯奇和我；一部分是‘未成作家’，如彭康，李初梨，等等。这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些‘小伙计’，如仿吾的侄子成绍宗，以及邱韵铎，龚冰庐等，他们有时也写文章。创造社中有的人有野心，要拿创造社这个组织，以对等资格，同共产党说话。资平是第三党人物，根本不可靠。伯奇是个小政客。那些未成作家方面，大多是新从学校出来的，都很纯洁，其中只有个别人颇有野心，我们须用力量去克服他。”

我去时，创造社已经停止攻击鲁迅了，我去后未曾讨论过鲁迅问题。也未曾讨论太阳社问题，但蒋光赤和钱杏邨二人仍向我控告创造社，指出刊物上批评太阳社文章的几点错误。例如，中国第

一个提出“革命文学”的是蒋光赤，创造社刊物则说是郭沫若；又如《太阳》上有一篇文章说：“知识生于经验”，创造社刊物则指为“唯心论错误”之类。我不记得怎样回答他们。但调停创造社内部冲突，则比调停创造社和太阳社更费力些。仿吾出国了，资平无形脱离，剩下独清和伯奇二人极不相容，但那些未成作家又共同反对这二个已成作家。闹的都是个人琐细问题。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两人不知何故认为有由我出头干涉的必要。以我的名义和宣传部的经费，李民治在他家里叫了一桌川菜请他们，席间说起他们内部的意见，请他们公开提出来互相解释一下。可是王独清不愿意，他说：“我们同夫妻吵架一般，上半夜吵，下半夜好，不值得讨论的。”别的人则一件件说出来了，大家解释了误会，尽欢而散。这个和解筵席，是否有真实效力，我不得而知。每次开会后，独清总是拉我到 he 家里去，或者上咖啡馆，有时还上酒馆或跳舞场，因此显得我同独清特别接近，伯奇大不高兴，其他的人则说我“受了包围”。由我的关系，独清遂和汪泽楷往来，他们二人本在法国认识；汪泽楷介绍他去见彭述之和李季，他在述之家中遇见独秀，由此结合了这方面的友谊，而促成这位创造社已成作家走到托洛茨基主义来，无论受如何打击和诱惑都坚定不移直至于死。

王独清那本有名的写广州暴动的长诗，就是在我认识他以后写的。他拿草稿给我看，问我用什么书名好，我给他题了“11 Dec.”。

我一向是把这些作家看作同路人，并未计划拉他们入党。六次大会后，蔡和森当宣传部长时，创造社党团开会请他出席，他表示同我一般的意见。他称他们为“德漠克拉西”。可是李立三继他后任和我脱离宣传部以后，不知何时，这些未成作家一个个人党了。一般说来，他们并不辜负他们的任务，上面已经说过李初梨在狱中的坚定。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朱镜我恰巧关在我的隔壁囚室，我们二人日日见面，议论虽不合，亦无恶感。出狱后，他在

新四军中；那年皖南事变，据说他为了避免做俘虏命运拿起手枪自杀（一说从担架上滚下深谷自杀）。彭康为一件恐怖案入狱，起初关在西牢，我在南京狱内看到苏州反省院刊物中有他写的一篇研究《老子》的文章，其中说老子学说合于陈立夫的“唯生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重视同志在反省院写的文章，那么他出狱后仍可算为一个好同志的。

* * *

广州暴动失败后，“革命高涨”信念似乎有点动摇了。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四人在莫斯科签名，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其中已不很乐观。代表们出国以后，李震瀛回到上海来，他特别找我去谈话，送我一本法文《欧洲年鉴》。我问起他签署的那篇宣言，以及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意见。他说，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尚未回到高潮，但已过了最低潮，现在开始上升。说时，他伸开左手拇指和食指成一V字形，拿右手食指指给我看。他说：“斯大林同志说的，革命已不在这里了（说时，他指着V字形的尖端），而是过了这里向上升（说时，他又指着左手食指上离V字形尖端半寸处）。”我不记得斯大林或国际其他同志曾于何时说过中国革命到了V字形尖端。我只记得过去所见通告都是说革命向上高涨的。难道说通告上不许说革命下降的话么？即使不得不承认过去革命下降的，也仍必须补充一句“现在已开始上升”的话么？我曾于广州暴动时唤起一点幻想，过后就不相信什么“高涨”鬼话，听到别人说“高涨”时，每次都要厌恶，——但我并未能由此做出什么有系统的结论。代表们出国后，不仅对外的斗争沉寂无闻，连内部生活也是奄奄一息的。七月间，李维汉派我去福建整理工作，因为有一个省委委员反动，投降漳州小军阀张贞，以致党组织陷于混乱。

我从上海乘船到了厦门。记得九年前，我从厦门乘船出发，经过欧陆诸国，最后坐西比利亚火车到海参崴，由海参崴乘船到上

海。环绕欧亚大陆一周,只差上海和厦门间一段路程未曾走过。如今填补这个缺陷了。闽西数县那时正在暴动,厦门报纸连日有暴动消息。但省委和暴动区域失去了联络,在厦门,漳州一带无事可做,福州更无工作。我到那里召集了全省代表大会(但暴动区没有代表来),鼓励了若干消极的同志,选举了新的省委委员,巡视了外县农村工作,直至九月,我才回到上海。到上海第二日,报纸上即登载厦门破获共产党机关消息。住在接头处的几个华侨学生被捕,外县也破获一个机关。但敌人主要目的未曾达到:中央巡视员已离开厦门了。中央各机关不知道我回来的人,看见了报,都在为我恐慌。

此时中央热闹起来了。在苏联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已经选出新的中央,那些常务委员也已经回到上海了。

我在大风雨中回到愚园路房子来,上楼,静和我相抱,喜极而哭。新婚后,这是第一次离别,四十余日的离别。静告诉我,新的宣传部长蔡和森已经来过了。总书记是向忠发,李维汉落了选,连候补委员都得不着,正在办交代。秋白,国焘,若飞三人扣留在莫斯科,不放回来。李立三以候补委员资格回来,为了正式委员中有人出缺,递补上去。新中央开会已经决议仍任我做党报主编兼宣传部秘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颇不快活。此次,我没有兴趣又在蔡和森手下做工作。他的武汉作为和他的《机会主义史》引起我的鄙视。现在难道找不到别人做他的秘书么?我向向忠发报告了福建巡视工作以后,就提出辞去新任秘书之职。人家不许我辞职。

汪泽楷也回国了,他来找我,告诉我六次大会种种故事。“陈独秀派”团结于王若飞周围,成为大会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和其他反对中央的各派联合起来给中央以打击。秋白受了打击不得回国,李维汉受了打击不能当选,李立三受了打击几乎不能当选。李维汉完全是被何资深打下去的。

云南代表王懋廷来找我，他是静的同乡，以前我未曾见过他。他交给我一封药水写的秘密信，又告诉我写信用的药水和洗信用的药水。我到药房配了药水来，把信洗出，原来是若飞写给独秀的长信，报告他关于第六次大会经过。若飞此信本来写成公开的信，交给新中央送给独秀的。但因信内对于某些领袖有不恭敬的话或为了别的原故，中央收下来，不肯送递；若飞明白信转不到，才将这封信写成秘密形式，托王懋廷交给我转。王懋廷和我们这些“陈独秀派”本无渊源，他是从自己工作经验而成为当时中央反对派的。他在思想理论方面比较当时的所谓“陈独秀派”还更进步些，据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或第三国际大会中国代表团会议上，总之是那时莫斯科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公然要求讨论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许多代表，无论是中央派的，或反对派的，回国后私人谈话中都说起这件事情，拿来作为托洛茨基派在苏联活动的证据。“连中国代表也受影响哩！”但王懋廷为了同“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未被扣留在莫斯科，如王若飞，刘伯坚等，回国后也未曾受处罚，如汪泽楷，任旭，何资深等，——他仍回云南省委书记原任。也许他正为了同受压迫的“陈独秀派”没有渊源原故，才敢在莫斯科公开说话罢？王懋廷回去云南工作不到一年，就被龙云捕去枪毙了。

新中央不许我辞职，但实际上我没有做工作，党报和宣传部，自从我去福建后就在停顿中。我不知道这个僵局将如何打开。可是出人意外，我从福建回来没有多久，似乎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倒了。北方同志在大会以后才向新中央控告他在大会以前种种罪状。我不记得这些罪状，因为在这党内斗争风潮中一个同志被控告的罪状并不引起我的兴趣。新中央根据这些罪状查办他，革除他的常委资格，因此他自然而然不能继续做宣传部长了。

新任宣传部长是李立三。推翻蔡和森时，他有重要作用。他是大会选出的候补委员，似乎是末了一个候补委员，但选出的中央

委员有好多已经死了,或反动了,或消极了,或受处罚了,他一步步递补上去做了正式委员,现在又加入常委,而且担任宣传部长。第一次来宣传部开会时,他演说:“我们的党缺少一个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言下,大有自己将成为这个中心之意。我暗笑。但我笑错了的。从此开始一个时期内,李立三果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心和政治中心”。罗绮园问他关于六次大会上内部斗争的事情。他报告了一点,结论是:一些反对派都不是在原则立场上结合起来的,没有原则结合的党派决不会长久存在。会开完时候,我又提出辞职,他哈哈大笑,就把别的话岔开了。在他催促之下,《布尔塞维克》又出了几期。

在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回到中国来继续发展。陈独秀本人仍旧站在这个斗争圈子之外。汪泽楷向他报告了第六次大会经过以后,请他积极行动起来。他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立一个新党。”汪泽楷向我转述这话,摇摇头。我们当时认为在旧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恢复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干部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有兴趣。有人去找他,说了几句话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为了研究江浙读音,他还请我带他到沈雁冰家里去。我们对于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汉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确实用了许多工夫。一年多后,他写成了一本书,其中创立了三十多个中文字母,大多数是罗马字母,有几个是希腊字母,还有一个和二个是他新造的字母。拼音规则颇复杂。分成北京语,吴

语，粤语，闽语四种方言。这稿子写好，交付于他的几位北大老友，语言学专家赵元任似乎见过这书。如果不毁于“一二八”炮火，这部稿子定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过去著的《字义类例》和入狱后写的关于文字学的文章，可知他对于文字学本有兴趣。这汉字拼音工作，本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展开。

陈独秀的文字学即使不是曹参的酒，但他的站在党内斗争圈子外的态度仍是需要解释的。他的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若飞从莫斯科写给他的长信中曾告诉他以敌人这个认识。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我试来解释一下。我认为他自知反对他的是莫斯科，而不是中国那些领袖；他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他并不把若飞等人看做“他的”群众，他认为一切党员都是他的群众，连秋白自己也是的。为此原故，他于研究文字学余暇，只限于为某一特定问题贡献一点意见，而不肯组织一种反对势力。

在他这种态度之下，所谓“陈独秀派”的活动必然是要失败的。若如李立三一般说的，若飞团结的一部分人仅是个人团结，而没有原则的基础，——那也是不对的。仔细研究起来，当时这一派与其他小派别不同，他们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结合，而是有一种原则，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得来的，或从陈独秀谈话里启示出来的原则（主要是认为革命在退潮中，不是在进潮中），——模糊的原则，没有人明白提出来，也没有人敢彻底思想下去。这是一个有原则的派别，不仅从这些人后来差不多全体参加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可以证明，而且表现在有名的“江苏省委议决案”里面。这个“议决案”，是若飞未出国去参加大会以前起草的，但以项英为首的江苏省委另一派并未正式通过，不知何故莫斯科中山大学把它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发表了。托洛茨基看见了很高兴，特别为了它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它暗合于左派反对派的主张。可是这一派有个根本

错误,即是把斗争限制在第三国际法律(Légalité)许可的范围之内,以中国若干领袖为对象,而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对象,反而思量借斯大林和布哈林力量去打击中国领袖。这打击也相当成功,秋白和维汉都倒了。但继他们起来的,是比他们更坏的敌人:李立三。

若飞没有回国,过去江苏省委反对中央的倾向遂为项英利用去。项英是李立三的竞争者,他的对头。一九二四年,我初回国时,上海微弱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们二人分别领导的。一个负沪东责任,一个负沪西责任,二人比赛谁的成绩好,结果立三成绩更好些。现在立三做了全党“理论和政治中心”,项英首先不服。他不知担负一个什么职务,大约是负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但他的力量在江苏省委,大会以前他似乎是省委书记。新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委委员何孟雄拥护他,但蔡振德和马玉夫(即马禹敷)保存过去王若飞的传统。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李立三中央。斗争结果,江苏省委宣布“独立”。江苏经费有独立的来源,无需依靠中央接济;江苏又能单独与外省通信,有希望某几省起来响应。声势非常浩大,但不多几日就烟消云散了。周恩来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会,保证了外省的忠实。向忠发,李立三等又威吓项英,指项英为唆使人,虽然项英自己并未露面。项英经不起威吓,屈服了。解铃还是系铃人,结果江苏省委恢复原状,除了蔡振德和马玉夫二人退出。正当风潮开始时,何孟雄日日问蔡振德:“超麟为什么还不来?”蔡振德不知怎样告诉他,我是与江苏省委一致的。李富春自己到我家里来找我,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宣传部工作,而且把愚园路房子顶掉,搬到李民治家里去住。富春要我去帮忙,允许给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要我帮忙,并不令我惊讶,因为我的怠工和赌气是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交换条件”则令我惊讶。富春这个手段也许是做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候学来的。但我还是去“帮忙”。我在蔡振德家里,同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三人帮助江苏省

委写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可是没有一篇采用，因为都是超过了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人的政治界限以外的。

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或二月间的事情。那时我早已离开宣传部了。起初，李立三上任后，我第一次辞职未准；第二次辞职，他说没有人接替，须待有适当的人时再来考虑；第三次辞职，他仍不准，但几日后他派了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潘文育来宣传部，要我派给工作。我明白他已经找到“适当的人”了，于是坚决辞职，得到了允准。他们没有派我新的工作，但允许我们夫妇去莫斯科读书。我和静先搬在李民治家里住，从那里再搬到蔡振德家里去。蔡振德坚邀我们去，李民治和潘汉年则挽留我们。我住的本是潘汉年夫妇的房间，是暂时借住性质，因为这两夫妇回宜兴去。他们回来时，不要我搬家，而住在李民治楼下大房间去，我不自安，但主要是为了政治倾向原故，终于搬到施高塔路恒丰里延年被捕的屋子隔壁三层楼上。那里二层楼住着蔡振德夫妇，亭子间住着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和他的女儿，此时刚出世不久，尚没有名字。

三月十八日，我们在这屋子里被捕。

第一次入狱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蒙达尔森林中,薛世纶征求我同意参加发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时,我是迟疑了一下才表示同意的。这迟疑并无关于思想和认识。我的共产主义那时已经成熟了。但从思想走到行动这个关头,需要下决心,需要有不惜入狱,受刑,被枪毙的决心。

在中国,为共产主义运动入狱的,陈独秀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任了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捕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而且永远驱逐出法租界。在他自己,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入狱了,不过为了共产主义入狱是第一次。

除此以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二七”,是否有党员入狱或死难,我不知道。“二七”是轩然大波。除当场中枪死的党员和群众及被处死刑的林祥谦和施洋不算,中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的,在汉口有刘芬,许白昊诸人;在长辛店有史文彬,吴雨铭诸人;在上海有李启汉,韩白骅诸人。汉口和长辛店被捕的,直接与铁路罢工有关;上海被捕的则是间接的关系;李启汉负工人运动责任,韩白骅是《向导周报》发行人。一九二四年春天,张国焘和杨志烈两夫妇在北京被捕。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们更加痛切感到迫害,因为几个月前国焘曾在这里东方大学对我们演说。那时谣传这两夫妇受了严刑,且说国焘折断了一条臂膀。冯玉祥“倒戈”之后,两夫妇释放出来,次年春天来上海,我问国焘狱中受刑经过,他说并未受刑。

“倒戈”之后,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似乎没有遇着迫害,直至五卅

前后。顾正红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为赴顾正红追悼会在戈登路被捕的韩步先,朱义权等四个上大学生则都是共产党员。四人定于五月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审判,这就是五卅演讲和继起的屠杀的一个原因。在讲演时被捕的学生,列为第一名被告受审的瞿景白,秋白的一个弟弟,是共产党员。在屠杀时当场死去的何秉彝是共产党员。二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高潮中,与上海总工会同时也成立了“国际革命者救济会”(M.O.P.R.)的中国支部。为采取一个通俗的名称,陈独秀便定名为“济难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经费很充裕,负责的同志都做绅士打扮,以便于向那些高等华人交际和募捐。事实上也是一个宣传机关。济难会初成立时,没有什么人狱的或死难的革命者待它救济的,因为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一般不敢动手,或不知道怎样去动手。复工后、退潮期间,流氓曾来捣毁总工会,常玉清诸徒弟曾将李立三绑到常玉清那里去,强迫承认什么条件,最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通缉它的委员长李立三。但李立三逃脱了。济难会救济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刘华,一个四川人,很好的青年,在上海大学或附中读书,受李立三指导,在小沙渡做工人运动。五卅前后,小沙渡无数次罢工之中没有一次与他无关的。他成为公开的工人领袖。中外资本家恨他刺骨。孙传芳到上海后,他害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没有活动,而且表现消极。病后有一天在公共租界电车上被捕房密探认出了,立即被捕,路过四马路,有几个工人看见他,而且同他说了几句话。不久,他解到龙华去。以后就听说他在狱中被孙传芳秘密枪毙了。据说孙传芳在总商会某次宴会中,有几个资本家向他诉说刘华如何“可恶”,请他枪毙的。我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上海暴动成功后,总工会曾公开登报寻觅刘华遗体,似乎未曾寻到。第二个受救济的是周水平。周水平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在江阴鼓动农民反对地主,结果被当地豪绅勾结军阀把他捕去枪毙了。济难会为

了表示不是共产党机关,也救济了这个死难的革命者。

说到江阴,已经走出上海了。从五卅屠杀直至暴动时期,共产党员除了刘华以外似乎没有别人受迫害的。但其他地方就不能这样说。差不多与五卅屠杀同时,青岛也发生了屠杀,可惜为上海大潮所淹没了,知道青岛屠杀的人比较少。这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负责的人是与我在蒙达尔工厂做工的李慰农。七月间,李慰农终于被张宗昌捕去枪毙了。

为了抗议五卅屠杀,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同国内各地一般,也发起一个运动,他们用传统方法,包围公使馆,强迫陈篆签字在什么文件之上,结果法国警察来驱散了,领导者任卓宣,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书记,被捕,判决了一年徒刑,确实在有名的 Santé 狱中监禁了几个月。

“三·一八”当场中枪死的人比“五卅”那天死的更多了。死者之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但没有我认识的人,乔年在纷乱中胸前挨了一刺刀。屠杀之后,段祺瑞还公布了一个通缉名单,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最重要的是李大钊。许多人离开北京到南方来了。

北京屠杀之后二日,广州也出了乱子。蒋介石派兵包围俄国顾问团,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逮捕或软禁黄埔学校里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此次虽然未曾杀死一个人,虽然除李之龙外其他中国的和俄国的革命者不久都恢复自由,李之龙最后也释放了,但是在迫害革命的意义上说,“三月二十日”是比“三·一八”更加重要的。后来的白色恐怖并非出自段祺瑞,而是出自蒋介石。

五卅以后,北伐以前,湖南发生过二次屠杀:水口山和安源。水口山死者不知是否同志,安源工人俱乐部主席,被枪毙了的,确实是同志。

在此时期中,北方,保定组织被破获,被捕了许多同志,大多是

男女学生。负责人高风,为了免除其他同志罪名,便把一切责任都认在自己身上了,结果牺牲了他一个人。

北伐军兴,阵亡的同志一定不少,但没有我认识的人。袁庆云随军出发,死于郴州,但他是害虎列拉死的。武昌,一个繁盛的丁字街头,竖立一个纪念碑,我到那里时碑还是新的。湖北省委机关中人告诉我说:这是纪念围城时被北军杀死的某个同志。

但从此以后共产党员牺牲的就渐渐加多了。我们回到上海来罢。当共产党准备上海暴动时候,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有一次闲谈说:暴动成功,我们三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的,但不知哪个先牺牲?第一次暴动时,我们的同志死了奚佐尧,陶静轩若干人。报纸详细登载他们被捕,审判和枪毙的经过。他们都承认是国民党员。秋白看了报后,向我表示他的感慨。他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塞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秋白不知从这个感慨做出什么结论没有?能彻底思想的人,当时应当做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而独立起来,必须以自己的面目对着群众。

第二次暴动时,上海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巡行街道,遇着发传单的或喊口号的人立即斩杀。死了好多的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除了大刀队以外,警察和包探还逮捕许多有嫌疑的人或示威运动时常露面的人,其中有好多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些被捕的人大多判决徒刑,监禁在漕河泾监狱,暴动成功后总工会纠察队派了一队人去迎接出来。

第三次暴动,在巷战中阵亡的同志,我都不认识。暴动成功,纠察队逮捕了几个特别出力的警官和包探,结果不知如何处置。可是此时,我们已经感到新的威胁了。占据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是蒋介石属下的第一军,但是蒋介石一路来的反动事迹,我们已有所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他捕去枪毙,九江总工会被他买通流氓捣毁。难道我们的盟友蒋介石将代替我们的敌人孙传芳和张宗

昌来迫害我们么？

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事情。头一日晚上，何今亮又去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曾在电话中叫何今亮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暴动前后，杜月笙一派青帮通过纽永建与我们合作。第二次暴动时，我们在法租界设了指挥暴动机关，就是依赖杜月笙保护的。何今亮是我们同志中与杜月笙接头者之一。他假名汪寿华，身份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四月十一日晚上他坐了汽车到杜月笙那里去，从此不再回来了。次日据汽车夫报告，他被扣留，而且被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最近，友人谢澹如读了我这个回忆录，托人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汪寿华死难经过。据他说，汪寿华被扣留，而且解往新设的公安局去。公安局怕负责任，不敢拘押他。夜里，放他出来，故意把路灯熄灭，埋伏了人在后来的蓬莱市场近旁，俟他走近来时，开枪打他，他带了枪伤倒毙在谢澹如亲戚家的后门口。这故事是很可信的，因为当时别处也曾采取这种杀人手段。

在缴械时纠察队阵亡的，以及示威游行时群众被屠杀的，姑且不去说它。我们只说以后的白色恐怖。施行恐怖的机关是龙华司令部，施行的人是侦缉队长杨虎和政治部主任陈群。杨虎和陈群两个名字当时是联在一起说的，以致成了“养虎成群”，一句象征着恐怖的话。但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他若落在杨虎手里就没有命了。被龙华司令部捕去的起初是那些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仅在上海做工作的，而且在别处做工作逃来上海的。死的人很多，但我认识的人则不多。上海大学学生何洛和他的爱人刘尊一被捕了。男的是民选上海市政府委员，而且兼什么局局长，女的则是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之一。刘尊一，北京某大学学生，一个四川姑娘，与赵世炎的二个姊妹和其他的女学生结拜“十姊妹”，相约不

嫁。此时其中已有过半数背约了，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也已有了爱人。现在，她和她的爱人在等待着死刑。可是，司令白崇禧的另一个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她，杀了何洛而娶了她。“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她的同乡欧阳继修常念这二句旧诗，欧阳继修曾有一本长篇小说写这件事情，但我未曾读过。

这一批被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宣中华和安体诚，两人都是从杭州逃到上海被捕的。宣中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是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都是杭州有名的共产党员。在杭州被捕被杀的还有好多人，但我不知道。

与上海同时，南京也实行屠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全体被捕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们，放他们出去，但埋伏了打手在街上，开枪杀死他们。其中我认识的有主任委员侯绍裘，他本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在上海时与秋白同住在菜市路；有谢文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有张应春，妇女部长，柳亚子的朋友，柳亚子有许多文章纪念她。一九二六年间，她在上海，为妇女运动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找陈碧兰，因此与我相当熟。

“四一二”恐怖，死的人很多，蒋介石军事系统下各地都有牺牲者。一九二八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时，厦门的同志都向我称道一个同志，厦门大学学生，死难者之一。一九四〇年我回上海途中路过宁波时，看见宁波中山公园进门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国民党“四一二”屠杀宁波共产党员的“功绩”。需要未来的历史家来详细记载此次恐怖，我所知的是很有限的！

在广州的恐怖称为“四一五”，即比上海迟三日。那里的事情我更加不知道。全国总工会内的李启汉被杀了。黄埔学校中死难的，我认识的有熊雄和萧楚女。但我特别怀念一个姓陈的青年，他是我的小同乡，当我去法国时，他在漳州师范一年级读书，当我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他从家乡写信给我，讨论革命问题。以后，他去广州，我介绍他去找陈延年，结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他也死在这次

恐怖中。据说，他四一五被捕，拘押在集中营里，以后才被杀的。

此时前后，张作霖也在北京与国民党竞赛恐怖了。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人中，我认识李大钊，范鸿劼，李季达，谢陈常。李秀达是我的莫斯科同学，回来在天津做了很久工作；谢陈常曾与我同在蒙达尔做工。他们的死是张国焘在第五次大会上宣布出来的，大会为他们静默几分钟志哀。关于他们的事情，报纸登载得很多。

我到汉口后，上海的恐怖又踏进了新的阶段。陈延年被捕了！上海报纸登载老狗吴稚晖致杨虎的贺电。老狗电中说：捕得小陈比捕得大陈更加有意义，因为在共产党内小陈比大陈更加重要。老狗仇恨陈延年，是有原因的。陈延年过去与他同属于无政府主义，可是“少年共产党”发起时，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来了。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吴老狗的死对头，他的假面具就是给我们揭下来的。延年被捕消息震动了全党。因为他是广东党内负责人，他初到广东时那里只有几十个同志，不到三年发展上万，工作的发展更不用说。全党对他有很大的希望，有人说国际要他代替他的父亲为全国领袖。又因为过去的恐怖只限于牺牲那些做国民党工作的人，或做其他公开工作的人，如今进一步要牺牲党内重要组织的负责同志了。我不知道延年死难经过。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罗亦农在上海公馆里请吃饭，席散后，苏兆征，王若飞和我三人尚在斗酒。苏兆征已经醉了，不知怎样提起延年，他大声哭起来。他说，他的眼泪只好流人肚里去。

不记得那一日，总之是国民党也在武汉宣布反共之后，罗亦农代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时候。亦农和我在浴堂洗澡，我们无意中谈起赵世炎的皮肤病。亦农忽然用俄语同我说：“Радин арестован！”（辣丁被捕了！）我吓了一跳。辣丁是世炎的俄文名字。当时党内对世炎被捕消息保持秘密。同志间偶然知道这消息时，问负责人，负责人都否认，或者说：“不错，上海又有一批同志被捕了，其中有个工人同志自称是赵世炎，为了欺骗杨虎，以便世炎脱

逃。”这秘密是表示我们在上海正设法用贿赂或其他手段营救世炎。延年死后，我们的党不能再有这个损失了。党内的人知道陈延年的多，除北京和上海同志以外很少知道赵世炎的，这两地同志也不很知道赵世炎的重要。延年和世炎各有所长，假使两人交换了工作，不知道成绩怎样？延年不是广大群众领袖人才，他所长在于运筹帷幄，指挥同志工作。世炎是群众领袖，运筹帷幄能力，我看，并不下于延年。这两个同志又是十分纯洁的，俭朴的，毫无个人野心，绝不似罗亦农和彭述之，又极能取得同志信仰。我未曾听见人对这两个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们死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党内斗争时期，这斗争结果至于分裂。延年和世炎如果不死，不知道怎样？这分裂自然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可是斗争和分裂方式，我想，一定会同实际经过的不同。

我知道世炎死了，但尽量避免宣布。世炎的姊姊世兰同“十姊妹”之一李慧住在汉口兰陵花园亦农公馆，我们天天见面，大家都不敢提起世炎。有一天，我们将近离开汉口了，我到亦农家里去，看见世兰在流泪，她骂我们不该瞒骗她。她的哥哥从青岛或天津写信给她，她才知道世炎已经死了。

我离开汉口以前，武汉三镇已经捕人了。七月十五日所谓“和平分共”之后，起初唐生智还不多捕人，更未杀人。到了鄂南数县暴动以后，就渐渐施行恐怖了。周维桢在武昌军委机关被捕，这是反动以后最初被捕的重要同志，他本是湖北省委中负军事责任的委员。他从狱中有信出来请求营救。我们想不出办法。我不知他以后的命运。我未退出湖北省委以前，省委一个开会和接头机关被破获，幸而事情发生在黄昏时候，我们都不在那里办公了，只留下二个女同志，河南人，住宿在那里。后来听说是某区委书记过铁路线被兵士搜查出一张开会通知单而发现这个机关的；又听说两个女同志都判了十年徒刑。我在汉口时候，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中央和省委机关都未遇着什么灾祸。武汉的真正恐怖发生于我去上

海以后。省委机关一连破获了好几次,死了好多的人,与我共同做过工作的马峻山,余忠迪,魏某,符向一,任开国,都死了。穆清被捕,因证据不足,又有同乡力保,幸得逃生,但只为得半年或一年之后去四川送命。罗亦农从上海去巡视长江工作,几乎被捕。从此武汉无法建立工作,刘少猷,刘伯庄等等,被任为省委书记。去那里不久都逃回上海来。向警予也在那里枪毙,中国官厅向法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时曾遇了一些麻烦。

我们在湖南基础比在湖北的好得多,但恐怖之下我们也无法在长沙做工作。我们的干部同志牺牲于长沙的比牺牲于武汉的更多些。“马日事变”中,我们的同志不知死了几人,但那都是做工会,农民协会或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党内负责的人则很少。薛世纶那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正在长沙,这一夜听了枪声吓得魂不附体,次日就逃往外县去,从此脱离了党。夏曦下落如何,我不知道。“八七会议”参加人中与我同不是中央委员的彭公达,开会后就回去湖南做省委委员,不久就牺牲了。过去负湖南责任的人已经无法在长沙做工作了。中央派王一飞去,他是浙江人,未曾在湖南做过工作。他做了一个时间省委书记,终于被捕,枪毙。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他与王一飞一同被捕,一同枪毙,当夜或次晨,有一个农民在郊外刑场经过,发现一具死尸还没有死,便救活了他,送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负责同志送他进医院医治枪伤。差不多快医好了,不知如何被人发现,他又作了阶下囚。此次与前次不同了。任卓宣为了保存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尽其力之所能为白色恐怖服务。不知有多少人牺牲在他手里!颜昌颐的爱人傅凤君也在牺牲者之中,她隐藏了“伍桐”(何資深)好久,而当时一切案件无不与伍桐有关的。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袁笃实(大时)也被捕了,他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任卓

宣和袁笃实及其他几个叛徒在长沙发表宣言劝其他同志投降。

这是我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同恩来谈起叛党的同志。恩来叹息道：“谁想得到连袁笃实也做了叛徒哩！”袁笃实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贫农家庭出身，少时曾替人牧牛。东大中国学生内部斗争中，他是要角之一。回国以后，他做下层工人运动工作，忠实而努力。一九二七年底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与王若飞同住一处，那时我才识面，虽然久已闻名。以后他就调往湖南去了。我同他不熟，他的反动未曾像任卓宣的反动给我如此深刻印象。恩来与卓宣关系，比与笃实关系更深些，不知何故单提笃实？也许为了卓宣在国内工作表现不如笃实罢？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湖南作用完毕后，袁笃实在陕西去做了一任县长，任卓宣则回归四川继续研究和宣传他的“马克思主

义”。一九三〇年间,他来到上海,办辛垦书店,出版丛书和杂志,用“叶青”笔名写理论文章。斯大林派中国共产党无法奈何他,只好骂他“托派”。斯大林派有许许多多诬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话,但我认为他们把任卓宣说做“托派”是最无耻的诬蔑之一呀!

我回上海后,全国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恶,更加扩大和深入。广州暴动失败,死了无量数的人,这个血债,中国无产阶级是要索取的。我认识的死者只有张太雷,他是这个暴动的总指挥,他参加了广州群众大会之后坐汽车回公安局来,不知这个暴动者司令部几分钟前已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白军向汽车开枪,一弹射中太雷胸膛,登时死于车内。与他同车的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居然逃脱。

北京在张作霖治下也施行恐怖。有一批人牺牲了,其中一个王荷波,福建最早的共产党员,第三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参加过几次国际大会。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为了张宝全夫妇喜筵,我们被会计处扣去几元生活费,说:那日原是大家集资给宝全夫妇贺喜的。但邓希贤夫妇喜筵,则我们生活费未曾被扣,据说是小邓家里寄钱来请客的。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结婚,但未曾请客,即是说未曾请党内工作同志吃喜酒。

那时杨虎已经去职了。他的恐怖如此之残酷,而且化为一种敲诈手段,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厌恶他。此时国民党在大城市的统治已经稳定,经济趋于复兴,上海工人运动已退至无能为害的地

步。杨虎时代被捕的判决了徒刑的共产党员，向司法机关控诉，法院特为此设立一个法庭，重新审判，好多人交保释放了，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国主义撤退驻华军队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但龙华看守所仍然有政治犯待审，他们多半是个人仇恨或偶然失机的牺牲品，不然则是各省逃来的亡命者受人告发的。中央属下外埠接头处被破获，负责者王荷波的弟弟王警东被捕，解往南京，那是外埠发生事情牵连到上海的。我们并不恐慌，此案也没有发展，中央还派人去南京活动，买王警东出来。可是不成功，王警东判决了无期徒刑，后来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遇着他，化名王凯，番号是“一号”。我出狱时他还未曾放出。

一九二八年初乔年一批人被捕，这是我到上海后党组织第一次遇到的恐怖。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三人枪毙后，其余的人判决了徒刑，我在苏州军人监狱中还遇着他们这一案的人。此案发生经过我不很清楚。

张宝全被捕，不记得是与陈乔年同时，还是与罗亦农同时，总之是在同一个发生恐怖的时候。张宝全奉命通知各机关以恐怖消息，他到宣传部来通知后，还要到其他几处去。他袋内装了许多信件。我劝他化化装，但一时没有办法，他穿西装，我穿的也是西装，我们只能交换一件大衣：我的较旧的材料较坏的换了他的较新的材料较好的。他从此一去不回了。原来，他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许多信，人们知道他的重要，用了许多刑法拷问他，可是这个忠实的关西大汉什么机关都不肯说出，以至于死。我继续穿着他的大衣，纪念着他，经过第一次入狱，经过反对派活动，经过第二次入狱，从上海穿到杭州，从杭州穿到苏州，从苏州穿到南京，那年冬天借给一个苏州难友，一个青年政治犯，他不肯还我，我很惋惜没有带出狱来。

张宝全来也许是通知我罗亦农被捕的消息。罗亦农的阔绰公馆早已取消了。此次，他巡视了长江工作才回来，无家可住，暂时

住在宣传部,我的家。白天则到戈登路爱文义路口一个机关办公。一天夜里,他没有回来睡觉,这虽是不平常的事情,我也不很着急。次日才知道他被捕了。江苏省委机关破获,中央机关都不恐慌,因为这是两个系统。此次大家恐慌起来。我和静二人搬到大世界近旁一个公寓去,留下娘姨看家,托词往杭州烧香。直至报纸登出了亦农枪毙消息和照片,我们才搬回来。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知道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从此以后一年多,上海未曾有重要机关被破获,未曾有重要同志被捕。一九二八年七月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几乎在那里被捕。敌人目标在我,可是我于一日前离开厦门了,几个同志被捕,新选的省委常委之一李连生也在内,他一人在漳州枪毙。未死以前,他在狱中遇见前省委书记陈少微。不久,陈少微挖了墙洞逃出来。

以上所记不能视为白色恐怖史,因为是不完全的。我只记下我所见闻的事情,记载详略并不是与事情的重要程度成比例的。凡我知道得多的,印象深刻的,就写得详细些。济难会曾出几本小册子记载死难同志的略历,有时还印出了照片。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家能否找到这些出版物?但愿有人记载一部完全的白色恐怖史!

我还可以接着写下去。可是我要先写我第一次入狱的经过

了。

* * *

退出中央宣传部时，我们，我和静二人，本是准备去莫斯科读书的。据说越过中俄国境，须步行几十里路程。静不良于行，我迫她每日练习走路。愚园路房子未曾顶去以前，我们到静安寺电车站去或从那里回家，常常走路，不坐黄包车，也不坐当时新开的电车或公共汽车。住在李民治家时还练习走路，住在蔡振德家时就停止练习了。因为渐渐有人劝我们勿去莫斯科。陈碧兰告诉我，她曾听到老先生同述之说：“超麟走了，我们要办杂志更缺少写文章的人了。”我从这话知道了老头子准备办杂志。他方面，出国时日延了又延，最后竟无确定的消息。我们也不去催问。

不去莫斯科也好，但生活成了问题。我们是没有工作的同志，在等待出国期间，每人支领原薪一半，即二十只大洋，衣食住零用一概在内。这个维持费自然不够维持生活。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任旭等人已经不靠团体维持了，他们或翻译或写作，总之卖文为生。蔡振德退出江苏省委时，李富春和何孟雄待他还不错，送他一笔款足够维持二三个月生活。马玉夫仍做工人运动，有生活费可拿。我每日翻译几页《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希望卖得稿费还债以及维持以后的生活。当时出版界渐渐要求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个要求后来更加迫切，以致小书店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竞争着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革命失败，但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这个离奇现象是颇难解释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各国过去的革命，每次失败之后，革命理论总要消沉一个时候的。例如，西欧一八四八年以后的时期和俄国一九〇五年以后的时期。中国此次革命失败为什么不然呢？我有一个不很圆满的解释。我认为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了，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以及湖南的农民运动，骤然发挥威力，虽然将共产党推上去，与国民党平分政权，但来不及唤起全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就骤然被

反革命所压倒了。先锋队失败之后,后备军才慢慢动员起来,已来不及挽回革命的命运。正是这个特殊的状况,才使得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头脑糊涂,一直将退潮看作进潮;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中国才能发生“红军”形式的乡村武装斗争,使此斗争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对象,以致现在这种“国共关系”;也正是这个特殊状况,一九二九年后四五年间中国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学生群众,被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

但这是我事后的解释,从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红军”的解释中启示得来的。一九二九年初,当我翻译恩格斯这本书时,我还未曾看出出版界有这个趋势哩。我翻译着,当作研究,当作消磨时间,完全没有把握能找到出版者。

蔡振德夫妇和小孩,张以森母女,以及我们二人,合伙吃饭。我们常常拿不出伙食费。起初蔡振德还有江苏省委给他一笔款子,后来也没有办法维持伙食了。三月十八日,我们一家人没有钱买米和小菜。张以森到夏之栩家打麻将去了,那里可以吃一顿晚饭。蔡振德夫妇到同乡或朋友家去措油;我们二人身上尚有一只大洋,正在思量如何解决这顿晚饭。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正想出去,忽然后门冲进一群人来,都握着手枪,要捉亭子间的张以森。他们是公安局派来的包打听和警察。可是张以森不在家,我们是房客,她也是房客,她去哪里,何时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包打听满意我的解释,便在楼下客堂坐等,直等至深夜。他们不到三层楼我们的房间来。我们自己恐慌,把文件捆成儿包,送到晒台上屋瓦底下一个洞里。刚送完,马玉夫跑了来,他也许是准备来我们这里措油吃一顿饭的。人家放他进来,却不许他出去,他说是我的客人。我们商量几句应答的话。天快黑时,一个包打听上来守住我们房门口监视我们,但说话很客气。他说:“刚才我们在后门守望的人

看见有人藏了什么东西在晒台上。我们取下来看，原来都是共产党文件。我们又问了娘姨，她说你们是一家吃饭，张以森是你们的姑奶奶。”我们那时还用一个江北娘姨，这日她有旧饭可吃。

约九点钟，我们的房东回来了，包打听跟着这两夫妇进二楼房里一抄，文件柜里装满了文件。他们也立即受了监视。张以森抱着小女孩直至十一点钟才回来。在她房里抄出何资深的照片，书信和文件。所有文件装满了两个皮箱，连人一同带到狄思威路后面中国地界一个分局里去，那里问了姓名年籍等之后，就坐一辆大卡车到南市公安局来。江北娘姨也同我们一路。

我们在总局包探间坐候天亮，有二个强盗比我们先到包探间。强盗确是受罪犯待遇，我们则仿佛是客人，包打听很有礼貌，称我们做“同志”。一个烟容满面的书记传张以森到另外房间去，问了很久的话。她回来告诉我们，说是南京“湖南同乡会”写公文给上海公安局，请求公安局捕她的。书记拿公文给她看，其中说她是湖南著名共产党领袖伍桐之妻，伍桐现在山东被捕。我们早已知道何资深在山东被捕，但不知是谁向湖南同乡会报告以森在上海住处。后来，资深告诉我，这报告人是他的前妻的堂弟，资深与这人的老婆有暧昧关系，这人怀恨，用此恶毒手段报复。这人在吴淞什么大学读书，曾来看以森，到过我们的恒丰里房子。

公安局里的人听说我们是共产党案，都不高兴。他们说：“自己又打起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昨天蒋介石和李宗仁打仗了。南京派了许多兵去进攻汉口。侦缉队长，一个矮子，来办公，房里顿时热闹。他问两个强盗口供，强盗不说，就叫人拉到隔壁一个房间去，一会我们就听到悲惨的喊叫。我想跑过去看看，一个包打听阻止我，他说：“你们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强盗回来，都供认了。侦缉队长只问了以森几句话，就进他的办公室去。不久，一个书记从办公室出来，好像向我们贺喜的神气。他说：“你们是不要紧的，你们是‘为国家’。”以后公安局长黄某走了进来，侦缉队长

陪他进来,说:“这个女的就是张以森,她住在一个‘机关’里,这些人都是在机关里面捕来的。”我们向局长说:“冤枉”。局长说:“你们放心,凡是冤枉的,都要释放。”公安局长去后,来了一个穿西装的人。这人,我认识。我想糟了。他一看见我,便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王绳祖。”他说:“面孔好熟。”他去后,蔡振德问我:“你认识他么?”我说:“他是双方做侦探的家伙,北伐军到上海前,住在上海大学近旁,认识李季,曾帮助李季出版《马克思传》,有一次托李季请我去他家里谈过一次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振德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只知他姓鲍。”振德说:“莫非是鲍君甫,我也知道有这个人,很靠不住。”

我的一只大洋买了一百只小包子,当作早点心。黄公安局长吩咐人叫几客和菜请我们吃午饭。下午三点钟,侦缉队长办公室里一声声“发科”,“发科”,“发科”,立即就有几个包打听来请“诸位同志”跟随他们到那边去了。“那边”,就是看守所。男女分开,一个房间拥挤了好多人,既脏又臭,远没有包探间舒服。看守拿着竹鞭,真正把我们当作犯人了。我们颇留恋于包探间,可是同室难友告诉我们:在包探间是要“吃大菜”的,他们巴不得有“发科”二字。“发科”,就是侦缉队手续完毕,将犯人移交第三种(司法科)办理之意。我们在看守所里关了三四天,第三科“提堂”了两次。张以森侃侃而谈,毫不畏惧和隐瞒。是的,她就是湖南同乡会所要的人,她的丈夫是共产党,现在山东“被捕”。她在包探间时向侦缉队长也是这般说。队长说:“‘被捕’?你这小姑娘懂得什么叫做‘被捕’”?问她:“文件是哪里来的?”她说:“我的丈夫的一个朋友寄存的。”“这个朋友呢?”“在汉口枪毙了。”我们则否认文件从自己房间抄出。李季生(马玉夫)和娘姨居张氏更没有什么可问的。有一天,鲍君甫跑到看守所来,问我们各人住的房间,他气愤愤说:“他们如此糊涂,把所有文件通通混杂在一起了,分不出那一包是从那个房间抄出的!”如此,我们更加能否认自己房间有文件。第二次

“提堂”，法官拿出几封“王绳祖先生启”的信件，那是我从福建写给静的，其中有许多难解的话。他指为一种秘密的信件，里面有共产党阴谋。“小猫猫，小狗狗，是什么意思？”我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大发了雷霆。他说：“我们待你们很客气。给你们一点刑罚尝尝，看你们说不说！不问了！”我同其余“提堂”的人都还押看守所，别人也不问了。第二日就解龙华司令部。临上汽车时，看守所所长，一个湖南平江人，大声喊：“东西要当心！有两瓶毒药水不要打破了！还有一尊马克思像！”于是我明白，他们又去恒丰里抄了一次，把我写字台上的铁铸的马克思像拿了来，那两瓶做通信用的隐显药水也拿了来。如此认真，此去龙华是凶多吉少的了。

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里另是一番景象。那里房间更大得多，每房里关的人更少得多，弄堂铁门关好，十个“号子”（房间）的人可以互相往来，饭尽量吃，小菜不能下咽，但你可以请看守兵到外面买小菜来吃。看守所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一九二九年春间，龙华司令部里约有十几个共产党囚犯，其中只有王克全是比较重要的，他是浦东区委书记或委员，为了偶然原因被捕，其他的政治犯都是为了私人仇恨被告发的，有些是真实的共产党员，有些是冤枉。我们一到，立即受了欢迎。政治犯有团结，他们既欢迎我们，其他罪犯就不敢向我们索取陋规了。强盗之中有几个是真实的共产党员，都认识马玉夫。

四个女犯，张以森，王绍华，刘静贞，居张氏，关在女监，那时女监设在第三弄弄门对面，其中没有一个政治犯。我们三个男犯，王绳祖，刘士奇，李秀生，都关在第二弄，那里是政治犯的集中地。同弄有个绑匪，他的老婆也在女监，他的五岁儿子小毛则往来于两监之间。小毛的口袋成了我们的邮筒。以王克全为首的政治犯，以及其他的罪犯，都在唱歌，哗笑，下棋或赌钱，好像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在这种空气之下，我们不久也就克服忧虑和恐慌了。他们说，

只要没有原告催迫,政治犯都可以运动出去的。有原告的,即使证据确凿也不过判决几个月徒刑。谈起死刑或长期徒刑的话,则其中羁押最久的政治犯也不过听前人说过,自己并未曾见过。他们说那都是有特别的原因。

济难会买通一个看守兵,传递消息,又常常派人送钱,送物,接济这些政治犯。我们一到,济难会负责人,上海大学学生吴瑜(后来在《时事新报》当记者,改名吴苏中)立即知道了,他设法接济我们,以致我们没有缺少什么。王克全提议在狱中组织党支部,按期开会,我认为不妥当,结果没有实行。王克全在外面本很熟悉蔡振德和马玉夫,但与我第一次见面。这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工人,曾与赵世炎一起被杨虎捕去,受了刑不肯屈服。世炎枪毙了,他在漕河泾监狱关了几个月,设法保出。此次他深怕翻出旧案,幸而无事,在我们以后出狱,渐渐升高了党内的地位,直做到江苏省委书记,为后来所谓“调和派”的一个重要干部。最后,反动了,积极逮捕共产党员。但那是我第二次入狱以后的事情。

我融化在这种空气里面,不久也就忘记了自己是犯人。被捕那天,我们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哩,如今则一切都不愁了。房租不必付,电灯免费,饭是警备司令送吃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在外面买的要贵一些。一天下午,看守兵来通知,说法官下来查监房了。老囚犯都很诧异,因为法官向来不查监房的。我们每人都回到自己房间。不久,弄堂铁门响,看守所长陪着法官进来,每个房间都进去一下,走进我们房间时,我吓了一跳,立即把脸转开对着窗外。这位法官是我的中学同班学友苏福畴,我曾与他共一自修室半年长久。足足十年不见了,但我看得清楚,决不会错的。他向我们房里囚犯说:“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处名义向你们家属敲诈,下次你们写信时必须关照家属不可上当。军法处是秉公办案,决不徇私的。”一口福建龙岩县人说的官话,我在中学时代听惯了的官话。他出了铁门,

我立刻走到铁门边看他向女监走去,为了说同样的话。一点不错是苏福畴。回来问一个老犯人,他的案子恰巧是苏法官办理的,他拿出苏法官的批示来看,上面盖着“苏印福畴”方形图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利或有害。我虽叫做“王绳祖”,但年龄籍贯以及出身的学校都照实说。在公安分局时,我决想不到法官之中有一个也是“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而且是与我同班毕业的。至今,我仍不知道苏法官在我这案内起了什么作用。我不敢说他有助于我的释放,但他没有加害于我,则是确然无疑的。只消有人指出“王绳祖”实是“郑超麟”,我就要大费周折了。后来鲍君甫告诉我,当我们还押在公安局时,吴开先曾去看黄局长,为了通缉谷正纲的事情。吴开先看见桌上文件中有“郑超麟”信,便对局长说:“这件案子若是同郑超麟有关,办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局长问:“有人认得郑超麟么?”吴开先答应去找人到看守所来认。后来不知怎样未曾实行。吴开先的一个秘书,黄正厂,本是共产党员,上海第二次暴动时曾在辣斐德路冠华里内和我共同工作,他认识我。黄正厂曾问梅电龙:“郑超麟也捉去了?”电龙回答他:“瞎说!”这问答不知是后来的事情,还是当我在公安局时的事情。

办理我们这案的法官,不是苏福畴,而是一个江西人,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也忘记第一次提堂是在苏法官查监以前或以后。江西法官任随我瞎说,毫不反驳我,口供记下,叫我签字之后,他才拿出那几封“王绳祖启”的信来,问我信内说的什么意思。我同在公安局一样干脆否认这些信是属于我的。他于是发起气来,骂我“放屁”!“难道是包探栽诬你?你只消说这些信说的都是戏话就完了。我本以为你没有嫌疑,现在我看你大有嫌疑。”于是他叫书记在口供后面再添人我否认这些信的话。

第二次提堂,是到军法处办公室。这次不是审案,而是鲍君甫来看我。他说,李先生托他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谢谢他,就回来了。

第三次提堂,即是交保。此次提堂以前,一日或二日,李秀生和居张氏无条件释放了。马玉夫卷起衣包辞别了我们,江北娘姨受了我们连累遭这场无妄之灾,从此不再与我们见面。接着张以森判决了八个月徒刑。她提问了几堂,承认一切文件都是从她的房间搜出的。判决后,她写呈文请求纳金代替徒刑,未准。

我们交保后,写了信出去,好多天未见保人来。静的哥哥刚从云南来上海,从同乡处得知我们入狱,到龙华来看我们。我们告诉他已经交保了。他无法找到铺保。我比其余的人更着急,因为静在女监害病,看守所长告诉我,说是“肺炎”。特别允许我去女监探望一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我们终于出狱了。吴瑜来接我们,从龙华雇了汽车直达上海二马路新旅社。次日送静入红十字会医院,前后疗养了一个多月,病才好。若是铺保多延几日,静非死不可。

顾顺章当日来新旅社看我们,告诉我鲍君甫此次极力帮忙。中央为我们的案给鲍君甫五百元做活动费。顾顺章又给我三十元,要我请鲍君甫吃一餐饭,看一次电影。我照着做了。鲍君甫老实告诉我,他在公安局帮了一点忙,例如催促第三科解我们去龙华,因为经过两个机关办理,容易含混些;至于龙华方面,则不是他的力量,即使没有他去同法官说话,我们也能出来的,他不知法官为什么如此宽宏。

我没有把苏法官和我的关系告诉他。此外,我出来后,又知道了另一件为鲍君甫所不知道的事情。这里,我要回头叙述十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了。

一九一九年我乘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停泊于博赛港时,一个中国人从岸上到船上来,请求船上诸位同胞设法帮助他到法国去。原来他是半个月以前同其他的勤工俭学生一路乘船经过此处的,他下船来,在旅馆住了一夜,大约是为了解决性的问题。次日走到

海边时，船已经开了，举目无亲，又不懂得一种外国话，钱也不曾带在身边。幸而那里遇见几个广东水手，言语虽不通，究竟是中国人，他们带他去做种种苦工，勉强糊了口。这是一个纯粹的北方人，年纪已不小了。勤工俭学生带他到头等舱去见张继，张继认识他是陕西有名的革命党李仲三。于是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件事当作笑谈。我们也到博赛街上去游玩，但有几位登徒子，经过其他商埠常要开旅馆过夜的，此次就不敢尝试了。以后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

全体三十几个福建学生分发到圣日耳曼中学读书，入学那日我发现有个外省人搀人在福建学生中间。这就是博赛上船的北佬儿。教务长注意到他，问他多少岁，他回答：三十八。福建学生都窃笑。那么大的年纪，而且如此老实，不晓得隐瞒！福建学生是排外的，何况他是老实可欺的北佬儿。他们常常欺侮他。我至少是个“省际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成见。我同他谈起长安，谈起华山，谈起汉唐古迹，他愈谈愈兴奋起来。他的行李中有一部《张惠言词选》，又有一部《恣斋集古录》。几个月之后，他没有钱读书，只好到工厂做工去了；他把《恣斋集古录》寄存我处。这是吴大澂搜集的古董的拓片，一共几本，装在小木箱内，很值得一点钱。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勤工俭学生，而且不作自我宣传，如徐特立一流人所做的。他力气大，技艺差，做的都是笨重的工作。一年以后，他把一部《恣斋集古录》讨回去，说有人买它。后来，我收到他准备回国的信。到西安后，他又有信给我，但我没有回他的信。

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人，直至冯玉祥“倒戈”以后，我才在国民军将领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后来报纸上常常有他的名字。他曾以国民第二军驻京代表资格，带两个马弁把当时现任的国务总理姚震逮捕去，经姚震向他下跪和旁人说情，才释放。上海英文报纸举出此事，作为中国“无政府”的证据。我想这就是当初福建学生所欺侮的北佬儿。

我在创造社第一次会见郑伯奇时，伯奇告诉我“仲三现在上海，他常常提起你。”我很奇怪，李仲三还记得我的姓名。后来看见蔡振德，振德也同我说这样的话。郑伯奇和蔡振德都是陕西人。

我们被捕之后，振德的同乡就去找李仲三，而且告诉他，我和振德一同被捕。李仲三到南京去，找他的朋友胡逸民，由胡逸民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营救王绳祖和刘士奇两个犯人。我们住在法租界某公寓时，李仲三来看我们，携来熊式辉复胡逸民的信，说军法处就要释放这两个犯人了。

从此李仲三便和我们往来，而断绝了旧的关系。最后，他从军阀一变为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这是中国未曾经过斯大林主义学校的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左派反对派

在狱中不过四十日，出来后仿佛换了一个世界。汽车在龙华路上行驶时，两旁已看不见桃花了，一片是草长莺飞的江南景色。回忆被捕以前，上海都市里还没有什么春意，马路两旁人行道树上也未长出叶子。我们在龙华狱中望不见树，院里的草可怜得很，清明时节曾见看守兵手拿一枝桃花从外面走进来，心里知道现在是春天，但想不到此时外面如此春深。到上海，热闹的市街和扰攘的人群也给我以向来没有的印象。

但另有一种变化，更在时序变化之上。尹宽来新旅社看我们。三月十八日，他本约好来我们家里打牌；不知是为了忘记，还是为了有事，他没有来，侥幸逃脱马玉夫的命运。我们都在称赞他好运。寒暄之后，他拿出一卷油印的纸头来。那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篇文章，后来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内的。^①这篇文章印得很坏，但比中央秘书处精印的，瞿秋白精译的第三国际通告之类，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我昏乱了，一时间不能判断那篇文章里面的话说得对不对。后来看见彭述之和汪泽楷，知道他们已经见过这种油印的东西；从他们那里又知道陈独秀也见过这种东西。都是尹宽拿给他们看的，尹宽则是从山东同志王平一那里得来。王平一新从莫斯科回来，尹宽曾带我去见他，但没有说什么话。

此后，我一连看了几篇油印的东西，还有一二期《我们的话》。

^① 此处时间，地点有误。尹宽不是在我们刚出狱时送反对派文件给我们，而是在我们搬了家之后才送给我们的。——作者校阅时新注

尹宽并未曾叮咛我守秘密,他拿东西来,我看,蔡振德也看,马玉夫也看。我新从狱中出来,根本不知道中国党内已经有反对派组织,更不知道中央对这组织的态度。我以为同志间传观托洛茨基文章乃是公开的秘密。有一次,黄文容来看我,我问他:“中央对于托洛茨基的意见有什么答辩没有?”他反问我:“你从何处知道托洛茨基的意见?”我说:“看过油印的文章。”他又问:“从那里看到这种文章?”我想了一下,就说:“尹宽给我看的。”过几天,尹宽走来同我吵,因为黄文容回去报告之后,中央就追问尹宽这些文章的来源。我道了歉,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情如此严重。”从此,中央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接触到左派反对派文件了。

我们并非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行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未曾发表。后来,当他完全接受左派反对派主张以后,刘仁静竟根据这篇文章来攻击他。刘仁静似乎自己未曾看见这篇文章,而是间接从尹宽方面知道有这篇文章存在以及其中的结论。

* * *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究竟有什么主张呢?这里为回忆录性质所限制,我不能把这主张完全写出来,即使写个粗枝大叶也是很难能的,因为牵涉的范围太宽广。我们后来曾将托洛茨基那几年写的与此问题有关的文章汇印为两本书出版,名《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和第二集,好多年后又出一本第三集。他的主张都在这

三本书里面。此外，三年前，我曾写一本“小册子”《不断革命论ABC》，其中有一章专论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应用，那里就写下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

可是这里完全不提这个主张也是不可能的。三十年代注意政治和革命的青年人，或多或少知道托洛茨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是在四十年代，现在的青年人则没有他们前一辈人的幸运，他们甚至没有听过托洛茨基名字。我这回忆既是主要地为他们而写的，就必须多少说说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革命观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革命观有什么不同。

有三个现实问题致使苏联共产党分裂：苏联问题，英苏工会委员会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三年左派反对派初形成时候，党内争论的是苏联问题；一九二七年新反对派形成时候，争论的兼有后二问题。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合组的新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并非完全一致的。季诺维埃夫一派不肯接受不断革命论，以致在这问题的根本理论上常不彻底，且有错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决裂之后，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才提出彻底的系统的正确的主张来。下面所说是以托洛茨基流放以后的意见为基础的。

与过去共同遵奉的图式相反，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中国革命无需要先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再来开始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过去和现在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中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即所谓“国民革命”，须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方能完成；而为了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又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外，去实现若干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任务。

托洛茨基这个见解是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而得到的。中国的殖民地地位，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绝不会团结中国国内“一切”阶级，如当时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恰好相反，革命愈发展，资产阶级愈趋向于联合帝国主义来进攻下层劳动阶级，即愈无能力

完成中国的解放。民族问题如此,土地问题亦然。中国本无独立的贵族地主阶级,中国的大地主和中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结不解缘,中国土地革命本身就含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会赞助,而且要反对这个革命。

但仅仅根据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点,我们还不能断定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自从列宁以来,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不受本国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违反本国资产阶级意愿,去完成么?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便是如此解释俄国革命。列宁提出“工农民主专政”为这个革命的政权。中国既有许多与俄国相同之点,难道我们不可以同列宁一般断定中国革命也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么?难道中国革命不可以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么?

首先,俄国革命并未曾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一回国,立即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发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结果,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的。其次,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所以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只因为俄国本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传统。俄国存在着贵族地主阶级,农奴制度才废除不久,城市资产阶级和土地关系不像中国那样密切,这一切使得俄国产生了中国所没有的“民粹派”运动,产生了一个有长久奋斗历史的革命党即“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而怀抱着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即能走到社会主义的幻想。革命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明知俄国非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走到社会主义,但对于这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力量是不敢轻视的,对于工农关系尚悬拟几种方式,“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不过是其中一种方式。这就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的来源。一九一七年革命证明了:不管上面说的那一切,俄国农民仍是服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那个有革命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在真正革命之前表现无

力而趋于瓦解。所以当革命时列宁说道：“凡一味主张‘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人，都是落于时代之后，而且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这些人应当放入革命前布尔塞维克垃圾桶里去。”

俄国尚且如此，何况中国？中国农村经济比俄国更少封建残余，中国又无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而过去事实证明中国农民是能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国行不通，惟一可能的革命政权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但要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

广州暴动便是事实的证据。广州苏维埃以法令公布：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大工业，交通和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大资产阶级一切住宅供给劳动者居住，等等。托洛茨基问道：这样的革命如果是资产阶级性革命，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性革命又是什么？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见解，虽从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得来，而且经过了广州暴动证验，但完全符合于他的独特的理论，即他的“不断革命论”。这里，我不能把这个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各方面的意义写出来，我只说托洛茨基这个理论是在他领导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时候形成的，他分析了俄国社会关系之后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过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像西欧诸先进国那样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的。俄国革命，开始时，就其直接任务说，无论含有多少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非继续发展下去，直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而且实现若干社会主义任务时候，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有力的保证。俄国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能否成功，及成功至什么程度，则一而由国内条件决定，他而也是由国外条件决定的。俄国革命只能看做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托洛茨基根据他这个形成于一九〇五年的理论坚决主张俄国革命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必预先经过“工农民主专政”阶段。一九

一七年革命就证实他的理论和主张了。

托洛茨基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三年第三国际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个人坚决反对;一九二五年他又正式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但被人拒绝了。他明白看出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党,中国革命要能成功,无产阶级不仅不应拥护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四一二”以前,托洛茨基就指出国民党领袖要背叛革命,不久蒋介石果然屠杀上海工人了。“四一二”以后,他又指出所谓国民党左派也是靠不住的,他们也是要屠杀工农的。他要求立即进行苏维埃组织,先深入革命,然后扩大之。人家不采纳他的意见,不久武汉果真反动了。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终结,而提出“两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以准备第二次革命。可是此时,人家才采取他以前的主张,进行暴动和组织苏维埃。人家把退潮误认做进潮,在退潮中应用进潮的策略。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真理,即是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局势的时候和在无革命局势的时候,不能是一样的。”

托洛茨基在这“两革命间”时期提出了“国民会议”策略。他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既然失败,统治阶级就有一种政治稳定,而这政治稳定又是经济复兴的前驱。在革命和内战中衰落了工商业可以渐渐恢复,失业的劳动者人数可以相当减少,工人队伍可以相当增加,因之无产阶级在国内社会生活中的比重也可以相当增大起来,以恢复其革命的自信心。但此时,如果没有意外的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共产党的任务首先在于如何重新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最好的方法是国民会议运动。因为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条件下,统治阶级自身也需要一种议会制度,为了相当抑制掌握大权的武人,减少非生产的耗费,并便于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小资产阶级此时也会活跃起来,提出更

民主的要求。他们为了这些要求,还会去联合城市和乡村民众中较上层的分子。在这运动前面,共产党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必须积极参加进去,为了排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工农群众的影响,并引导群众重新走入政治生活。共产党必须走在各阶级前面,自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

* * *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主张,是在革命失败以前提出的;他的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则提出于革命失败以后,而且在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即一九二八年秋天以后。前者属于战略方面,后者则属于策略方面。可是这两方面的主张同时传到中国来,同时为我们所接受。这中间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外面一知半解的人更多误会。有一次,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约了高语罕去谈话,问道:“你们托洛茨基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苏维埃口号。——两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么?”邓演达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组织苏维埃;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我不记得高语罕如何回答他。

我们当时虽都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各人的了解和注意点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一九四〇年我重来上海时,彭述之第一次见面就同我说:“我们当初都是从右的观点去接受第四国际主张的。”这话不确。彭述之自己确是“从右的观点”,由斯大林主义者一变而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并非人人同他一般。彭述之接受“国民会议”主张,而且把这主张的策略意义抬高为战略意义。他把国民会议当作无产阶级在未来第三次革命中夺取政权的路线。其实托洛茨基说得很清楚。他的“国民会议”主张是在他的《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一篇长文中第一次有系统提出的,那一段的小题目就叫做“两革命间时期及此时期中呈现出来的任务。”此

外,他在这篇长文后面又特别提出警告说:“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道路”。彭述之也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主张,但他特别攻击两个观念:“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含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在统一谈判中,他极力攻击这两个观念;在南京监狱中他著文攻击这两个观念;一九四一年争论时他又提出这两个观念来攻击。他不明白,托洛茨基的主张中除去这两个观念以后,就没有什么与斯大林主义不同了。斯大林主义者并不否认,中国第三次革命发展至后期能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尤其主张必须先郑重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彭述之“从右的观点”去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是很明显的。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张,则是出于另一种观点。上面有一处,我说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遵奉一个图式,即认为中国必须经过“国民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对这图式有两种不同的了解。某些人认为中国既然能实行国民革命,那么我们就专心一致做国民革命工作好了,社会主义革命渺茫得很,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去看它还不为迟。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既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我们就来实行国民革命罢,但这不是我们的革命,这不过是我们的革命的前提,我们正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才来实行国民革命的。实在说来,这两个倾向乃是斯大林主义的双生子,因为都是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段:先完成国民革命,再进行社会革命。但仔细比较,二者之间究竟有这点不同,即后一倾向有可能抛弃两段革命论而走到不断革命论来,前一倾向则否。陈独秀属于后一倾向。他曾为了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注重工农群众运动,以至于公开反对北伐和秘密向第三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可是北伐居然胜利了。编练常备军来革命,比广大群众

罢工和暴动不是更有力量么？从此，他渐渐抛弃后一倾向而接受前一倾向。武汉失败以后他才觉悟：不以广大群众为主力，是不能革命的。雇佣军队，无论编练得如何好，毕竟靠不住。左派反对派的主张恰好迎合他这个倾向。他一接受这个主张，立即著文反对“红军”运动，反对党机关和同志纷纷抛弃城市群众工作，纷纷到乡村去，而且到乡村只为了编练“红军”。

关于红军的起源，我知道得很少。五次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的，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李大钊始终在北京。毛泽东，当我初回国时，还在上海，似乎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因为中央开会没有看见他参加。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他在湖南并不长久，似乎也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后来，我从广东区委报告或来的人知道了毛泽东在广州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部长汪精卫很看重他；他又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武昌大会场上看见他，向他传递了他的弟弟毛泽民托带的信。恰在那时，我看见了有著的一本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他是党内重要干部中第一个注意农民运动的。他亲自到湖南各县去实地调查农民运动状况。这本书出版未曾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查，但当时宣传部并未实行党内出版物审查权。五次大会以后，毛泽东奉命去湖南代替李维汉做省委书记，但至“马日事变”之后才接了事。那时湖南的党已走人地底下了。唐生智回长沙时，湖南省委布置党员们张贴“欢迎劳苦功高的唐总司令！”标语，贴标语的同志竟被唐生智部下兵士拖去痛打。何资深向毛泽东抗议这个标语，毛泽东才收回命令。当时人们还希望拉拢唐生智来抵制许克祥或何键哩！

五次大会前后，党内种种阴谋中，毛泽东演了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他当然不满意陈独秀，但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也是不融洽的。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上出政权”。这是

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一个参加创立共产党的人，在革命高潮当中郁郁不得志，只担负一些不相干的工作，直至革命已落于退潮时候，才露出头角来，到了斗争改变了方式时候，才一跃而为全党领袖，直至今日，——这个貌似离奇现象，其实完全可以拿他本人的性格和思想来解释的。

七月十五日前后，张太雷临交卸湖北省委书记职务时候，曾向我们报告了几个领袖的动向，其中提起毛泽东，则说：“润之准备入川去做右达开。”八月七日会议，毛泽东也出席，他发了言，我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似乎不是提出入川计划。从这日以后，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何资深同他关系很密切，他们二人“马日事变”后在湖南共同工作了一个时期，颇投机，因为二人都是对前任省委书记有意见，这个共同点联系了他们。一九二七年末或一九二八年初，二人都在上海。毛泽东要回湖南去时，何资深已经知道他的意向，临行送他一部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标点本《水浒传》和几幅湖南各县邮路地图。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尤其后者，因为这是高潮时邮工同志送给党的，本非卖品，也很难得，其中所记村镇及相互距离当然是比他种地图可靠得多的。

毛泽东到湖南团结了过去各县农民协会残余的武力，使之脱离了农民群众，而自己保存起来。这就是后来“红军”的一种来源。

他方面，当八月一日叶挺和贺龙在南昌暴动时，听说参谋部方面关于这个暴动军的去向曾发生一场争论。刘伯承主张把军队开往湖南去，到那里“干土地革命”，其他的人则主张开往广东去，占领广州，组织政府，扩充军队，然后开始“第二次北伐”。后一种主张占优势了。叶、贺军队的命运大家知道，无需在这里说。但其中

有一小部分军队，归朱德^①带领的，未曾陷于溃灭命运。这少部分军队转徙于广东，江西，湖南边境，曾有一个时期依附范石生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后来不知怎样同毛泽东带领的农民军残余部队合流了。如此构成了“红军”核心，以后渐渐扩大起来，中间经过许多挫折，直至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是后话。

“红军”不是中央或国际有意造成的。初起时，中央对于“红军”不感兴趣，因为认为没有前途。在李立三时代，共产党还没有决心完全放弃大城市工作。可是，那小小的军事核心居然能够发展起来，朱毛居然继叶贺为人所称道；他方面共产党在大城市也渐渐不能存身了，于是把力量移到“红军”去，把整个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即使在城市工人中做工作，那也只是运动工人准备响应“红军”的，如同当初响应北伐军一般。我们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时候，全党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下。我们和其他的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谈到最后遇着一个论据，即说：无论中央和国际如何错误，但“红军”，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只能依靠“红军”夺得政权，要国民会议做什么用呢？毛泽东主义于是支配全党了。有一次，向忠发和周恩来两人到陈独秀家里谈话，那时已离分裂不远。话题自然转到“红军”去。陈独秀问道：“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信口回答说：“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来修正说：“论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

我们都感到了“红军”问题的危险性，害怕党会因此抛弃正当的革命工作，完全去做军事冒险，结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成为代表农民，甚至土匪的党。那时我们还未曾料想到这个党会堕落到

① 罗亦农任江西省委书记，与朱德认识。朱是滇军中一个将领，曾去德国留学，似乎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亦农调来湖北后，有一次曾约我去某旅馆会见一个军官同志。到那里，我才知是朱德。我们匆忙谈几句话就走了。除了觉得他是个瘦子以外，我别无印象。

今日的程度！

陈独秀写了一篇长文反对“红军”运动。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用说，斯大林主义的中央是大发雷霆的。当时，所谓“调和派”，项英和罗章龙领导下的人，也认为老头子“老糊涂”。我们以外的反对派同志向托洛茨基攻击“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这篇反对“红军”的文章，托洛茨基回信指出“红军”发生的意义及其积极的方面，不能完全反对。在各方面攻击之下，我们几个人，当初同意这篇文章的，也怀疑起来了。尹宽认为“措辞不好”。后来，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是否窜改，我不知道。我手头没有这篇文章，忘记了其中反对“红军”的论据，但是，革命应注重城市工人，革命应依靠广大群众势力，军事力量只有辅助意义，这一点无疑含在里面的。这是陈独秀从武汉失败取得的教训。他以此教训为基础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

对于我，托洛茨基的主张不啻是叫我退回到当初在法国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立场去，叫我将中国革命看做与其他国家革命相异的，宁可看做是相同的，叫我不要找出许许多多的“特殊国情”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当初我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后退到“国民革命”的，我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往往要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兼能适用于中国，一部分只能适用于西方。现在如此一来，过去所学都成为活泼有用的工具了。此外，我编辑《布尔塞维克》时萦绕我的两个问题：“进潮或退潮？”“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到此也得到了解决。

我们几个人讨论时，或同其他同志谈话时，我注重的是革命性质问题：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蔡振德和马玉夫也同我一样注重这个问题。但尹宽不谓然。他说：“托洛茨基并不注重这个问题，不过顺带提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罢了，你们如果在这问题上同别人辩论，就有将政治讨论化为玄学讨论的危险。”尹宽注重的是苏维埃或国民会议问题。那时文件还不

很多,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方面,托洛茨基意见先后也有出入。到了刘仁静回国后,我们才看到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写的几篇系统的长文章,那里面,革命性质问题并非不占重要位置的。

* * *

刘仁静回国,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代英否认,而且请他自由发表意见,保证中央必加以讨论。仁静问:“中央不肯发表我的意见呢?”代英说:“那么我就同你一起斗争。”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独秀。

狱中出来后,我和蔡振德就退还了恒丰里房子,搬出家具和行李。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只遗失一件皮袄,那是静从娘家带来的。我们起初在武昌路租一个后厢房,二个月后蔡振德又约我们住在他新租的一幢房子,在东有恒路余庆里。刘仁静就是到我们这个房子来的。这里成了我们这部分反对派的中心,起初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开会议。中央一定有所闻了。他们采取笼络手段。宣传部秘书潘文育来找我,很客气地请我回去宣传部工作;我拒绝回去做固定工作,但愿意替他们翻译文件,隔几日去一次,交稿或拿材料。他们给我每月四十元生活费。何孟雄也来找蔡振德,荐他去某通信社做工作,一天几个钟头,酬劳很好。我翻译文件余暇,继续翻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被捕前已译成三分之二,译稿同文件一起经过公安局到龙华去,出狱那天,我请求军法官发还。

我托了許多人代卖这本译稿,都不成功。结果,杨贤江帮了忙,他替我把这本译稿卖给新成立的沪滨书店。书店经理是彭述之的同乡马任之,他不久也参加反对派了。当时杨贤江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汪泽楷和我都在这个支部里面,我们提出中国革命根本

问题同江苏省委派来的代表反复辩论。支部书记杨贤江动摇于双方中间,以致支部对于这个辩论始终未成立决议。不久,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诸人被中央直接开除了。我未曾看见通告,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内,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经在自己的支部里提出来讨论了。”

汪泽楷和我在支部里提出的政治意见还没有结论。汪泽楷虽然开除,我仍在支部里面,上层机关仍须回答我。最后,省委书记王克全亲自出席,他带了李初梨来记录我的发言,我系统地叙说我的政治意见之后,又抗议中央开除几个同志手续上不合法。王克全只限于约定下星期开会时正式回答我,但支部书记杨贤江此次确定了态度;他站在中央意见方面,他又认为这几个同志是应当开除的。我很惊讶杨贤江态度的转变,但不久就明白人家开会前一定疏通了他,或恐吓了他。下星期,我和静二人去杨贤江家里开会时,别人都没有来,主人殷勤招待我们,说他们也许为了临时有什么事情不来开会。我们向他告别,而且约定了下次开会时间。可是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曾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听人说,我的罪名是煽动报馆支部和云南代表反对中央。

这是事实。在马玉夫和蔡振德影响之下,有几个支部和一些个人如罗世藩,薛农山等走到反对派来,报馆支部是其中一个。支部书记屠仰之,当时是《时事新报》馆排字工人,他以及其他几个工人领袖跟随马玉夫走。大家推举我代表反对派去出席支部会议。

我们开了几次会,整个支部都站在反对派方面,没有一个人替中央说话。可是有人报告中央关于报馆支部和我的活动。结果支部解散,书记屠仰之也开除了。云南代表,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曾在刘少猷家里同他谈一次话,不知是他自己或刘少猷的爱人陈季如向中央或江苏省委报告,我的活动也被人发现了。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对人说:“列宁不死,一定会被斯大林关在监狱里的!”

这是国际性的斗争。当时第三国际各国支部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发生分裂。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有“左派反对派”成立起来,选出领导机关,出版刊物,进行国际团结。国际左派反对派也成立了,这就是后来第四国际的先驱。

如果不是国际性的斗争,而是中国一党内部的斗争,则情形会完全不同的。我们几个人不会如此轻易抛弃国际和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也不敢如此简单开除我们。开除我们的,是第三国际的命令,并非简单是中央的决议。

在斗争期间,许多真诚的革命者很忧虑,害怕双方各趋极端。他们即使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也是反对用开除一类手段来制裁我们的。可是在国际命令之下,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连抗议也不敢。我只知道有三个同志,在特殊情形下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一九二九年秋,彭湃,杨殷,颜昌颐三人被捕。前二人,我仅识面,颜昌颐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三个正直的同志,厌恶党内一切阴谋诡计。有一次,我去宣传部交稿或领材料,潘文育拿给我看他们三个人写的字条,从龙华狱中寄出来的。三人说,他们自己知道已经无望了,现在利用残余的时日在狱中做宣传工作;关于党的意

见,他们希望现在内部的争论,中央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这是三个重要同志的最后遗嘱,可是没有人听从他们。

此时,周恩来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开除我们,他应负组织上责任。

当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早已有组织了,我们这些人尚沉溺在斯大林主义泥潭里时候就已有组织了。这个组织起源于莫斯科孙文大学,在莫斯科已有光荣的斗争史。这一切将有合格的人去写它。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从莫斯科回国的反对派学生在中国正式成立组织,出版一个刊物《我们的话》。渐渐有未出国的同志加入这个组织。我们所见的文件就是这个组织散发的。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对于这个组织本身并不满意。尹宽,彭述之及其他的人,也许有其他方面的不满意,例如嫌负责的人无经验,无能力,各不相下等等,但我只不满意一点,即《我们的话》分析当时中国状况是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中的,或已从低潮恢复为高潮的。我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回头读他们写的文章,觉得这些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竟如此不了解托洛茨基!

刘仁静经过西欧回国,途中去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约他做中国通信员,他于是以“老托代表”自命,不肯服从反对派组织指挥。他在正式的反党派组织以外团结了一部分反对派同志,又出版一个刊物叫做《十月》。但刘仁静并不能指挥“十月社”。陈独秀或尹宽曾告诉我:刘仁静不过是傀儡,“十月社”的灵魂是一个莫斯科回国学生王文元。我于是想起了马任之的话。沪滨书店出版一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我问他是谁译的,他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个“小孩子”译的,这个小孩子聪明能干。不久,刘仁静就被“十月社”赶走了,他仍以“老托代表”资格一个人活动,甚至一个人出刊物《明天》。

这两个反对派组织以外,还有几个游离分子,刘胤,赵济,王平等,另外出版一个刊物。他们讨论刊物名称时,想起了当时美国

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寄来的机关报“The Militant”，遂定名为“战斗”（其实应作“战士”）。“战斗社”的人没有明白的一贯的足称为特性的主张。

以上三个组织之外，还有一些在正式党做工作而且得到信任的分子，他们在莫斯科与反对派没有组织关系。但此时回国后渐渐表明反对派立场，如吴季严，江常师，屠庆祺等。

我们这些被正式党斥为“机会主义者”的人，虽然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同志眼中，仍不能算是左派反对派。他们也跟着斥我们为“机会主义者”。他们也许欢迎我们所影响的群众，但反对我们的领袖，尤其陈独秀本人。刘仁静把一切情形都写信报告托洛茨基了。托洛茨基回信来纠正这个观念。他说，陈独秀过去执行的，不是自己的路线，而是第三国际的路线，陈独秀本人则是一个好的革命家，你们青年人应当向他学习的。托洛茨基提议四个反对派各派代表共同组织一个“协议委员会”，把组织统一起来。有他如此干涉，其余三派就不能不将我们看做左派反对派，同他们一样了。

此时，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正式的组织。我们编了几个支部，选举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自然是陈独秀，常务委员是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藩，秘书长先是吴季严，后是何资深。我们发了一个宣言，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有八十多人签字，有些工人同志用假名签字，我们又出了一个刊物，讨论名称时，我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他们都接受了，但后来不知何故采取《无产者》。前二期是铅印的，以后则是油印的。

“协议”过程拖延得很长久。这是一个极错综复杂纷乱而无聊的过程。每个组织并不把其他的组织看做同志，而是看做敌人，大家都拿出外交手段来，互相斗争。这中间两个大组织“无产者社”

和“我们的话社”内部又爆发了斗争^①。吴季严当过“无产者社”代表,他告诉我:“这些手段,将来用在议会里面是很好的。”我对于这类斗争,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内心发生厌恶。我对于此时的原则争论也没有兴趣,因为此时这种争论都夹杂着组织斗争,而且是为了组织斗争而牵强附会的。在这长久的“协议”期间,我几乎不闻不问。我埋头翻译能赚钱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直至最后“无产者社”内部分裂,双方倾向都已明了之时,我才下决心出来干涉,从此自己也积极投身于这个斗争漩涡中了。

协议委员会中“无产者社”第一任代表是马玉夫和吴季严,他们回来报告,都说其他三派的人没有统一诚意,我信了他们的话。其他三派的人,我没有一个认识,他们以前既然不认我们为反对派,现在勉强奉托洛茨基命令进行协议,自然会反对统一的;至于我们方面的人,则我自己认为有统一必要,别人相差不远,也必认为有统一必要。何况,资深告诉我说,我们从旧党分出来的一点基础大天在涣散,如不统一,不久整个组织都会名存实亡了。独秀自己也很着急。我确知他在希望统一。托洛茨基来信后,“十月社”和“我们的话社”都曾派代表去见他。他向我说出他的感想。他说:“我看见这些青年人,如同五四时候和五卅时候看见的青年人一般,都是朝气蓬勃的。”他的话一方面也是表示他对于旧的干部的失望。这些经过了一次革命的人,此时都是暮气沉沉的了。我不满意他们,也不满意自己,而希望新的同志能使我振作起来。可是最后我发现没有统一诚意的,主要不是其他三派的代表,而是我们自己的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受彭述之指挥,统一的最大障碍乃是彭述之。

陈独秀一向鄙视内部组织上的阴谋诡计,我们看他从武汉时代到第六次大会时代在正式党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彭述之则不

^① 当时四派都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不自称什么“社”是别人称的,但为互相区别,自己也默认了。——作者注

然。他有领袖欲。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非从群众斗争当中造成的，而是依靠一些组织上的手段。在莫斯科二三十个中国学生之中，他用那有名的“旅莫支部”训练法来造就和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回国后，国内同志看他做国际派来的代表，他也以此资格加入主席团，而且取得陈独秀的信任。以后，他就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独秀以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有一个时期，即他一九二五年从医院出来以后和秋白一九二七年提出自己意见以前，他竟如此狂妄，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那时蔡和森在莫斯科。主席团只有四个人，彭述之说：“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平心而论，陈独秀不用说，其他三人和森，秋白，国焘，能力都比他高。主席团五人中他是最无用的。到了武汉，他轻而易举地被人推翻了。若飞，乔年，在党内团结核心，进行抵抗，但对他都无好感。他下台后愈加抓紧陈独秀。尹宽得到反对派文件以后，要同独秀谈话时，必须通过他，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因为尹宽不能直接到独秀家里去。彭述之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

四组织统一问题发生后，我们注意的是：各人的政治意见在原则上能否一致。彭述之及他影响下的几个同志则注意另一个问题：怎样统一。“我们的话社”是反对派正统，托洛茨基提议协议的信未曾寄来以前，“我们的话社”只能容许这些“觉悟了的机会主义者”分别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有去取之权，此外没有什么“统一”问题可言。这种方式，彭述之听也不愿意听。托洛茨基来信以后，“我们的话社”降低身份同其他三派相等了，四个组织要统一为一个新的组织，无所谓正统和非正统。可是这个方式，彭述之也不愿意。他轻视和不信任其他的组织，事实上是他知道这些青年同志大多对他没有好感，在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不敢提出以“无产者社”为正统的主张，只好设法延宕和破坏这统一谈判。

这个情形,我们是经过好久才看出来的。尹宽虽不是代表,但认识其他三派中许多人,常同他们往来,他发现我们的代表的报告不合事实,他看出彭述之坚决反对团结。有一次,他瞒过彭述之,约了独秀去他家里谈话(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把种种情形告诉独秀,于是独秀彻底觉醒了。开常委会议时,他坚决主张召回马玉夫和吴季严,而自己同尹宽二人代替他们去代表“无产者社”出席协议委员会。从此统一谈判就一帆风顺了。

陈独秀一经觉醒,立即同彭述之决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存在了。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现在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戳穿之后是空无所有的。独秀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从此以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陈独秀,尹宽,何资深是赞成统一的,彭述之,马玉夫是反对统一的,罗世藩态度如何,我不能说确定的话。如此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组织自然消灭时候为止。

这两个老朋友决裂了。我第二次入狱后,彭述之又升为领袖,再与陈独秀合作,但已无友谊存在。两人被捕,入狱,以至释放,中间闹了许多无聊的私人的纠纷。陈独秀不愿意提起这些纠纷,我出狱以后看他,他始终不提起彭述之。王文元在汉口曾有一次向他提起彭述之。他说:“这个人,还提他做什么!”,反之,彭述之则津津乐道他在狱中和独秀的冲突。一九四〇年,我在上海看见他,他就向我提起好多次。他不惜以丑恶不堪的话诋毁陈独秀,而且把这种无聊的私人纠纷说做他的正确路线和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中间的冲突。陈独秀死讯传到上海后,彭述之写了一篇文章丑诋他,又写了一付联语骂他,其中有“晚节不终”一类的话。

“无产者社”在常委中赞成统一的人占多数了,但在各支部中反对统一的人仍占多数。各支部的人,一部分是蔡振德和马玉夫从正式党中上海的组织分出来的,一部分是过去的干部在上海或外省做工作的,他们拥护陈独秀,但大多必须经过彭述之去拥护陈独秀。此时,蔡振德消极了,马玉夫和彭述之都反对统一。旧干部里没有人信任尹宽。尹宽是个聪明人,无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比彭述之敏捷,但他有一种犬儒主义,其实无害的犬儒主义,为了应付别人的少些,为了卖弄自己聪明的多些,可是人家因此不喜欢他。彭述之容易把统一和不统一问题说做他和尹宽之间的争执,于是为了反对尹宽原故,好多人就反对统一。

自从托洛茨基来信提议设立协议委员会起直至此吋,这几个月中间,我都是站在一切纠纷以外的。此时常委派我代表“无产者社”上海地方组织去同“我们的话社”上海地方组织谈判合并。我在一个小学内遇着史唐,见面之后才知他本是中央一个印刷厂内的排字工人,这印刷厂属我管理,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他于一九二七年去莫斯科读书,加入反对派,回国后负重要责任。现在他问我:“这几个月争论中,为什么没有听到人家提起你的名字?”我不记得拿什么话回答他。但从此以后争论中也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因为我坚决赞成统一了。“无产者社”各支部赞成统一的人渐渐占了多数,他们选举统一大会代表,其中有陈独秀也有我。陈独秀当选是当然的;彭述之,马玉夫没有当选也是当然的;最坚决赞成统一的尹宽没有当选似乎有点奇怪,但这是证明人们虽然赞成统一,仍是反对尹宽,认为尹宽假借统一问题来排挤彭述之。没有人怀疑我有什么私人野心。

在这协议过程中,“我们的话社”也分裂了。梁干乔一派基础在广东,区芳一派基础在上海,有好多在上海加入的反对派。此时区芳监禁在漕河泾狱中,代表这派来参加统一大会的,就是在上海加入的宋敬修。

* * *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在大连湾路新租的一幢弄堂房子开会。

协议委员会将布置会场责任完全付托于“无产者社”，“无产者社”又把把这个责任付托于何资深。李仲三拿出一件猢猻皮袍，我拿去当得二百多元，做大会经费。何资深调了工人同志王芝槐一家人做这幢房子的二房东。王芝槐本人也是“无产者社”一个代表。各派其他的代表三五人一群，分头集合，然后由人带领到会场去，一进门之后即不能出来了，直至三日或四日散会时。只有一个人可以出门：陈独秀。

代表人数已不记得，想得起来的，“无产者社”有陈独秀，江常师，蒋振东，王芝槐，我；^①“我们的话社”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四个香港工人；“十月社”有王文元，濮德志，宋逢春，罗汉；“战斗社”有来燕堂。其他三派代表，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无产者社代表蒋振东也是第一次见面。

各种决议案都是协议委员会起草好了的，各派重要人物都已同意，这些人大多数在代表之列，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我只记得，讨论政治决议案时，我曾起立发言，而且同人辩论。问题是关于政治稳定和国民会议之间的关系。从一九二九年到此时一九三一年，经过两年了。近几个月各派又有很激烈的辩论，口头的和文字的。大家都有进步了。《我们的话》已经不说：目前恢复了革命高潮。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治上已相当稳定。但这稳定能持久么？我认为是能持久一个较长时期的，我而且把我们的国民会议主张建立在这个政治稳定之上。这个见解受人反驳，反驳的：我记得有梁干乔和宋逢春。他们的理由，则不记得。

^① 协议委员会计算各派人数，最后决定“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各增加大会代表一人，“无产者社”决定派彭述之去，开会后二、三日，他才到会（或未到会）。——作者注

最后一场会议是选举。有些人对于这场会议特别有兴趣，往往大会是为选举而开的。我不记得当时一共选举几个中央委员。陈独秀和王文元得票一般多，两人都得到全体代表投票。其他的人得票参差不齐。最末当选的有二人：彭述之和梁干乔，得票一般多。重新举行投票，结果彭述之当选了。梁干乔落选出人意外。后来陈亦谋说这中间有误会，因为香港四个工人不晓得梁干乔，只晓得梁大慈，因此没有投票。

协议委员会已经决议统一后，彭述之还在进行反对。他“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觉得麻烦的。我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只消保证他选举时定有中央委员位置，他就不会反对了。”尹宽和何资深都斥我胡说，都说我把政治问题和彭述之本人都看得太简单了。我说：“政治问题，我也许不懂，但彭述之，我是了解的。”五月一日开了会，独秀回去，资深交给他述之写来一封长信，其中述之斥此次统一为“虚伪的”，“无聊的”，及其他难听的话。他声明：“他誓死不承认。”可是他不知道居然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了。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他来出席，独秀拿出他这封信给大家看，看完之后当面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么？”我清楚记得他坐在床边，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结果我出来打圆场，免除了他这麻烦的答话。事后，何资深骂我，说我姑息养奸，说我政治上不坚决。他认为像彭述之这种人应当彻底打击下去，而这封信是打击的好机会。我说：“他已经够受了。”反之，资深承认开会以前是他错的，当时他认为我把彭述之看得太简单。但尹宽没有同我提起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开会，选举了五个人成立常务委员会：陈独秀，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我。分配职务：陈独秀书记，陈亦谋组织，我宣传，王文元党报，宋逢春秘书长。

这个领导机关成立不久,刚刚开始认真工作时候,就被破获了,除陈独秀以外,全体常务委员会被捕。相隔二年,我第二次入狱了。这次没有第一次那么惬意。二年前,我在狱中关了四十天,这次就关了六年零三个月,直至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准备放弃首都南京时,才得出来。

作者补注

本书出版后,我仔细看了一遍,随手作几条补注,借以说明问题或订正误记。

补注一(162页,25行)——此文名《宪法与孔教》,作于1916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3号,所引二句应作“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补注二(179页,2行)——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认为他在国内及初至法国时是墨翟主义者,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派学说来研究;到1920年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改称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补注三(189页,24行)——此处回忆有误。黄齐生比我先到木棚居住。

补注四(205页,19行)——事实是陈独秀在五四示威以前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

补注五(231页,14行)——这里,我把1922年的西湖中央会议和1923年的第三次大会混合起来说了。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在西湖会议上,到第三次大会时他已被说服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了。

补注六(265页,9行)——延年初次从广州来上海,似非在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从广州来上海有好几次,这里所记是综合几次而写的,在我的记忆中分不清楚。此外,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间可以从《民国日报》寻马道甫的广告栏内查得出来。

补注七(284页,17行)——罗明纳兹是自杀的。罗明纳兹起

草的八七会议文件叫做《告同志书》。

补注八(325页,5行)——李季达不是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他在李大钊死了半年后才在天津被捕,牺牲。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

记尹宽



自序

记尹宽

这篇稿虽名《记尹宽》，但并非专写尹宽，其中一大部分写了我们在法国的建党活动。现在，我们在法国的活动已经在党史上划归“建党时期”。但中国的“建党时期”种种活动，写的人不少，留下的史料也多，而法国及西欧的建党活动几乎没有人写。一些人在老年时写了一些回忆材料，但语焉不详，且有错误，那些当事的人都未曾留下回忆。我所知不多，但究竟知道了一些，关于旅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如何开展斗争，如何在斗争中分成派别互相攻击，又如何从敌对的状态化为友好的状态，最后联合成立了“少年共产党”，等等，几乎没有人知道，据我所知，只有我此稿留下了材料，即此一点也值得发表。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我的革命朋友中，认识最早的、相知最深的，要数尹宽。尹宽可以说是第一个引导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

我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到法国，十二月中旬便进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的。这个中学第一次收中国学生，特辟一个法文补习班，请一个教师来教我们。全班除一人外都是福建籍的学生，陈炯明派来的，每年有本县公款三百元补助的半官费生。约两个月之后，华法教育会又送来几十个学生，另开一个法文补习班。这一班学生中就有尹宽。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辑中，我

找不到尹宽的踪迹。并非每个勤工俭学生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踪迹。但凭我以上的记忆,即他一九二〇年二月间到圣日耳曼中学来这件事实,我可以借助于这本书推断他是乘安德烈朋号轮来法国的。此轮,在上海载去学生五十多人,在香港载去四十多人,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抵马赛,与勒苏士号载去的学生,从伦敦转来法国的人差不多同时到达巴黎。所以圣日耳曼中学新开的法文补习班中既有尹宽,又有汪颂鲁、熊志南及其他几个乘勒苏士号来的贵州学生。安德烈朋号乘客,上述书中没有全部名单,只有江苏、浙江、河南三省学生名单,故找不到尹宽姓名。我从别处知道,向警予、蔡和森、蔡畅以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也是乘此轮来法国的。由此可以想见,尹宽在轮船上就已认识了蔡和森。

在圣日耳曼中学里,福建班学生和外省班学生,畛域分明。首先是语言隔阂,福建学生每人能说普通话,但一般都说不好,少数人说得好的,究竟不如说方言畅快。语言不便使福建学生同外省学生发生隔阂,在福建学生中也发生了漳州话和客家话之间的隔阂,因此又发生地域隔阂。旧漳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漳州话,旧汀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客家话。两府学生时常争吵,以至于打架,有一次还请张继来学生中间做调解工作。我在反感之中也受到了教育。开始,我也难免有地方主义,但受了教育后很快就从地方主义发展为汀漳一家的思想,福建一家的思想,全国一家的思想,以至于全世界一家的思想。

但比语言更重要的是文化程度的差异,福建学生是落后的。福建学生也经过了五四运动,但汀漳两府的五四运动,单是抵制日货的运动,而不是新文化运动。外省学生大多数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那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例如尹宽就是芜湖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于他们说来,抵制日货和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他们一面组织学生出去检查日货,同以当地商会为组织的资本家阶级面对面

斗争，一面手不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出版的杂志，他们互相争论“文言和白话”、“一纲五常”和“赛先生德先生”，甚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汀漳两府的学生不知道这些问题，即使知道一点对之也没有兴趣。他们爱说的是如何发财，如何物质享乐，如何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他们向往的是南洋群岛，是华侨生活，充其量也是资本主义。他们动不动就开口相骂，甚至挥拳相打。他们对于外省学生含有敌意，称之为“外江人”。外省学生很快就感觉到这些福建人“野蛮”。有个湖南人明白说出这个感想，于是一部分福建人就准备去“问罪”，即是要打这个湖南学生，结果没有打起来。

我在这一批同乡中没有谈话的对象。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话，他们不感兴趣。有时与外省人交谈几句，我倒发现有许多感兴趣的问题可谈的。至少，我可以向外省人借书看。福建学生的行篋中没有一本《新青年》等的新文化杂志，没有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这也是福建学生落后的证据。反之，外省学生则有很多这类的书刊。我的第一本《新青年》就是在轮船上向一个外省学生借来的。确切点说是一个福建学生向外省学生借来看，看不下去，然后我拿起来看。这本《新青年》登载了一个叫做陈独秀的人写的一篇非圣无法的文章，最后用“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话来反对孔子（按：这篇文章题为《宪法与孔丘》，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期）。当日，我写日记时长篇大论大骂陈独秀。可是从此我有了瘾，借了更多的《新青年》以及其他的新文化杂志来看，外省学生来到圣日耳曼中学后我就向他们借这类书刊来看。我早已不骂陈独秀了。

自明社

外省学生中有几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并不骂福建学生野蛮，而是像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徒一般要感化野蛮人。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我这个爱借新书看的人特别引起他们注意。贵州学生江颂鲁特别喜欢帮助我向别人借书，喜欢同我谈话、讨论问题。他在我背后替我宣传，引得更多的外省人同我谈话。自然不可以把我上面说的话绝对化了，好像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同外省学生有思想上的接触。另有一个或两个福建学生也有些接触，不过性质上多少有点不同。他们是为了交朋友，我则是为了求知识。

一天汪颂鲁带我到校内一个偏僻课堂的门口去。课堂内没有人，门是锁着的，门前走廊上站着一个人高而瘦的人，面孔像煮熟的螃蟹壳。汪颂鲁作了介绍，说这人名尹宽，我听了不觉暗笑，叫做“尹长”不是更适合些么？这个人未等寒暄，立即向我作了一篇演说。内容，我自然忘记了。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常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为了不致引起别人惊怪，我们往往到校外圣日耳曼森林内的空地石登上去谈话。渐渐地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来研究学问。讨论名称时，我建议叫做“自明社”，他们两人立即接受了。

为什么叫做“自明社”呢？因为当时《新青年》发表了张崧年一篇文章，介绍以罗曼罗兰为首有名的知识分子发表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张崧年给每个签字的人作了简单的介绍，对于不久之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金的巴比赛，除介绍他本人外，还说他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光明社”。我不知怎样在巴黎一条小街道上寻找到

了“光明社”出的刊物《光明》的地址，订了一份《光明》。那地址是一个小书店，卖革命书刊的。我的法文学得比他们两人好，常常告诉他们以革命书刊的内容。汪颂鲁说：“你这个名称取得好，要向别人说道理，自己先要懂得这道理。”我们的计划是以三人为核心先组织起来，然后争取别人加入的。可是，没有增加一个人，最终连团体本身也无形消灭了。

团体成立不久，暑假到了。外省学生全部离开学校，福建学生大部分离开学校，只有少数人没有离开，我是其中之一。

人分散了，但“自明社”没有解散。我们决定以通信来联系。暑假分手以前，在讨论问题中，我和尹宽两人之间就常有争论。分手以后我们用通信来争论，争论的是宗教问题。当时接受新文化的青年都是反对宗教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尹宽赞成宗教。他赞成的不是某一具体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类，而是宗教精神。他认为必须有宗教徒那种百折不回，甘愿为信仰而忍受牺牲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便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他举一个例说，有些勤工俭学生写回家信，信封上要写“大中华民国”，这个“大”字就是宗教精神。可见，他所谓“宗教”，意义是很广泛的。后来争论就演变为理智和感情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主张感情应服从理智，他则相反。我们反复辩难，来往的信都写得很长。双方的信，我都保存下来，连同汪颂鲁的调和的短信。争论自然没有结果，但不记得怎样没有继续下去。一九二一年，我住在墨兰，认识了曾琦，谈得颇投机。他要拉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我虽未参加，但拿我和尹宽关于宗教问题的来往信给曾琦看了。曾琦说《少年中国》准备出反对宗教的专号，他要拿这几封信去发表，我征求尹宽同意，尹宽反对，理由是：“不成熟的。”这些信，我还是保存下来，但以后遗失了，不记得何时遗失及怎样遗失的。

当时我们的思想确实是不成熟的。我们三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新青年》的水平上，而且是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水平上。一九

二〇年的《新青年》已经谈社会主义了,但我们没有跟上去。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下半月,我终于离开了圣日耳曼中学而住到墨兰来。当时,汪颂鲁住在巴黎,尹宽住在墨兰。巴黎生活费太贵,房租就出不起;墨兰是外省小城市,适合于我的经济条件。

法国有两个外省小城市,读音相近,都有中学,都收中国学生补习法文。一个叫 Melun,一个叫 Moulins。二者读音,法国人是容易分别的,但其中第二音节中国人很难分别,前者一般译为墨兰,后者一般译为慕兰,也有其他的译名。墨兰是“塞纳与曼因”县(有人译为“省”,其实面积只有中国一县大)的县城,后者是“阿里耶”县的县城。两县都在法国中部,前者偏北,后者偏南。我搬去的是墨兰城,在巴黎东南四十公里,塞纳河岸上,巴黎至马赛的铁路经过市外,人口不足两万。中学有几十个中国学生补习法文,市内也有不少中国人赁屋居住,自炊自濯,自己学习。我是来此自学的。在圣日耳曼,不能过这种生活,因为房租太贵。在墨兰,除租赁人家余屋之外,还可以住小公寓,房间简陋,但租金便宜。我住的就是小公寓,可以向公寓主人包伙食,但我宁愿自己烧饭。我不是通过尹宽,而是通过一个在墨兰中学补习法文的中国学生预先租好公寓房间的。这个人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过,我忘记是谁,可能是四川人秦治谷。尹宽住的是人家的余屋,他东奔西跑,不常在家。不久,汪颂鲁也搬到墨兰来。他也租赁人家余屋,虽然比我多付房租,但比巴黎公寓的房租节省得多了。

我们三人之中谁也不再提“自明社”的事情。我们各人思想都有发展以至于分歧。这时恰好爆发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对中国公使馆和法法教育会进行斗争,同时群众内部也发生分化和斗争。法国各地方,有勤工俭学生聚居的,都派代表到巴黎西北近郊的小镇拉加伦哥隆来,那里有个花园洋房的别墅,坐落在盘特街三十九号,是一位法国有钱的老寡妇赠送给中国侨民的。门前挂“华侨协社”牌子,表明是好几个华侨团体公共使用的,事实上是华法

教育会一家独用,它处理有关勤工俭学的一切问题。我们同国内通信也在这里转交。屋子三层都作办公室,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则住在地窖内;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

一九二一年初,那里住了不少的人,各地代表到达后便在那里开会。当时群众已形成了两个核心:一个叫做蒙达尔派,另一个很难用简单的名称概括起来,故称为“另一派”。蒙达尔派提的口号是:生存权和求学权——意思是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保障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即供给勤工俭学生进学校的一切费用。另一派则提出劳动权口号,只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设法让勤工俭学生能进工厂做工。自然还有其他次要的分歧。双方在群众面前辩论,而且写成文字,胶印多份散发。辩论发展为谩骂和诬蔑。另一派骂蒙达尔派为“寄生虫”,为逃避自食其力的劳动,而要求上层社会的豢养;他们根本反对蒙达尔派号召的二月二十八日去巴黎巴比伦街中国公使馆请愿,以为请愿是可耻的。蒙达尔派则说另一派受了公使陈策收买,破坏群众运动。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只有蒙达尔派的群众来巴黎请愿,大闹公使馆,结果被法国警察冲散了。另一派则不参加这个“二八运动”。我自己当然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因为我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半官费生”,因此我一向误记为另一派也参加了“二八运动”。近年看到了李隆郅对于这个事件的回忆,才知道另一派并未参加这个运动。李隆郅的回忆文章说:“二八事件包围公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策的收买,因此对于这个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个行动,但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便明确表示:(一)坚决反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二)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这话是可信的,另一派确实没有参加“二八运动”,我以为他们也参加了,是出于误记,李隆郅回忆文章中其他部分的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则不是完全可信的,例如文章有意

冲淡了两派之间激烈的对立和斗争的事实。我虽置身事外,但知道了和记得了这些事实。我的两个朋友恰好分属于两派:尹宽站在蒙达尔派方面,而汪颂鲁站在另一派方面。他们各自向我说本派的好话而丑诋敌派,我由此知道了双方的主张及其遗闻轶事。有时,尹宽和汪颂鲁在我家中见面也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好的,他们各人对我也是好的,但他们中间已经丧失友谊了,见面时候点点头,内心互相鄙视,但也不在我面前说对方的坏话。

我置身于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之外,把运动消息当作与己无关的社会新闻,也不去判断两派争论谁是谁非。我不想去认识两派中的活动人物,但通过尹宽和汪颂鲁,双方都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虽然并不重视我这个人。有一天,李隆邛来墨兰看一个什么人(不是汪颂鲁),不知怎样到我的小公寓来,推开我的房门,说他叫李隆邛,顺便来认识一下。我知道这个人,正要招待他坐下来谈谈,他不坐,说有事情就要走,改日再来谈。从此直至三年之后我才在上海同他见了面。那时他已改名李成了,次年再改名李立三。

我那时还在准备考大学,自修法文、数学及其他科学,同时通过《人道报》和《光明》杂志以及国内出版的书刊去关心当前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理论。我试译《光明》杂志上一篇法郎士的文章,投寄《东方杂志》,居然发表出来了,并寄来稿费。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可是直至六十二年之后的今天我尚未看过这一期《东方杂志》。

汪颂鲁约我合译一本法文书。我选定了当时新出的一本《文学入门》,是法兰西学院一位有名的院士爱弥·法格(Emile Faguet)著的。一面译,一面写信给胡适,问他要不要这本译稿。当时胡适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很快收到胡适寄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某个职员用胡适的名义写的),嘱寄去看看。我们译好便寄去了,从此没有下文。这几个月的翻译工作,促进了我

的法文知识,也给了我以许多有关世界文学发展的知识,书未出版,领不到稿费,我也不在乎。在翻译的过程中,汪颂鲁把关于波兰文学的一章单独抄出,寄出《学艺》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个编辑是汪颂鲁的朋友却发表了。译者用汪颂鲁、郑超麟之名。我在什么刊物的广告上看见目录,但至今也未看到这期杂志,更未得到稿费。奇怪的是我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目中看到了一本《文学入门》(或类此的书名),也是法格著的,但系另一个人翻译的。是否商务印书馆收到我们的译稿后,认为书是好的,但翻译不好。(翻译当然不会好,因为我当时只学了一年多的法文),找另一个人重译出版呢?我对于此事如此没有兴趣,以至于懒得买一本来研究一下。

工学世界社

尹宽当时就不赞成我做翻译工作,也不赞成我读《光明》杂志。一天,他拿一本法文的《共产党宣言》给我,要我看。他说:“这本书,有学问的人看了,不见得欣赏,工人看了,则每句话都说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立刻就会接受的。”我早知道这本有名的著作,但自己是不会去买来看的。尹宽给我的是一本字体很小,纸张很薄的书,法国共产党人印出来向群众宣传的。我拿到了尹宽介绍的书,自然要看下去,同时知道这是蒙达尔派拿给尹宽看的书,尹宽对我说的那几句话也一定是蒙达尔派拿书给他时对他说的话。我看了《共产党宣言》,随后又看了尹宽拿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了这两本法文小册子,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识,更多知道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如此而已,我自己未曾在工厂做工,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在工厂做过工的人,我仅仅把各派社会主义当作学说,社会主义著作上的话都未能说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是在“探索真理”,在各种学说中探索我所认为的“真理”。但尹宽以及他背后的蒙达尔派显然已经把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奉为惟一真理了。

尹宽和汪颂鲁确实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一年前,在圣日耳曼中学,我们三人的思想根本是一致的,即都是新青年派,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等等。一年以后,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种思想了,我们都在探索,尹宽受了蒙达尔派的影响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是在探索;汪颂鲁也在探索,但不久就落后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三个思想进程不同,明显是受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所

决定的。这里,我说的不是一般的规律,而是就尹宽、汪颂鲁、郑超麟三个人的具体经历来说。

尹宽喜欢说自己的家庭出身,并非同我熟悉之后才同我说,而是一认识我就同我说了。似乎第一次见面,在圣日耳曼中学课堂门口的走廊上他站着向我发表长篇演说之时就告诉我他的家庭出身。他说,他的父亲是农民,家里很穷,他少时就在田里劳动,也在私塾读书。私塾先生看见他很聪明,很会读书,可以造就为人才,于是有意培养他,物质上支持他(我想,当然不是先生自己拿钱培养他,因“十个先生九个穷”),送他进新式学校,最后送他到芜湖进农业中学。五四运动中,他在芜湖成了学生的一个领袖。

我欣赏尹宽是桐城人,我交了一个桐城人朋友,因为我在中学学的是桐城派古文,读的是桐城人姚鼐选的《古文辞类纂》。那时人家说桐城人出门只说自己是桐城人就够了,不必说安徽省桐城人。安庆府首县是怀宁,但与桐城并举时人家不说“怀桐”而说“桐怀”等等。《新青年》虽然骂“桐城谬种”,我虽然不再作桐城派古文,但余威还在,对于桐城的向往尚未泯灭。反之,我却不欣赏尹宽的农民家庭出身。我是世代地主家庭出身的,从我上溯五代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到我父亲一代成为破产的地主,但我还是看不起家乡农家出身的读书子弟,这种人各地方都有。我这个感想总是放在心里,从来没有说出来的。事实上,我很佩服尹宽。他读的书也许没有我多,但比我从书中得到更多更大的益处。他没有书呆子气,能办事,能辩论,能指挥群众,能演说,而在群众面前说话时又能随机应变。这些,我是自叹不如的。自然,他的优点之中也包含了缺点。

他是五四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很活跃。在五四运动中,安徽各城市的学生没有芜湖闹得凶,省会安庆学生运动也不如芜湖。高语罕、恽代英都曾在芜湖教书,恽代英在宣城教书,但常来芜湖讲演,自然发生了作用,但这不是惟一的原因。尹宽怎样活

动,我今天已经说不出来了。他也许根本没有同我说起,可能说了但我忘记。我是从其他安徽学生知道一点尹宽的作用的。我身边有一本安徽省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〇年第一辑(总第二辑),其中几篇文章记载芜湖的五四学生运动,可是翻遍这些文章只发现一处提到尹宽,即在介绍李慰农烈士时提到李慰农“后与尹宽(硕夫)等同时赴法参加勤工俭学”,在记载芜湖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时都把尹宽姓名抹掉了。例如,《芜湖学生运动记略》一文内记载“二农”(全文是“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风潮开除五个学生时只记何其巩、王思、马寅寿三个姓名,另两个姓名就不记了。

我自然不能补叙尹宽在芜湖这一段生活,我想后人可能找到史料。我只说,在法国,安徽学生都是把尹宽看作领导人而表示敬意的,但又都在背后骂他或说他坏话。惟有李慰农一人始终跟着他走。以后我还有机会说到李慰农。在法国,尹宽还领导全体安徽学生,争取安徽省军阀政权拨款救济本省学生,所以安徽学生的经济情况比四川、湖南学生好些。

上面提到二农被开除的学生何其巩。此人,三十年代中期做了国民党政权的北平市长,不是蒋介石嫡系,而是宋哲元委任的。尹宽在芜湖同他关系很好,第二次被捕时写信向他求援,他也出了力,以致尹宽此次没有判刑而从南京卫戍司令部解去反省院。这与其他政治犯经过自首而解反省院的,是不同的。

尹宽怎样参加了蒙达尔派的呢?蒙达尔派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一个安徽人怎样会加入其中呢?以前我没有去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同他一道由上海第一看守所解去提篮桥大监狱,关在一个囚室,谈话间想起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他告诉了我如下的情节。

他同蒙达尔派早有来往了,但思想尚未一致。蒙达尔派很看重他这个人,蔡和森特意派欧阳泽(字玉生)从蒙达尔到墨兰来,住

在尹宽家中,天天同尹宽讨论问题,最后说服了尹宽。这就是说,尹宽由此从复杂的混乱的思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

经他一说,我想起了一九二一年我搬到墨兰那个小公寓自炊自学时,几次在尹宽家中看见一个湖南青年,叫做欧阳玉生的,介绍之后他也同我谈思想问题,谈人生权,谈一般的哲学。至今我还保留着如下的印象:这个人很有学问。当时,我对于哲学发生了兴趣,找中国杂志来看,同时也找法文书来看。我在中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笛卡儿;我在法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 Descartes。我如此幼稚,竟不知道把这两个人名联系起来。欧阳玉生同我谈笛卡儿,我知道,我也能够同他谈,可是一次他说了笛卡儿,接着就用法文注释“德斯卡特斯”,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笛卡儿就是 Descartes。欧阳玉生同我一样读错了法国字。Descartes 不应当读为“德斯卡特斯”,正应当读为笛卡儿或德卡尔。但由此我承认欧阳玉生知道得比我多。

最近看到新发表的《贺果日记》,我还可以确定欧阳玉生到墨兰来去的具体日期。贺果日记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尔开大会(第一次大会),贺果从商巴尼(Champagne)来蒙达尔,会毕,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回去。这日的日记说:“上午八时偕寿圃、富春回商巴尼;同车者有特夫、兼士往巴黎转郎西去;有欧阳君玉生往木兰去。……”木兰即墨兰。这就是说:欧阳玉生是工学世界社大会后决定派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说:“早五时十八分附车赴巴里,与驻巴代表谈话一切,商及直接行动办法。下午偕尹君赴木兰,晚宿尹君寓所。”巴里即巴黎。这就是说:尹宽也参加了“二八运动”,也是一个领导人,事前五日亲自去巴黎,同蒙达尔派的人商议行动计划,当日便同贺果回墨兰,留贺果住在自己家里。贺果来墨兰是有作用的。二月二十四日日日记说:“上午木兰公学同学会商,结果赞成直

接行动,签名的十二人。下午偕欧阳君来商巴尼。和笙已自蒙达尼归。晚印公启五十份,明早即发。”和笙就是李维汉,他当时也住在商巴尼。那次,商巴尼的学生派贺果去巴黎,派李维汉去蒙达尔,派另一个人去枫丹白露。贺果由巴黎再到墨兰去动员。更重要的是由此知道,欧阳玉生做尹宽工作已经成功了,二月二十四日离开墨兰回商巴尼去。欧阳玉生在墨兰共住了五十三日。二月二十八日,尹宽无疑去参加了包围公使馆这个直接行动。

发生这一切时,我都住在墨兰,但事后才知道这个运动。尹宽事前毫未告诉我。这是奇怪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勤工俭学生,此外我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尹宽给我法文《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看,当是“二八运动”以后的事情。

提到欧阳玉生,尹宽在上海市监狱内还告诉我一件事情。欧阳玉生是蔡畅第一个爱人,这我知道。尹宽告诉我,这人生了肺结核病,在什么地方租了房子养病,蔡畅特意从蒙达尔住到那里去,服侍他,帮他烧饭、洗衣服。两人是自由恋爱的,但“蔡伯母”不赞成,“蔡伯母”看中了李富春。里昂大学事件中,欧阳泽同蔡和森一起被遣送回国了,两人的关系从此断绝。(也可能遣送前就已断绝了的。)蔡畅留在法国,同李富春住在一起,没有同她的母亲和嫂嫂一起回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这俩夫妇参加。我记得李富春出席了第二次大会,但我未见过蔡畅,他们转来苏联时,我已回国了。我未回国前,莫斯科东方大学收到了欧阳玉生从湖南寄来一本日记,用毛笔在十行纸上写的,给蔡畅,此时蔡畅尚未到莫斯科。我们都拿来看了,我从头看到底。日记大多数是思念蔡畅的话。第一篇讨论的是“人死观”的问题。那时他的肺病已经很重了。我由此联想到他在墨兰同我说“人生观”问题。贺果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说:“下午因为欧阳玉生的人生问题特开谈话会。会场在森林中,欧阳谓‘人生的究竟怎样,谁也不能解答,所以人生是无意义的。凡人的行动都是无意义的。……’经数人数时的讨论,归

结到人生等于凡生物之生存,所以是形而上学的空想,必须提开,专注重既生以后的生的方法。以为人的意义就在于‘生’,所以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由此可见,欧阳玉生到处拉人谈“人生观”问题,至死还纠缠在人生观问题上,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都要纠缠这个问题。但二十年代,我们已经抛开这个问题了,正如贺果说的“必须提开”,可是欧阳玉生提不开。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够说服尹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欧阳玉生这本寄给蔡畅的日记,不知下落如何?也许这人看看,那人看看之后就遗失了,蔡畅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后可能没有看到。我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会见蔡畅时曾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是淡淡一笑,不说自己看到了,也不说自己不知道此事。欧阳玉生显然寄出日记之后不久就死了。

参加工学世界社,是尹宽生平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一般的民主思想转到马克思主义。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

我一向认为工学世界社就是蔡和森领导的一个组织,服从蔡和森的一切指挥的。近年看见一些史料才知道事情没有我设想的那么简单。蔡和森领导的,只是总部设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组织。在湖南,蔡和森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领袖,两人思想状态不相上下,蔡和森率领一部分会员来保定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期间,思想进步了,研究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据说,他刚刚学了几天法文,便依靠字典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带了妹妹和母亲一起来到法国,始终住在蒙达尔,似乎未曾离开那里的中学。向警予住在那里的女子中学。法国的中学是男女分开的。向警予在蔡和森思想影响之下不久也走到马克思主义来了。他们两人结婚时发表了一个《向上同盟》的宣言。蔡和森在蒙达尔中学更加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人道报》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书。他学习,谈话,工作,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人说,他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囚首垢面而谈马克思主义”。这话自然

是夸大了的。后来,我在上海碰到蔡和森,同他夫妇相处几个月,发现他虽不修边幅,却没有传闻的那种地步。不仅在新民学会的旅法会员中间而且在全体勤工俭学生中间,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遥遥领先的。

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他认为蔡和森在国内是墨翟主义者,初到法国时,也在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之间探索,直至一九二〇年法国社会党都尔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改名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而排斥其他社会主义学说。

工学世界社不过是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一部分人的组织,是以李维汉为领袖的。这些人仍旧是新民学会会员,仍旧受国内毛泽东、国外蔡和森的领导。他们组织这个新团体,不是要代替新民学会,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为了互相帮助,如交换书报,储蓄救济之类。成员不限于新民学会会员,更不限于湖南籍学生。用现在的话说,那不过是新民学会的一个外团团体。一九二〇年七月间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蒙达尔开大会,工学世界社中属于新民学会的人自然参加,不属于新民学会的人也列席。如此,工学世界社的人可以说都参加了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的人不见得都参加工学世界社。蔡和森本人及其亲近的几个人就未曾参加工学世界社。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大会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应邀参加的。蔡和森为什么不加入工学世界社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反对“工学”二字。蔡和森早已认为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开第二次大会时就提出改变工学世界社名称的问题。贺果日记说,一部分人主张改名,因为原名名不副实;另一部分人则注重实际,认为不必改名。双主人数量相等,就不改名了。这是表示,此时工学世界社事实上已经抛弃工学主义了。

我们外面的人只知道蒙达尔的组织就是工学世界社,不知道有这些曲折。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我俩筹备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时,李维汉关照我:“如果木棚宿舍有人问你去巴黎做什么,你就回答说:去参加工学世界社的年会。”尹宽参加的,可见也是工学世界社,而不是新民学会。而且,据我研究,尹宽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年会时才正式参加的。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把尹宽姓名列入一九二〇年年底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出席者之内。恐怕是误记的。事实是第一次年会以后,欧阳玉生才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第二次年会上,据贺果日记有十四个人新加入的,而且在大会上发言,尹宽为在此十四个人之中。但因从“二八运动”前后起尹宽便同蒙达尔派站在一起了,无论是另一派,无论是群众都把尹宽算入蒙达尔派,而且算入蒙达尔派的头头。

本书初稿写好,我才看到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的《芜湖党史资料》第四辑,其中有尹宽一篇回忆文章。关于他在法国和苏联生活的。这是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所记有许多不合事实,但也有许多是可信的,可以补充和证实我这里所说的。

尹宽论蔡和森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是蔡和森。蔡和森这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是无产阶级专政,除开会外终日抱着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他还做‘转运’工作,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蔡和森在法国最初所团结的团体,就是工学世界社。顾名思义,可以知道这个团体还是受五四运动后工读互助团之类泛劳动主义的影响。据说它的基础还是五四运动时湖南师范所成立的新民学会,不待说它的成员起初也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以后才掺进我这个忘记省界的安徽人。”(按:尹宽也不清楚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之间曲折的关系。)

尹宽说他怎样被欧阳泽说服走到革命路上去的。“我在来法国的轮船上认识一个湖南人欧阳泽(又名玉生),并且成为至交。

一天,他从蒙达尔公学转来木兰(按:即墨兰)找我……他就依靠我过生活,住在一个狭小的阁楼上,每日买面包,煮汤,如是一个多月,谈话间知道,他是受蔡和森和李维汉等友人委托,特来做说客的。不过,他再三申明,他自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他仰慕尼采的超人主义,当时所研究的是柏格森的创化论,他的书包里就夹着一大本柏格森创化论原木。但他不向我宣传创化论,只向我宣传蔡和森的革命。他说:未来的革命的领袖不是陈独秀,而是蔡和森。他向我宣传蔡和森如何有能力。他说:他自己将来不愿意参加革命,却愿意从旁赞助。很显然,他把革命运动当作俗事,而他自己另有高尚的理想。不知怎的,我竟被他说动了,竟被他拉到蒙达尔去见蔡和森、李维汉,以及工学世界社的一些社员。不知怎的,我后来也就加入了工学世界社。从此我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新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我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我开始读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共产党宣言》,解放后经过十多年的‘教育改造’,我才弄懂了哩!这是否叫做‘人牵着不走,鬼牵着乱跑’呢?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当时摆我面前的路很多,也曾有人引我走‘正路’,惟独欧阳泽来一说,我就听从了,归根结蒂,还不是什么人走什么路么?”

我本来听说,蒙达尔派有四个头头: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蔡和森又是头头中的头头,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他自己不在群众面前露面,李维汉、汪泽楷等人向群众说的就是他的话。现在看到一些史料之后才知不然。新民学会会员虽初到法国时思想是复杂而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工学主义,占了上风。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学习了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其他会员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大抵可以这样说:蒙达尔派夺取勤工俭学群众运动领导权的过程,同时就是蔡和森统一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思想的过程。从贺果日记可以看到蒙达尔派第二个头头李维汉,思想上同蔡和森距离很远。蔡和森

早已克服工学主义了，李维汉另组织一个团体仍以“工学”为名（“工学励进社”，后改“工学世界社”）；一九二〇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年会时，“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定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可是，第二天李维汉谈话则“主张无政府主义；从个性出发，主张社会〔应〕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李维汉的无政府主义不知何时才放弃而接受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我想经过“二八运动”之后，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开第二次年会时，工学世界社的思想当然得到统一了？

李维汉在思想转变期间，据尹宽解放前某次闲谈时告诉我说，曾发表一种议论，认为社会的动力是“为己主义”。尹宽说这话当然是为了反对李维汉。其实，尹宽不知道，这不是李维汉的发明，而是近代哲学中有一派这样说。为己主义并非自私自利之意。我们古代的杨朱毕竟是百家中的一家，不可废的。此外，当时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存有这种思想的，决非李维汉一人。上面引的贺果一条日记就说他们讨论欧阳玉生提出的人生观问题时，一致的结论是：“人的意义就在于生，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应当说一说蒙达尔派的对立面，另一派的情况。这派一个头头李隆邨写了回忆。他说，他到法国以为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旅欧周刊》，登载出来了。文章大意是拥护勤工俭学，希望国内贫苦学生更多来法国勤工俭学，而反对当时出现的“勤工俭学不可能”的论调。赵世炎看到这篇文章，写信给作者表示同意并要求见面。从此李赵二人结成一个核心，不久吸收了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若等共七八人，组成一个“劳动学会”，他们反对“请愿”，不参加二八包围公使馆的运动。运动失败后，群众更多拥护他们。他们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学会”，以原来的“劳动学会”为“领导核心”，“不久，三千多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按：这

话是夸大的。)“若飞、延年、乔年同志等都参加了。”(按:王若飞确实参加了,但陈延年、乔年兄弟曾否参加,还须查考。)

据我所知,组成另一派的勤工俭学生是各省人都有的,不似蒙达尔派以湖南人为主体的。大体可以说另一派是:四川人,非新民学会系统的湖南人,跟随黄齐生来法国的贵州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分子组成的。贵州人是其中活跃的人物,除王若飞之外还有熊志南。黄齐生自己没有参加,他不是勤工俭学生。这一批贵州学生,我找到了踪迹,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上海坐英国轮船勒苏士号出发的,先到英国,再由英国转来法国。我们有中国乘客的全体名单,共四十人,其中贵州籍十一人,有三人不是黄齐生系统的。属于黄齐生系统的八人,名单如下:黄齐生、汪颂鲁、刘方岳、熊铭青、熊瑾、冉蕴明、胡礼同、熊志南。这名单中没有王若飞,也没有我知道另几个贵州人,他们大概是另坐一船来法国的。我在汪颂鲁住所看见他的许多同乡,他们在勤工俭学生内部斗争中都是站在另一派方面的。

“二八运动”失败后,两派各自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攻击,采取多种多样方式。一九二一年初夏某一天,汪颂鲁来找我,说有几个朋友提议组织一个“通信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或别的类此名称,我记不清楚),办法是:参加的人把身边的书开一张目录,然后汇齐印成总目录,发给各人,书名下注明何人所有,何号可借等等。他们邀汪颂鲁参加,并托汪颂鲁邀我参加,参加者可于某日去巴黎西郊散客卢(Saint - Cloud)地方熊志南的寓所开一个成立会。散客卢是巴黎一个名胜地,在丘陵上,有拿破仑离宫,普法战争时被普鲁士人焚毁,美丽的花园还在。我没有去过。熊志南的寓所就设在山坡上,他替一个瓷器厂画瓷坯,每月工资相当多。熊志南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我常常见面,但未曾谈过话。我知道,他在勤工俭学生中属于另一派,反对蒙达尔派的。汪颂鲁说,他自己决定参加了。他劝我也去参加。我不愿意卷入斗争漩涡,

过去只听尹宽说蒙达尔派,听汪颂鲁说另一派,不置可否;他们两人有时在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我也不作左右袒。但现在,要成立的团体,不过是互相借书看,即不参加行动,也不讨论思想,同这一派人往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答应那日到散客卢去了。汪颂鲁也约尹宽一道去。尹宽属于蒙达尔派是人所共知的。汪颂鲁大概是虚邀一声,明知尹宽不会去的。谁知出人意外,尹宽答应去了。

到了约定的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墨兰到巴黎去。熊志南热情迎接我们,房里收拾得很干净,案头放着未画完的花瓶瓷坯,窗外阳光灿烂,天气并不热,在那里的人,除熊志南外,我都是初次见面的,有王若飞,有赵世炎,有无名,还有两三个其他的人,有两件事,我的印象最深,至今还不会忘记。一件,在开会前,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闲步。赵世炎正在路上同人说话,尹宽走上前去,问道:“你是赵世炎么?”问了两次,可是赵世炎没有回答他,是有意不回答呢,还是没有听到呢?我至今还不能确定。据李隆郅说,他们那一派于“二八运动”后曾派赵世炎去蒙达尔同蔡和森谈了三天的话。不知在此以前以后?即令在此以后,蔡和森会见了赵世炎,尹宽也不见得会见了赵世炎。恐怕在“二八”前后的群众运动中尹宽也没有机会同赵世炎会面。另一件则发生于开会以后。开会,讨论名称、章程、推举办事人,及其他事情,我都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我自己也发了言,而且同王若飞争论了什么事情。尹宽一句话没有说。会开完了,他才站起来说:他今天是来旁听的。这话大出我意外,我只记得,会上只无名一个人有反应,好像是用讽刺的口吻回答了一句:“我们知道了。”

无名当时也是翩翩年少,年龄同我差不多。我似乎未曾听汪颂鲁说起他。事后,汪颂鲁才告诉我,无名的父亲是革命党,在辛亥革命或反袁斗争中被杀了,他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三无”中有“无家庭”的一项,因此废除原有的姓名,自称“无名”,有时也叫“吴明”。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我听了汪颂鲁

的话,也不觉得奇怪。以后几个月,无名在里大运动中也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在法国收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出版的机关报《先驱》,看见无名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一九二四年秋天,我回国以后,听说,无名已经消极脱离了,留下一则故事供人传说。即说:某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上海不安全,沈玄卢邀请他们去萧山开。会开了,但无名为了杨之华的美貌神魂颠倒,以后就消极,离开上海,不知去向。最近几年,我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一些历史资料,才第一次知道无名、吴明的真姓名叫做陈公培,很早就脱了党,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曾代表十九路军去同江西红军谈判,解放后尚未死,曾留下一些回忆文章,其中也提到我这个人,虽然是道听途说的。

散客卢开会那日,李隆郅没有出场。这个会以及成立的“通信图书馆”,显然是一种活动,借此发展影响和组织的。团体成立了,我把身边的书抄了一份目录寄去,不久收到全体成员的名单和总书目。成员中有李隆郅,有熊雄、有林祖烈以及其他我知名的人。自然有那日到会的人。尹宽不在内,蒙达尔派都不在内。我也曾向别人借书看,别人也曾向我借书看。这个“通信图书馆”还是有生命的。可是这生命太短促了。图书馆成立不久,勤工俭学生中的两派就合作发起一个更大的群众运动,即准备占领里昂大学。尹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里昂大学运动的经过记载很多,我这里不必多费笔墨。我只说尹宽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访问羁押在那里的尹宽,搜集有关赵世炎传记的资料。尹宽自己说:他在那次运动中是参加占领里大校舍的;他同大伙一起被关押在一个兵营内,吴稚晖到法国后,要被押学生推出代表同他谈判,尹宽就是被推举的四个代表之一,他们面对面同吴稚晖辩论;谈判失败后,代表复回兵营;回到门口,里面的学生叫尹宽不要进去,而去巴黎同公使陈策办交

涉；他到巴黎后不久，一百多学生就被驱逐回国了。

尹宽这个叙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细节方面有不合事实之处。被关押的学生确实同吴稚晖当面辩论过，李立三的回亿也这样说。我自己没有参加这个运动，说不清楚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这件事，也记得十月间尹宽在墨兰，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们一起听到那批学生被驱逐回国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间听到的，也不是在尹宽的房间听到的，当时我和尹宽都在小公寓三楼一个大房间内，那里住的也是一个安徽学生，忘其姓名，英文很好。他主张打电报去里昂或巴黎证实这个消息。电报简单写“expulsion?”尹宽并未接受这个建议。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清楚记得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和尹宽的回亿并不矛盾。可以设想，尹宽从里昂回到巴黎，看见无事可做，便回墨兰来了，在墨兰听到了驱逐回国的消息。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十个人留守巴黎，做后援的工作。据今人考证，此十人中有李维汉、汪泽楷、萧子暉、王若飞、方敦元等，赵世炎、尹宽二人则是从里昂兵营内逃出来的。

里大运动当时算是失败，群众纷纷反对领导的人，这些未被驱逐回国的人特别引起群众的反对，当面骂他们，甚至要打他们。这是任何群众运动经过失败后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一切集会、研究等工作都停止了，无法进行了。我参加的那个“通信图书馆”也是如此无形消灭。但对我说来，这个组织并非无疾而终的。里大运动失败后，一天，我在墨兰接到“图书馆”办事人熊志南来信，向我借《老子》《庄子》《列子》三部古书，我寄给他。熊志南向我借这三部古书已经是奇怪的了，但他写给我的信更加令人惊异。他接连给我几封信，简直是把我也当作知己，向我倾诉心中的苦闷。他不知道哪里来这些苦闷！他的世界是空虚的，他的前途是渺茫的，他要在道家思想中寻找依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信。我能够回答他什么呢？我正在从出世走向人世，而熊志南此时则从人世走向山世。当时外面传说，我是易卜生主义者，我主张极端的个人主

义，我自己却不知道是什么主义。熊志南大概希望我能够在他的绝望之中拉他一把。我没有这个力量。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听汪颂鲁说，熊志南死了。他去法国北方县做工，爱了一个法国姑娘，相约在一个什么咖啡馆举行“裸体结婚”。届时，姑娘没有来，他于是发了疯，闹了笑话，不久就死去了。以后，我去华侨协社，在转信处窗口看见里面一大堆书，其中有我的《老子》《孔子》《列子》。我没有向转信人讨回这些书。

事隔六十多年，我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这件事，我一向以为是偶然的个人的事件，不值得去寻根究底；此次为记尹宽事顺带回忆起来，忽然想起熊志南的发疯可能与里大运动的失败有关系。我也曾问过王若飞和赵世炎关于熊志南的事情，他们两人都不愿回答。现在想起来，他们两人可能有理由不愿回答熊志南的事情。今天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只好依靠想像试作一个解释。

没有根据断定熊志南参加了里大运动。即使他没有参加，但运动的失败一定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是一个画家，艺术家；同他几次接触之后，我发现他的心灵是很脆弱的，多愁善感。运动失败了，代表北京政府的陈篆公使首先成了仇恨的对象。其次，吴稚晖以及一切提倡勤工俭学的人也成了仇恨的对象，至少被人看作“骗子”。但这还不会使熊志南发疯，我猜想他还反对运动的领导人，反对自己一派的赵世炎和王若飞，不仅反对他们无能，而且怀疑甚至肯定他们“叛卖”。这是一切群众运动遭受失败之后，领导人的命运。熊志南也同普通群众一般，在失败之下不去反对敌人的残暴和狡诈，而去反对自己的领导人。所有残留下来的领导人当时都遭受这个命运。赵世炎被迫要去自杀。汪泽楷在少年共产党中取的化名叫做“裸体”，意为自己是清白无疵的。我当时接触的群众很少，不知道群众对于这些领导人提出了什么奇奇怪怪的控告。正因为我不参加运动，不是领导人，不属于哪一派，熊志南才把心里的怨恨和苦闷向我倾诉的。以上所说，纯属臆测，没有根据。

从英国轮船勒苏士号中国乘客的名单中,我发现了熊志南名下填:贵州人,二十一岁,去英国,天津南开学校出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书中还登载了熊志南一个长篇记事,从七卷《学生杂志》第二、第六、第七号转载来的。署名“贵州留学团熊志南”。记事文从上海登船以前写起,到法国安置下来为止。文内最后部分,说起他到伦敦以后如何改变计划转到法国来的。

熊志南与尹宽无关,整个“通信图书馆”也与尹宽无闻,我这里写得那么多,只因图书馆成立大会时尹宽曾去“旁听”,又因许多回忆文章中惟有尹宽提到这个图书馆。尹宽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回答访问者说:“另一派当时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以后又搞了一个劳动学会。”事实上是劳动学会在先,图书馆在后。又尹宽记得名称是“流动图书馆”,可能他记得对。^①

初稿写完后,我才细看赵世炎在法国写的几封信,发现有两处提到熊志南。他致周太玄的信中说:“我们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实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会成立后就好办了(至少一百人),我们也才可以自问,否则精神痛苦受不住。像熊自难,已经算是‘弱了一个’”。信后记的日期是“24”,未记年月。编者注,此信“估计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于克鲁邹发出的。”一九二一年是不错的,发自克鲁邹也是可信的,五月不见得准确,似是六月或七月。由此信可以知道,熊志南所以“弱了一个”是由于“精神痛苦受不住”,而精神痛苦是由于他们那一派在“二八运动”后“成为众矢之的”。我上面说熊志南发疯在里大运动以后,由此看来他倾向消极在里大运动以前,可能经受里大失败打击之后才完全发疯。

赵世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致无名信说:“熊自难艺术家早已经疯了,始拘于比国,现移在里尔狱里,我们百法挽救无效。”可

① 真实的名称是“旅行图书馆”。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〇年第二十二期《一大前留法学生中无共产主义小组》一文所引陈公培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在法国发表的一篇文章。

见,熊志南不仅发疯,而且因疯犯了法,先被比利时警察拘捕,后移交法国,关在里面(北方县首城)监狱中,最后死于狱中。

里大运动并未表明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之间思想已趋于统一。两派之间不过是联合行动而已,思想上并未统一。运动失败以后,两派仍旧分开,各干各的。蒙达尔派残存的人仍旧回到蒙达尔,李维汉成为这一派最高领导人,他此时大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残存的人则分散各地。熊志南发疯了,赵世炎去北方县做苦工,其余的人也都分散,似乎失去了联系。

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即:在里大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欧有没有组织?换一句话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前法国是否已有“共产主义小组”存在,只因路远才不能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建党大会?党史界经常争论这个问题。

当事人张崧年的回忆是不能作准的。据他说,一九二〇年八月间,上海、北京两地开始建党;上海有以陈独秀为首的几个人,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他二人;他十一月间乘船去法国,应聘作未来的里大教授,一九二一年初住在巴黎,当时刘清扬和周恩来也在巴黎,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后二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约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不久之后,赵世炎和陈公培也来法国,于是原来三个党员连同新来两个党员共五人成立一个小组。张崧年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我俩没有以小组的名义领导活动,小组同这三次斗争没有关系。”(以上张崧年的话出于他的两篇访问记:《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张崧年这两篇访问记有许多失实之处,关于中共旅欧的组织的成立,其时间和人数,也是不可全信的。我查出了:赵世炎是一九二〇年五月九日离上海,六月十五日抵马赛的,陈公培是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八月四日抵马赛的(按:赵陈二人离上海时陈独秀尚未在上海建党),周恩来是同年十一月七日离上海,十二月

十三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和刘清扬二人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离上海,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到法国后即介绍刘清扬入党,二三月间二人再介绍周恩来入党,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了便同他们三人结成一个小组,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即中共一大以前就成立了“巴黎小组”,——就时间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论当时的斗争情况,一九二一年上半年,甚至里大运动以前,看不出有共产党小组存在的迹象。我认为小组正式成立,至少赵世炎同小组发生联系,是里大运动失败以后的事情。除张崧年老年回忆不可靠之外,我们发现小组活动,最早的证据是李维汉的回忆。他说:“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此时,周恩来尚未去柏林,赵世炎尚未去北方县,他们才能约李维汉从蒙达尔来巴黎会面。赵世炎是一九二一年底去北方县的,可见此次会面是一九二一年底的事,即里大运动失败后一个多月的事。从此以后小组活动的证据就多起来了。我们有周恩来一九二二年三月给“山妹”(邓颖超?)的信,又有赵世炎同年四月给李隆郅和无名的信。惟有这样才能说明: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另一次是反对朱启铃来法借款事)中,“共产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为什么表现得远逊于非共产党员的蒙达尔派。

我将另作一文,说明我这个意见,不在这里喧宾夺主了。

尹宽参加了里大斗争,侥幸未被关押而驱逐回国。他成了剩余的蒙达尔派的一个头头,似乎住到蒙达尔去了。此时,他和别的头头都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他有理由看不起汪颂鲁,也看不起我。同他比较起来,我当时确实是落后的。我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学说,同别的学说一般的地位。我那时还一心只想考进大学,没有疏忽考试的准备。我不需要去工厂做工,因为即使家里没有钱寄来,县公署每年还可以给我三百元官费,在党时法国生活程度之下我仍然可以维持自

学的生活的。

可是,一九二一年底,我的如意算盘都打破了,不仅家里没有钱寄来,连三百元官费也被父亲领来作为家用。地主家庭破产到了这种地步!听说,我的三伯父为此同我的父亲大闹一场。但有什么办法呢,一家人饿死何如一个人饿死。三伯父大概以为我就要葬身异域的了。

这个时候汪颂鲁也陷于与我相同的命运。我们身边的钱都剩下不多了。里昂大学从国内招来的学生中有二个是汪颂鲁的同乡、朋友。汪颂鲁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当时出现一种传说,里昂大学准备通过考试在法国招收一部分学生,而且学膳宿等费用可以拖欠,候国内寄钱来偿还的。汪颂鲁和我于是从墨兰迁居里昂,交涉这件事情。两个福建学生同我们一起迁去,他们身边剩下更多的钱。

谁知这传说不符合事实。确实有几个勤工俭学生进里大上课的,但那是“走后门”进去的,我们没有后门可走。我们在学校院子内看到了校长吴稚晖正在同学生聊天,于是走上去向他提出要求。他说了几句风趣的话拒绝了。我们进退两难。一天,汪颂鲁提议:找褚民谊去!我和两个福建同乡跟着他去。我们以为是去交涉入学事情的。但见面时,汪颂鲁直接叫褚民谊负责我们几个人的生活,即叫他拿出钱来给我们,这话大出我们意外。我们三个福建学生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汪颂鲁和褚民谊吵起来,双方拍桌子大骂。学校办事的人出来劝解,把褚民谊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了,汪颂鲁才同我们回去。这事情近于无赖,我们都不满意汪颂鲁,尤其不满意他事先不同我们商量。

我和尹宽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尹宽社会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但仍是一派学生腔,汪颂鲁则像一个政客。他未曾告诉我,出了校门以后做了什么事情,但我知道他交游甚广,认识许多贵州籍的学者,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艺》,编辑部就有他的熟人,他把我

们二人合译的一章文学史寄去,居然登载出来了。他曾告诉我,他看见几个做官的朋友显赫一时不久就没落了,几个研究学问的朋友始终有名。结论是做官不好,做学者好。一九二〇年暑假后,他从圣日耳曼迁去巴黎,在孔德派办的一个什么自由讲座听讲,同时也结交了几个中国名人。在墨兰时,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去巴黎卢森堡公园同一个叫做谢寿康的留学生会面,谈了社会主义问题。在里昂时,一天我同他在街上走路,他同封面来的一个中年中国人打招呼,介绍我说这个人华林,我当然知道当时很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华林。这天以前几日发生了李鹤龄刺陈策的事件。汪颂鲁和华林站在街上谈几句关于这件事的话。总之,汪颂鲁活动的方向是与尹宽不同的。

以上写的这一段里昂生活,尹宽恐怕全不知道,否则他更加有理由轻视汪颂鲁和我为落后分子。

里昂大学进不去,我身边的钱也用光了,家里何时寄钱来没有准信,不能长久依靠向同乡学生借钱过生活。怎么办?此时我第一次考虑进工厂做工的办法。汪颂鲁自己不考虑这个办法,但代我筹划。我们发现蒙达尔郊外的橡胶工厂还能接受中国学生去做工,我们在圣日耳曼中学认识的四川人秦治谷正在那里做工。于是我写信给秦治谷,得到回信后我便一个人带着轻便行李从里昂乘火车去蒙达尔了。

如此结束了我的俭学生活而开始我的勤工生活。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间的事。

“少年共产党”

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两公里，连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在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璠，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同他一样住在城里的，还有几个人，大部分是蒙达尔派的头头，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益、汪泽巍；尹宽和王若飞来做工时也住在城里。他们倒不是为了工资更高，图舒服而住在城里的，而是为了避免群众反对，不敢住到厂方免费供给的木棚宿舍。二十几个人都住在木棚宿舍，我也住在那里。那里不付房租、电费、水费。两个安徽学生，汪同祖和余中楫，脱产给大家烧饭，打扫，照顾财物。每人每日付饭费三法郎，包含食物和二人工资在内，月底报告账目。二人照领厂里的计时工资，即每日十法郎。面包尽吃，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或烧土豆，或烧卷心菜，此外有汤。我自离开圣日耳曼中学以来，日常伙食没有这样好。我做的始终是计时制，每日十法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劳动十小时，即一小时一个法郎，账倒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个星期日和四个星期六下午，我每月净收入为二百四十法郎。付出九十法郎伙食费之后还剩下一百五十法郎可供还债和零用。我没有做衣服，一直穿着香港做的三件头西装和初到法国买的现成大衣，

内衣添置是另一回事。

木棚里住的人，四川、安徽两省共占半数以上，湖南人倒不多，其余各省人更少。我只认识一个秦治谷，他在圣日耳曼中学读过书，我在那里认识他，同他说过话。似乎我去墨兰也是请他先租好房间的。他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他不大清楚我的思想。反之，木棚里倒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却很清楚我的思想。我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来同我接近，同老朋友一般对待我，向我谈社会主义，谈马克思主义。我很诧异，后来才明白他是从尹宽处知道我的。那时尹宽并不在蒙达尔，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李慰农——这个人就是李慰农——大概得到尹宽的信来注意我的。我渐渐知道他是安徽巢县人，在芜湖读书，同尹宽一起来法国的。三年前我得到一张圣日耳曼中学中国学生的集体照片，发现其中也有李慰农，由此才知道他同尹宽一起在那个中学读了半年书。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别的安徽学生也认识尹宽，但提起时都没有好感。他们对李慰农也没有好感，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尤其反对他爱谈社会主义，那些四川学生也反对谈社会主义，听到人家谈话涉及思想理论问题时候，就走开了，或者说“又是社会学！”我同李慰农接近，引起他们注意。

我一到木棚，就发现西南角靠墙的床铺上坐着一个老头子，戴着眼镜，留着一部山羊须，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没有去工厂做工。秦治谷告诉我，他就是黄齐生。我知道黄齐生，他是汪颂鲁的先生；他带着一批学生从贵州出来在全国游历，去北京、上海等地访问名人，其中有康有为、章炳麟、也有陈独秀。他带着他们去过日本，又带着他们来英国和法国。他自称来欧洲考察教育，并不像徐特立（另一个老头子）那样标榜为来法国勤工俭学的。“二八运动”以后，里大运动以前，他和湖北人石英出面做调人，奔走于勤工俭学生和华法教育会之间。《旅欧周刊》或勤工俭学生发表的文件记载此事。我想不到在这里遇着他。不知道什么人安排他住在这

个木棚里,在这里吃饭,不交伙食费,有时我们上工去,他帮助打扫。蒙达尔派头头没有一个人同他接触。

黄齐生自然不知道我的底细。他看见新来一个青年人,便同我谈话,掂斤簸两,中外古今无所不谈。似乎当时别的人都不愿同他谈话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不消几日他就摸清我的底细了,于是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关心我。他的思想还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或更早的阶段,对我不会有什么帮助。

我当时尚未放弃考进大学的计划,尚以为来此做工是暂时的,一旦家里寄钱来又可恢复自学的的生活。每日做了十小时工以后,我还有精力和时间读书到九点或十点以后上床睡觉。我还携带一本法文的解析几何,每日学习一点,以后才丢开了。

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两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有十八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我心里想,这个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这个意见。

大概在那个时候新出版一个《工余》杂志,寄到蒙达尔木棚来,大家都可拿来看。过去只有《旅欧周刊》,在都尔的中文印刷厂铅印的,记载旅法侨民的消息,也有言论。那是华法教育会办的,没有人爱看。勤工俭学生有什么事情就发表宣言、公启,有胶印印几十份散发。胶印很方便,到文具店去买一张胶版纸,一瓶特殊墨水,把文字写在一种特殊纸上,然后把写字的一面覆盖在胶版上,揭开以后留下墨迹,就可以用普通纸头去印了。我在苏联和中国都没有看到胶印。勤工俭学生自己办的油印刊物,《工余》是第一个。我看了一两期,后发现它并不替华法教育会及其他统治者说话,于是投了一篇稿子,随使用一个笔名。不久登出来了,但有许多删节(以后知道是陈延年删节的)。木棚里的人纷纷议论这篇文

章,猜想是谁写的。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写的,可是我听到李慰农低声告诉别人:是郑超麟写的。我很惊讶。现在想起来,并不奇怪,因为我同李慰农谈话发过这种议论。究竟什么议论,用什么题目,署什么笔名,我都忘记了。如果有人收藏《工余》,我可能找出这篇文章。

李慰农大概同尹宽一起早已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但他未去占领里大,未当代表,未出头露角,又不是湖南人,因此那些群众不仇视他。仅仅为了他爱谈社会主义而当面挖苦他。至于住在城里那些头头,以及湖南籍的工学世界社分子当时是不能在木棚居住的。

有一天,天气已经转暖了,李慰农暗中通知我:“明日,星期天下午,有人约你去森林里谈话。”我答应了。工厂近旁有一片小森林。我去那里,会见了李慰农、韩奇和薛世纶。约我们去谈话的,就是薛世纶。我早知道这个人,他是蒙达尔派的第四个头头,在工厂上下工时也有人指给我看。至于韩奇,他也住在木棚,我没有同他谈过话,但秦治谷告诉我:这个人头脑很不简单。

我们在森林里坐下来。薛世纶说了很多话,结论是说:现在有人发起,要组织一个“少年共产党”,征求我们三个人参加这个组织。李慰农,不用说,是早已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早已决定参加了的,但薛世纶还是把他当作征求的对象,同我们两人一样。我考虑了好久,才答应参加。韩奇比我考虑得更长久。如此,决定了我的一生的方向。

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事,是以张崧年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或其他名称)的决策,我事后就知道了,现在更有文件为证。据李隆邳回忆,一九二一年赵世炎在克鲁邹做工时曾写信给蔡和森建议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表示同意组织,但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名称;同年五六月间(按:据贺果日记系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工学世界社开大会,李隆邳应邀列席,蔡和森提议组织“少年共产党”,但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李隆邳虽赞成,但

因以客人身份列席,不便争论,故未通过。李隆郅这个回忆如果符合事实,那也可见,此时,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前,张崧年所说有赵世炎和陈公培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小组尚未存在,因为如果已经存在,赵世炎为什么还要同蒙达尔派一起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会呢?由此又可见,“少年共产党”虽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但名称已提出于一九二一年了,是蔡和森提出的。蔡和森要组织的显然是《人道报》上常见的 Jeunesse Communiste 而不是 Parti Communiste,即是团而不是党。当时蔡和森不见得知道国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译名。赵世炎、李隆郅等人要组织的,则是党而不是团,或者说他们也许不知道党团的区分。以后,赵世炎同张崧年接了头,建立少年共产党的工作便由旅欧支部担负起来了。支部派周恩来协助赵世炎进行这个工作。他们二人联名写信给住在蒙达尔的李维汉,不是直接邮寄的,而是托人转交的,约李维汉来巴黎一个小旅馆商谈建党事。时间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底。以后,赵世炎就去北方县做工了,一面同在柏林的支部密切通信,也同蒙达尔派函商建党问题。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信内还透露若干有关筹备的消息:蒙达尔派主张工学世界社全体参加,并“以去就争”;旅欧支部则主张个人参加;人数估计为法国约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但若工学世界社坚持原意,人数就不能前定。信中提到蒙达尔派头头只说李维汉和薛世纶。但四月三十日给无名的信则说:“工学世界社世纶、硕夫等欲等该社开会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争。我不赞成。”硕夫就是尹宽,可证此时尹宽是工学世界社一个重要头头,负责同赵世炎谈判的。赵世炎接着说:“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现在他们亦承认。”可见,到四月三十日,双方争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五月一日,赵世炎就离开北方县到巴黎来,以后便完全为建党事而奔走了。

薛世纶约我们谈话,大概在五一赵世炎回巴黎以后,至早也在那个争执问题解决了以后。

由赵世炎给无名两信,也可以知道建党事是设在德国的旅欧支部命令和督促赵世炎去做的。信内说:“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暉、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又说:“申府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这些话,对于那次在法国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事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尹宽的生平也是很重要的。张崧年今天还活着,可是这段生活他几乎忘记干净了。他一九七七年回忆说:“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完全忘记了还有张伯简、谢寿康、萧子暉、熊雄。

森林谈话之后一个星期日,李慰农带我进城去会见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益、汪泽巍。似乎没有看见尹宽,可是次一个星期日尹宽又是在蒙达尔,因为那天我们四个人(李维汉、尹宽、李慰农和我)一起到巴黎去。赵世炎到里昂车站接我们。我第二次看见他。我们乘地道电车到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去,到广场侧面一条不很热闹的道路 Rue Codfroy(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一个小旅馆去。那就是赵世炎从北方县迁来巴黎后租住的旅馆。他住在底层,窗子开向一个小院子。我们当日就回蒙达尔去。谈了什么话,我都忘记了,也忘记了有没有别的中国人同他住在这个旅馆。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我再去这个小旅馆时,几次都看到情况改变了:楼下的房间是陈延年兄弟居住,赵世炎则搬到二楼上一个房间,尚有其他五六个人也租住这个小旅馆,纷纷扰扰,热闹得很。我没有去别的房间,包含周恩来所住房间在内,因为大家都在楼下陈延年兄弟房间和二楼赵世炎房间会面。

六月十八日开成立大会,蒙达尔同志决定派李维汉、尹宽和我三人去巴黎出席。当时,决定参加的人在蒙达尔有:汪泽楷、薛世

纶、汪泽巍、张增益、李慰农、韩奇，连我们去出席的共九人。我们没有开会，没有选举，得到李慰农通知，十七日我就同李尹二人去巴黎了。各地代表人数和名单，大概是赵世炎、周恩来，连同各地的头头协商决定的，即使不是当面协商，也是通信协商。蒙达尔由李维汉和尹宽出席，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二人本是头头。但为什么派我去呢？如果要派一个非工学世界社成员，那么韩奇也比我适宜。

我们三人似乎不住在一个旅馆，因为我记得十八日早晨是独自一人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北郊外布洛宜森林(Buis de Bonluynes)某一进口处的。那里我看见许多中国人。一个人上前招呼我，自称任卓宣。我未曾见过。他和我并排走，指着前面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人，说是周恩来。好像我已经知道周恩来是什么人。任卓宣住在巴黎，常去赵世炎旅馆，当然见过周恩来，也许知道了周恩来是张崧年派来协助赵世炎建“党”的。我则不知道这个内幕，李慰农不会告诉我，他自己也许不知道。当时六月间，虽非盛暑，我们都不穿大衣了。我看见周恩来穿得整整齐齐，不像在工厂做工的。再走一段路，到一个转折点，任卓宣又指着站在路旁同人说话的一个人说是陈延年。我听说过有个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但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陈独秀的。陈延年倒是同我们一样 *endimanche*，即是一个工人，星期日换一套好衣服上街的。大家来到一个林中空地，各人拿起一把铁折椅，围成圆圈坐下来。赵世炎这年四月二十六日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现在开会地址是很难觅。”会址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我们上下午开会，高谈阔论，都无人过问。下午，才有一个老太婆来收椅子租钱。她说：“你们在这里开会。嗽(指着任卓宣)！他是你们的主席。”

上午的主席是赵世炎，他宣布开会，到会的共十八人，介绍了姓名。我早已记不齐全了。肯定到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尹宽、萧朴生、任卓宣、刘伯坚、熊锐、王凌汉、余立亚、

郑超麟。其余六人,想不起来。可能有袁庆云。似乎没有陈乔年。

议事日程,我也想不起来,却记得几次争论。

第一次是关于名称的争论。一致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干脆五个字,没有戴什么“旅欧中国”的帽子,那是后来加上的);惟有周恩来提出异议,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争论的是“党”字和“团”字。周恩来的理由是说: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不能再成立一个共产党;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以为“少年”二字足够区别了。当时没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都知道,要建立的就是《人道报》上常说的 Jeunesse Communiste (全名是 La Ligue de Jeunesse Communiste),谁也不以为要建立第二个党。我一向认为,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中国已有“青年团”的译名。但看了赵世炎给无名的信以后才知道至少赵世炎一人是知道国内已译为“青年团”的,可以断言旅欧支部都知道这个译名。为什么大会上没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名称呢?因为张崧年不赞成这个译名,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的名称。周恩来是代表张崧年和旅欧支部主张用“少年共产团”名称的。赵世炎当主席不能附和周恩来说话,他也不能根据国内已经固定的译名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名称。张崧年如此固执用“少年共产团”名称,以致半个世纪之后回忆时他也只记得“少年共产团”,而忘记了此名称已为成立大会所否决。他甚至于否定曾经用过“少年共产党”的名称,反而捏造一个什么“共产主义少年团”的名称。

另一个争论是在讨论党章的时候。周恩来提出党章要规定凡入党的人都须“宣誓”。起初我们听不懂他的口音(他曾说:“酝酿”二字,搞了好久我们才听懂),后来弄清楚他说的是“宣誓”二字时,我们几乎一致反对。我当时反对宗教的意识十分强烈,当然反对,但别的人也反对。我们认为宣誓是宗教的仪式,是向上帝或其他的神宣誓的,我们不信神,向谁宣誓呢?周恩来解释说,宣誓不一定是宗教的仪式。他举最近的历史为例:民国元年,孙中山让袁世

凯接替他做临时总统时,要求袁世凯就职那天宣誓忠于民国,袁世凯宣誓了,以后做皇帝,孙中山便以他背誓为理由讨伐他。我们同周恩来辩论,结果否决了他的提议。我们成立少年共产党没有宣誓,以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宣誓,回国以后我参加几次入党仪式也没有看见宣誓,但后来我在图书和电影中看见入党仪式,发现入党的人都要举起拳头对着党旗发表几句决心,不知道算不算宣誓?

讨论党章以后还要讨论党纲,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当好好学习。但在党章和党纲的问题上,这几年我却发现,二十年代初期闹笑话的不止我一个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一个文件,称为党纲,而其实是党章,不过夹杂了几个党纲性质的条文,至少应当说是党纲和党章的混合物。今天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纲,只有党章,不过在党章的总纲部分列了几个党纲性质的条文,但我今天不能够引用这些事例来辩护我当初的缺乏常识。

当天晚上,我就向赵世炎请假不参加以后的大会而回蒙达尔去。理由是工厂旷工太久不好。因此,第二天和第三天开会的情形,我就知道了。最后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和分工,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而且知道得不完全。结合周恩来于第二次大会后向国内团中央所作的第一号报告,可以列出委员会的名单:赵世炎、张伯简、陈延年、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尹宽共七人。分工时,赵世炎任总书记,张伯简任组织部长,陈延年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任职工部长(或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张伯简当时在德国,没有参加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张伯简未回巴黎就职之前,以李维汉代理组织部长。

“少年共产党”成立便完全结束勤工俭学生中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即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互相对立的历史了。双方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统一于共产主义,丝毫没有留下旧的裂痕。两派之外还团结了从无政府党分裂出来的陈延年一派。无政府党在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中没有地位,但他们代表一种思想倾向,足以影响劳动学会方面的人,甚至工学世界社方面的人。

赵世炎离开北方县前一天,即四月三十日,写信给无名,说他对于建党事立下两个原则:(一)极端严格。(二)没有遗漏。这两个原则,他是实行了的。当时参加的人确实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应当团结的人确实没有或很少遗漏。

当时,汪颂鲁也在巴黎,他本来靠近劳动学会方面,早就认识赵世炎,同王若飞既是同乡,又同出于黄齐生门下,但没有人去团结他。他们显然不满意汪颂鲁。我以后同赵世炎和王若飞无所不谈,但从未谈到汪颂鲁。组织成立之后我也想不到介绍汪颂鲁参加。在里昂那一个月,我同他都到了山穷水尽,都靠向同乡借钱过生活的地步了。我下决心去工厂做工,可是他不能下此决心,继续借钱度日。他从不到蒙达尔来,却有一次约我去巴黎见面。原来,他从一个与我接近的福建学生讨得介绍信,要去新加坡筹款,再来法国进学校的。他借到船费就要动身了,我去巴黎同他叙别。我颇怀疑他能实现这个计划。以后我就忘记这个朋友了。五卅运动后那个福建学生回国来上海看我,说汪颂鲁居然在新加坡筹到一笔款,再到法国去,可是过去学的法国话都忘记了。我很惊讶。后来一想,这是出于华侨的风气。有时华侨赚了钱,并不大方,但想结交几个有地位的朋友。一个法国留学生,愿意同他交朋友,他会感到光荣而向同辈夸耀的。在此情形下资助一笔钱也是不会困难的。汪颂鲁以后的下落,我完全不知道。

另一个老朋友尹宽,从“少年共产党”成立起,甚至可说从里大运动起,他和我的关系便融化于一般朋友关系,同志关系之中了。

我和他之间从此没有私人的关系,未曾单独说一次话,一直到回国在上海见面的时候。

“少年共产党”一成立,工学世界社便停止存在了,新民学会也停止存在,至于勤工俭学会,劳动学会更不会有人提起。我们亲密地团结起来,不定期地开会,接受和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散发对外的油印刊物《少年》,封面上公开印着“少年共产党机关”字样(应写“机关报”,但张崧年坚持不用“报”字),阅读对内的刊物。(我忘记了名称,只记得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有各方面活动的消息,有同志的建议和意见,等等。每本封面都编了号码,不能给外人看,脱党时必须交还的。)我们住在木棚的三个人(李慰农、韩奇和我)单独成一个小组,单独开会,然后由李慰农上城里汇报。记得木棚小组第一次开会时,韩奇提出一个建议,即党内每个人都须采用一个化名,大家以化名相称。这个建议由李慰农汇报上去,立即被采用了,很快内部刊物就登出了真名化名对照表。我至今还记得好多人的化名。乐生(赵世炎)、红鸿(张伯简)、罗迈(李维汉)、林木(陈延年)、伍豪(周恩来)、雷音(王若飞)、石人(尹宽)、罗热(陈乔年)、爱弥(萧子暉)、R(张崧年)、裸体(汪泽楷)、锄斧(李慰农)、捉掀(任卓宣)、戈般(王凌汉)、觉奴(萧朴生)、丝连(郑超麟)、尹常(熊锐)、其光(熊雄)等等。这些化名,后来都不用了,惟有“罗迈”、“伍豪”两名一直用下来。据说“罗迈”取义于浪漫主义,不知确否?“伍豪”则是周恩来在天津的觉悟社的化名。觉悟社似乎是一种秘密的或半秘密的团体,社员编成号码,周恩来编为第五号,故谐声为“伍豪”;刘清扬编为第二十五号,故谐声为“念吾”,她在少年共产党中亦用此为化名;一个人编为第十三号,故谐声为“施珊”;一个人编为第十一号,故谐声为“施以”;一个人编为四十三号,故谐声为“峙山”;一个人编为第一号,故谐声为“逸豪”。

“少年共产党”一成立,立即进行对内的团结和教育的工作,对外的活动和发展的工作。

凡有成员住居的地方都成立小组，定期开会，定期向中央汇报；中央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给各小组以书面报告，总书记赵世炎也曾几次巡视法国各地，写出巡视的报告。中央之下设立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以张崧年为主任，内部刊物曾发表张崧年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几本应读的书，有法文的、英文的，也有德文的。我不记得法国境内有几个地方小组，但记得比国有一个小组，设在沙鲁瓦，有刘伯坚等人，德国有一个小组，设在柏林，有张崧年、刘清扬、熊雄等人。在蒙达尔，我们住木棚的三个人，似乎是起初单独开会，后来还是同住城里的人一道开会的。我只记得两次开会的内容。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概是中共二次大会以后或西湖会议以后通告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以备三大作出决议的。旅欧支部得到此通告后便通过少年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动各地小组讨论这个问题，形式上说，少年共产党是独立的，并非中国共产党属下的一个组织，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而要加入国民党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而且有青年团员（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早已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了）。我在小组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不仅反对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反对南方的国民党政府。我出国前在广州住了个把月，看见那里公开烟赌，每隔几家店铺就有一面大旗挂着，上写“边防经费，楼上开灯。”政府抽取烟捐、赌捐、还有花捐，数目不少，美其名曰“边防经费”，以此准许公开吃鸦片烟，公开赌博，公开卖淫。我并不认为国民党的南方政府比军阀的北方政府更好些。不错，我出国前的广州不是国民党嫡系军队统治的，是广西陆荣廷统治的，但后来国民党嫡系军队陈炯明代替广西军阀统治广州，照样抽取烟捐、赌捐、花捐。至于国民党的“主义”，辛亥革命前后我从父亲的朋友的议论中知道是很厉害的，是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可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我三年来的思想变化以后，那种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经失去吸引力了。我正是

因为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和孙文的思想的失望才会去参加组织少年共产党的。但现在要我回头去加入国民党！我在小组会上提出反对意见，但得不到别人同情，特别带头反对我的恰好是我的老朋友尹宽。我想，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已开过会议，讨论过这个通告，而取得一致意见的。尹宽说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是从策略立论的，认为我们不过利用国民党已成的力量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并不需要思想方面的让步。我还记得他的譬喻，他说，譬如狮子滚雪球，愈滚愈大；又说，法国共产党虽然是公开的，但仍有秘密的部分，侵犯的人就有生命的危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秘密工作应当与公开工作相结合）。我是孤立的，讨论结果自然是蒙达尔小组以赞成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汇报于巴黎中央。另一次会议则是为了送别李维汉的。“少年共产党”特派组织部长李维汉回国去交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我们一面散步，一面谈话。我们的会议往往如此。有时坐下来，说一阵话，然后再走。李维汉留下一篇告别书，同时也说了一通告别的话，内容我都忘记了，大意是勉励的话。这次会议没有争论。李维汉回国后不知谁继任组织部长，可能是周恩来。

对外的活动，则有好多事情可记。首先要复活里大以前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现在，两派群众领袖已经融合为一个组织，不会互相斗争了。可是，这个时候，这些领袖，李维汉、汪泽楷、赵世炎、王若飞、尹宽等人都不能出面。群众仍在反对他们，虽不至于打他们，总不会响应他们的号召，必须换一批人出来号召。少年共产党有人才。蒙达尔小组就有一个韩奇。我同他住在一个宿舍，但在薛世纶约我们谈话以前，我未曾同他谈过一句话。他这个人很能干，活动能力决不会比那些头头差。他很快就看穿我这个人，看不起我的能力。我们参加同一组织之后，虽然一起开会，交换意见，但会外也不单独谈话。我们的组织决定要发起一个群众运动，调韩奇出来领导，我忘记了为什么事情。韩奇在木棚一号

召,大家都来听他说话,他做了报告,主张用“蒙达尔同学”名义发表宣言,印发给法国各地勤工俭学生集中的地方,要求各地派代表到华法教育会来开会讨论。很快得到响应。“蒙达尔同学”就派韩奇为代表到巴黎去。各地方代表都来了,都是新人,其中有几个是少年共产党党员,但也有几个非党员。开会有争论,结果韩奇代表的“蒙达尔同学”的主张得到胜利。事情应当顺利发展下去了。我没有去巴黎,不知道详情,连为什么去开会,今天也不记得。但不久之后,李慰农告诉我,韩奇退出组织,就要离开蒙达尔,运动也停止了。原来是韩奇和王若飞发生冲突。过去的领袖不能出面,只可让从来不出面的韩奇去领导群众,但又不放心,于是派王若飞去暗中指导。王若飞跟着韩奇到巴黎去,“手把手地”教着韩奇怎么做,最后惹得韩奇发火,王若飞使用纪律去压他,结果破裂了。我从李慰农的话抽绎出这件事情的轮廓,细节如何,是否另有原因,则我无从知道。

韩奇以后在法国进了什么学校,学成归国,恢复原名为韩雁门,在国民党底下做了什么小官,出版了一本替他的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父亲韩耆伯作纪念的书,请他的父亲的故友高语罕写一篇长序。在抗战时期我在上海看到这本书,前面一张照片: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站在一个坟墓的墓碑旁边。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见高语罕,说起了韩耆伯的故事。一九五六年我在市监狱遇见尹宽,闲谈中提到韩奇,他竟不认识。我说这人后来改名韩雁门,他才说他认识韩雁门,五四运动时同他站在对立面的。他问我怎么认识韩雁门?他竟不知韩雁门曾改名韩奇,与他同在一厂做工,同属于一个革命组织!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年老忘记了。

蒙达尔城里的人指挥李慰农和我在木棚活动,叫我们发起一个讨论会,他们星期日也可以来木棚参加。我们两人活动力有限,只组织了两三个人,秦治谷在内。第一次开会时城里竟来了五个人: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尹宽、王若飞,大家提出问题来讨论。

我提出一个问题,好像是说我们对待社会上的斗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我说: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供选择,一是站在进步方面反对落后方面,一是站在落后方面反对进步方面,一是超然于斗争双方之上。我原意是要先列出这三种可能的态度,然后批评第二种和第三种而归结于第一种的。可是未曾等我把话说下去,王若飞立即打断我的话,说只有两种态度,没有第三种态度。我说第三种态度是有的,例如罗曼罗兰,于是所有的人,包含秦治谷在内,都支持王若飞而攻击我。结果不欢而散。散会之后下微雨,他们要回城去,我送他们一程,他们不要我送,我送到一个桥底下避雨之处才看出他们是要交换意见如何对待我这个“错误”的。我就回木棚去了。下次开小组会,他们严厉批评我,说连群众都认为没有超然的态度,而你坚持有超然的态度。我说:那天,你们不让我说下去;我的意思是要批评超然的态度,但必须把这个态度列出来才好批评的。他们将信将疑,还是说我赞成超然的态度。尹宽当然说了反对我的话,但我忘记了什么话。这件事无疑同尹宽有关,因为他知道我以前爱读罗曼罗兰尤其欣赏他在世界大战中发表的那几篇反战的文章,总标题为 *Au-dessus de Mêleé*(《超于混战之上》),尹宽知道;他也知道我就是用此态度对待一九二一年勤工俭学生中蒙达尔派和另一派之间的斗争的。他不知道,我进了工厂之后思想已经进步了,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来批评我这个旧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们在木棚的暗中活动,群众的情绪渐渐改变了,渐渐不反对那些过去领导运动至于失败的一批头头。新来工厂的群众本来就没有成见。此时,大约九月间,发生了一件事。工头谭天玺,湖南人,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但不属于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一派,同这一派人有矛盾。他法国话说得好,去橡胶厂做工,被提拔为工头,即不做工而管理厂内的中国工人,工资照拿。事实上是资本家雇用的一条狗,侦察中国工人动静的。一天,他在做工时间同薛世纶发生冲突,他报告资本家,立刻就辞

退薛世纶了。究竟为什么事情冲突,谁是谁非,我现在全不记得,也许当时就不知道。但薛世纶被辞退是由于谭天玺向资本家报告,则是尽人皆知的。于是经过我们号召,全体中国工人都不上工,以示抗议,木棚里开大会。激昂慷慨讲话,怒斥谭天玺,号召罢工的,不是我们,李慰农和我都没有这种群众鼓动的能力,而是江苏泰州人于履中和四川人穆清。两人都是新来的工人,罢工是一致的。我不记得这件事如何收场,以及罢了几天工。我们要求资本家辞退谭天玺,但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可能薛世纶复了工。事后我们介绍于履中和穆清参加了组织。谭天玺好久不敢到木棚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可是,十月初,他来到木棚了,带了一个讨好群众的消息,即说他已经同厂方说好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国庆,给中国工人放假一天,让大家在木棚里庆祝佳节。他要带照相机来给大家照相。群众自然欢迎,我则十分愤慨。到十月十日,大家都不上工,连李慰农和住在城里的同志也不上工,但我同一个福建学生相约照样上工。一面为了抗议群众同谭天玺和解,一面也是表示反对中华民国。少年共产党的建立,以及我自己参加这个组织,正是为了革中华民国之命的。晚上放工回到木棚来,黄齐生老先生把我拉到他的床前去,点着指头说:“你这个怪物!”他看我当时的表情,没有说下去。以后,我上城去看汪泽楷,他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只是说:辛亥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李石曾就是同盟会内的暗杀部长,我可以承认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但李石曾即使当过暗杀部长,那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那几个月,橡胶厂的中国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好多新人来做几个星期的工,就离开了,他们的旧成见比较少,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工作,吸收了许多同志。上述于履中、穆清之外,参加我们的组织的还有:吴祺、周维桢、谢陈常、李季达、李枏,以及我忘记了姓名的几个人。旧的人,在我以前来做工的,也渐渐消除成见而同我们接近,以至于加入我们的组织了。例如,秦治谷、熊禹九、舒某某,

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看见他们才知道他们也是同志。但那是我离开工厂去莫斯科以后的事情。

这里就要说说我们怎样去莫斯科的。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三年初,我每次去巴黎玩时,总要到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去看看的。他们招待我。赵世炎还把收到的信,不准备发表于内部刊物的,拿出来给我看。一次,我看见了李维汉回国以后写来的信。他到了北京,找到了“老施”(施存统),交涉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老施”答应了。一次,我看见了萧子暉从莫斯科写来的信,他在那里看见了中国共产党派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团。我还记得他说刘仁静“二十少年,有名无实”。一次,我看见了陈独秀写给赵世炎的信,显然不是第一次通信,因为陈独秀在信内反驳了赵世炎所持的不肯回国的理由。赵世炎去信,我未见,大概是说法国有许多华工,需要他去做工作,他不能丢开这些华工。陈独秀反驳说:国内的工人不知道比法国华工多多少倍,你为什么不在更多的工人中间做工作呢?我忘记了是在这封信内,或者另一封信内,或在萧子暉的信内,我得悉莫斯科有个什么学校可以招收中国学生,要少年共产党派几个同志去。我当时并未曾把这个消息同我自己联系起来,我只当作李维汉回国交涉成功,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张伯简、萧子暉去莫斯科读书一类新闻来看,看过就不去想了。可是,有一天,大概已经进入一九二三年,李慰农悄悄告诉我:“组织上正在考虑派你去莫斯科的事情。”我听到大出意外。但我想,在考虑么,不见得决定派我去的。那时我早已放弃在法国进大学的念头了,我对于个人出路也不再去想,甚至不去想将来怎样回国的问题。我是无产阶级一分子,受外国资本家剥削不是同受中国资本家剥削一样么?在外国照样可以干革命。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正式通知我,要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我并不争取,但已经决定派我去,我也就不推辞了。

我去莫斯科读书一事，尹宽有不同意见。上面所引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那不好斗争，又不肯胼胝甘为劳动人的郑超麟，却先我到了莫斯科留学；他在一九二二年初就同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第一批由组织介绍到莫斯科进了东方劳动大学，我是在这年十月才同刘伯坚等十人到莫斯科的。”尹宽应当知道，此事不是我争取的。

少年共产党决定在巴黎再开一次大会，议决几项日程，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日程就是：决定正式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的问题和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问题。后一问题所以成为必要，因为准备派往莫斯科的同志中有几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我们在巴黎西郊向警察分局租了一个会场，开了四天大会。根据会后新选出的书记周恩来写的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报告，会期是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我始终以为此次是“少年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但周恩来上述报告则说是“临时代表大会”，当以当时的报告为准。

此次我们不是在森林中露天下开会，而是在一个正式的会场开会。周恩来报告中当然不会提到这是一个什么会场。这是巴黎西郊比扬古镇（Billancourt）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比扬古镇有许多工厂，也是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之一。镇的北面就是布洛宜森林，第一次大会开会的地方；镇的南面临塞纳河，河上有桥，过桥就是散客卢。我住在巴黎中心，一个福建同乡租的旅馆，每日早晨在塞纳河边乘船来到比扬古码头的。

警察局里的会议厅是袁庆云租来的。四川人袁庆云是赵世炎的朋友，长久住在比扬古镇，且与一个法国姑娘同居很久，直到离开法国。赵世炎常借他的住址转信。他的法国话说得不见得好，但能达意。他同警察分局很熟，以中国学生开会为名租下这个会议厅。他关照我们，法国警察听不懂中国话，我们什么话都可以

说,但不要唱国际歌。虽然如此,这四日开会期间我们还是提心吊胆的。警察常常在会场门口经过,有时探头进来看看。

大会经过,有周恩来的报告可看(见《一大前后》第一册)。我已经忘记了,即使记得也不值得写。但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而且值得写的,何况它同尹宽有关。这就是大会开除张崧年的事件。我一向保持着很简单的印象,即:张崧年在第一次大会上并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控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太上皇。周恩来和赵世炎是党员,执行他的指示,但其他的中央委员不服气,反对他,直至于开除他。发言最激烈的是陈延年和尹宽。他们的话我忘记了,大意是反对张崧年处处干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张崧年大概提出了“少年共产党”应受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的原则,而他是旅欧支部书记(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任的旅欧通信员)。陈延年和尹宽就是不接受这个原则。我记得尹宽说:“R(即张崧年)把他这个身份装在口袋里,需要时就拿出来,不需要时就不拿出来。”大会上只有周恩来替张崧年辩护,赵世炎当主席(四天大会都是他当主席),不能说话。到表决时,他要大会另推一个主席主持表决。我忘记了大会是否另推主席,但周恩来那个报告说:四天大会未换主席。

但最近读周恩来报告,发现开除张崧年事件比我所记忆的更复杂得多。原来,在德国张崧年和张伯简两人发生矛盾,张崧年列举张伯简种种罪状,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张伯简。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张崧年“罗织罪状过甚”,只决定给张伯简以“警告”处分,而不“开除”他。在这件事情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现了独立性。两个党员(周恩来和赵世炎)占据少数,只好服从多数。于是张崧年生气,“且有胁迫中央之言”。中央又给他“劝告”(不是“警告”),张崧年不接受此“劝告”,并辞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之职,而且向“柏林地方会”几次声明他退出少年共产党。此时“柏林地方会”是廖焕星负责。赵世炎说廖焕星并未报告张崧

年声明退出少年共产党的事。大概廖焕星以为张崧年退出是一时气话,没有报告上来的。周恩来代表德国同志向大会报告德国工作,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于是大会认为张崧年“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决议开除他。

张崧年得知大会开除他,暴跳起来。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告同志书寄到巴黎来。我看到了,其中他引用周恩来大会后回柏林时同他的对话来证明开除完全出于周恩来的阴谋。例如,周恩来对他说:“你太骄傲了,群众不满意,故打击你一下。”据周恩来从柏林回巴黎告诉我们,张崧年曾反问周恩来:“如果群众反对仲甫同志,我们也要跟着反对仲甫同志吗?”于此可见,张崧年当时有决心,如果全党反对陈独秀,他一个人也要站在陈独秀方面的。一个月以后,周恩来陪伴我们去莫斯科的人到柏林时,张崧年和刘清扬夫妇竟拒绝同我们见面,也不愿意再见周恩来。周恩来只好召集“柏林地方会”的其他同志同我们开一个会。除了我们从法国来的十个人以外,属于德国方面的同志有熊雄、王圭、周恩来本人,此外还到了一个人(或两个人)。根据周恩来报告,此时在德国的同志只有八人,已知张崧年、刘清扬、周恩来、熊雄、王圭五人外尚有一人,其中必有一人是柏林地方会负责人廖焕星。那天来的可能是廖焕星。我只记得他衣服穿得很好,不像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生,也不像熊雄、王圭。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而周恩来则声嘶力竭,替自己辩护,力言他在开除张崧年事件上没有耍阴谋诡计,直至于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发誓。

张崧年既然要求退出“少年共产党”,现在“少年共产党”开除了他,“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何必暴跳如雷呢?这也可以证明他要求退出是假的,不过是一种抗议手段,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驯服于他这个太上皇之下罢了。

现在还是回到大会去罢。最后一天大会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去掉“中央”二字)。事先,于履中给我一个小条了,叫我投票

选哪几个人,我照办了。于履中住在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当然是前任执行委员会授意的。我忘记了选出哪些人,但周恩来报告中有名单。正式执行委员为周恩来、尹宽、任卓宣、汪泽楷、萧朴生五人;候补执行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执行委员会开会,推周恩来为书记(去掉“总”字),尹宽为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张崧年)、汪泽楷为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萧朴生为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为出版委员会主任。

领导人于是分成两路:一路去苏联学习,一路留在法国领导。周恩来和尹宽留下来领导,汪泽楷、萧朴生、任卓宣填补了离去者的空缺。

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还照了相,在警察分局内,会议厅外空地上照的,这照片今天还保存着。会后将近一个月,我们这些去苏联的人才终于离开了巴黎。

为什么会派我去呢?至今是一个谜。我是一个消极的成员,没有办事的能力,连文章也不写。初进工厂,看到初出版的《工余》杂志还投了一篇稿子,发泄当时的感想。《少年》出版了,有自己的刊物,反而无话可说。有个党史单位问我当时的化名是什么,在《少年》上发表了哪些文章。我说了化名,又说从未曾在《少年》上发表文章。可是这个单位告诉我,《少年》上有我的文章。原来是我到苏联后从法文或世界语译了一篇文章寄回巴黎去发表的,也许我不知道《少年》是否发表了 my 译文。我在木棚里利用工余的时间,既读当时新出的《国家与革命》法文译本,也读大仲马的达特安三部曲。那么凭什么选派我去苏联读书呢?大概十二人中我是最蹩脚的一个人。周恩来报告中列出的赴苏名单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后两人本来在德国,袁庆云则是当作先遣人员,当周恩来作此报告时(三月十三日)已经去柏林了,我还看见他从柏林写回巴黎来的信。信内有个名词“兴六

娃”，我不懂，赵世炎起初也不懂，后来说：“恐怕是 Chinois 的译音。”

我们是三月十八日从巴黎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办理了离开工厂的手续，然后携行李去巴黎的。木棚里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读书，于是几个平时谈得来的朋友要给我饯行。政治上的朋友，我们相约，在众人面前不要表示亲密；至于平日同我闲谈、说笑的，我认为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里还有一部分人，则平日见面也不说话，或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加热的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面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十八日早上，我们九个人出发了，周恩来同我们一路走，护照上写着经过西伯利亚回中国去。我们在比利时境内的沙鲁瓦停下来，住一日或二日，同那里的劳动大学的同志开会，谈话，照相。到柏林，我们同袁庆云、熊雄、王圭三个人会了面，在柏林办理苏联入境的手续等等。

办手续事同我们接头的，是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约三十多岁，能说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他同我们说话当中常常提到一个人，叫做混格混格，我不知道是谁，好久才弄清楚他说的是俄文名字 Хонг - Хонг，法文则为 Hong - Hong，中文则为红鸿，即张伯简。原来张伯简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后来萧子暉也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

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大会开除张崧年，起因于张崧年和张伯简的矛盾；再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推张伯简为组织部长，暂叫李维汉代理；现在又说到张伯简第一个开辟到莫斯科之路。张伯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里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

部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就要离开西欧去俄国了,应当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张崧年在老年回忆中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他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回忆说:他初到欧洲后一九二一年春天介绍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以后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他们已在国内入党,“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一九七九年的回忆则说的更详细:不仅有那五个人,而且有其他的从国内去的党员: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李季、孙炳文、廖焕星,而且介绍朱德入党。他也提到张伯简,以及张伯简介绍的谢寿康,但所记不实。总之,张崧年所记旅欧共产党员只有两类,不是新介绍入党的,便是国内转来的。他完全忘记了第三类党员,即先加入德国或法国共产党,然后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天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这件事要从张伯简说起。

张伯简云南人,滇军出身,不知何时并怎样来到欧洲,但并非先在国内入党再来欧洲的。他很能活动,善于耍手腕,有野心,看中了共产党这条道路,在法国结识了谢寿康,又与张崧年和赵世炎分别通信。据我所知,谢寿康,江西人,在法国留学,官费生或自费生,爱谈社会主义,有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团体,物色同道者。汪颂鲁也曾介绍我去巴黎同他在卢森堡公园谈了一次话,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张崧年说他是德国学文学的,大概因为后来谢寿康也从法国转到德国去了,为德国生活便宜,或为德国便于进行社会主义活动,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些细节已无法查考了,我只好出于假定,以待后人做出正确结论。我假定,谢寿康同德国共产党接上了关系,自己加入德国党,又介绍张伯简、熊雄、王圭及其他的人加入德国党,由此认识了在德国活动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反过来,这几个德国共产党员又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即张崧年说的“小组”。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张崧年无法拒绝他们。但在德国的张崧年对于张伯简、谢寿康二人的印象是不好的,结果

至于要求“少年共产党”开除张伯简；在法国的赵世炎，对于这两个人的印象是好的，甚至于主张派谢寿康做代表去出席准备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而且写信给国内的党员李隆郅和无名，要他们活动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派谢寿康为代表。对于张伯简，赵世炎在致李隆郅信中则说：“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

这些德国共产党员显然都参加了旅欧支部的。张崧年自言张伯简介绍谢寿康入党，意即以德国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旅欧支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前，谢寿康、张崧年、张伯简、周恩来、刘清扬、萧子暲、熊雄七人还从德国“联合”写信给赵世炎，催促赵世炎建成少年共产党，“促于五一前告成”。正是由于如此重视张伯简，所以在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张伯简虽未出席，仍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开会还任命他为组织部长。

在法国，据萧子暲回忆，“少年共产党”五个成员：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萧子暲，经过阮爱国的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些法国共产党员反过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这里产生了混乱，引起了纠纷，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凡是共产党员，无论住在哪一个国家，都应当参加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如此，旅欧支部便无存在的理由（同样，旅莫支部亦无存在的理由）。住在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员都应当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组织，住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员都应当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出于同样理由，“少年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理论上这样说，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混乱、纠纷，就是从这个矛盾产生出来的。张崧年事实上反对人家先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然后参加旅欧支部的组织，但他理论上无法反对。他老年回忆时，就我所见而言，他绝口不提旅欧支部中这第三类的党员。“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周恩来报告说是“临时代表大会”）上，便有人提出一项议案：“以后本团团员有加入各所在国

共产党者，必须得本团执行委员会之许可。”何人提出这个议案，无法查考了。但这个议案是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每个共产主义者有权加入共产党，每个共产党有权接纳任何它认为合格的人为党员，不受任何限制。这次大会讨论了这个议案，但没有通过，也没有撤销，而是决定“交新执行委员会审议”。

这些第三类党员并未曾辜负同志的信任（除谢寿康不久消极脱离以外）。大会批准了旧执行委员会给张伯简的警告处分。张伯简确实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到一九二五年未病死为止，仍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我所知道的他的一项错误就是告诉人说：他手里掌握着一个秘密团体，有几十个成员，都是很好的，现在尚未到公开出来的时候。赵世炎信以为真，因此团结他，要他参加“少年共产党”，担任组织部长的重要职务。他因事羁留德国，没有参加第一次大会。以后，他回法国来了，李维汉以代理组织部长的身份接待他，要他交出这个秘密组织。他不肯，李维汉说：“我们的革命团体已经成立了，你还保持那个秘密组织干什么？”没有让他做组织部长。他又去德国了，以后由德国去苏联。在德国，他同张崧年发生冲突；在苏联，他同罗觉发生冲突。两次为什么事情发生冲突，我当时就不知道，也不想去研究。从两次冲突对方都是组织的“第一把手”看来，我可以设想张伯简要争领导权，他自命不凡。觉得“第一把手”不够重视他。冲突结果，他都失败了。从此以后他放弃争当领导人的野心，忠实地做工作。一九二四年临暑假时，他从莫斯科回国，恰好同尹宽一路。回国后，尹宽被派去山东作省委书记，萧子璋被派去湖南作青年团省委书记，蒋光赤被派去上海大学当教授，张伯简仅仅做新设立的中央宣传部一个工作人员，管理印刷、发行及其他事务性工作。他做得很好，很令人满意。我回国后与他同在中央宣传部共事，他处处帮助我，绝不同别人一样鄙视我缺乏办事能力。一九二五年秋后，广东国共合作准备消灭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中央派他去广东做滇军工作。我不知道他在

此战役中有何贡献,但战役结束后,他肺病发作了,死于医院。留下了结婚不久的爱人,她是上海一个女工同志。

现在要说说尹宽是怎样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的。尹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已经是党员了,每次参加旅莫支部党员会议。他一九六〇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时,说:“少年共产党”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另外几个原来加入党的,如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萧三、我等几个人,就成立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些党员入党是没有手续的,国内党指示在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选一些年纪较大的,政治上较为稳定的,作为党员,和国内联络,报国内批准,推赵世炎作通讯员。这几个党员都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尹宽这几句话并不可信,他这篇访问记有好多处明显地不符合事实。这也难怪。我们关在监狱内,不断地有人来审问案情,绝未去想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事;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不是问案情,而是问革命史料,我们一时当然不会回答得很正确。例如,这里说的,国内党指示把团员中一部分年纪较大政治上较成熟的人升格为党员,——这话,别人就未曾说过,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如果这话是可信的,那么赵世炎、周恩来两人本来都是团员,到此时才升格为党员。这是说不过去的。但尹宽说他也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话萧子暉未说,却是可信的,即使不在同一次,也在以后几次。尹宽也是第三类党员。

上引尹宽的交代材料,也说到他如何变成党员和旅欧支部的问题:他的回忆多不可信,这里所引,不过聊备一说而已。他说:“我们的党员都是‘自封’的;并且还认定,以后青年团员要升为党员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报告中央核准。所谓‘总支部’的领导人,就是张申府。张申府与陈独秀原来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与周恩来也是旧相识,他的总支部‘领导人’也是自封的。在法国的党小组,我们就推定赵世炎负责同中央通信,因为他是我们青年团的书记。……取消‘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称,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

欧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实际上并不存在),都是根据张申府通过周恩来传来陈独秀的信决定的。”

我们从法国出发的几个人,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便同原在柏林的三个人一起乘火车去莫斯科了。四月初的一天,我们到了莫斯科。我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以上写法国的生活,即使与尹宽无直接关系,我回忆起来也舍不得抛弃。那些事实,即使与尹宽本人无直接关系,也足以烘托那个时代,尹宽和我们就在那个时代中形成性格和思想的。

但以后,我不能那样写了。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以及回国后长年的生活,可以写的事实很多,如果照以前那样写下去,不知道要写成多大的篇幅!我决定以后只写与尹宽直接有关的事实。

我们第一批人春天到莫斯科,同年秋天第二批人又从法国来了。其中有尹宽,也有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刘伯坚、李鹤龄、于履中、王人达等。据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此行一共十人,我忘记了另几个是谁。他们经过柏林时分别住在德国共产党工人党员的家中。他们看见德国同志兴高采烈,准备纱布绷带为即将举行的武装起义之用。此事,廖焕星的回忆中亦有记载,说他们极受工人党员的“热情招待”(但廖焕星记此行人名有错误)。廖焕星说是十一月间事,尹宽说是十二月间事,廖说较可靠,因为他们经过柏林时德国那次革命尚未失败(尹宽在上引交代材料中,则说是十月,那更可靠)。他们是从史特丁港上船来彼得格勒,然后由彼得格勒乘车来莫斯科的。尹宽一到莫斯科,就参加旅莫党支部会议,可证那时他已经是党员,我还是团员。在莫斯科,我同他的关系完全同别的同志的关系一样。他自己也没有突出之处。他没有参加党的领导圈子,也没有参加团的领导圈子,未曾担负任何特殊的工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他不是同我一班上课,而是另编一班。他没有学俄文,或虽学而没学好。倒不是因为当时旅莫支部有反对学俄文的空气,他如果想学,会抵制这位空气的。他不是从

通过翻译听课而增长知识,他是读法文书增长知识的。他能读法文,也能翻译法文,自然没有我理解得好,翻译得好。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旅欧支部发起给《新青年》季刊供给稿子。我翻译了一篇普列哈诺夫论辩证法的文章,从俄文译的;他也翻译了一篇论辩证法的文章,则是从法文译的,我不记得何人所作。我们两人的译文后来都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登载出来了。这一期不是瞿秋白编的,瞿秋白去了广州,而是陈独秀编的,莫斯科供给的稿子都登载了。后来瞿秋白很不满意,曾告诉我这两篇文章为什么译得那样诘屈聱牙。稿子送回国前,旅莫支部领导人先审查一遍。第一把手罗觉以为哲学是他的专业,特别找尹宽和我谈一次话,暗示我们两人都不懂得辩证法。其实,我们两人不过借翻译来学习辩证法而已。这件事情也可以证明,尹宽和我那时不约而同地从哲学下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期间,我和尹宽关系是很疏远的。我想不起他还有什么事情可记。而上引的交代材料中,尹宽自己记了一段他在那个时期的事情。他所记,我也未曾发现有什么不符合事实之处。

尹宽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里总共住了不到半年。列宁逝世以后,我正在距莫斯科百里的一个旧地主农庄上休养一个多月,因此,今日回忆起来,没有多少有意思的话可说。

我一到莫斯科,人们就把我看成书呆子,给我取个俄文名字:里亚萨诺夫。他是当时布尔塞维克党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们一叫里亚萨诺夫,就特别强调,含有几分诙谐的意思。

在东方劳动大学里有俄共的中国支部(按:应说中共的旅莫支部),其负责人就是罗觉(即罗亦农),彭述之等。不多时,支部就指令陈延年主持一个特别的讨论会,讨论民族问题,参加的主要是从法国来的人,赵世炎当然也参加,会议一开始就指定我做正报告。然后由彭泽湘做副报告。……正副报告两方面的冲突是很厉害

的,其详细内容,我已全记不得了。可想而知,彭泽湘是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革命性,甚至说吴佩孚也有一些民族倾向,在一定条件下能结成反帝统一战线,他们都经过支部从俄国共产党方面拾得一些牙慧,我则对当时领导路线毫无所闻,只是在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就养成了一些阶级成见,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确实是格格不入。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毫无斗争经验,只知一本正经地说出自己所想的,而罗觉、彭述之等得风气之先,已从俄国布尔塞维克党学得了一些斗争的经验和方法。今日,经过十二年的教育改造,回忆起来,我才省悟到那次讨论会是专为打击我而召集的,大概因为我平时在言谈中流露出一些不合领导路线的意见,被人认为有懈可击。当晚,讨论会结果,绝大多数都拥护彭泽湘的主张,而反对我的意见。主持人做了结论后还声明:如我有不同意见,下次再开会讨论。会后,我又写了一篇意见书,申述我的意见,也不记得写了些什么,只记得一次张太雷来到宿舍时,彭述之拿我的意见给他看,他拿到手,看我那歪歪斜斜的字,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扔在床铺上走出去了。”

原来尹宽在莫斯科时曾去乡下疗养,又曾被人开会批斗,我都忘记了。记得在法国小组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我反对加入,尹宽赞成加入;在莫斯科,我比他先到半年,讨论同一问题时,我不再反对了,他倒采取反对立场,因为在法国他是领导人,在莫斯科他只是普通党员。

一九二四年暑假前,旅莫支部派了一批人回国。当时国共正式合作,共产党帮助孙文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政府帮助孙文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供给金钱和枪械,国内需要一批干部开展工作。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说是七月离开莫斯科的,我则记得更早一些,在暑假以前,因为萧子暲路上写信回来,我们尚未去乡村度假,在学校里收到信,互相传观。信内说了旅途上一些

笑话。萧子暲给尹宽取一个绰号叫做“虾子”，形容他身高而背曲。萧子暲和尹宽二人又嘲笑蒋光赤的“恋爱至上主义”。蒋光赤路上爱谈女人，又写爱情诗，哥哥，妹妹，尹宽给蒋光赤取个绰号叫做“马桶盖”，萧子暲则叫蒋光赤做“拜 X 教主”。我们传观时大家哈哈大笑，彭述之则不笑而说萧子暲无聊。以后在国内，大家都叫尹宽“长子”，我有时叫他“虾子”。

我忘记了这批回国的有几个人，上面三个人之外还有谁，他们是走哪条道路回到上海的。张伯简无疑是这批回国的。

我是第二批回国的。那时我已经是党员了，这年春间罗觉同我谈了一次话，取得我同意，介绍我入党。旅莫党支部开会，李大钊出席，举行了入党仪式：介绍人说了几句话，我表示了态度，没有任何宣誓，支部便讨论其他日程了。暑假，我们都到乡村避暑，住了一个时候，然后得到通知准备回国。我回国要做什么工作，已经在莫斯科内定了。旅莫支部发动同志写稿给《新青年》季刊，已经寄回一批了，我提议《新青年》应当出一期“列宁号”，纪念年初逝世的伟大导师。提议被接受了，分配了应写的稿子，又派我负责催写。我认真履行责任，到期便去催讨，那些写稿的人看见我去，就说：“债主又来了。”彭述之看中我这个本事，以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派他回国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他要去占领《新青年》，便决定叫我去做他的助手。事先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这批人大约是七月下旬离开莫斯科的，火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海参崴，在那里候船约一个月，到得上海时已是九月下旬了。我们这一批人以陈延年为队长，我为会计，队员记得的有：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蔡支华、周兆秋、傅大庆、李仲武、林可彝，似乎还有其他的人。内定的宣传部长彭述之在我们动身之后好久才离开莫斯科的，但他经过满洲里从陆路回国，比我先到上海。他已经建立了中央宣传部，张伯简帮助了他。我一到上海就搬进宣传部机关居住。

王 辩

到上海后,张伯简告诉我尹宽奉派去山东做省委书记了。三个多月以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大会,尹宽代表山东的党组织来上海出席,我担任大会记录,我们二人又见了面,而且同周恩来见了面,周恩来是以旅欧支部代表身份从广东来出席大会的。参加大会的人当中惟有尹宽、周恩来和我三个人是从法国来的,因此关系特别密切(不错,还有李维汉,但他老成持重,不同我们一道玩)。周恩来住在二马路大新街口新旅社,尹宽住在大会会场三楼,我住在宣传部,但每日散会之后周恩来就邀我们二人到他的旅馆去,请我们吃饭,饭后闲谈,或在马路上玩,夜深我们两人才回家去,或竟不回去。我们两人没有钱,玩的钱都是周恩来出的。我们绝口不谈工作,也不谈正经话。我记得周恩来告诉我们两人,他已经约邓颖超从天津来上海会面了;以后他又告诉我们邓颖超来信说不来上海了。

尹宽没有同我谈起山东工作,我也不问他,他在大会上自然报告了山东工作;我也记录下来,但现在我完全想不起他报告了什么,大会记录也已丧失了。不过,我在中央似乎听人说山东工作做得好。

尹宽不是中央派去山东主持工作的第一个人。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山东党史的材料,知道从北京派去的第一个人是湖南人陈为人,他不久就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央派吴容沧化名吴慧铭去负责山东“地方会”工作,以扶轮学校教员为掩护。他是浙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在济南做了一年以上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

闹出一个笑话：持手枪去某银行找经理，要借一千元做共产党经费，结果被捕，判了四年十个月徒刑。此事影响极坏，“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党的工作停顿了好几个月。可以知道尹宽就是派去恢复山东组织的。马保三一九五一年说：“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宽来山东协助党务工作，当时的书记是王烬美同志；一九二五年初根据中央指示，又选举尹宽为书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尹宽离山东回上海。”马保三不是亲知，是从王翔千知道的，应当可信，其中说尹宽初到山东时不是省委书记大概也是可信的。《一大前后》书中收了三篇有关山东早期党史的材料，两篇系老党员所写都抹煞了尹宽姓名，惟有这篇马保三得自王翔千的史料提到尹宽。王翔千是不会抹煞尹宽姓名的。

尹宽在法国和苏联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经验；他能写文章，能演说，在芜湖做学生运动时又有领导群众的本领；他很注意群众心理，研究群众运动方法，初到法国略能阅读法文书后便买来法国人列朋写的《群众心理学》，并介绍我去读。我对于这门学问没有兴趣，读不下去。王烬美、陈为人都曾出国，到苏联去，又都不久就回来了，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尹宽则是学习了很久，很多，刚刚从国外回来的。他对内进行了思想教育训练的工作；对外发动了群众的斗争，特别是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和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当时报纸新闻常称为“青沪工潮”。可是，上海有多少能干的同志做工作，山东则是尹宽一个人领导本省同志做工作。在罢工高潮中，中央派刚回国的李慰农去山东协助尹宽，尹宽派李慰农坐镇青岛。李慰农与尹宽同是芜湖二农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跟着尹宽闹学潮的。他跟着尹宽去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工学世界社，参加少年共产党，又一路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但比尹宽后半年多才回国。他在青岛工作没有多少时候，还在拟订工作计划，就被捕了。当时山东是奉系军阀张宗

昌的地盘,李慰农不久被张宗昌枪毙了。

李慰农死后,尹宽继续领导山东工作。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山东群众同其他各省一样蜂起反对。自然,这是客观革命形势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尹宽,但尹宽个人是发挥了作用。

上海革命形势,五卅以后和五卅以前大不相同,党的工作也不相同。我最近看见一个党史资料,据上海区委组织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报告,五卅前上海全区党员为二九五八人,五卅后增加至一千零八十八人,其中包括上海以外的九个支部党员人数,换一句话说,经过这次大运动后上海党员人数猛增三·七倍。负责上海地方工作的庄文恭,忠实有余而能力不足,五卅前勉强可以对付,五卅后大家都看出非换一个有本事的人不能处理上海工作了。上海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像北方赵世炎,南方陈延年那样的人来领导工作。哪里去找那样的人呢?中央考虑结果,决定把尹宽从山东调到上海来。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兼中央组织部长,最后的决定是他作出的。谁向他推荐呢?当时,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陈独秀之外只有两个中央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他们不熟悉尹宽,同陈独秀一样。相当知道尹宽的彭述之此时还在实隆医院养病。无疑,中央是根据山东工作的成绩作出这个决定的。

最近上海市委发表的一个史料说: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李成七人为上海区委正式委员,张佐臣、戴三、陈竹山三人为候补委员;上海区委由尹宽任书记;区委下设组织、宣传、工农三个部;组织部由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负责,庄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负责召集会议,顾顺章负责党内工作,陈竹山负责书报流通处;宣传部由尹宽、郑超麟负责,尹宽任主任(兼),郑超麟负责传单和号外的出版印发工作;工农部由何今亮、李成负责,何今亮任主任并负责对内的工作,李成负责对外的工作,张佐臣负责对群众工作,戴三任交通。”这个史料是可信

的,由此可以知道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尹宽已经来到上海。

这个史料也列入我的名字,而且是第一次发现我参加上海地方工作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史料的记载和我个人的回忆相差很远。照此史料说,我是尹宽做上海区委书记时候起才参加上海工作的;照我的回忆说,则我早已参加了上海地方工作,庄文恭任书记时候,我就参加了,到尹宽任书记时候我就退出了上海工作。史料是可信的,我的回忆则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回忆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无疑,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我就参加了以庄文恭为首的地方委员会工作,当时地委设在闸北香山路一个弄堂内,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办公,楼下吃饭,我常在那里吃饭。我奉庄文恭之命,代表地委去出席基层支部会议。但五卅惨案前后地委如何开会,如何布置工作,则我毫无印象。这怎么解释呢?大概我那时不是正式参加地委,而是帮忙的性质,中央宣传部工作忙时可以不必要去地委工作。八月间,《热血日报》早已停刊,运动趋于低潮,我又应当去地委兼职了。地委改组为区委,尹宽代替庄文恭,我无疑被任命为区委七个委员之一的,但我没有改变过去那种“客串”的观念,尹宽上任不久就下台,故我以为未曾同尹宽在区委工作上合作过。但我记得,我正式脱离上海地方工作是在这年深秋靠瞿秋白说情才达到的,在尹宽和王一飞任上我还是在上海区委兼职的。

不论如何,尹宽来上海后我还是时常去看他,不仅在区委机关见面,而是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从山东来上海后我第一次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时,发现他的房间内有个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约不到二十岁,长的并不漂亮。尹宽介绍了她的姓名,“王辩同志”,但未介绍二人的关系。姑娘不说一句话,只低着头笑。不必等待别人传说,我已经猜准二人之间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了。

以后不久,从中央传出了一件大事:山东同志几乎全体闹起

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同志之女王辩逃到上海来。王翔千本人要带刀来上海同尹宽拼老命。山东同志都支持王翔千。

这个问题提到中央面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不会对这种落后意识让步。——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邹鲁礼仪之邦的封建意识。——但这件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也不能置之不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看见中央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王翔千要求尹宽和王辩正式举行婚礼,而陈独秀和恽代英两人出来做证婚人。这个让步的要求,中央也没有答应。问题挂在那里。最后,尹宽吐血了,他本来有肺病。结果,中央这样处理: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工作,王辩则去莫斯科读书。没有开除尹宽党籍,没有罢免尹宽上海区委书记之职,没有拆散尹宽和王辩的关系,王翔千和山东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我过去只知道山东有两个老同志,王烬美和邓恩铭,他们参加了第一次党大会;此时,我才知道山东还有第三个老同志,王翔千。王翔千比王邓二人大得多,不是学生或初出校门的人,而是一个老先生,在济南一家什么报纸当编辑,据说是清朝的秀才,从中国古代学问逐步走向革命的。最近我翻阅有关山东的早期党史材料,看见贾乃甫回忆说:“王翔千,山东诸城人,是诸城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都好。”又说:在山东早期活动中,“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占主要地位。”马馥塘回忆说:王翔千是中学的国文教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参加,那时已有三十多岁(按:如此他不会清朝秀才),自称为“特别团员”。

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王翔千为什么给女儿取名为“辩”了。在先秦,“辩”就是辩论术,就是逻辑学,有“墨辩”。父亲希望女儿长大后不仅有学问,还要有条理,做出结论要有根据。父亲特别爱女儿,把她当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绍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受革命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尹宽骗走了

她！王翔千气愤到了发狂的程度，这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的气愤，不能够说与邹鲁礼仪之邦的旧意识毫无关系。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只顾气愤，却从不考虑王辩本人的意志，好像王辩只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深闺小姐，听到一个坏人的甜言蜜语就跟着坏人走了的。

事实恰好相反。王辩发挥了自己的意志，对尹宽个人对革命对政治作了充分的考虑，然后决定的。她以后的行动可以证明。

据尹宽说，他在山东每次在会议上讲话时，王辩如痴如醉地听着，表现十分佩服的神气。当时，她一定把尹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山东工作又开展得很好，以为完全是尹宽的功绩，由此生出了个人崇拜，这一切尹宽都知道。当他奉了中央调来上海的命令，临走前夕，才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姑娘随他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简单的衣服，跟他来了。后来发生的风波，她预先应当能够想到的。尹宽吐血以后，她尽力服侍。尹宽想到会由此一病不起的。有一天，他问王辩：“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王辩摇摇头，似乎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中央派她去莫斯科读书，我不知道她如何反应。是不是为了服从命令，解决由她引起的纠纷，才勉强同意去的？

我和尹宽在莫斯科的时候，东方大学没有一个中国女学生。我们回来以后，那一年秋天就有好几个女同志去莫斯科读书了。她们都有爱人在国内，她们都在莫斯科另找爱人。那时正在冯玉祥举行军事政变以后，我们都把女同志在莫斯科的作为叫做“倒戈”。尹宽为此寝食不安，他同王辩是经常有书信往来的，我当然不知道通信的内容。可是，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有人去莫斯科开会回来后，都说尹宽不对：“你担心王辩爱了别人，可是王辩在莫斯科是爱情专一的，心心念念不忘尹宽，好多男同志追求她，她都不理会。”事实上也是这样。似乎当时，在莫斯科，王辩是未曾“倒戈”的惟一女同志。

一九二七年秋末，王辩才从莫斯科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尹宽已经离开广州来上海了，王辩到广州恰逢“广暴”，暴动的军队在马路上站岗，她和另一个女同志从小旅馆出来拿介绍信及其他证件给站岗的兵看，说要找“党”。当时战斗正紧张，那些兵没有理她们。暴动失败后，她们才回到上海。此时，尹宽已经离开上海去芜湖作安徽省委书记了。尹宽在上海等待派遣工作时，住在九江路口新旅社，我常去看他。他不知道听谁说，王辩已经来到上海，但找不到党的线索，他于是在什么报纸上登载一个寻人广告，男女双方都用两人知道的化名。几日之后，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你登报寻的女人已经某某商店的小开骗去做小老婆了。他拿这封信给我看，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中央终于派王辩同另一个女同志去安徽工作，受尹宽指挥。那时工作很忙，两人虽同居一处，没有工夫回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暇，尹宽才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同王辩两人享受一下生活。

不久之后，安徽党的机关被国民党破获，王辩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宽似乎还支持一个时期，以后也逃到上海来了。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判了短期的徒刑，关在安庆或其他地方。

一九二九年秋，王辩出狱，来到上海，找到中央。那时尹宽和我们一起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中央不放王辩去找尹宽，告诉了她理由，王辩坚持要同尹宽见面，于是放她来了。我不能肯定两人重新见面的时间，但我想总是在我们这些反对派被正式开除以前；如果在开除以后，中央决不会放王辩来的。那时尹宽住在虹口公园前面一个弄堂房子。我听说王辩来了，便同我的爱人去看他们。那时我也有爱人了，我的爱人也要看看有名的王辩。我们去时，尹宽和王辩正在争吵。四年不见，王辩完全变了，更大，更老，特别是失去少女羞涩的神气。以前是不讲话的，现在看见我去，就拉着我同我辩论政治问题，特别是反对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

派。她还要鼓动我的爱人去拥护中央,反对我们。次日或两三天后,王辩便抛弃尹宽回中央去了。据尹宽说,那天有什么人来通知,说反对派某同志被捕,大家恐慌起来。王辩说:“我当作托派被捕,太不值得。”于是走了。尹宽估计中央机关设在某个菜场附近,于是天天去那个菜场周围徘徊,希望能遇着王辩。我们都嘲笑尹宽。直至解放后,尹宽关在监狱内,也没有忘记王辩。他碰到犯人中有山东籍老干部的,总要打听王辩的下落。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市监狱内遇着他,闲谈中也提起王辩。他告诉我,王辩还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脱党,在家中替人杀猪。

以上所写,我是以自己的见闻和尹宽的谈话为根据的。五十多年前的记忆难免有失真之处。

在这件事情上,尹宽是不是有错误呢?我没有听到当时同志中间议论尹宽的错误。也许听到了,但已经忘记。我想,总有人指责尹宽的错误,但放在心里不肯说出来。我就是这样。我并未当面或背后批评尹宽,但不以尹宽为然。我以为恋爱是个人私事,但不能妨害政治,不能妨害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如果处于尹宽的地位,我不会做出这件事情来。在山东做了几个月领导工作,多少知道当地落后的意识,共产党员也不例外,那么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可以预先看到的。当时,我也有一个“对象”,但由尹宽的遭遇(以及当时别人的事情)取得教训,做出了恋爱不可妨害政治的结论,我就毅然终止进行了。我始终遵循这个结论,一生中未曾为这种个人私事闹出任何政治纠纷。

现在回到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尹宽就任新改组的上海区委书记的时候来。上面所引的史料又说:“九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各部主任会议研究了九月十七日中央局会议的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为:‘尹宽病,允请假静养,区委书记职责兼宣传部暂指派王一飞担任。’会上决定,遵照中央局的决议执行。”由此可以确定知道,尹宽就任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不到一个月,九月十八日就卸任

了。编年记事总是简单的,平淡无奇的,而事实上这二十八日中发生了惊涛骇浪:一个省的同志蜂起要求中央开除上海区委书记的党籍,中央为了平息党内群众的不合理的气愤,不得不趁尹宽吐血的机会事实上撤销他的书记职责,并事实上拆散他的婚姻关系。

王辩走后,尹宽继续养病,我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才出来工作。在王一飞任上,他没有出来工作,即使他完全恢复健康也不能出来工作。王一飞也是过渡性的。他是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不能长久兼职。中央不断地考虑适当的人选,最后选中了罗亦农。早就应当调罗亦农来担任上海区委书记了。我不能解释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调来。一九二五年下半年罗亦农在北京个人办一个党校,训练北方几省的本地干部,很有成绩。但这不是不调他来上海的适当理由。

上引那个编年记事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区委发出第二十二号通告。该通告的内容为:‘中央局派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四月,上海区委的正式委员为:罗亦农、庄文恭、尹宽、何今亮、陈比难、沈雁冰、顾顺章、林仲楠、郑覆他、谢文锦十人,候补委员张佐臣、陈竹山、朱阿毛三人,以罗亦农为书记,庄文恭为组织部主任,尹宽为宣传部主任,何今亮负责工人工作,陈比难负责妇女工作,沈雁冰负责民校工作。”四月六日,区委主席团决议:“各部会议由何松林、尹硕夫分别担任。”六月四日,区委主席团决议:“尹宽、罗亦农多到下面去跑,——尹宽多注重宣传方面,罗亦农注重接洽及市党部,学生的事”。“六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宣布区委新任正式委员为:罗亦农、何松林、赵世炎、庄文恭、尹宽、张佐臣、顾顺章、郭伯和、贺昌等九人;候补委员为:郑覆他、丁郁、梅电龙、沈雁冰、余泽鸿五人。”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上海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选出区委委员,“计正式委员十三人:罗亦农、张佐臣、赵世炎、李泊之、尹宽、何松林、张之甫、

谢文锦、郑覆他、余立亚、庄文恭、张永和、王亚璋；候补委员七人：张叔平、余泽鸿、江元清、杨培生、刘尊一、郭持民、王承伟。”十六日新区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罗亦农为区委书记，赵世炎任组织，尹宽任宣传，何松林任职工，由以上四人组成区委主席团。”

以后就进入第三次暴动时期了。关于尹宽在这个时期的作用和地位，以后再说。以上我是从最近发表的一份党史资料中摘录有关尹宽的记载的，从他到上海就任区委书记起到第三次起义前夜为止，我不能系统而具体地写出尹宽此一年半内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实上（不是形式上，形式上当他作区委书记那一个月前后，我是区委委员，一道工作），我没有同他一道工作，我们还是密切来往的，我去他家的时间比他来我家的时间更多。但我们见面都是“言不及义”的，即我们绝口不谈各人的工作。以上所引有关尹宽的记载，当然是不完全的，尽管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情况，仍可作些补充。

尹宽本是上海区委书记，只因王辩事被人攻击，借吐血下台，到了罗亦农任上，才恢复工作，作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地位低得多，权力小得多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这一点是不会介意的。我要试探一下，他是否介意。可是，很好，他丝毫没有介意。他很佩服罗亦农的才干。他说，罗亦农一面同同志谈话，一面写指示信，两种工作同时进行，都做得好。确实是这样。我也是从罗亦农在上海的工作中才认识罗亦农才干的。他是旅莫支部书记（那时名罗觉），但我在莫斯科并不佩服他，那种工作容易做。赵世炎是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才参加上海区委担任组织部长的，他的能力也不逊于罗亦农，尹宽虽未同我说起赵世炎才干的话，显然他也是佩服赵世炎的。上引资料说，区委委员中罗亦农、赵世炎、尹宽、何松林四人组成常委，但事实上罗赵何三人时常碰头，尹宽很少同他们在一起，这一点尹宽也没有怨言。我倒看出罗亦农和赵世炎有不满意尹宽的暗示，好像认为尹宽只会写文章。当时党内有组织家

看不起宣传家的风气。他们说：“你们不过多读几本书，多懂些理论，会写文章，会翻译而已；你们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领导党。”罗亦农便是这样看彭述之的。他在莫斯科就给彭述之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孔夫子”。现在罗亦农、赵世炎也是这样看尹宽。在罗亦农任上，尹宽始终作宣传部长，始终作宣传教育的工作。他们更加是这样看我。我心服，我确实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领导党，比起他们相差得很远。他们这样看尹宽，我不心服，因为尹宽能做群众工作，能够领导党，——虽然能力不及罗亦农、赵世炎。

上引那个党史资料说：“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我不知道或忘记了这件事情。当然宣传部长尹宽不能不担任高级党校的“教授”工作。这个党校预定有二十八人听讲，其中包含沈雁冰、丁晓先、侯绍裘、张廷瀚、梅电龙、顾谷宜一类有名的党内知识分子。我没有参加教授工作。反之，从来的两期党校，则有好多人去教课，我也去了，因此至今记得。一期是招收上海本地和江浙两省的基层干部，约有四五十人，校址设在辣菲德路一个弄堂里，三楼三底房子，弄口和大门口挂着“启迪中学”牌子。尹宽做校长，区委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做庶务兼会计。那时已经同杜月笙合作了，学校受杜月笙保护，我们堂而皇之教党课。二个月结束后，房子派了其他什么用场。一九二七年二月间，这房子做了第二次暴动的指挥部，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另一期则设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恒丰里一〇四号三层楼房子，校长仍是尹宽，学员也是基层干部，但换了一批人，这期党校未曾结业便发生第三次暴动了，于是校舍做了暴动的联络站，前方的消息汇集到这里来，然后转给暴动指挥部（我不知道设在哪里）和陈独秀（他住在中央宣传部）及其他地方；对前方有所指示时，也是先汇集在这里再发出去的。我曾传递陈独秀的指示到这里来。这个三层楼房子后来作区委的一个机

关,常在这里召集干部会议。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捕的。我不久之前才去看过,那个党史资料对后二期党校没有记载。

尹宽也曾写文章在《向导》上发表,我已忘记文章的内容。尹宽也曾任上海大学教书,教的什么,起迄何时,我都不知道。他住家在闸北青云路附近,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同他一道住。这是山东人,上海大学学生。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仿佛听说他被捕投降了。我常去尹宽家中谈闲话,从来不谈工作,所以写不出他在上海做了什么事情。

现在就来说上海的第三次暴动。尹宽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狱中回答访问者说:“关于三次武装起义,我没参加,所以情况不明。”这是他年老忘记了。我却记得,他是第三次暴动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我在监狱中,一天提审,恰值纪念上海三次暴动胜利的日子。我告诉提审员说:今天纪念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可是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尹宽却关在监狱里。最近,上海档案馆拿出了三次暴动的档案,证明我的记忆没有错。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三次暴动,又成立一个特别军委和一个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璋(应作璋,即萧子璋)。特别军委无尹宽,特别宣委成员为: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或刘昌群)、徐伟。

“特别委员会”是最高的暴动机关,从二月成立起直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改组加入陈延年为止,开了好多次会,尹宽都参加。同时,区委主席团也经常开会,尹宽都参加。每次会议都有记录,现在只发表一部分会议的记录,将来会全部发表的,那时我们就可以从中分析出尹宽在上海第三次暴动中的作用了。

“特别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于四月十六日开会,记录已发表,出席者为: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在会上,李立三宣布中央局派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三人,连同原在上

海的赵世炎、周恩来二人组成特委会。这就是说尹宽退出了。会上决定打电报给中央局，要求讨伐蒋介石，电文归周恩来起草，以个人名义签字。现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收了这个电文，但书上无签字。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了各人的签字，尹宽在内。十八日，新的特委会开会，但罗亦农、尹宽二人仍出席。

“特别宣传委员会”没有开会记录。尹宽为主任，我亦参加其中，但对于此事，我完全忘记了，也许根本没有正式成立，总之我毫无同高语罕、贺昌、徐伟一起开会工作的印象。我只记得在三次暴动期间，我同尹宽、陆定一三个人常在一起，采访新闻，起草传单，等等。

以上写好，我才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书，其中发表了《特委会议记录》全部，共十九次会议，记录前面出席者名单中都有尹宽，有少数记录没有开列出席者名单，但其中一次恰有尹宽发言，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每次特委会议，尹宽都是参加的；但并非每次都有他的发言。有几次发言是他报告宣传工作的：出版什么报纸，印多少份，怎么发行，等等，不值得研究。似乎他只关心做好本分的工作。但本分工作，也未曾做好。特委末次会议，周恩来提出对于第三次暴动的总结意见，其中第五点批评“技术工作太坏”，首先就说“政治宣传不好，此为沪区宣传部的责任。”如此说来，我也有责任。

上引书中，除特委会议外，区委全体会议也有记录。三月八日上午会议，出席者十一人，其中有尹宽。何今亮和尹宽发生了争论。何今亮就罗亦农报告中列举的上次暴动时所犯的三大错误表示意见，他认为这三个错误不能算大的错误，而第二次暴动虽然失败还是有积极后果的，还是进步的。他又说，现在北伐军一时不能来上海，此消息不要让群众知道。尹宽不同意何今亮，认为现在的局面不是我们预想的，而是客观造成的；至于北伐军晚来也不会太久；我们仍要积极承认工作错误。何今亮说，第三点（时间太早）不

算错误。尹宽不同意。何今亮收回自己的意见。结论同意罗亦农的报告。

十七日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上海出席党的第五次大会的代表名单,其中没有尹宽。可是后来尹宽出席了大会。这中间怎样变化,我不清楚。资料说尹宽是四月下旬离开上海的,周恩来接替他做宣传部长。我想起了,他是在我以后到达武汉的,似乎没有参加大会在武昌开的开幕式,却确定参加了黄陂会馆的会议。此行,他似乎负有另外的使命,因为我曾听他说他不是直接从上海乘船去武汉的,而是一段旱路,一段水路走了来,中间曾在芜湖住了几日。

我初到武汉没有工作可做,他也没有工作,我们二人常在一起游玩、访友。一次,我同他去民国日报馆找沈雁冰。沈雁冰很客气,请我们去交通路底一家广东小馆子吃饭,并写字条叫堂倌送到附近什么地方请孙伏园同我们一起吃。沈雁冰只说我们二人是新从上海来的,孙伏园就不问下去了。我久闻孙伏园这个人,此次才看见,至今还记得他生了一部大胡子。在黄陂会馆开会期间,我也常同尹宽在一道,休息时在会场外草地上坐着闲谈,评论时事和个人。我们互相信任,无所不谈。我曾把我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告诉他,后来在上海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中央出版的内部刊物(似名《中央政治通信》)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了。就在这样的草地谈话时,有一次罗亦农跑了来,参加了我们的谈话。罗亦农那时也是大会的反对派,他来谈话是别有用心的。他告诉我们,说从庄文恭处知道国际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做总书记,庄文恭之弟韩白驹新从苏联回国告诉庄文恭这话。对于当时的党内斗争,罗亦农当然比我和尹宽知道得多。

大会开后不久,我被派去做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搬去武昌居住,尹宽仍住在汉口,从此我们就不在一起玩了,但也不是从此不见面。我记得曾去汉口找他,也记得他曾来武昌找我。我记得一

次他要我同他联名去营救台一谷。台一谷是安徽人，一九二六年在辣斐德路办的党校的一个学员，聪明而漂亮，好多人对他有好感。我不知他是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工作的。到了尹宽找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汉口被湖北省总工会的纠察队捕去了，事实上是中央军委捕去的，据说某地一个机关被蒋介石政权破获是台一谷告密，现在他又混到武汉来。尹宽认为这是冤案，因为告发台一谷的也是那个党校的学员，向来与台一谷不和，挟嫌诬陷的。我信任尹宽，便允许把我的姓名写进他的营救信内了。他说，安徽同乡也找蒋光赤写了营救信。以后过了一个时候，我又碰到尹宽，问起这件事情。他说，顾顺章曾找他和蒋光赤两人谈话，叫他们不要管这件事情。尹宽此时才告诉我，他根据一件什么事情，也怀疑台一谷做了叛徒。

我不知道尹宽此时住在汉口做什么工作。尹宽一九六〇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的话时，说“我到武汉留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尹宽这篇访问记有好多事实错误，但这句话却是可信的，因为在武汉出版的《向导》几乎每期都有尹宽写的文章。瞿秋白排斥我，不让我在中央工作，却不排斥尹宽。直至武汉快反动，中央疏散干部时，尹宽才被派去广东作省委宣传部长。总之，尹宽仍旧只被人看作“宣传家”。他本来是一等干部，自从为王辩事被山东同志打下来以后，就退居于二等干部，同我一样了。

尹宽领了路费，离开武汉去广州就职，轮船经过安庆时竟上岸回桐城老家去，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重上征途。

以后，我在上海同他见面时，知道此事，我便批评他不对。在那种紧张的革命斗争中，奉了使命，怎么能够逃离战场至一个多月之久呢？我不止批评他一次，只要有会，我就提起来批评他。有时他表示接受，有时他要弄诡辩。尹宽的诡辩是有名的，尹宽接受批评，承认错误，是十分罕见的。一九五六年，我在监狱中同他见面，自由谈话时，他曾说他从前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现在落

得这个下场！我于是同年轻时一样不客气地骂他：“忠心耿耿，有什么可夸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你忠心耿耿，为什么派你去广州时，你半路上回家去住了一个多月？”

张太雷是同他一起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的，但张太雷迟迟其行。他有野心要掌握中央的权力。七一五前夕，陈独秀辞去总书记之职后，成立了一个五人临时政治局接受陈独秀的职权，张太雷也在此五人之内。一直到八七会议成立正式的政治局之后，张太雷才离开武汉到广州去。他比尹宽先到广州。他严厉责问尹宽：“你这一个月到哪里去？”他恐吓说要调查尹宽的行动。在此情形下，省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就无法合作了。就事论事，错误自然在尹宽方面，但这里也表现了张太雷的成见，张太雷是反对陈独秀的，他把尹宽首先看作陈独秀派。不久之后，张太雷就找一个借口派尹宽来上海向八七会议后的中央报告什么事情，一到上海中央就不让尹宽再回广州去。我又能够同尹宽时常见面，并带尹宽到《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部来。我征求尹宽对于已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的意见，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把他的信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四期上，连同我回答他的信。

从尹宽这封信也可以窥见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他首先拿《布尔塞维克》来比较过去的《向导》。他说：“以前的《向导》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实际上只是自处于左派国民党的地位；现在的《布尔塞维克》焕然一新，完全拿出共产党的政治面貌来。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他认为是现在注重理论问题，过去“简直是宣言和传单式的，没有政策和策略的讨论。”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多介绍国际问题；第二，要多讨论政策和策略的实际问题；第三，要公开争论，登载批评的文章，不管正确的或错误的，也都应该公开于革命的群众之前。我的答复表示接受他这三点建议，要努力做到，同时也批评过去的缺点。我说：“过去的宣传可以说只限于一般民族解放的理论，对于资本雇佣的关系，农村阶级的分析，

工农群众暴动的必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共产党对于工农劳苦民众的作用等,……统而言之,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知道的常识,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向工农劳苦民众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党都没有有计划有系统地宣传过。”话虽如此说,但在我编辑期间,《布尔塞维克》未能实现这个诺言。由此又可见后来我们共同走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道路也不是偶然的。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中央派尹宽去做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委是五次大会之后才成立的,尹宽不是第一任书记。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尹宽起初是做中央巡视员去安徽的,后来才正式担任省委书记。省委设在芜湖。他现在不是“宣传家”而是“组织家”了,同他初回国时一样。可是,他在山东做出了成绩,在安徽却没有成绩可言。尹宽还是那个时候的尹宽,但时代不同了。在山东时,中国革命正在趋向高潮;在安徽时,革命已经惨遭失败了。在他任职期间,好多同志被捕,连他的爱人王辩也被捕。他不仅没有受到表扬,而且有许多安徽同志向中央控告他。控告他什么?他在安徽怎样工作?我都不知道,我们见面时照例是不谈个人工作的。一九二八年秋,他又从安徽来到上海,我请两个福建来的干部在福州路一个小馆子吃饭,也请他来作陪。蔡和森下台后,李立三当权时,他又来上海,我未看见他,只听到李立三说尹宽同他说了如何荒谬的话。什么话,我忘记了,但我想像得到尹宽是不会买李立三的账的。李立三摆出党内最高领袖的面孔,要求下屈服从。我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很快就辞去《布尔塞维克》编辑之职,避免同他争吵。尹宽恐怕表面上也不会敷衍李立三的。

一九二九年二月间,我已经搬出机关,在外闲住,此时又遇着尹宽,他也在上海闲住,也许同李立三争吵后就没有回安徽去。我当时与蔡振德住在一幢屋子,一道吃饭,我约尹宽搬来住,但蔡振德反对。尹宽人缘不好,不知道为了什么。当时他在上海闲住,但我们陈独秀派在蔡振德家里集会,帮助江苏省委反对李立三中央

时,尹宽并未参加我们的集会,不知何故?我想总是因为当时除我之外人家还不信任他。他也同当时闲住的老朋友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往来,但同他们并不融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约尹宽到我家里来玩,他失约了。恰好这一日下午,我们这个屋子的人,蔡振德夫妇,我夫妇,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全体被捕,连串门的马禹敷也被捕。我想,幸而尹宽失约,否则也要被捕的。我们关了四十多日放出来,我第一次再看到尹宽时,就祝贺他的运气好。我们搬了新家,他又成为我家的常客了。

左派反对派

不记得我们释放出来多久,总之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了,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蔡振德仍旧与我同住,马禹敷也常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三个人,连同刘静贞、王绍华都看了。这不过是第一批文章,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尹宽以后也拿来给我们看。同时,他也拿到彭述之夫妇、汪泽楷夫妇住的家里去,给他们看;刘伯庄常到他们那里去,也看了这些文章。托洛茨基本人写的文章之外还有苏联左派反对派的文件。究竟什么文章,我想不起来,反正我们后来已经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这些人不会办事,出了许多错字。我拿到书后很生气,为什么不交给我这个熟悉出版工作的人去做呢?

当时,我和蔡振德住在东有恒路(今名东余杭路),彭述之和汪泽楷住在昆明路,两地相距很近,尹宽住家时常迁移,距离我们较远,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更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文章,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尹宽不知道如何,可能他看到了文章,立刻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他的思想本来是很敏锐的,但我们其余的人有一段接受过程。我们看了,都互相讨论,常常去彭汪家一起讨论。尹宽也参

加我们的讨论,他总是站在托洛茨基观点方面解答我们的疑问。不久之后,我们都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惟有陈独秀继续抵抗,尹宽继续说服他。我不是每日去彭汪家的,但尹宽常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他们在彭汪家讨论的经过。据尹宽说,每次谈话最后,“老头子”总坚持他的不同意见;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尹宽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分手时还坚持这个新的不同意见;再下次来时,这个新的不同意见又消失了,但又提出更新的不同意见,如此类推。陈独秀并未曾最后被完全说服,他还保留着不同意见,主要是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他认为中国革命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陈独秀不仅口头上同尹宽和我们辩论,而且几次写出书面意见给我们看。我记得他大约写了五六篇或七八篇文章,可惜这些文章都丧失了。

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也未尝不是大事。

苏联共产党发生派别斗争,我们过去是知道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最初出现于一九二三年,那时我们尚在苏联。东方大学苏共支部曾召集一次党员全体会议,彭述之出席,^① 两派都派重要人物来辩论,代表反对派来的是拉狄克,代表中央派来的是加米涅夫。彭述之回来曾向我们说起开会时的笑话,例如拉狄克说:“世界上的人知道有托洛茨基,什么人知道你加米涅夫呢?”至于双方辩论内容,则彭述之没有说。这一阶级的争论,我们后来也知道了。起初托洛茨基攻击苏共中央多数人的官僚主义作风,后来发表他的《十月教训》,季诺维埃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发表他们的反击文章。以后我们也知道季诺维埃夫、加米涅夫联合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但不知道他们之间争论什么问题,尤其不知道

^① 按:此会不是东方大学苏共支部的会议,而是苏共莫斯科市委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大会。

中国革命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之一，更加不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提出什么主张。一九二七年，蔡和森新从苏联回国，瞿秋白同俄国顾问频繁接触。他们二人多少知道，但我们别的人完全蒙在鼓里。有些同志从日本报纸获悉了所谓“清算派”的论点，他们来问我，我说不出来。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绝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而斗争。现在，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参加了当前世界上最有决定性的一场斗争，挽救十月革命及其成果陷于蜕化变质的大斗争，可是自己不知道。

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这是尹宽的功绩。他又一次引导我从徬徨中走上正道。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尹宽，我们就找不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还是找得到的，正如一九二一年如果没有尹宽给我法文的《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我仍旧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一样。但事实是：一九二一年尹宽带我走向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九年尹宽又带我走向托洛茨基主义。

当时，中国托派的正统组织，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对于我们陈独秀派的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我们仍是斯大林派，但因在中国党内受了斯大林派的打击，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投向托洛茨基主义求出路。我不否认，我们当中某些人确是这样。例如，彭述之，他在党内受打击，八七会

议后的中央向六大大会建议开除他，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决定交给新选出的中央去办理。六大以后的中央仍旧把他编入支部。托洛茨基主义对于他个人可能是没有出路中的一个出路。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在反对派组织中占据了领导者地位以后，他的理论仍旧是斯大林主义的，他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手段更加是斯大林主义的。但陈独秀并不是这样。陈独秀完全站在革命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从辞去总书记之职起便明白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共产国际是不能解决的。^①但他不愿推卸自己应负的失败责任。他考虑了将近两年，但做不出结论。他仅仅认为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派来中国的代表也不理解中国事情，以此领导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未曾想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并不是仅仅出于对中国事情的隔阂，主要还是由于苏联产生了一个当权的斯大林派系，他们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国际主义，不肯诚心诚意援助各国革命，而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去援助各国革命，而且把各国共产党当作苏联外交的工具。托洛茨基那几篇文章使陈独秀明白了，原来中国共产党当初就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原来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并不是什么“四个阶级的联盟”，原来在革命高潮中应当竭力发动工农群众，领导工农群众去夺取政权，而不应当为了保持国共合作而束缚群众的手脚，等等。这一切，托洛茨基都看到了，而且说出了。（可见，远在莫斯科的人并非注定不能看出中国革命的大方向的。自然领导实际的斗争需要本国的领袖。）一九二七年以后，陈独秀认为革命是失败了，共产党应当改变政策以适应客观的形势，不要狂呼革命更加高涨，到处实行盲动，托洛茨基恰好也是这样看法。

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

^① 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书中说，他陪陈独秀从武汉回上海时，在轮船上，陈独秀曾说：“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又在第十一期上写了社论，认为革命的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什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彭述之完全没有思想基础。这就埋伏了他后来同尹宽发生冲突，同陈独秀发生冲突的根子。彭述之如此不诚实，他最近几年发表文章竟抹煞了尹宽，把我们陈独秀派获得托洛茨基文件的事情归功于他自己。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彭述之在一篇丑表功的文章中对于这件事情说了如下的话：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作了一次长谈，从他们知道了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情形，以及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从他们得到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我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后，惊异地感到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对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的指责，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痛苦事实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当时中央领导所施行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体提出来的方针。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第二天，我带着托的文件去见独秀，并把我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的谈话内容告诉他，请他仔细研究托的文件。独秀看了托的文件后，即来到我们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全同意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批评和当前防御政策的建议。”

彭述之如此把尹宽做的事情记载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尹宽死了，我有责任代替尹宽去拆穿彭述之这个西洋镜。我也是为了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做的。

尹宽拿到托洛茨基文件,听到苏共党内斗争情况,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王平一给他的,告诉他的,王平一是山东人,他在山东时认识尹宽;彭述之则说文件和情况是几个无姓无名的莫斯科回国学生给他的,告诉他的。

王平一拿给尹宽的,只是托洛茨基几篇短的或较短的文章,后来陈独秀出钱把这些文章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彭述之却说那些无姓无名的回国学生给他的是托洛茨基的两篇长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里就露出了马脚。托洛茨基这两篇长文章是刘仁静九月间带到上海来的,那时我们都已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刘仁静带来的这两篇长文章是俄文,我们立即译成中文,刘仁静译第一篇,我译第二篇,随后仍由陈独秀出钱用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以前出版的便作“第一集”),此次则是我担任校对的。

什么人发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彭述之不顾历史事实,捏造自己的功绩,以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则我记述尹宽事迹时不能不就所知辨明真相。

刘仁静从莫斯科转到西欧回国,路上弯到君上但丁堡去,同托洛茨基见了面,带回这两篇长文章之外还带回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刘仁静的托派面目是很明显的。他住在法租界蒲柏路上一个公寓,同正统的托派组织取得联系,由此知道我们陈独秀派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便带信给尹宽和我,要我们两人去公寓见他。尹宽通知我,我们两人一起去了。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最后约定一天我来公寓带他去我家中同陈独秀见面。那两篇长文章和那一篇纲领(草案),就是刘仁静在这次会面中拿给我们的。

刘仁静未曾回国以前,我们陈独秀派早已活动起来了。我们无形中分为几个小组,互相讨论,统一思想,解答疑问。尹宽自告奋勇,写“宣传大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提纲”。他把争论的

问题理成系统，一条条依次写出来。这也是他经过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后，现在坐下来整理一下。他耗费不长的时间，但写出很多，我们油印起来，简直成为一本书。我自然看过，而且在无形的小组中讨论过，可是以后就想不起来究竟列出几个问题，究竟每个问题是怎样说明的。这本“宣传大纲”的内容，我忘记了，但我还记得约在此时尹宽在谈话或开会中发表了一种议论，大意说：我们同斯大林派讨论问题，要注重讨论现实问题，讨论现时是革命高潮还是低潮，要不要实行武装暴动，城市重要还是乡村重要，等等，我们不要同人家纠缠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等等问题。他这种议论可能是针对我而发的。那时我也在整理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偏重于说服别人，而是偏重于说服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形成系统，不致自相矛盾，一旦同别人辩论时，如果深入下去，那就要离开现实问题，而涉及更高一层的问题。但尹宽的意见也有道理。这就是“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对于一般群众说来，那些更高一层的问题是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

尹宽主要的活动还是在那些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学生方面。他最初只认得王平一，不久就通过王平一认得赵济夫妇和刘胤，有个时期与他们同住一幢房子。这些都不是正统托派组织掌权的人。不知何时，尹宽也认识那些掌权的人了，如区芳、张特、史唐之类。谈判统一以前，尹宽就同他们有来往了。彭述之、汪泽楷一流人同他们没有来往。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要找陈独秀派，在谈判统一以前，只有通过尹宽。他们以尹宽为陈独秀派代表，以尹宽的言行和作风为陈独秀派的言行和作风，以尹宽个人的缺点为陈独秀派的缺点。他们对尹宽的感情并不好，称尹宽为犬儒主义者。

彭述之、汪泽楷等人的活动，则在党内的干部方面，尤其是从外地来上海的干部方面。他们是努力活动的，活动也很有成绩。

马禹敷则在上海本地工人同志中间活动，也很努力，很有成

绩。他是江苏省委委员，多年在上海做基层干部，认识很多工人同志。在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下，工人同志对于党的领导是不满意的，马禹敷一号召，好多工人同志都跟上来了，其中有一些基层的，甚至中层的干部。

为了培养这些干部，马禹敷分派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去做工作。他教尹宽去培养蒋振东，派何资深去培养两个电车工人，叫我去培养两个中层干部。惟有尹宽的努力结了果实，蒋振东至死没有放弃托洛茨基主义，至死保持着对尹宽的兄弟一般的友谊。

我们统一了思想，发展了影响以后，便进行组织工作。各小组选举产生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为领导机关：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马禹敷、杜培之。陈独秀是当然的。彭述之、尹宽、马禹敷三人是最积极，最活动而有成绩的。杜培之是一个工人，某织绸厂的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被马禹敷完全拉到我们方面来了，当时共产党内流行提拔工人为领导的风气，向忠发还做了六大以后党中央的总书记。我们也提拔一个工人同志到领导机关来，这是马禹敷推荐的。杜培之曾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有一次是在我家里开会。但不久之后，他去做强盗，被国民党治安机关逮捕，解往南京枪毙了。他没有暴露他的政治身份。杜培之死后补了罗世藩为委员。委员会的秘书是吴季严，后来才换为何资深。

选出彭述之、尹宽、马禹敷为委员，大家是心服的，因为这三个人确实是最努力，最有成绩的。没有其他更适当的人选了。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为了没有“领袖欲”，还是为了对革命不负责任，——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

派给我的工作，我还是做的。马禹敷叫我去领导报馆支部，我

去了,而且去了好多次。云南有个代表来上海向中央报告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也约他谈话,向他宣传。就是为了这两件事情,我被开除党籍的。

我忘记了尹宽何时被开除党籍。我们有当时的文件,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禹敷、蔡振德四人的决议。尹宽不在此名单内。我未曾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等人,以后才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尹宽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开除的。

为了回答中央的开除,陈独秀自己写了一篇《告全党同志书》,同时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合作写了一篇《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共有八十一人签名,那些尚未开除的人在签名后也开除了。

我们从此打出了“左派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旗帜。我们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但我没有写文章,因为不需要我写文章。尹宽当然在那上面写了很多文章。

直到此时,陈独秀派的托派组织内部尚未发生斗争。内部斗争发生于“统一”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以后,就把基本意见相同的同志组织起来,进行活动,吸收新的同志参加,由十几个人扩大为几十个人,都是经历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共产党员。我们发表了八十一人签名的政治主张,以后继续发表。与此同时,成立于莫斯科的那个正统托派组织也发展了,也在国内吸收新的同志,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但正统托派组织,一面发展,一面发生分裂。首先,以刘仁静为首的一部分人,另外出版刊物,名为《十月》,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其次,王平一、赵济、刘胤及另一个人也另外出版刊物《战斗》,也另外成立组织。我们陈独秀派原来只想先成立自己的组织,巩固自己的组织,然后再来考虑如何统一托派组织问题的。统一的对象原来只有那

个正统组织。我们没有正式提出统一问题,因此我们中间对此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没有暴露出来。但各种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的,是迟早要暴露出来的。

首先提出统一问题的,是那个正统组织。陈独秀派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事实,是正统组织方面及时知道的。刘仁静回国后,他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刘仁静提出陈独秀派的组织问题,那是刘仁静自己提出的,并非我们委托他提出。我们那时还在党内斗争,还未曾被开除出党,更未发表八十一人签名的政治主张,决不会委托刘仁静提出参加正统托派组织问题。刘仁静主张吸收我们加入组织,别的人则反对刘仁静的提议。别的人说:陈独秀和陈独秀派都是“机会主义者”,比斯大林派更右,只因斯大林派不要他们,他们才投机表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他们不能全体加入组织,只能一个一个地经过审查之后加入组织。

不一定是受了这种态度所刺激,我们陈独秀派当中早有一部分人,以彭述之为首,就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即说: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应当以我们的组织为主,吸收他们加入。但除了这部分人外,陈独秀派并不这样想,尹宽肯定不是这样想,陈独秀以后事实证明也不是这样想,别的人至少可以说尚未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得知正统组织的意见以后,就不再谈统一问题了。

正统组织把这个问题报告了托洛茨基,刘仁静是托洛茨基的“通信员”,也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也知道了正统组织分裂的事实,于是他写信给正统组织,反对他们在统一问题上采取的错误态度。托洛茨基大意说: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组织继续分立下去,就要各自寻找理由,替分立辩护。至于陈独秀,则我看到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其中并没有什么违反我们的主张的话。陈独秀是老革命家,他知道什么是革命,你们年轻人

应当向他学习。以上托洛茨基书信,是我凭记忆写出来的,字句和原件当有出入。同一信中,托洛茨基还具体建议四派组织应当以平等的地位成立一个“协议委员会”,共同讨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十月派和战斗派自然欢迎托洛茨基这个建议。正统组织,即后来称为我们的话派的,是反对这个建议的;他们突然从正统的身份降落下来,同从他们内部分裂出来的两派平等相处,而且同他们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派,即后来称为无产者派的,平等相处,心有未甘;但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他们对托洛茨基也搞个人崇拜,同斯大林派对斯大林一样。至于陈独秀派,即无产者派,反应是不同的。彭述之和他的追随者得意起来了:托洛茨基制止了那些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的胡闹,而重视我们这批领导过革命的老干部,并不说我们是什么“机会主义者”,看哪,我们可以同他们平等协议统一了。彭述之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但他另有企图。他要假借平等协议的机会来达到他原先的目的,即以我们陈独秀派为主,吸收那些青年托派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其他的陈独秀派则没有这个另外企图。我们欢迎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愿意同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托派平等协议统一组织。陈独秀第一次同一批青年托派见了面,谈了话,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事后,他告诉了我们会面时的感想。他说,他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和建党时代同青年人谈话一般,尹宽同这些青年托派接触最多,拿他们同我们这些老气横秋的陈独秀派相比,更希望我们同他们统一起来。尹宽可能另有一种企图,如后来彭述之及其追随者所控告的,即认为在陈独秀派内他不能越过彭述之而充当领袖。彭述之已经造成那种形势,除陈独秀外他就是最高的领袖,他要代替陈独秀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在莫斯科时已经立下这个目标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可笑的目标,至少他是志大才疏的。我自己当时认为,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后,我们的陈独秀派组织如果继续下去不久也要消灭的。我当时同那些青年托派并无接

触,不过通过别人知道他们一些情况而已。

我们的委员会一致决议,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同其他三个托派一起协议统一。我们派出马禹敷和吴季严为代表参加协议委员会。

我没有过问此事,也没有关心此事。协议委员会经常开会,地方时常更换。我只觉得为什么那样长久不能达成协议。一次,吴季严来我家中闲谈时,感叹道:那些青年人将来可以做国会议员!他们很熟悉政治党派之间勾心斗角那一套!他没有说具体的事例,我也没有兴趣向他打听。

协议过程拖了很长久,没有进展。两个代表回到委员会来报告时,总是说,其他三派的代表提出一些不可接受的条件,以致协议不下去;他们没有统一的诚意。彭述之接着发表议论,赞助两个代表,陈独秀信以为真。

尹宽是常同那些青年托派接触的,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点协议的经验,渐渐地尹宽明白了,协议不下去,应当归咎于我们的代表,而不能归咎于其他三派。他自己在委员会争不过彭述之。他看见陈独秀蒙在鼓里,于是决定向陈独秀揭露协议的真相。可是,他没有办法同陈独秀单独谈话。他每次同陈独秀见面时都有彭述之在场。一九二九年春天,陈独秀搬了家,只有彭述之一个人知道他的家。要找陈独秀必须通过彭述之,尹宽没有办法。一天,凑巧,尹宽在路上遇着陈独秀,于是带陈独秀到尹宽自己的家里去,痛痛快快地把协议不能进展的症结向陈独秀揭露了。原来是彭述之操纵我们的两个代表在协议委员会上设置障碍,为的是达到以陈独秀派为中心来统一托派组织的目的。不需多说,陈独秀立刻就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和彭述之私人交情的转折点。从此时起,委员会每次开会都要吵架;陈独秀和彭述之的私人交情,也从此破裂,直到陈独秀逝世都未恢复。

我从未旁听委员会会议,但知道在哪里开的,开时吵得厉害。我们租了房子,叫马禹敷介绍的一个铁路工人王茨槐去住,王茨槐有妻有女,装成二房东。后来,王茨槐告诉我开会争吵的事。他曾提出意见,说争吵不好。彭述之回答说:第三国际开会也要争吵哩!他问我:陈独秀和彭述之是否属于不同的帮派?王茨槐参加过青帮,他知道帮派的斗争。

开会争吵结果,陈独秀和尹宽的主张得到胜利了。第五个委员罗世藩最后站在陈独秀和尹宽方面。罗世藩是马禹敷引进委员会来的,但他反对彭述之,这就决定了他的态度。两个代表撤回来了,陈独秀和尹宽亲自出马去参加协议委员会。从此,协议就一帆风顺了。

何资深代替吴季严做秘书长。马禹敷表示消极,不参加会议。彭述之是积极参加会议的,但每次都反对协议工作的任何成就,同时掀起了反对尹宽的运动。彭述之及其追随者不敢反对陈独秀,但集中火力反对尹宽。尹宽的作风也有很多不满人意之处。

协议委员会对于统一问题的意见趋于统一后,便成为统一大会的筹备机构了,尹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共同起草各种决议,讨论和解决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等。可是,到了选举大会代表的问题提出来,又遇着困难。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在青年托派中彭述之的名声也是很臭的。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陈独秀本人并不反对尹宽。我亲见江常师在我家里向陈独秀攻击尹宽,而陈独秀替尹宽辩护。在客观形成的局势之下,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代表名额大体是依照各派成员人数比例选出的,似乎是每二

十人选一人。无产者派和我们的话派一样多的名额，即各为六人。十月派四人。战斗派一人。无产者的六个代表是：陈独秀、郑超麟、王茨槐、蒋振东、江常师、彭述之。其中彭述之是最后算清人数，可以多派一个代表才加入的。我记不清楚他是否出席大会，即使出席，也是开幕以后何资深才送他去会场的。我们的话派的六个代表是：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两个香港工人，另有一个是谁我忘记了。其中宋敬修是代替楼国华出席的，楼国华的爱人阿凤（也是同志）恰于五月一日分娩。十月派的代表是：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罗汉。战斗派的代表是：来燕堂，本来派王平一，但王平一回山东去了，临时由来燕堂代替，也是开幕之后何资深送去的。

统一大会的经过就不必在这里说了。

大会选举结果，当选为委员的有：陈独秀、王文元、郑超麟、陈亦谋、宋逢春、濮德志，一个香港工人，宋敬修、彭述之。前七人为正式委员，后两人为候补委员。与彭述之票数相等的，还有梁干乔。于是，就梁干乔和彭述之二人重新投票，结果彭述之票数多于梁干乔票数，当选了。

按照陈独秀和何资深的安排，彭述之和尹宽二人都不让充当代表，更不让当选委员，可是彭述之有本事挤进代表，又有本事挤进委员了。

大会闭幕后次日或第三日，新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候补委员也列席。分工：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长，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王文元为机关报《火花》的编辑，宋逢春为秘书长。陈独秀主张王文元为宣传部长，我为机关报编辑，我认为宣传部长好做一点，机关报麻烦，就推掉了。

就在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演了一幕趣戏，我至今牢牢记得。会议快结束时，陈独秀拿出一封长信让大家讨论。那是彭述之写给他的信，大会开幕后他送给何资深，要何资深转交陈独秀的。在

信中,彭述之大骂此次统一大会,说这是分赃会议,等等。总之,他那时看出他已被排斥于统一组织之外了,连大会也不能参加,于是决定另立组织。这个致陈独秀信便是他的宣言。可是出于他的意料,交出这封信后他竟获得了参加大会的资格,而且被选举为候补委员!他无法收回这封信。

大家传观了这封信之后,陈独秀便问彭述之:“你现在是不是坚持信上说的意见?”彭述之坐在椅子上,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还是我出来帮他的忙,说几句打圆场的话,让他过关去了。事后何资深批评我:“政治斗争不坚决。像彭述之这样的人,有了这个好机会,应当在政治上把他打下去。”何资深这个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这件事情,我首先联想到的,倒不是何资深这个不无道理的批评,而是觉得彭述之太无能了。如果尹宽处在这个地位,决不会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尹宽会泰然处之,会振振有辞,以攻为守。那些青年托派同尹宽打了很多交道,对于尹宽这个人的认识同我对他的认识差不多。我常说尹宽是 Sophiste(诡辩家),有本事把是说为非,非说为是;青年托派则说尹宽是 Cyniste(犬儒主义者),都不十分恰切,但犬儒主义者可以包含诡辩家,比较恰切一些。什么叫做“犬儒主义”?我们心知其意,但很难以汉语表达。汉语有“玩世不恭”的成语,可以表达犬儒主义一部分的意义,但不能表达其全部的意义。同一件事,尹宽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说来说去都有道理。我往往为此拍桌子同他大吵。青年托派对尹宽的感想都不好,但他们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尹宽还是会坚持原则,可以信赖的。他的后半生以事实证明了人家对他的信赖:哪怕他有时不得不耍些花腔,做些令人不能满意的动作,但至死他仍保持他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念。

那几年,即从开除以后到被捕以前,尹宽的生活费用是哪里来的呢?我本来知道,但写此回忆时完全忘记了。以后看到汪原放

写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才想起来。原来,尹宽的生活还是陈独秀替他安排的,陈独秀介绍他给亚东图书馆译书,亚东老板汪孟邹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尹宽按月交译稿,亚东按月付稿费,书译齐后,亚东并不出版,把译稿搁置起来。这是那时出版机构常有的事情。

书名《现代文明史》,法国历史家薛纽伯著的。他著了一系列的《文明史》,这是其中一本,约有三十万字,陈独秀曾译了几章发表于《新青年》上,尹宽在国内就看到了,很欣赏。他来法国就买了一本,而且介绍我看。我翻了一下,没有兴趣看下去。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买的法文书中的一本。他在那篇交代材料中说,他被欧阳泽说服后,“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新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把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这本法文《现代文明史》就是那些名著中的一本,他当时不见得读完这本法文书。我既未读这本法文书,也未读尹宽的译本,因为译本是一九三三年才出版的。那时汪孟邹已把亚东交给汪原放经营,自己退回绩溪老家去了。

汪原放说:“记得有一次,我去牢里看望陈仲翁,谈起要出《现代文明史》,要加一篇序才好。他说:‘那本书可出,序,我想,可以请高一涵先生写一篇,一定妥当。’我回上海,找到一涵先生,他果然一口答应,由邮寄了一篇给我。后来高语罕先生看了高一涵先生的序,又加了一篇,放在后面。仲翁说,王慧琴的译笔是很不错的。我问起前面有几章是仲翁自己译过发表在《新青年》里的。他说,不错,可是他要王先生译成,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有工夫来译完它了。”

汪原放这段记载引起了我的记忆。我记起了,那几年中尹宽曾来问我,他要译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何处可以买到此法文书(尹宽自己在法国买的书,当然遗失了)?我说上海是买不到的,除非去法文图书馆借。当时法租界有个半官方的“法文学会”(Al-

liance Francaise), 内设一个法文图书馆, 可能有此书。当时, 我自己未曾入会, 不能去借书, 但王独清入了会的。尹宽于是找王独清, 王独清便介绍他入会, 付出会费十二元。他借到书后便不去还了。

这是尹宽一生翻译的唯一的法文书。出版时, 我关在国民党监牢内, 出版后, 我也没有弄一本看看。

我们的统一大会是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日开的。统一组织成立之后还不到三个星期, 各派的基层组织还来不及合并起来, 便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整个统一的委员会, 几乎全体被捕了, 除陈独秀及两个候补委员以及不在上海的香港工人之外, 都被捕了。这是叛徒马禹敷告密的。我们由租界引渡去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一共八个人: 郑超麟、何资深、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陈亦谋、江常师、楼国华。

我们关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候审时候, 八月间, 又有一批人被捕送到龙华来; 尹宽、宋敬修、蒋振东、刘义, 及一个或两个工人同志。

我没有同他们关在一条弄堂, 根据同他们关在一条弄堂的人说, 他们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这批人被捕之后不久, 陈独秀便出来收拾残局, 与彭述之、宋敬修这两个委员组成一个领导机关, 似乎增补了新的委员, 但尹宽不在内。尹宽于是联合几个干部打算另立一个委员会, 在福州路一个旅馆开会。彭述之知道了, 派宋敬修去制止。到会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奸细, 于是一网打尽。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可是以后好多年, 我同蒋振东谈起此事, 蒋振东否认这个说法。他说, 那次开的是建立沪西区委的会议, 预先报告了领导委员会, 彭述之才派宋敬修来出席的。蒋振东没有理由说假话。事情真相究竟如何, 已无从查考了。

我们一案十一月间判决解往漕河泾模范监狱后, 尹宽一案尚未判决。以后, 我知道, 尹宽和宋敬修判了徒刑, 也解到漕河泾执行, 刘义、蒋振东及其他的人则释放了。

我们是军法判决的，关在司法监狱，属于寄押性质，按规定以后要解往军人监狱的（但有时长期寄押在司法监狱）。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战争，十九路军派了一个副官协同漕河泾监狱把犯人解往杭州。在集合过程中，王文元、楼国华、何资深和我，赶紧凑在一处，一起排队，一起钉镣（两人共一副脚镣），站在大院子里等待其他犯人出来。此时濮德志已经活动出狱了，但陈亦谋、宋逢春、江常师、尹宽、宋敬修不知何故没有同我们会聚在一起。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队伍。我们看见他们从里面走出院子来。我只看见尹宽，但别人也看见其他的人。我只看见尹宽，不仅因为他个子高，比别的人高出一头，而且因为他利用这个群众场面鼓动群众。监狱当局早把犯人的存款，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想不到这天全体犯人解往他处。犯人要求发还存款才肯离开监狱，可是监狱拿不出钱来。监狱的会计，一个胖子，在院子里急得满头大汗。监狱长也在院子里，比较镇静些，答应我们到了杭州以后便把钱寄去。犯人不依。尹宽排在后面，便大声说几句话，大意说非要监狱立即还钱不可。十九路军的副官也在院子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立在前面的犯人便告诉他这件事情。也有人说：监狱长贪污，把犯人存款吞没了。于是监狱长出来说话，他不多谈存款的事情，只一手指着天上说：看哪，日本飞机在上面盘旋，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人站在院子里，非常危险，必须立刻离开，不要再耽搁了，一切其他事情都好办，钱一个铜板不会缺少的。十九路军副官于是下出发的命令。我们到了杭州不久，存款还是如数寄还我们的。

我们在新龙华车站上车，到杭州车站下车。后上车的队先下，先上车的队后下。尹宽和别的同志走在我们前面。他们先进入杭州的军人监狱。我们到时，监狱已经满额了，我们被带到西湖边有名的昭庆寺一个大殿内去关押，约有二百多犯人。昭庆寺大殿当然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属于临时收容所的性质。

我们寄押在昭庆寺，尹宽等人寄押在监狱，完全是偶然的，但

这偶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我们在昭庆寺住了一个多月，便经过运河解去苏州军人监狱关押，我们以后都活着出狱了；但他们到上海暂时平定后又由杭州解回漕河泾模范监狱去。军人监狱当然恶劣，但同司法监狱（我说的是漕河泾模范监狱）比较起来，不啻天堂。陈亦谋不久就病死了，宋敬修也病死了，以前反对派同志区芳和葛崇镛也病死在漕河泾狱中。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至于宋逢春和江常师，则亏得家属活动，很早出狱，否则也要死在狱内的。

尹宽怎样保外，出来怎样活动，以后又怎样进去，那时我关在中央军人监狱中，不知道。一九八二年秋，我请蒋振东就所知写给我。他尚未写完尹宽保外的经过就中风死了。这篇东西成为他的绝笔。现在抄录如下：

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尹宽要保外就医，叫我找一个保人，我就拿他的信去找金鸿图。此时金鸿图已经不住在提篮桥西牢背后而搬去韬朋路底一个新造的弄堂了。我找到金鸿图，同他商量找保人的事，决定找朱英如为保人。朱英如的丈夫沈天觉开了一间小机器店，只有一间门面，做的是铣床活。金鸿图的老婆阿珠出面说话，朱英如夫妇都很热心，答应作保人，立即盖了图章。保单交上去后，就来对保，不久尹宽就写信给我说某日可以出来，叫我去接。我先去徐家汇红卍字小学找到赵济的爱人，然后找到赵济，告诉他尹宽出来的事。赵济给我几元钱作费用。到约定的一天上午，我去漕河泾监狱旁边一家小茶馆等候，大约十一点钟，尹宽扶着墙壁艰难地走到茶馆来了。他喝了几口茶，我们便坐了两部黄包车先到徐家汇，再换车到我家里。我把赵济的信和钱交给他，金鸿图来看他，谈了别后的情况。

尹宽在我家中住了两天。他的身体实在太坏，要我

送他进医院。我送他进一家天主教办的医院，住三等病房，一共只付了十元，没有钱再付，只好说候家里寄钱来付。他住了两个月左右，欠了二百多元，心里很着急，向组织要钱。陈其昌答应送钱来，但始终没有送来，最后连人也不来了。

怎么办呢？他和我商量，只有逃走。星期日上午，医生、看护、办事人都去隔壁教堂做礼拜了，尹宽就逃出医院，身上还穿着医院的衣服，他住在我家，华盛路同乐坊，一间前楼。

尹宽住了几天，准备回桐城老家去。忽然，监狱的医生来保人家里，催促尹宽回监狱去。朱英如找到金鸿图，金鸿图到我家里来。尹宽非常着急。我们商定尹宽先开一间旅馆住下，再去疏通保人。我们在三马路源源旅社开了一个房间，我随即去找赵济，赵济来旅馆看尹宽，并给尹宽一些钱。我到朱英如家里去，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朱英如夫妇不在家。我赶回旅馆时，尹宽又失踪了。我回家才知道尹宽被保人押回保人的家。我在朱英如家里看见尹宽躺在床上，他告诉我完全是金鸿图夫妇捣鬼。我去金鸿图家，他们已经睡了，我责问他们，他们无言可答。

次日，我去朱英如家看尹宽，尹宽笑嘻嘻地告诉我：他同朱英如商量好，去买通监狱医官这一关。一天，大概是星期天，上午，我买了四样礼物去漕河泾监狱附近那个医官家里，医官非常客气，随即把四……

蒋振东在此处绝笔。用不着说，医官收了那四样礼物，就不来催促尹宽回监狱去了，尹宽也就不必回桐城老家了。蒋振东这个回忆，细节上可能有错，尹宽保外的时间也可能早于一九三四年八九月，以后也许有史料来纠正的。

尹宽病好以后,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参加了“区委”,在区委中同陈其昌发生矛盾和斗争,又同陈其昌一起同葛拉斯和刘仁静支持的一批新干部发生矛盾和斗争;他又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同人家进行论战;他团结和说服一些干部跟着他走;最后,他又被国民党捕去坐牢了。这一切蒋振东是知道的,可惜他死了。

我看到两个历史文件,都是尹宽写作而有几个人签名的。一个是写给监狱中的陈独秀,向陈独秀控告陈其昌的,其中列举了陈其昌的缺点或过失,要求陈独秀撤换他或不要支持他。后面有七个人签字。另一个是提出不同的政治的路线,即使不是请求陈独秀批准,至少也是给陈独秀参考或征求陈独秀意见的。后面有八个人签字。这两个文件都不长,签字的人有“东”(蒋振东),“希”(贺希),“商”(商吉士或别的字,即尹宽),尹宽签在最后,表明文件是他起草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手中时恰逢我忙于别的事,没有抄录下来。由这两个文件可以知道那时托派的主持人还是在监狱中的陈独秀所任命或支持的,他们实行陈独秀的路线;又可以知道尹宽反对这个路线,也反对陈独秀所支持的陈其昌。文件一般是通过陈其昌送入监狱给陈独秀的,但反对陈其昌的文件如何通过陈其昌送去呢?于是尹宽决定派贺希去南京见陈独秀。我从其他方面知道贺希曾去监狱见陈独秀。蒋振东完全忘记了这两个文件,忘记了怎样讨论,怎样签名的,但他记得尹宽曾派贺希去见陈独秀。我不知道此次交涉的结果,但显然可见陈独秀并未接受尹宽等人的意见。尹宽为路线和陈其昌事,同陈独秀办交涉,决不止这两个文件所记录的,因此到最后陈独秀大发脾气,在监狱中声明:他永远不再同尹宽合作。^①抗日战争后,我同尹宽见面时,直至狱内谈话,尹宽都不再提陈独秀,不得不涉及陈独秀时他也未曾表

^① 陈独秀出狱后,从武汉写信给陈其昌等的信,也说:“关于老彭和长子(按: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合作,况且意见相差甚远。”

示好感。

但尹宽还是同陈其昌一起抵抗刘仁静所支持的一批青年托派的攻击的。不知道是陈独秀被捕以前还是以后,有个南非籍的记者葛拉斯来到上海,以后做了《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他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同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经常通信。不知怎样,他同刘仁静和陈其昌很快取得联系了。他说服了伊罗生从第三国际转到第四国际。他介绍刘仁静去帮助伊罗生搜集和翻译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史料。伊罗生还拿出三百元帮助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一个印刷机关。葛拉斯联合陈其昌、尹宽以及从北平南下的几个青年学生(斯潮生、刘家良、王树本、扈文章)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机关,葛拉斯本人也在内,陈独秀自始就不信任葛拉斯,叫陈其昌等人不要同葛拉斯往来。陈其昌会说英语,接触久了,知道葛拉斯是好人,同意参加了新的机关。尹宽对葛拉斯很有兴趣,他不会说英语,便拉邮局一个朋友做翻译去同葛拉斯说话。有人说,每次尹宽都是向葛拉斯要钱。据说那个印刷机关就是尹宽建立起来的。

北平南下的青年人是接近刘仁静的,刘仁静自始就反对陈独秀,在组织上和路线上都反对陈独秀。他当时住在北平,似乎本人没有参加新的领导机关,但通过那些青年人去影响新的领导机关。如此组成的领导机关,不久就发生内部斗争了。那些青年人反对陈其昌和尹宽,最后反对陈独秀,葛拉斯支持他们。他们占得多数,终于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以及其他的老托派。但陈其昌、尹宽以及其他的老托派不理睬他们。他们要印刷机关,但陈其昌、尹宽以及负责印刷工作的同志不肯交出。双方互相攻击。一九三五年某月,由于叛徒告密,这个由青年托派控制的领导机关便被国民党逮捕了,连远在北平的刘仁静也被逮捕了。他们都解到南京去。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四个青年托派,刘家良判了七年,其他三人判了五年。

我在中央军人监狱看到了王树本、扈文章、斯潮生三人，同他们谈了话(但未看到刘家良)。他们告诉我内部的斗争和分裂，特别攻击尹宽和陈其昌，说尹宽霸占了印刷机关。

这些青年人被捕之后，托派组织仍旧归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葛拉斯又同他们合作了。

尹宽从事于内部工作和斗争之外，还对外进行理论的斗争。当时所谓“社会史论战”已经过去了，但开始了农村经济性质的论战，在此论战中代表托派立场的就是尹宽。不久之前追悼孙冶方的文章中有人说孙冶方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农村》(或别的刊名)同托派作理论的斗争。孙冶方的对手就是尹宽。尹宽通过蒋振东的一个什么关系认识了《中国农村》杂志的一个编辑(蒋振东说是薛暮桥，恐怕记错，似乎是王宜昌)，因此写了好多篇文章在那个杂志上发表，似乎以商吉士为笔名。我从未见过这个杂志，更未见过尹宽的文章，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但要研究尹宽这个时期的思想，是应当分析这些文章的。今天肯定能在大图书馆找到《中国农村》旧杂志。

近日，我终于在图书馆找到旧杂志《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看到了尹宽的文章，文章题目为《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署名“王景波”。

出乎意外，我发现这篇文章写得好。尹宽的文章，我看了不少，但从未看到写得那么好的文章。为了纪念尹宽，今天应当重新发表他这篇文章。

无论枝节上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妥当，但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他完全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去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以至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当时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早已过去了。这个论战是在尹宽以及我们这一案的人被国民党逮捕以后才开始的，我们自然无法参加。陈独秀和彭述之虽尚未被捕，但他们忙于更重要的恢复组织和领导现实斗

争的工作,无法参加。代表托派参加此论战的,是一些游离的分子,如任曙、严灵峰之类;刘仁静也参加,但那时他尚未加入组织。总之,这些参加的人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这些人都未抓住论战的要点,姑不论说了许多错话,授人以柄,而且相互间打起来了,让人耻笑。社会史论战中所谓托派的言论,没有丝毫增加托派的光荣。

尹宽则是抓住论战中心的。中共党员根据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路线,高潮时和失败后的路线,强调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之不得不强调中国经济上的封建的落后的成分,说到农村经济时特别要强调这种成分。他们完全忘记了整个世界处于什么时代,中国又处于什么地位,那些封建的落后的成分,在此情形下又含有什么新的性质。

尹宽明白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不跟着别人说“半殖民地”,并非因为他不知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区别。这区别,在讨论另一类问题时是重要的,在讨论中国是否资本主义问题时则不重要。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进行得更加迅速。《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起初确是摧毁资本主义以前一切生产方式的,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则于摧毁旧的生产方式之外还可以利用旧的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服务。所以强调中国尤其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并不足以否定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就是叫我们于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时,不要单独就中国一个地方来看,而应当根据时代和世界来看。这就是国际主义的观点。

资本主义利用以前的生产方式来剥削人民,这话不是尹宽独创的。正在我们坐牢时候,上海的新生命书局(蒋介石出钱,周佛海当编辑的)翻译并出版了列宁著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俄国民粹派也借口俄国农村的封建性、落

后性,认为俄国还没有资本主义,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例如,他们说,俄国的富农使用雇农劳动,而雇农自己有一小块土地,受雇做工不过贴补家用而已。列宁回答说:“这些都是无产者,不管他们在法律上拥有一小块公社分地,他们事实上就是富农的日工、牧人、佣仆。”

尹宽的文章是作为“读者园地”发表的,即现在说的当作“反面教材”发表的,发表它,是为的批判它。第一卷第十二期果真发表孙冶方一篇针对尹宽的长文章了,孙冶方引经据典反驳尹宽,但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利用旧时的剥削方式的事实。他而且从《资本论》或马克思其他的著作引出实例。欧洲资本家到非洲去经营种植园,用的还是奴隶劳动呢!但孙冶方还是强调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因为这是“辩证法”。中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孙冶方的文章重新发表在前几年新出版的《〈中国农村〉论文选》内,但他批判的尹宽文章则不再发表。

尹宽被“驳倒”了。托派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都被“驳倒”了。于是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都以托派“失败”而写入历史。这“失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以前未经人指出。这就是社会性质论战掩盖着另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论战,而后一个论战是不能在公开的出版物上进行的。

原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其进行中和失败后,向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次革命以及失败后将要起来的革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呢?换另一种话来说,即:革命胜利建立的政权,究竟是工农民主专政呢,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革命中以及革命失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当权派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双方争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进行反对派运动,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苏联是公开讨论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但在国民党的中国则不能公

开讨论。于是只能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上讨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同的问题。论战双方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争论的是革命性质问题，于是都在社会性质问题上钻牛角尖，说了许多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尹宽的文章却未曾忘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只证明了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就够了，不必多费力气去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封建的剥削方式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但尹宽文章的结论已经足够证明中国革命所要推翻的绝不是封建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了。

但问题还有另外的方面，即：决定革命性质的，不仅有一国的社会性质，还有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发挥了。

尹宽没有写文章回答孙冶方的反驳，也许写了，《中国农村》不登，现在没有办法查考了。尹宽这篇文章写完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此时，他一面写文章同党外的人论战，一面在党内进行工作，同自己的人斗争。这后一方面，我们只得到一些零星的材料，例如他团结七八个人，签名于两个文件上，送给南京监狱陈独秀看。幸而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公开后传出了托派临时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次会议的记录，其中记了尹宽的几次发言，足以窥见尹宽当时活动和思想之一斑。

我上面说到刘仁静遥控下的青年托派组成的中央，同尹宽和陈其昌发生斗争，开除了他们，不久这个中央就给国民党破获了，直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晚上，葛拉斯才联合尹宽、陈其昌以及其他的人，在葛拉斯寓所召开一次会议，成立新的中央。葛拉斯当会议的记录，用英文记的。这记录保存在托洛茨基的哈佛档案内。

到会的有：王凡西，陈其昌，尹宽，蒋振东，贺希，邵鲁，李福仁。晚上七点十分宣布开会，选举王凡西为主席。议事日程有好几项，其中与尹宽有关的有如下几件事：

关于选举中国同志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问题。

尹宽发言：他从刘家良的老婆那里得到消息，说刘仁静已经自首，转送苏州反省院，不久可能获释。他已声明自愿投降国民党，虽尚未有确证，有些同志已不愿选举他参加总理事会了。

于是大家讨论可否选举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曾来信，说他要同那些反对陈独秀进总理事会的人作斗争，尹宽问：此事，是否已写信给国际？李福仁回答：就他所知，尚未写过这样的信，不过托洛茨基同志知道过去曾有人反对陈独秀，为此无疑他才预先说要同那些反对的人作斗争。虽然存在这些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旧坚持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

尹宽发言：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果只为他的威望和影响力，那就欢迎他作候选人。但我们应当讨论他的政治意见，判断他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为了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

陈其昌发言：中国同志中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分别两个问题：一、我们要不要选举陈独秀进总理事会；二、陈独秀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接受不接受他的提名。

尹宽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同时我们告诉托洛茨基：我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陈其昌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提名陈独秀为总理事会候选人，不管陈独秀与我们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们必须仅仅从第四国际的大原则来考虑这个提名。”

李福仁发言：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因为我们的立场的方案尚未定出。这个决议案只能简单赞成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无任何保留，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陈独秀，尤其在我们尚未将我们的立场规定下来以前。这个决

议不需要附加什么保留,对于这个提名,我们只能表示赞成或反对。

尹宽重申他的意见: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争论可于最近解决。

有些同志反对这个附加的条件。

李福仁发言:尹宽好像以为接受了陈独秀的提名就是接受了陈独秀的各方面的意见。这不是一回事。

李福仁再提出决议草案:“赞成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宽发言:如果委员会举行表决,那还得让全体同志批准。

于是就“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四票赞成,三票反对,赞成者:陈其昌、王凡西、邵鲁、李福仁。

这一项议程结束以后,讨论其他议程时,尹宽也有发言,但我不能多引了。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

首先要选出一个书记兼会计。陈其昌提议选李福仁;李福仁推辞,说应当选一个中国同志。如果选他,也要另选一个同志做他的副手。这意见没有被接受,于是有人提议书记和会计分为两人。

贺希主张尹宽作书记,李福仁作会计。陈其昌主张李福仁作书记,因为书记要能团结所有的人。于是问题转成为:书记究竟是干什么的?是政治代言人呢,还是做技术工作,如写信,记录之类。王凡西认为书记是做技术工作的,不是掌握政治路线决定权的。讨论结果举行表决:李福仁得三票(尹宽,陈其昌,邵鲁)当选书记兼会计,尹宽得两票(贺希,蒋振东)落选。

其次要选出一个宣传委员兼《火花》主编。王凡西得四票(陈其昌,邵鲁,李福仁,尹宽)当选,尹宽落选。

其三要选出《斗争》主编。邵鲁提陈其昌,蒋振东提尹宽。陈其昌得三票(李福仁,邵鲁,王凡西)当选,尹宽得两票(蒋振东,贺希)落选。

表决之后,尹宽提出责问:为什么要选举陈其昌?这个表决是否算数?陈其昌是不能胜利《斗争》主编的,因为他从未发表政治意见。你李福仁为什么要投陈其昌的票?

李福仁回答:根本不应当要求一个同志说明他投票的理由。既然要求我说明了,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理由。我是根据过去我同这两个同志的接触来投这一票的。几个星期以来,尹宽同我和别人谈话或通信时总喜欢宣传他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组织的意见。至于陈其昌,他如果不能胜任他的职务,则我们可以撤换他,如同撤换其他当选的人一样。现在陈其昌已经当选了,尹宽就应当忠实地就力之所能同他合作。尹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蒋振东发言:这里牵涉到两条路线:布尔塞维克和孟塞维克。

贺希发言:应当根据政治观点来挑选《斗争》的主编。李福仁应当根据这两个提名人的政治意见的是非来投他的票。

李福仁回答:我没有很多机会来仔细了解这两个提名人现在的政治意见,但我很清楚记得他们在几个月以前政治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办法在政治方面分出是非,只好根据别的因素来决定取舍了。

其四要选举组织委员,有三人被提名:邵鲁、尹宽、贺希。结果,尹宽以三票(陈其昌,邵鲁,李福仁)当选。

书记兼会计,宣传委员,《斗争》主编,组织委员四人组成常委。

以上的材料是难得的。我从中摘引了许多与尹宽有关的文字,不必加以评论。于此可见,尹宽保外就医这个时期,并未在那里养病,他仍在活动,斗争,对外的和对内的斗争。难怪此次会议之后不久,他又一次被捕入狱了。

最后,结果这个时期的生活,尹宽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了。我过去知道,他同贺希,邵鲁一起被捕,一起出来。去年秋天,打听到贺希地址,蒋振东写信给贺希,要贺希写这件事的经过。贺希有

病,得信后拖了一个多月才回信,回信到时蒋振东已经死了。我以后写信给贺希,至今未得回信,大概贺希也死了(已经确知贺希在今年三月间死去的)。今将贺希信中有关此事的一段话抄录于下:

老尹被捕,先于我一个多星期。他和邵鲁在小赵家中吃过午饭后一同到文庙去玩,他们早被敌人盯住,就被捕了。一个多星期后,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去闸北鼎鑫纱厂看朋友,刚走上造币厂附近苏州河大桥,后面跟上来的家伙就把我抓了。先关在闸北公安派出所,后解到市公安局,在那里看见了老尹和邵鲁。大约又过两个星期后,一天深夜,我们解到南京,我和老尹一直住在一道。老尹时常生病。我也发了一次高烧,以致壮年(二十九岁)就耳聋目盲,一生病痛。……

贺希说了他们被捕的原因:

罗章龙派在上海的两个干部(寒君、李平)带着一批为数不多的人参加了托派。其中有个在申新九厂细纱间做加油工的,叫“泰安小李”,是个奸细、叛徒,我们却特别看重他,培养他成为积极分子。老尹同他谈过几次话。老尹被捕后,敌人问他:曾给什么人一本小册子?于是老尹想到这个人叛徒。我经过回忆,也同意了。我释放后到了上海,小赵告诉我:我们被捕后,小李也无人理睬,才感到对不起我。这就是铁证!我们被捕是泰安小李出卖的。

贺希没有提到他们未曾判刑,而是解反省院的。尹宽此次被捕,恰值他的“二农”同学何其巩做了北平市长,他写信给何其巩求援。据说,何其巩帮了忙,设法让尹宽去住反省院。连带地贺希和邵鲁也去住反省院了。国民党把政治犯不送去监狱而送去反省院,一般是为了“优待”叛徒或“悔过者”的。但有例外,有势力的人来援救,国民党不能不买账,但又不愿无条件释放,往往就送去反

省院。可能需要犯人有书面的悔过表示。尹宽等三个人去反省院就是属于例外一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写了什么书面的表示，但事实上都未屈服。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着一个朋友，他是通过家属活动，调去反省院，经过半年出来的。他同尹宽关在一起，很佩服尹宽。他说，一天犯人起来同管理人员斗争，尹宽一面吐血，一面鼓动群众上去斗争。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两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这两人说的是哲学、政治的问题。我又看了尹宽的文章，但说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固然说的不是革命的道理，但也未曾说反革命的道理。

关于出狱事，贺希信中说了如下的话：

最后结果，是邵鲁最先释放；老尹在释放政治犯前不久因吐血而被保释；剩下我一人，到释放政治犯时才出来。

贺希老年回忆未必完全可靠。关于出狱事，我听尹宽说的和贺希自己说的，与此回忆都有出入。尹宽告诉我，他是南京快沦陷时才释放出来的，他立即渡江乘车去合肥，住在一个小旅馆，然后去合肥的汽车站，打电话给安庆汽车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的朋友设法让他能回安庆去。他的朋友接了电话，告诉他合肥车站最后一辆车几分钟后就要开，以后没有车了，他要来安庆就要立刻坐上车去。于是他穿着汗衫短裤上了车，把放在小旅馆的东西都丢弃了，贺希则告诉我，释放政治犯时他同邵鲁一起跟着别的犯人到中共招待所去，到了招待所，别的犯人便告诉那里的负责人说：这两个是托派，不是我们的人，于是贺希和邵鲁被赶出来。可见没有邵鲁先释放，尹宽被保释的事情。事实真相如何，现在已无从查考了。

贺希回到上海，上海的组织知道尹宽活着出狱，估计他回桐城

老家去,但得不到他的音信。一九四〇年,我回到上海,遇着蒋振东,问起尹宽的消息。他说:尹宽以前给了他桐城老家的地址,他藏在房里糊墙纸隙缝中,以后找不到了。我在“一二八”战争后解往杭州时见了他一面,至此多年看不到他,想他是老肺病,恐已不在人世了。

直至日本投降后两年,即一九四七年,我们才突然收到从桐城写来的信。原来,日本投降以后第二年,彭述之筹到一笔款办一个公开的杂志,名为《求真》,拉拢了几个名流写文章,都署真名,连李季的文章也署真名,但彭述之自己的文章则暑假名。在第一期或第二期上彭述之发表了一篇论老子的文章,李季次期便写一篇文章批评彭述之,彭述之来一个反批评,双方争论起来。在那个形势下争论老子问题,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可是尹宽在桐城看到了《求真》杂志,他由这几篇文章看出这个杂志同我们有关系,于是按照杂志的地址写一封信给李季,请李季转交我们。他给了我们以他的地址,并劝告我们不要同李季辩论,伤了朋友感情。他把彭述之的无聊文章当作托派的共同意见!我们立即写信给他。我和蒋振东两人凑了十元(不知当时多少钱,但价值约等于抗战前的十元)寄给他。由此就联系上了。我们以己度人,总是认为尹宽一定在家里等米下锅的。以后才知道他并没有我们在上海那样穷。他当时做了桐城简易师范的校长,又做了桐城县参议员。我同过去见面时一样吵吵闹闹,写了一封信去讽刺他做了国民党的官。处在他的地位,校长我可能做的,但决不可能做参议员。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同我辩论。

不久之后,他就到上海来了,住在蒋振东当校长的中陆小学,同我们老朋友都见了面。此时他才知道我们组织早已发生分裂,我和蒋振东都不同彭述之往来了。我们让他了解这个分裂的理论和政策方面,以及人事关系方面。蒋振东特别告诉尹宽,他亲自从彭述之听来的话:一次,开会时候,不知怎样谈起尹宽,彭述之郑重

声明说他以后无论如何不愿意同尹宽合作。我上面曾说陈独秀声明过他以后不愿意再同尹宽合作。彭述之也作了这个声明。我本人始终对尹宽保持好感,但对他也有反感的时候。

尹宽这次来上海,不待说也同彭述之见了面,从他听到他们对于此次分裂的说明的,但我没有留下记忆。我后来想起尹宽此次来上海知道了分裂的事实,也听到双方对此分裂的说明,可是他没有明白表示态度,或者说,他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我们听来好像他是站在我们方面的。

以后尹宽就回桐城去了。不久,他当校长的那个师范学校闹了学潮,学生赶走他,他把学生散发的油印传单寄给我,不附一个字。传单写得很长,其中骂“托匪尹宽”。我不知道反对尹宽的群众是国民党唆使的,还是共产党唆使的。一九四八年夏他再来上海时也不愿意说这个问题。

一九四八年夏某一天,完全出于我们意外,尹宽跑到上海来了,仍旧住在中陆小学。他不说来的目的,我们也未曾联想到彭述之一派的所谓“建党大会”上去。我们早知道他们在筹备大会,他们也把大会主要文件的草案寄给我们看。当时我生伤寒病,住在医院。王凡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针对着彭述之起草的所谓“党纲”。我忘记了尹宽来时我是否病愈出院(这是可以查考得到的)。我们绝未怀疑到尹宽会去参加彭述之派的大会。有几天,他一早离开中陆小学至晚上才回来睡觉。最后,他约王凡西、蒋振东、楼子春、何资深到我家里来会面。那时,我已经出院,在家里静养了,他告诉我们这几天他参加了彭述之派的大会;他详细说了大会的经过,以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又推举为宣传部长,与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等组成“常委”,等等。他说,彭述之、刘家良等人要所有代表都反对你们,但他们达不到这个目的,代表中仍有人赞成你们,而他尹宽也曾发言说王凡西写的对彭述之纲领草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能置之不理,等等。听了尹宽这一透露之后,不知道

别人有什么感想,我只觉得一阵恶心。……以后,尹宽就搬出中陆小学,住到彭述之给他安排的房子去了。彭述之还介绍他去上海某一高等学校教书。虽然如此,他还是常常到我家里来,把彭述之方面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我们。……我对他已经不是无话不谈了。当时第四国际开了世界大会之后不久,寄了一篇大会宣言给我们。我不顾大病初愈,尚未复原,便翻译起来,但不让尹宽知道我在翻译。他们方面也收到这个宣言,但因只有法文本,便交给“宣传部长”自己去翻译。尹宽告诉我此事。我说:“好么,你去翻译,将来我可以看看。”我很快就翻译好了,而且油印出来,尹宽才停止翻译下去,他辛辛苦苦译出的部分只好作废了。

但不久,尹宽便同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发生冲突了。无论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以至于个人生活方面,尹宽和彭述之怎么能够合作呢?尹宽在此问题上太不慎重考虑了。但如此迅速发生冲突,也是出于我的意外的。我们也不理尹宽,他只好回桐城去了。一九四八年底,彭述之派领导机关决定搬去香港时,刘家良曾写信去桐城,要尹宽一起去香港,尹宽置之不理。

事情过了以后,我想尹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以为聪明,有权术,而其实是很蠢的。这就是好多人说的他的“犬儒主义”!我不值得为此生气。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夏末秋初,他从老家运了一批农产品去芜湖或南京出卖,得了钱又到上海来找我们,仍旧住在中陆小学,我仍旧像老朋友一样招待他。他准备长住上海,但不愿住在中陆小学,要我设法让他住在王凡西家里去。此时,王凡西已经去香港了。这怎么行呢?我没有帮他这个忙,他只好回桐城老家去了。从此他和我们断了联系,他不写信给我们,我们也不写信给他。

一九五〇年,如果不是更迟些,何资深不知从何处听到一个消息,说安徽桐城有个老头子,公开向群众批评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拿他没有办法。何资深说:不会是尹宽吧?我也不能判断。我

至今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老头子,他是不是尹宽。

就在这一年,或更迟些,中陆小学收到了尹宽的女儿一封信,说她的父亲到上海去了,但身上衣服很少,希望我们在上海照顾他。我们由此信体会出尹宽被捕了,已经解来上海。其实此时尹宽尚未解来上海,还关在合肥。

近年,我听到一个传说,关于尹宽怎样被捕的。据说,一九五〇年某月,毛泽东来安庆视察,地委书记向他汇报,中间谈到桐城县有个老头子自称是周总理的老朋友,说了许多怪话,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旁,便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地委书记说:叫尹宽。罗瑞卿说:我们正要找他。于是尹宽被捕了。看来何资深听到的那个消息是有根据的。不过以后尹宽在狱中同我见面,也曾说起他被捕事,但未涉及这个传说。也许他自己不知道。尹宽喜欢告诉人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则是事实。他本来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一九二三年春我们一批人去苏联后,西欧的“少年共产党”组织就是周恩来和尹宽两人领导的。但在共产党统治下何必抬出这个关系来呢?五十年代下半期,我关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一天开出独居囚室去理发,理发犯趁看守不在旁边,悄悄地问我:“你就是周总理的老朋友么?”于是我明白理发犯误认为尹宽,而尹宽喜欢告诉人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这是后话。尹宽后来告诉我,他在桐城老家被捕后就解到合肥来,在合肥关押很久,才解来上海,关在华东公安部的看守所,以后转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他在合肥吃了苦头,两手反铐很长时间,吃饭靠人喂,大便靠人揩屁股。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已经三年半了,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看守来通知我“收拾东西”。我把随身的衣物包好,看守来开门,帮我拿东西,从三楼走下来。到二楼,我忽然看见尹宽,走在我前面,他的东西有另一个看守拿着。我们对看一眼,不敢打招呼。这是三年半以来看见的第一人。

到了楼下大厅,办理手续,我们虽站在一起仍不敢说话。上了吉普车,开到看守所大门以外,我们才说起话来。起初,押车的看守还要干涉,以后就不管了。我们不知道解往何处,但估计不是去枪毙。吉普车开进了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在收发室办了很久的人监手续,然后被送往一号监去。尹宽告诉我,一号监关的都是重刑犯。他也曾在这里关押一个时期的。我们被带到三楼,起初分住两个囚室,约三个钟头,后来我和他同住一个囚室。我们谈话一直到深夜,最后二楼犯人出声干涉,我们才停止谈话。次日早上,我们又被拆开,从此就没有机会同住一个房间。这日早上,我们看见几十个同案犯人,已经判决解到这里执行的,从其他部分纷纷调到这里,一号监三楼西部来,其中有蒋振东,也有何资深,我们囚室的门都不关,我们走出门外看这些新来的人。我莫名其妙,便问尹宽:“把我们调来干什么?”尹宽说:“来学习么!”然后,我知道,尹宽比我更有经验。原来,国务院有命令给各地专政机关,组织托派犯人出去参观,参观后学习。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十二三人。起初几天漫谈,七月五日起出去参观:工厂、商店、高级合作社、文化宫、展览会、体育场等等。大约参观了一个星期。以后就开会学习。最后,写总结。直到八月十二日才结束。集中起来的人,又调散了,我们几个尚未判刑的人仍旧解回看守所去,但不是回第一看守所,而是去第二看守所。这年九月间,我们又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学习一次,此次则是学习八大文件的,同时去人民广场参观了国庆节群众大会和游行。

在集中学习期间,监狱囚室的门白天一般是不关闭的。我们可以走到门外走廊上来。所以我虽不同尹宽住在一个囚室,仍有机会说话,一两句简单的话也可以交换各人的思想。即使囚室的门关着,我们也可以站在门后大声交谈。

我和尹宽两人不是分配在同一个小组,但我可以通过与尹宽同小组的人知道尹宽在小组发言的大意。尹宽被捕初时大概采取

了抵抗的态度,因此在合肥吃了苦头;解来上海后就软化了,就说了认罪一类的话,因此对他管理放松了一点,即不一定个人独处一室,也可以同其他犯人共处一室。不像我,除了集中学习时两人共处一室外,都是一人独处一室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斗争”以后才能同别的犯人共处一室。尹宽认罪以后仍旧得不到信任。因为容易看出他的认罪是假的。我那天夜里同他住在一室,谈话到深夜,以及以后几次见面交谈,我很满意:不管老朋友表面上怎样说,他的根本思想,即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仍旧没有改变。他仍旧与我有共同的语言。例如,我们谈到苏共二十大,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我说:“将来总有一天,斯大林的玻璃棺材要从列宁坟墓中抬走的”。尹宽说:“不要他们自己抬走,要别人去抬走。”这是表明他比我更加反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派,包含那些反对斯大林的斯大林派在内。又如(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事情),我们谈起当时的反右派运动时,他说:“所谓‘右派’,其实是拥护共产党的,反对共产党的人今天只会说恭维话,不会说批评话。”这些话都说得很好,都足以表明尹宽不管表面如何认罪,内心上决不认为自己有罪。

尹宽在小组学习中,据同组的人告诉我,他采取了这种态度,即:认罪,但不说或少说自己的罪,而说别人的罪。他在小组会上气愤地揭发彭述之和他那个组织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举出证据,说那次开“建党大会”,很阔绰,会后还办了酒席,大吃一顿。这些钱哪里来?还不是从国民党特务机关拿来的?他还举出一些他所接触的社会人士,说这些人就是特务。他以为如此一说,既可以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又可以说明他尹宽不是特务。他的“揭发”还是有分寸的。他始终没有说过王凡西、郑超麟、蒋振东以及所谓“少数派”也是特务。他不像另一些人说所有托派都是特务!但尹宽这种发言是有害的。我知道了,特别去找他,劝告他不要在小组会上攻击彭述之。他又在我面前说了彭述之许多坏话。我说:“这都是事实,但我们同彭述之之间的账,将来有机会时再算,我们不应

当在共产党的监牢内同彭述之算账。”他又谈起建党大会用的钱。我说：“这钱哪里来，我知道，我今天不告诉你，只要告诉你：这钱是清白的，与国民党特务毫无关系。”原来，尹宽确实不知道彭述之开大会经费的来源；他只设想决没有人拿出这许多钱给中国托派开大会，因此只能作出特务出钱的结论。

彭述之开大会，为了弥补老同志不跟他走或少跟他走的缺陷，不惜费尽力气从内地乡村把尹宽拉出来撑门面，并选他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给他房子住，介绍他到什么高等学校去教书，可是连大会经费从哪里来也不肯告诉尹宽！

一九五七年四月底，我和尹宽又从第二看守所解到提篮桥监狱去，在那里住了一夜，只为的去参观五一节大会游行，没有学习，参观完就直接回第二看守所去了。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我们两人又去提篮桥监狱集中，此次则是为了准备去上海以外参观的。我们只在那里住了三天就回第二看守所去，因为临时改变计划，不要我们两人去参观，别人都去了。先在上海本地参观，然后去北京、去东北、去武汉，回到上海。他们还要学习，写总结。我以后知道这件事，觉得不去很好；尹宽则提出抗议，责问为什么不让他去参观？

大跃进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关在第二看守所。尹宽生病，常去监狱的医院（即市监狱内八号监）疗养。我没有病或不知道自己有病，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也被送往市监狱医院检查身体，住十几日回来，有意同尹宽错开。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我又去医院住十几日，此次尹宽也在那里，我们就不错开了。尹宽同别的犯人共居一室，我则仍旧独居一室，我在那里的运动场上看见了尹宽，交换了几句话。我们已经有五年不见而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现在变成小老头！”尹宽先我回到第二所去。

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离开第二看守所正式转入上海市监

狱。尹宽不知何时转去的。他关在八号监，我关在五号监，其他同案犯人则绝大部分关在一号监。政府生怕我们两个老头子病死。八号监关的是病犯，他们有“营养饭”吃，即每星期有三顿，菜中放了一些肉片或肉丝，以后增加至每日一顿。五号监四楼东部有几个房间是康复的病人住的，也吃“营养饭”，我虽不是病人，也被照顾吃“营养饭”。我们这两个老头子，生活是受照顾的，但居住是隔离的。我仍旧单人居住，不参加其他犯人的学习。

如此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政府又对托派犯人采取新的措施：全部集中到一号监三楼，学习当时陆续发表的所谓“反修文件”。

我的衣物先由劳动犯拿到三楼上去，我本人在楼下等待什么。不久带我到监长办公室去，承办单位的李科长和一个女秘书先在那里坐着。尹宽走进来了，他比我先一步从八号监调到这里来；在他背后又来了两个犯人。我们四个人都尚未判刑。李科长训了话，主要是安排生活和学习的。他说：你们四个人编为一个小组，住在三楼东部，每人一个房间，指定其中一人（当然不是尹宽，不是我）为小组召集人；四人轮流当记录；政府要组织我们出去参观。参观回来要学习，要写总结；以后还有其他的学习。他指着旁边坐着一个矮子，告诉我们说：“你们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们这位陆同志提出。”

李科长训话后，我们就上三楼东部各人的房间去了。其中两人已经定居在这里，我和尹宽是刚来的，我们的房间连接在一起，站在房间口可以互相谈话。此时，我们的衣物已经放在各人房间里了。劳动犯小组长向陆主管报告，说尹宽的衣物中虱子很多，他们捉了一部分，尚未捉完；我的衣物中也有虱子，但比较少些。陆主管很重视此事，因为一号监夺得了流动卫生红旗，高挂在监长的办公室内；而我们两人是从别的监调来的。不久之后，我们两人的臭虫也消灭了。我们四个房间靠近前部，陆主管办公的阳台。我

们这一案的犯人,不论已判的,未判的,都属于寄押的性质,学习是公安局承办单位直接掌握的,生活条件承办单位也有权过问。有些看守曾告诉我们的同案犯人:“你们的事情,我们这里不能管,都要报告公安局。”因此,托派犯人在提篮桥监狱内占据特殊地位:我们可以同案集中一起,别的犯人则是同案分开;我们时常出外参观,别的犯人则不参观或很少参观。此时,提篮桥一号监的犯人比较少,三楼东部前面还有两三个空房间,我们四个房间后面还有更多空房间,过去才有犯人,他们大多是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的。我们的同案犯已经判决的,则关在同楼西部前面的几个房间,他们约有十几个人至二十人,也是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的。他们另编一个或两个小组。陆主管严格防止我们这两部分犯人互相接触。每日下去空场“放风”时,总是西部的犯人排在队首,东部的犯人排在队尾,可以互相张望,但不能说话。到了出外参观时,在汽车上,在行路中,在参观地点,我们互相混合,可以说话了,但都在政府工作人员监视之下,只能互相问好,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而已。我一句话不说,即使我要同西部的人说话,他们也不敢理我。

出外参观约一个星期;参观了什么,我今天记不起来。我对于参观毫无兴趣。一次,在什么工厂参观了车间、机器、生产品等以后,到客厅长桌旁坐下听厂里负责人报告本厂历史和现状,最后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刑期即将届满的谢公墨,忽然提出工资基金占生产总额的百分比,以及工人平均工资的问题,可是得不到回答。我几年几次出去参观,政府工作人员多方鼓励我提出问题,我始终未提一个问题。我所感兴趣的,不在于厂房、机器、产品之类,而在于生产的工人对于生产的管理和计划究竟有多少发言权;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 M/V 究竟是多少? 而这一类问题是问不出来的,也是不该问的。

参观以前,我们的小组就开会学习了。先是漫谈,我提出我不能当记录。尹宽问我:“你说什么?”原来,在楼下监长办公室李科

长训话时,说四个人要轮流当记录,这话尹宽没有听进去,现在弄清楚之后,他赶紧说:他也不能当记录,“我自己发言也不能写出,怎能记录别人的发言呢?”以后小组长向陆主管汇报,就免除我们两个老头子的记录任务了。尹宽要求发给马列的古典著作,说他学习会发言时是要“引经据典”的。小组长说他身边有一些马列古典著作,可以借给我们看。

学习之外,关在各人房间内,我和他也可以站在门口谈话,自然没有同住一个房间时那样谈得痛快。他说,他在狱中作了几首旧诗词;我说,我也作了几首旧诗词。于是我们两人各抄几首交换着看。他的旧诗词作得实在不高明,我同从前一样老实告诉他:“你的诗词,平仄不合,用韵也不对,完全不行。”于是他争辩起来:为什么要讲平仄?为什么不可以用今天的读音为韵?我知道同他争论下去是徒费口舌的。反之,他称赞我的一首《绛都春》词,说简直像李后主做的。词中有几句:“憔悴,鬓皤腰瘦,幸方寸未乱,是非能理。”他说他建议改一个字,即把“幸”字改为“恨”字。最后两句是“词成付与秋坟,赚谁落泪!”他问我“秋坟”二字是什么意思?我于是解释给他听。总之,他欣赏的是词的内容,我倒喜欢别人注意我的格律和韵脚。

以后,我们出去参观。但参观未完,有一天各人关在房间,他忽然从隔壁房间喊我:“超麟,我要死了!”我说:“胡说!”他说:“心里慌”。于是小组长报告三楼看守,去找医务犯张辅卿(广慈医院的外科主任)来,张辅卿带他去狱内医院看病。我看见他跟着张辅卿走去的。不久劳动犯来收拾他的衣物,拿走了。我们知道他住到医院去。过了几天,医院派人来给他居住的房间消毒。我想,尹宽死了。

参观后期就没有尹宽,参观后的学习和总结也没有尹宽,以后的反修文件学习也没有尹宽。很可惜!我看出尹宽在此次学习中准备说许多的话。他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思一定有许多话可说。我

自己就是决定利用此次学习的机会把我这几年形成的系统思想说出来的。我希望尹宽能够听到我的系统思想,也希望我能够听到尹宽的系统思想,可惜都不可能了。

我积极参加了反修文件的学习,从世界革命总路线起,通过一评、二评……到十评为止。十评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才发表的。学习完毕之后都要写总结。我则把我的总结系统地写成八万五千字的小册子,书名为《干部主义论》,交给承办单位。

我认定尹宽已经死了。监狱管理很严,住院的犯人是死是活,无从知道。我写了一首《感皇恩》词“悼尹宽”。这词,同我在狱中写的约四百首旧诗词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收了。出狱后我只追忆出约十分之一,这首悼尹宽的《感皇恩》词,追忆不出来。为什么用《感皇恩》调呢?因为辛弃疾悼他的好友朱熹的词用的是这个调。朱熹死于“伪学之禁”时期,辛弃疾只能用隐晦的字句写悼词。

想不到我写悼尹宽的词时,尹宽尚未死。真是“东坡海外之谣!”我写悼词之后一年又四个月,即一九六五年十月,某一天,承办单位李科长忽然到监狱来,召集我们一案的所有犯人到一号监门口集中,向我们宣布:政府决定释放尹宽回家,明天就交给他的女儿带去,现在特来让我们同尹宽见一面。我吃了一惊:原来尹宽还未死!不久一个犯人用轮椅把尹宽推来了,大家走去同他握手,他都不认识,连蒋振东同他握手,他也不认识,但我上去握手时他却认识了,李科长叫尹宽讲话。显然是准备好的话,他讲出来还是有条理的。大意是说我们错了,接着劝告我们好好改造,改造好,政府会释放我们的,他就是现成的榜样,等等。说了话之后,李科长便叫那个犯人把尹宽推回医院去了。李科长然后叫我们每个人谈感想。这事情是摆得很明白的,但谁敢把心里想到的话谈出来呢?只好顺着政府的意思谈几句。我有意留在最后谈。

在我谈话以前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是同案犯人中最靠拢政府的,又自命为最聪明的籍云龙,在发言以前先问李科长:尹宽是释

放的呢,还是保外就医的呢?我心里暗笑。我想,你这个聪明人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愚蠢问题!李科长反问他道:“你看呢?”籍云龙然后作出政府所希望的发言。

最后,我不能不说了。我说:“几年前我曾对承办单位派来提审的人说:张芬神经失常,尹宽一身是病,关下去是要死的,这两个人都有儿女,都有温暖的家,应当放他们回家去。他们的病就会好的。张芬的刑期早已满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但今天你们释放尹宽回家了,这正是我一向所希望的,虽然不一定是我几年前的要求今天发生效力。”

李科长没有发脾气,只冷冷地说道:“哼!你几年前的要求!”“哼!你要尹宽释放回家!”……

此时,我仍不参加小组学习,因之没有为这几句话受到批判。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斗争时,也没有提出我这天的发言作为罪状。

李科长事先训话时曾告诉我们:尹宽的女儿此次是从家乡来“接见”尹宽的,我们告诉她政府明日释放尹宽,让她带回家去,她着急起来,说带来的路费不够。我们说:“你放心,我们会派人同你一路送他回去的。”

我断定,尹宽回到家里就会死的,如果不是死在路上的话。我们无法打听到尹宽的死活消息,因此每逢外调人员来问我尹宽的下落时,我总是说:尹宽死了,一九六五年就死了。

谁知此次我又错了。尹宽回到家中,改变了生活条件,慢慢地好起来,能够带着孙子在屋外散步,再活两年,到一九六七年才死。那时已到“史无前例”的时期,但他未曾挨斗,还来不及挨斗。一九八二年,我才同尹宽的家属取得联系。

我从尹宽的女儿还知道了一件事,李科长问她:“你父亲回去生活有问题么?”她回答说:“我们家里养得起他的。”李科长说:“那就好。”尹龙珠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她愁父亲回家没有路费,

她又不愿靠政府出钱来养父亲。尹宽倒想到出狱之后自己的生活问题。他问李科长：“我回家后生活怎么办？”李科长说：“我已经同你的女儿说好了。”尹宽回到家里，才知道政府把他的生活完全交给他的女儿负责。在那“史无前例”的几年，他虽来不及挨斗，但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恶劣下去，最后他感叹家里的生活还不如市监狱里的生活，但已经无法可想了。这完全出于我想像之外。一九六七年，与其说他死于老病，宁可说他死于营养不良，死于饥饿！（1988年，对尹宽去世另有新说，但我已无力去证实了。）

如此完结了一个革命家的一生！他是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徬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斯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四日